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近代史

BOOK
网络资源 中国风

前 言

本书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统设课教材，其编写是从电大教学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吸收近年来世界近代史研究的成果，系统地阐述世界近代史的历史线索，以期达到使学生了解资本主义的确立与发展的目的。

本书力求突出重点，史论结合，着重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各个问题，培养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书适合电大和各类成人高校文科教学使用，也可用作普通高校教材。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

王建吉：第一、三、四、五、六、七章。

乔明顺：第九、十、十三（第一、三节）、十四、十六、十七、十八（第二、三节）章。

吴筑星：第二、八、十一、十二、十三（第二节）章。

田仲文：第十五、二十章。

厉永平：第十七、十八（第一节）、十九、二十一章。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谬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同行及学员们批评指正。

乔明顺
1993年10月

第一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革命前的英国

资本主义的发展 17世纪的英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在全国的500万人口中，城市居民约为1/5，封建的农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从15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后，英国的工业获得了大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作为英国“民族工业”的呢绒业，发展得最快。16世纪初，在呢绒业中出现了分散的手工工场，并很快在全国农村普及。到17世纪初，呢绒业中又首先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集中的手工工场，有的工场雇工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之多。

随着英国呢绒业的发展，羊毛需求量激增，羊毛价格飞涨，使英国农村中的养羊业迅速地、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一些封建贵族地主开始圈占公有地，并将其变为牧场。尔后又开始大量圈占公簿持有农的土地。贵族地主圈地后很少自行经营，往往将其出租给农业资本家，以获取丰厚的地租，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始于13世纪，那时仅仅是英国农村中的局部现象。到16世纪之后，圈地运动则几乎波及了英国东部和西南部大部分地区。

圈地运动是贵族大规模剥夺农民的一种方式，也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之一，它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英国农村几乎变成了羊的世界。失去土地的农民部分成为农场的雇佣工人，更多则流入城市，成为自由劳动者，使英国实现了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的国家。

圈地运动另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使资本主义深入农村。由于封建贵族地主将圈来的土地大部分租给农业资本家，收取资本主义地租，从而逐渐破坏了英国农村的封建庄园土地制度，使英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日趋瓦解。依靠传统封建方式收取地租的旧贵族，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已无法维持其往日的的生活方式，只好出卖土地。由此可见，圈地运动也是英国农村封建剥削方式向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转化的重要原因。此外，圈地运动也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资本主义工业扩大了国内市场。

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海外掠夺和殖民侵略。从16世纪末开始，英国建立了许多从事掠夺的公司，其中最著名的有1579年建立的东陆公司，1588年建立的非洲公司和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特别是东印度公司，完全垄断了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英国的海外贸易还具有强烈的海盗掠夺的性质，各个海外贸易公司的据点，同时也进行海盗掠夺。在进行海外贸易和海盗掠夺的同时，英国在亚洲、非洲以及北美、西印度群岛等地进行疯狂的殖民侵略，在这些地区建立了许多殖民据点，掠夺当地人民的财富。

海外贸易，海盗掠夺以及殖民侵略，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它的发展。16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已经由羊毛出产国变成了呢绒成品输出国。其它如采煤、冶金、造船、造纸等行业也发展起来。17世纪初，英国已经出现了50多个集中的手工工场，分散的手

工工场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总之，尽管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英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农业国，但由于资本主义深入农村，使封建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的破坏，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阶级关系的变化 革命前的英国，由于经济上的变动，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强大起来，成为英国社会中最富有的阶级。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由不同的阶层组成。那些从事金融业的资本家、经营特许公司的大商人，以及王室的税人构成了大资产阶级。他们手中都掌握着大量的资金，并与封建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联系。虽然他们也要求改变和提高政治地位，但反对有激烈的变革，因此，在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大资产阶级对封建统治者的态度相当暧昧，在行动上表现得十分动摇，是资产阶级中的保守集团。英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主要由非行会型的手工工场的场主、经营资本主义农场的农业资本家、城市中的商人、殖民地的业主和商人组成。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力，经济上不仅要受封建王室的剥削，同时还要受到封建行会组织和特许公司的排挤。因此，他们要求废除国王专卖制度，实行自由贸易，废除封建特权和行会制度。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因此，在革命中，他们与新贵族结成了联盟，共同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的新贵族最初是在旧的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主要成分是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和骑士。他们除了经营土地外，还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圈地运动中，他们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并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经营农场。此外，新贵族还包括那些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牧场和农场的大贵族，在圈地运动中通过购买土地，成为新地主的商人和金融资本家。新贵族尽管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但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限制，还必须履行许多封建义务，如缴纳“骑士捐”等。因此，他们与资产阶级一样，与封建制度有着尖锐的矛盾。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新贵族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这个联盟决定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性。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

革命前，英国的农民主要分为三个阶层，自耕农、公簿持有农和茅舍农。自耕农是一直保持自由民身份，经营自己的土地的农民。在经济上较为独立，封建义务也比较轻。在圈地运动中，这一阶层中的许多人参与进去，成为农场主。公簿持有农由获得人身自由的农奴组成。在15世纪农奴解放后，原有的场地变成了领主租佃给他们的土地。公簿持有农的土地须经庄园法庭登记，不能自由支配，除向领主交纳地租外，还要负担许多封建义务。实际上仍处于半农奴的地位，革命倾向强烈。茅舍农是英国农村中最为贫困的阶层，他们依靠公有地从事养羊维持生计。圈地运动后，他们的生活更趋恶化，许多人沦为雇佣工人，因此，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革命性最强。

在城市中的平民，主要包括手工工场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工匠、水手、码头工人等。他们身受封建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力和自由，经济上则难以为生，因此，他们是资产阶级中革命性很强的一支力量。

17世纪中叶，尽管英国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的母腹中

已经孕育成熟，但以国王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地维护封建专制制度，采用各种手段，残酷压榨广大劳动人民，压制和阻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只有革命，才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摧毁封建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扫清道路。

清教运动 在英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的宗教改革完成。从此，英国国教代替了天主教的地位。英国国教基本上保留了天主教的教义和祭祀仪式，并保存了教阶制度。英国国教与天主教最大的区别仅在于，教会隶属于国王而与罗马教廷无关。英国国教完全由国王控制，规定国王为最高宗教领袖，主教要由国王任命。因此，国教拼命宣扬君权神授，从而给封建专制制度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英国国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

16世纪60年代，卡尔文教传入英国。卡尔文教宣扬，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上帝赋予其选民的神圣使命，只有那些发财致富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卡尔文教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反对宗教仪式中的繁文缛节，要求取消教士的特权。卡尔文教的教义，适应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因此受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以及广大下层人民的拥护，成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反对封建制度的精神武器。卡尔文教传入英国后，被称为清教，这是由于英国的卡尔文教徒要求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而得名。因此，英国的卡尔文教徒又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猛烈抨击国教教会中的腐败现象，提倡教士和教徒应过“严肃”、“节俭”的生活，提出建立“纯洁教会”的主张。清教徒主要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和下层劳动人民。他们身着黑衣，举止岸然，生活节俭，反对一切游乐和嬉戏。实际上，这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代所希望的，将一切时间和金钱都用于扩大再生产，发财致富的理想化的生活方式。

清教徒以其实际行动向人们表明他们的主张。他们到处抨击教会的等级制度，宣传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号召反对国王作为教会的首脑，要求教会组织民主化。清教徒的主张表明了处于上升阶段资产阶级的宗教和政治态度。在清教的旗帜下，集合起一切反对封建制度的人们。作为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清教起到了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的作用。因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清教的外衣下发动起来的。革命披着宗教的外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在反封建斗争中，由于社会各阶层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不同，清教徒逐渐分裂为两大派别，即长老派和独立派。长老派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的利益，反对由国王任命主教，主张按照卡尔文教的教义改革教会，要求由选出的年长者（长老）管理教会，并由长老组成地方和中央的教会会议，希望能够参与国家事务。独立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等新贵族的利益，要求严格的政教分离，并主张每个宗教团体独立自主，反对设立长老，提倡每个教徒都应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圣经，使教徒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17世纪初，清教徒的力量得到发展，许多下层劳动人民也加入了清教徒。但是，在后来的革命中，由于宗教上的分歧，长老派与独立派形成了两个政治上对立的派别。

专制制度的危机与革命形势的成熟 1603年，都铎王朝的女王伊丽莎白去世，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六世即位，是为詹姆斯一

世，从此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格兰的统治。詹姆斯一世上台后，极力加强专制王朝的统治，大力宣扬“君权神授”之说，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具有凌驾法律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国家事务无论巨细，都应由国王决定。同时他还宣布任何人议论上帝就是渎神，议论君主就是叛乱。

随着资产阶级新贵族经济力量的壮大，他们对詹姆斯一世加强专政王权的措施愈益不满，开始利用国会作为阵地，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

英国国会形成于13世纪，分为上院和下院。国会的上院主要是由国王任命的大贵族、高级教士组成。下院主要是由富裕的乡绅组成。16世纪之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下院已经占有大量的席位。下院的主要权力是批准征税，如无下院的批准，国王无权征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

詹姆斯一世宫廷生活十分奢华，王室领地和骑士捐已无法满足其需要，便要求下院同意他征收新税，但是下院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因此，他便解散了国会。从1614年起，英国国会一连七年没有召开。在这期间，詹姆斯一世拼命搜刮钱财，增加王室收入。此外，他还推行特许权和宫廷日用品采买优先的政策，规定商人只有从政府用重金购买特许权后，才能贩卖某些商品，包括许多种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宫廷可以优先采买任何商品，然后便以高价抛出，从中牟利，而商人在获得专卖权后，也以商品原有价格的几倍卖出。由于出卖特许权，王室每年获得了巨额收入。特许权政策的推行，少数与宫廷联系密切的大商人和宫廷贵族集团发了横财，但一般的工商业者则不能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收入锐减，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财，詹姆斯一世还公开地出卖爵位。此外，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詹姆斯一世还对英国的夙敌西班牙采取友好政策，极大地影响了资产阶级向外发展。詹姆斯一世的倒行逆施，使英国国内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

1625年，詹姆斯一世死去，其子查理即位，被称为查理一世。查理一世继承了其父的所有政策，骄奢淫逸则超过乃父。为了满足王室无止境的挥霍，查理一世即位后不久，便下令向富人借贷，并逮捕拒绝借贷的人。为了抵制借贷，国会于1628年召开会议，通过了《权力请愿书》，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征税和向人民借贷；未经法庭判决，不得随意逮捕任何人和剥夺他们的财产；不许在居民家中驻扎士兵等。同时，国会还决定拨款35万镑作为国王接受请愿书的条件，查理一世迫于压力，勉强接受了请愿书。

1629年，由于国会拒绝授予查理一世终身征收磅税（羊毛出口税）和吨税（酒类进口税）的权力，又与查理一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因此，查理一世下令解散国会，并停止召开国会有11年之久。在国会被解散期间，查理一世变本加厉地搜刮人民，恢复了早已废弃的“船税法”，并将大批的生活用品纳入专卖的范围，致使物价飞涨，生活用品极为短缺，使人民对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更为不满。由于人民贫困，购买力日益下降，也造成了许多生产部门的萎缩，给许多工商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无国会期间，查理一世继续推行迫害清教徒的政策。他指使国教的大主教劳德可以用任何名目逮捕清教徒。在此期间，重新恢复了英国教会的高级法院和星室法庭，不断地审判清教徒，每天都有清教徒被判

监禁，或处以罚款。凡是对国教稍有微词者，随时都有被捕入狱的危险。为了逃避迫害，从1630—1640年的10年中，逃往海外的清教徒达6万多人。

查理一世的倒行逆施，使英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城乡人民的起义、暴动时有发生。如1632年和1638年剑桥郡的农民反圈地起义，1639年和1640年伦敦发生的失业的手工业者、工人的暴动，1639—1640年的林肯郡的农民起义等。尽管这些起义和暴动都被镇压下去，但预示着大规模的革命风暴的到来。查理一世同时又是苏格兰国王，他也将其在英国的政策推行到苏格兰，从而引起了1637年的苏格兰起义。起义爆发后，为了筹措大批军费，查理一世不得不重新召开国会，企望借助国会帮助，来达到扩大税收的目的。1640年4月13日，新国会召开。但是，新国会一召开便激烈地抨击查理一世的暴政，因此，查理一世便于5月5日又解散了国会。由于这次国会仅存在三个星期，史称“短期国会”。

“短期国会”解散后，苏格兰的人民起义此时也更加激烈。走投无路的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召开国会。这一切表明，以查理一世为代表的英国封建专制统治已经陷入了深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第二节 1640年至1649年革命

长期国会与内战的爆发 1640年11月3日，新国会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这届国会一直存在了13年，史称“长期国会”。在长期国会的下院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议员占多数席位。因此，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以下院为阵地，与国王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641年5月，国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通过处死国王宠臣斯特拉福的决议，因为他是一系列暴政的主要策划者。查理一世企图救出斯特拉福，在国会的决议上拒不签字。愤怒的伦敦人民走上街头，连夜举行示威，并宣布要冲击王宫。至此，查理一世被迫同意在国会的决议上签字。5月12日，斯特拉福被处死。

长期国会的行动，不但表明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斗争到底的决心，也显示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控制国家政权的愿望。因此，长期国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长期国会取得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胜利。1641年2月，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国王不得随意解散国会和干涉国会的事务。查理一世被迫在法案上签字。同年6月，国会又通过决议，宣布不经国会批准，任何人不得征税，并废除磅税和吨税。同年7月，在国会压力下，查理一世被迫宣布解散星室法庭和高级法院。同年8月，查理一世又宣布取消商品专卖政策。

1641年11月，国会又通过了《大抗议书》。《大抗议书》是长期国会与国王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最重要的文件，也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大抗议书》全文共有204条款，其主要内容是要求自由发展工商业，建立对国会负责的政府，建立长老会制的教会组织，国王只能从国会相信的人中任命高级官员，废除一切封建特权等。《大抗议书》的出现，表明资产阶级新贵族已经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查理一世拒绝了《大抗议书》，又借口保卫国会，派兵把

它包围，并亲自带兵到下院逮捕了皮姆和汉普顿等 5 名激进派议员。国王的行动引起伦敦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国王的暴行，并自动组成民兵保卫国会。查理一世感到自己的处境危险，遂于 1642 年 1 月 10 日从伦敦出走，来到封建贵族势力强大的约克郡，并在那里招募军队，准备讨伐国会。国会于 7 月 12 日通过决议，决定组织国会军，保卫国会和自己的权力。至此，国王与国会的分裂终于公开化。8 月 22 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城堡上升起国王的军旗，宣布讨伐国会。从此，内战爆发。

第一次内战 内战爆发后，英国国内明显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拥护国王的旧贵族、官僚、国教教士的保王党，由于他们头戴假发，身佩长剑，所以被称为“骑士党”。另一方面是以国会为首的革命阵营，其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大多数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由于他们不戴假发，因此被称为“圆颅党”。

内战开始后，国会军尽管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在军事上却一再失败。1642 年 10 月，国王军队在埃季山大败国会军，并占领牛津。随后兵分三路直趋伦敦。只是在伦敦各阶层人民组成的民兵英勇抵抗下，国王军队才被迫撤离。1643 年夏季，战场上的形势仍对国会军队不利，国会军曾经占领的约克郡、林肯郡、德比郡等地先后失守。

国会军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掌握国会大权的元老派的动摇和妥协。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新贵族的元老派，始终持有正统的君主主义思想，他们只是希望国王能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允许他们发展资本主义企业，而不想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因此，他们在与国王军队交战的同时，又念念不忘自己是国王的臣属。从而在军事上就表现为动摇、软弱的失败主义，认为国王是不可战胜的，期望通过谈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国会军司令曼彻斯特伯爵在回答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的指责时说：“即使我们将国王击败 99 次，他还是国王，但如果国王击败我们一次，我们就得被绞死，子孙后代就得沦为奴隶。”正是这种君权神权的思想，导致了战场上的退却和失误。

在与国王军队的斗争中，独立派首领克伦威尔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日益显露出来，逐渐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克伦威尔是剑桥郡经营牧场的地主，新贵族中激进的革命家，曾参与起草《大抗议书》。内战后，他便组织了一支由自耕农和城市贫民为主要成分的骑兵部队。该部队士兵都是虔诚的清教徒，且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在国会军屡战屡败的情况下，这支军队却不断获得胜利。1644 年 7 月，克伦威尔的部队在马斯顿草原大败王军，取得了国会军开战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战役后，其部队被人们称为“铁军”。战局开始向有利于国会军的方面发展。

国会于 1644 年 12 月通过《自抑法》，规定凡国会议员都要辞去军职。又于 1645 年 1 月通过了《新模范军法案》。法案规定，建立一支以克伦威尔铁军为模式的新模范军。新模范军的编制为 22000 人，其中骑兵 7600 人，步兵为 14000 人；军费由国家预算中拨出；军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军服；实行募兵制，以保障兵源。

国会又于 1645 年 6 月通过决议，决定克伦威尔以议员身份仍留在军队。从此，军队的指挥权完全控制在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手中。随

着军权转入独立派手中，战局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645年6月，国会军在纳斯比大败国王军队。随后又攻占了由国王军队控制的许多地区。1647年2月，苏格兰人以40万英镑的代价，将逃到苏格兰的查理一世献给国会，国会将其囚于赫姆比堡。3月，国会军攻占国王军最后一个城堡，至此，第一次内战结束。

长老派、独立派和平等派之间的斗争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资产阶级新贵族夺取政权的斗争已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如何巩固政权，改造旧的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当时革命阵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各个政治派别在这个问题上，从各自代表的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内战胜利后，长期国会在长老派的领导之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造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首先宣布废除主教制，全国一律遵奉长老会的宗教信条，这实际等于宣布长老派教会已经取代了国教的地位。同时，教会的什一税也被保留下来。尽管这一政策的实行对长老派有利，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摧毁英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确立清教在英国的地位的作用。其次，长期国会颁布废除查理一世实行的专卖特许权和船税，保留海外贸易公司和包税制，对日用品征收间接税以保证国库收入，以及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自由贸易的法令。再次，在法律上承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土地的私有权，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1643年3月和9月，长期国会分别宣布没收国教教会和内战中站在国王一边的贵族的土地以及王室领地，于1646年全部进行拍卖，这些土地绝大部分都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同年，长期国会又宣布废除“骑士领有制”，彻底取消了土地所有者对国王的封建义务和从属关系，使土地完全成为其私产。但农民对于领主的封建义务并未随之取消，同时还须继续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国的农民尽管曾经为之英勇战斗，但得到的却是更加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从此，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地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制。土地的绝对私有制，使圈地为核心的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畅通无阻，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贫困和破产，成为雇佣劳动者，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

长期国会的长老派政策，由于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国家的表现，必然要损害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引起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不满。同时，长老派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也与独立派的主张形成了冲突。在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方面，长老派与独立派虽有分歧，但仅仅是手段和方法方面的不同，主要的矛盾在政治方面。内战后，独立派领导的军队由于战绩辉煌，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独立派不满长老派独揽政权的现状，要求与长老派享有相同的政治地位。因此长老派将独立派以及独立派领导的军队，视为比国王还要危险的潜在的敌人，处心积虑想消灭之。1647年，国会通过了解散军队的决议，长老派企图通过这一决议，达到瓦解独立派力量，并消灭正在军队中兴起的平等派运动的双重目的。

平等派是由手工业者、自耕农、小商人为主要成分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该派的领袖是约翰·利尔本（1618—1657年）。利尔本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当过商店的学徒。青年时代曾因散发清教书籍

而被捕入狱。内战爆发后，参加国会军，因战功卓著而累迁至上校军衔。1645年，利尔本开始发表反对长老派政策的言论，并写了许多关于民主和反对“暴君”以及“新暴君”的小册子。不久，他被长期国会逮捕。平等派的政治纲领是实行普选制，废除君主制和贵族上议院，建立民主共和国。此外，平等派还坚决主张取消商品专卖制度，制止圈地，废除什一税，保证人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以及信仰自由等等。平等派的主张，受到了军队中士兵们的欢迎，因此，平等派运动首先在军队中展开。士兵中选出了“鼓动员”，建立了“鼓动员委员会”，在军队中广泛宣传平等派的主张。

1647年2月，长老派决定解散军队的消息传出后，士兵们更加愤怒，他们坚决拒绝解散，并组织了“军队委员会”上书抗议。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军队中高级军官，最初曾在长老派解散军队决议公布时一度动摇，并反对士兵的行动。但是在看到整个军队由此可能瓦解的情况下，又转而站到士兵一边。6月2日，克伦威尔将被俘的查理一世劫持到部队驻地纽马凯特，并于6月5日召开“全军会议”，会议由独立派代表（军官）以及平等派代表（鼓动员）参加。这是独立派和平等派暂时合作的标志。长老派为了挽回失败的局面，不久在国会通过决议，解除所有独立派分子在军队中的职务。克伦威尔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击。8月6日，克伦威尔率军进入伦敦，清洗了长期国会中的11名长老派首要分子。独立派从此控制了国会。

独立派取得国会的控制权之后，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统治，并以在开进伦敦之前发表的《军队建议条目》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这一文件提出，保留君主制和上院，实行有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由国会产生的国务会议掌握宣战、媾和和外交大权。克伦威尔还曾以此文件同查理一世谈判，表示独立派也是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平等派针对独立派与国王的勾结，很快作出强烈的反映。10月10日，平等派针对《军队建立条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人民公约》。在人民公约中，平等派要求实行普选权，在普选的基础上成立一院制的国会，建立共和政体。11月末至12月初，独立派与平等派的代表在“全军会议”上就政体和普选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独立派的代表主要有克伦威尔和爱尔顿，平等派的代表主要有雷因波洛、塞克斯比。独立派坚持认为由普选产生的共和政体势必将破坏“合理的”贫富不均现象，废除君主制，将使国家崩溃。认为有限制的君主制，符合“社会契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平等派代表在发言中则坚决要求废除君主制，因为君主制是与主权在民学说格格不入的。辩论最后陷入了僵局。11月15日，9个团队的平等派士兵举行和平示威，要求克伦威尔等人接受“人民公约”，结果遭到了独立派高级军官们的严厉镇压，14名平等派的积极分子当场被逮捕，其中3人被判处死刑，1名被就地处决。平等派运动遂告失败。

平等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斗争使广大城乡的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治积极性，对于英国革命的下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次内战与共和国的建立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使保王党获得了喘息和东山再起的机会。1647年11月，查理一世在长老派分子的帮助下，逃出监护所至威特岛。保王党人则与苏格兰国会中掌权的长老派极

右分子谈判并达成协议，由苏格兰出兵帮助查理一世复位，解散国会军，建立长老派教会。1648年2月，王党在南威尔士、肯特郡和北部诸郡掀起叛乱，第二次内战爆发。

第二次内战爆发后，长期国会中的长老派分子趁机又控制了国会，利用权力阻挠军队镇压王党叛乱，在军事供应方面制造困难。王党的叛乱和长老派分子的叛变，使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上层集团对国王的態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克伦威尔发表讲话，指责查理一世是骗子，宣称没有国王统治的国家也是合理的。这样，独立派开始向平等派的主张靠近。为了抗击王党的叛乱，独立派又一次与平等派联合。1648年4月，独立派与平等派达成协议，表示双方要联合起来，粉碎叛乱，审判查理一世，实行《人民公约》。7月，苏格兰军队越过边境，侵入英国北部地区。8月，克伦威尔在普莱斯顿战役中粉碎了苏格兰军队的进攻。9月，克伦威尔的军队占领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第二次内战结束。

第二次内战结束后，独立派和平等派都意识到要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首先应该推翻长老派的统治。1648年12月6日，普莱德上校率军队包围了国会，逮捕和驱走了143个长老派议员，国会只剩下50多名支持独立派的议员，此后，长期国会又被称为“残阙国会”。

长老派的统治垮台后，如何处理国王又成为全国瞩目的问题。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和士兵，强烈要求审判国王。在人民的压力下，1648年12月23日，克伦威尔下令将查理一世押解到温莎城堡，等待审判。1649年1月1日，国会通过决议，成立特别法庭，审判国王。1649年1月27日，特别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的敌人”的罪名判处查理一世死刑。30日，查理一世在成千上万的群众围观下，在白厅前的广场被处以死刑。

1649年3月，国会通过决议，宣布废除君主制，取消上院。5月19日，国会宣布英国为共和国。

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和共和国的成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达到最高峰的表现。在这场革命中，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共和国虽然建立了，然而这个共和国只不过是以独立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进行专政的新形式。独立派根本就不是共和派，因此，在他们的统治下，自然不会实行主权在民的原则，也不会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在这个共和国中，更多的是暴力和高压。从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沿下降线发展，英国下层劳动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节 从共和国到1688年政变

共和国时期的人民运动 共和国成立之后，掌握政权的独立派，完全抛弃了在革命中做过巨大贡献的广大人民，一味地为自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谋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竭力镇压人民的任何要求民主的活动。

长期的内战，使英国的经济出现危机，人民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然而独立派仍继续因袭长老派的经济政策，既没有采取任何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也没有推行任何解决农民土地的政策。人民深恶痛绝的

消费品专卖政策此时仍然执行，获得专卖权的资本家任意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加之政府征收苛重的间接税，人民生活更为困难，城乡经济一片凋敝。反之，1649年国会两次通过决议，拍卖教会及国王和保王党人的地产，使大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这一切使人民群众日益不满，并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共和国时期影响最大的人民运动是掘地派运动。掘地派的主要成员是农村中少地和无地农民，其代表人物是杰拉尔德·温斯坦莱（1609—1652年）。温斯坦莱是一个破产的小商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因此十分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1651年，温斯坦莱发表《自由法典》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详尽阐述了掘地派的政治主张。他指出，人们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私有制，因此，消灭土地的不平均现象，取消地主的特权，实行土地公有制是广大人民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但是，温斯坦莱不主张通过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主张通过农民自己开垦荒地来实现土地公有的目标，掘地派便由此而得名。掘地派运动是具有原始共产主义倾向和反对封建剥削的人民运动，得到了许多农民的响应。1649年4月，大批农民聚集在萨里郡的圣·乔治山上进行垦荒，成为掘地派运动的发端。此后，在诺珊普顿、白金汉、肯特、格洛斯特诸郡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掘地派运动，掘地派运动使新贵族地主们大为恐慌，他们指斥掘地派破坏了土地私有制。1651年，克伦威尔派军队将这一运动镇压下去。

第二次内战后，平等派运动又发展起来。在第二次内战期间，为了共同对付王党和长老派的叛乱，独立派曾与平等派再次联合，并允诺实现《人民公约》。但是，在取得胜利之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建立的共和国，与平等派所希望建立的共和国大相径庭。于是，平等派再次起来斗争。1649年2月，利尔本发表了名为《粉碎英国的新枷锁》的小册子，并将它以请愿书的形式提交给国会。在这个小册子里，利尔本无情地抨击了独立派建立的共和国。他指出，新成立的国务委员会变成了一个“绝对的不负责任的机关”，号召人民起来“粉碎英国的新枷锁”——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的统治，为实现《人民公约》而斗争。1649年3月28日，长期国会逮捕了利尔本，并交由国务会议审讯，利尔本在狱中，又写了《英国人民自由公约》，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利尔本被逮捕的消息传出后，伦敦等地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请愿示威，要求释放利尔本。平等派于5月又发表了一个新的《人民公约》，提出了普选权、建立每年改选一次的一院制国会、行政和立法机构严格分开、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出版、宗教和贸易自由等口号和要求。新的《人民公约》集中体现了平等派在几年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所形成的全部政治理想，也是当时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5月中旬，平等派士兵发动了武装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9月，平等派士兵又一次起义，也遭到了镇压，平等派运动再次失败。

平等派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得到广大下层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支持，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忽视解决农民问题的必然结果。平等派运动的失败，使共和国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决定了共和国最后覆灭的命运。

征服爱尔兰 早在12世纪，英国就开始侵略爱尔兰，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英国在爱尔兰的东部和东南部建立起殖民统治。1641年，爱

爱尔兰人乘英国爆发革命之机，发动了起义，并宣布独立。由于不久英国爆发了内战，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无暇顾及爱尔兰事务。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英国的保王党人开始与爱尔兰人勾结，妄图以爱尔兰为基地，借助爱尔兰人的力量，恢复君主制。因此，独立派政府决定远征爱尔兰。但是，远征爱尔兰，粉碎王党阴谋并不是独立派政府的唯一目的。爱尔兰丰富的物产和肥沃的土地，一直为英国统治阶级所垂涎。出征爱尔兰，将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又一次大发一笔横财。此外，平等派运动失败后，军队中的平等派士兵一直心怀不满，因此，将那些对独立派充满仇恨情绪的士兵派到异国他乡作战，无疑是解除独立派政府心腹之患的一个极好的办法。

1649年8月，克伦威尔亲率大军在都柏林登陆，然后又相继攻陷了杜洛赫达和威克斯福德。此后，英军遭到爱尔兰人的凶猛抵抗。英军在爱尔兰进行了长达3年的残酷镇压，屠杀了几十万人，才最后征服了爱尔兰。独立派政府将占领的爱尔兰土地大部分以清偿债务和偿还欠饷的方式，分给军队军官士兵以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但是，爱尔兰土地上这些新的地主，却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建立农场，而是将英国古老的封建关系系统搬到爱尔兰，使原有土地上的爱尔兰人变成佃农，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

在征服爱尔兰的同时，克伦威尔又于1650年率大军远征苏格兰，平息了由苏格兰封建贵族发动的王党叛乱，苏格兰贵族拥戴的查理王子逃往法国。

英国远征爱尔兰，对英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许多资产阶级和军官成为爱尔兰的封建地主，许多平等派士兵也在这次战争中获得土地，从而完全丧失了旧日的革命精神，不再想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下去，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军事独裁政权保证他们在爱尔兰的封建利益，这就为日后的军事独裁的出现，提供了一大批有力的支持者，也使共和国覆灭的命运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共和国的覆灭 在英国革命和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中，广大的下层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场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却是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从而引起人民的不断反抗。1651年底，许多群众向军队递交请愿书，请求军队出面，要求政府减轻人民的负担。1653年，剑桥郡的农民举行了反对圈地和增加地租的起义，遭到政府镇压。在其它地方，也不断出现暴动和骚乱。在城市中，平民反对政府的赋税政策和奸商的巧取豪夺的斗争也时有发生。这一切引起了那些在共和国建立后获得了极大好处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巨大恐慌。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有强大武力支持的克伦威尔身上，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政权。

克伦威尔在征服爱尔兰之后，也得到了1000英亩的土地，成为爱尔兰的大封建主之一，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作为革命领袖时的意志。在镇压了平等派的起义之后，曾经反对他的长老派也转而支持他。1649年5月，由长老派把持的牛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克伦威尔此时也意识到，要保持和加强自己在英国政坛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依靠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实行军事独裁。

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强制解散了“残阙国会”。7月4日，

他又召集了新国会，议员都是他亲自圈定的其支持者。由于这届国会的议员只有 140 名，故被人称之为“小国会”。克伦威尔建立“小国会”的本意是利用它作为自己的御用工具，但是，由于多数议员不满意克伦威尔所实行的政策，并对此提出批评，克伦威尔于 1653 年 12 月又把这个小“小国会”解散了。

1653 年 12 月 16 日，在独立派军官和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的支持下，克伦威尔被拥戴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终身护国主，并颁布了作为宪法之用的《统治文件》，开始了英国近代史上的护国政治时期。《统治文件》规定，护国主兼任陆海军总司令，并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国会为一院制，国会议案须经护国主同意方能具有法律效力。至此，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统治建立起来，共和国覆灭了。

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 克伦威尔在建立军事独裁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统治。1655 年夏，他把全国分为 8 个军事行政区，各设总督一人，由高级军官担任。负责统辖军队、征税和监督居民等任务，为了确保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既得利益，他颁布了确认土地及其所属的一切权力归于土地主人，对于圈占的土地实行保护的政策。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严禁言论自由，任何传播民主思想的行为，都被视为异端，严惩不贷，其程度较之革命前的斯图亚特王朝更为严酷。

在对外政策方面，克伦威尔极力推行对外掠夺的扩张政策，以满足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贪欲。共和国初期，为了打击当时英国海外扩张的劲敌荷兰，在 1651 年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凡是进出口英国的商品，必须使用英国船只，否则禁止出入英国。1652 年，英荷两国爆发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护国主统治建立之后的 1654 年，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荷兰承认了《航海条例》，失去了海上霸权。1655 年，英国又与殖民强国西班牙发生战争，并获得胜利。随后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牙买加岛和有“欧洲大陆的钥匙”之称的敦克尔克。从此，英国海外贸易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英国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护国政治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夺取政权之后，为进一步巩固统治，稳定新建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政治体制。但是，作为这一社会秩序总代表的克伦威尔政权，是依靠武力和克伦威尔的个人声望才维持生存的，缺乏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这一统治势必是极为虚弱的。1658 年 9 月，克伦威尔死去，其子理查·克伦威尔继位为护国公。由于理查自认无能，于 1659 年 5 月辞职，政权落入高级军官们的手中。不久，高级军官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夺，并分成许多派别，从而使军事独裁统治逐渐松懈。同年 10 月，高级军官们组成了所谓“安全委员会”，护国政府的统治崩溃了。

1660 年的复辟 护国政府统治结束之后，英国政局又陷入一片混乱。各地的农民不断掀起反对当局和地主的暴动，军队中的士兵也出现了骚乱的迹象，高级军官们组成的“安全委员会”根本无法控制局势。鉴于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拒绝给政府贷款，使岌岌可危的英国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为了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他们极力寻求建立一个能够保障自己既得利益的政权。但在当时，英国已经寻找不出一个能够像克伦威尔那样的人物，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尚在国外流亡的查理王子，企图通过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来达到

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目的。

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复辟计划，得到了著名的君主主义者，驻苏格兰英军司令官蒙克将军的支持。1660年2月，蒙克率部队进入伦敦，大肆逮捕民主派人士，很快控制了局势。同时，他派人与在荷兰的查理王子谈判，达成了关于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协议。1660年4月4日，查理王子在荷兰的布列达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查理王子允诺在即位后不收回在内战中从王党和教会手里没收的土地，赦免所有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者，保证宗教信仰自由。5月1日，英国国会通过决议，迎立查理为国王。5月29日，查理回到伦敦即位，称查理二世（1660—1685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

查理二世复辟后，由于政权根基不稳，不得不迎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愿望，施行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如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英国海外贸易；扩大航海条例；对输入英国的一些商品收取高额的关税；颁布禁止雇工任意离开雇主的法令，以保证大农场主有足够的劳动力等等。但是，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实际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封建王朝在特殊形势下，由于共同的利益所达成的一种妥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决定了这种妥协只能是暂时的，双方的矛盾必然还要激化起来。

查理二世在政权巩固之后，马上便撕毁布列达宣言，宣布凡是参加审判查理一世的人，都是“弑君者”，一律处以极刑。后为又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参加革命的人，甚至将克伦威尔等人的尸体挖出来，然后枭首示众。查理二世为了恢复旧日的专制制度，重新恢复了上院和旧日的选举制度，以增强封建贵族在国会中的势力。为了获得法国的支持，查理二世将敦克尔克仅以20万英镑卖给法国，从而使英国商人失去了在欧洲大陆上的重要贸易据点。1670年，查理二世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签订了《都佛密约》，密约规定，查理二世在英国恢复天主教，法国在英国发生骚乱时，有义务派兵帮助镇压。1672年，查理二世颁布《容忍宣言》，宣布国王有权恢复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力，有权废除惩办天主教徒的刑法。查理二世的亲法政策和恢复天主教的企图，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极为不满，因为亲法政策使英国在海外贸易的竞争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恢复天主教实际就等于让那些在宗教改革时期，曾经收买了天主教教产土地的地主和新贵族归还这些土地。对于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来说，天主教会对于工商业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就更是难于容忍的。因此，当《容忍宣言》公布后，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在国会中便极力抵制，以至查理二世不得不废除了这一“宣言”。

1679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的斗争又激烈起来。由于查理二世无子嗣，其弟詹姆斯（当时封为约克公爵）便成为王位继承人。詹姆斯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即位之后，势必将恢复天主教。因此，为了防止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该年5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国会中提出《排斥法案》，提出取消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围绕这一法案，国会中分裂出两个党，一个是托利党，主要成员是封建地主和贵族，反对《排斥法案》；另一党是辉格党，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维护《排斥法案》。托利党和辉格党后来演变成保守党和自由党，这就是英国两党制的起源。1680年11月15日，下院通过了《排斥法案》，但上院却把它否决

了。此后，查理二世在 1681 年两次解散国会，并在无国会期间，残酷迫害辉格党人，迫使许多辉格党人逃离英国。

1688 年政变 1685 年查理二世死去，詹姆斯即位，称詹姆斯二世。詹姆斯即位后，马上宣布废止 1679 年颁布的《人身保护法》。同时，进一步加强同法国的关系，降低法国商品的进口税，以换取法国对他的支持。为了继续推行其兄恢复天主教的计划，他于 1687 年再次颁布《容忍宣言》，宣布以往反对天主教的一切法律均无效。《容忍宣言》的再次颁布，引起英国社会各阶级的一片惊慌，因为购买过天主教会地产的人不仅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也包括许多旧贵族的官吏，买地者遍布英国各地。因此，当《容忍宣言》颁布后，过去长期对立的各个政治派别和宗教派别，都在共同的利益关系之下携起手来，共同反对詹姆斯二世的统治。

1688 年，托利党和辉格党人决定联合举行政变，并在国会中达成协议，迎接有王位继承权的詹姆斯二世之女玛丽及其丈夫荷兰奥伦治亲王威廉为国王。玛丽信奉清教，威廉则是新教徒，这样做既可以杜绝天主教在英国复活的危险，又可以利用荷兰的军事力量，共同对抗法国的干涉威胁和镇压詹姆斯二世的反扑。

1688 年 11 月 5 日，威廉在荷兰海军的护送下，率领一万多名荷兰士兵在英国的托尔贝登陆。12 月 10 日，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12 月 18 日，威廉率领军队进入伦敦。1689 年 2 月 6 日，英国国会正式宣布詹姆斯二世“自行引退”，威廉为英国的新国王，称威廉三世。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 1688 年政变。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则把这次不流血的政变称之为“光荣革命”。

为了防止国王对国会的再度控制，英国国会于 1689 年 3 月通过了《权力法案》，规定此后英国的国王都必须是新教徒，国王只有在国会的同意之下才能够行使内政和外交权力。这一法案确保了国会的地位，限制了王权，从而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又一次跻身于统治阶级之中。从此，英国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 1640 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次革命打破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枷锁，建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居主导地位的政权，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奠定了英国在后来资本主义海外扩张中的霸权基础。这场革命对欧洲封建制度的打击也极为沉重，对于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以及欧洲各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影响极为深远，开辟了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属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因此带有浓厚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在这次革命中，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正是由于他们的力量，才使英国革命不断发展，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盟领导了这次革命，使革命后的英国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残余。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之为“清教革命”，显然是抹杀了这次革命的性质。尽管这次革命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是，在反对国教教会的口号下，实际上却掩盖着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推翻封建制

度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目的。因此，这场革命的目标始终对准以国王为首的封建专制制度，并且最终达到了目的。就其性质来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决不是一次宗教革命，而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一章。

乔明顺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一章。

王荣堂、姜德昌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第一章。

刘祚昌、光仁洪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第一章。

[美]帕尔默·科尔顿著：《近现代世界史》第八章。

周友光等主编：《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近代分册）第一章。

管敬绪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一章。

复习题：

1. 试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背景。
2. 试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3. 克伦威尔护国政权建立的历史条件及其性质。
4. 英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二章 17—18 世纪欧洲大陆的 主要国家

第一节 法国

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 1642 年黎塞留死去后，年仅 5 岁的路易十四（1643—1715 年）即位，但国家大权则由首相马扎然掌握。

1648 年，法国爆发了反对专制主义的“福隆德”运动。该年 5 月，巴黎高等法院联合各地法院通过决议，要求国王撤回派往各地的监督官，国王如要公布新税和其它财政法令时，须由法院审查登记，废除人头税和包税制，惩办贪官污吏与不法银行家，未经宣布罪状，不得任意捕人，被捕者需在 24 小时内交法庭审讯。马扎然下令逮捕高等法院中倡议福隆德运动的领袖。8 月 28 日巴黎爆发了起义。法王与廷臣逃往圣日耳曼，而后调兵围攻巴黎。1649 年 3 月起义被孔德亲王指挥的官兵镇压下去。1650 年，又爆发了投石党运动，该运动坚持了两年，于 1652 年也被镇压。

1661 年 3 月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亲政。法国专制主义进入鼎盛时期。路易十四凡事亲躬，把国家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宣称“朕即国家”，“法出于我”，声明不再需要首相，自己单独行使王权。路易十四每周 3—4 天召开仅由 3—5 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处理国政。路易十四还建立了内政、外交、财政、陆军与宗教委员会等机构，但这些机构只起咨询作用，决定权仍操于路易十四之手。路易十四宣布教士会议必须听命于国王，各大臣未经国王同意不得发出任何政令。1665 年又宣布，高等法院和地方高等法院不得讨论和表决国王的敕令。1664 年他派出官员到各郡整肃地方官吏，完善监督官制度以加强对各郡的控制。到路易十四亲政的后期，监督官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常驻各郡的行政官员。

路易十四针对当时法律混乱的状况，颁布了一系列新法律，即《民法》（1667 年）、《水利森林法》（1669 年）、《刑法》（1670 年）、《商法》（1673 年）、《海运法》（1687 年），以及关于殖民地奴隶的《黑人法》（1685 年）。路易十四凭借法治的手段有效地维持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秩序。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路易十四加快了军队建设。法国军队的人数由其执政初年的 8 万增至统治末年的 38 万人。将军中大批平民出身的有才干者提升为将军，既而又封为贵族。对一些具有反叛倾向的贵族则采用削弱军权的办法，并将他们置于负责陆军的国务大臣和他任命的监督官的监视之下。军队因此完全置于国王的控制之下。路易十四为了与英国海军对抗，在布列斯特、罗什福尔等地建立 5 个海军兵工厂。1681 年，法国已有战舰近 200 艘，海军 1.1 万人。路易十四还开办了几所炮兵学校，培养炮兵指挥人才，并在军队中建立炮兵团。

路易十四采取了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坚决推行者是其财政总监让·巴蒂斯塔·柯尔伯（1619—1683 年）。柯尔伯首先整顿财政，监督收税官吏，力求收支平衡，一年之内就使国库从亏空转为盈余。柯尔伯主张，要使法国富强，必须使对外贸易顺差，以增加国家的黄金储

备，为此必须鼓励国家工商业的发展。柯尔伯推行保护关税政策，以保护本国工业。他鼓励在法国生产威尼斯式的镜子和花边，英国式的长袜，荷兰式的呢绒，德国式的铜器。他招聘外国工匠，给企业主以专利和各种补助。在柯尔伯执政时期，开办了 45 家手工工场，使手工工场增加到 113 家。柯尔伯制定手工工场条例，对不合格产品给以惩罚。他取消国内关卡，改善道路，开凿运河。他创办垄断公司，包括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利凡特公司、北方公司，给这些公司以贸易垄断权，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柯尔伯竭力扩大海军，争夺海上霸权，以期建立一个法兰西世界帝国。他修造了 1000 多艘军舰和商船，并改造了马赛、罗什福尔、勒阿佛尔等港口设备。在柯尔伯执政时期，法国扩大了海外殖民地，在印度占领本地治理，在北美占领了路易斯安纳，在非洲占领了马达加斯加沿海、塞内加尔河口一带。

这个时期也是法国频繁进行对外扩张战争的时期。由于法国工商业在路易十四时期得到飞速发展，从而为法国的对外战争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基础。路易乘德意志和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西班牙与葡萄牙开始衰落，英荷相互交战之机，先后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与奥格斯堡同盟（荷兰、奥地利、勃兰登堡）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等。

持续的对外战争消耗了法国的大量财力和人力，臃肿的官僚机构开支浩大，贵族生活奢侈，国力不断消耗，国民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专制主义的法国开始迅速衰落。

路易十五时代 1715 年路易十四去世，其曾孙路易十五（1715—1774 年）即位，年仅 5 岁，由奥尔良公爵摄政。路易十五时期法国专制主义的危机公开暴露出来。路易十四去世时留下 24 亿锂国债，其中 1/3 已经到期，1715 年国家财政纯收入只有 6900 万锂，财政支出达到 1.447 亿锂，国家财政处于极大困难之中。1716 年国家的财政赤字接近 1 亿锂。政府企图以打击投机与高利贷为名收取罚款，但只得到 1000 余万锂。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奥尔良公爵起用约翰·劳进行财政改革。约翰·劳是位苏格兰银行家。在 1716 年他创办一所私人银行，发行银行券，这种银行券在缴纳国家赋税时同现金一样有效。1718 年，约翰·劳的银行，被宣布为国家银行，信誉大为提高。政府和贵族们都用这种银行券来清还自己的债务。约翰·劳还发行西印度公司股票，该公司享有对美洲进行贸易、殖民和种植销售烟草的权利。这在法国引起投机的狂潮，由此成为暴发户者大有人在。约翰·劳从此官运亨通，1720 年升任为财政大臣。但是，这一改革由于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结果使法国的财政陷入了更大的混乱。1720 年底，约翰·劳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达 30 亿锂，而银行的储备仅有 7 亿锂。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兑换金银的狂潮，约翰·劳出逃它国，银行倒闭。许多持有银行券的贵族、富商纷纷破产。尽管政府利用银行券偿还了大部债务，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又恢复了旧的财政制度，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1723 年，路易十五亲政，但国家财政未见好转。路易十五荒淫无度，每年的宫廷开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贵族集团效法宫廷生活奢侈。首相弗勒里曾一度改革财政，但终究无力挽救危机。下层群众生活贫困，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

路易十五继承了路易十四的扩张政策，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先后参

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并退出所占领的比利时、荷兰等地。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法国遭到惨败，失去了加拿大、俄亥俄河流域、路易斯安娜、塞内加尔的商站。它在印度也丢掉了大片殖民地，仅留下了5个商站。七年战争使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而法国的强国地位受到严重损害。长期的对外战争大量消耗了法国的国力，使法国陷入了专制主义的危机。

18世纪法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 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以国王为首的贵族以及僧侣手中。占全国人口95%以上的农民基本上是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虽然从18世纪初开始，法国东北部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但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像英国那样深入农村。

18世纪初，法国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一些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如里昂、奥尔良、阿尔萨斯—洛林等，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其中雇佣千名以上工人的分散的手工工场和雇佣百人左右的集中手工工场也不为罕见。到18世纪中叶，一些工业部门如采矿、冶炼等行业，已经开始使用先进的机器。在贸易方面，卢昂、爱克斯、亚眠、波尔多等许多城市都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法国对外主要出口酒类和各种奢侈品。进口货物主要有棉花、香料、皮革、咖啡等。由于工商业发达，法国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

但是，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重重阻碍。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从16世纪开始实行的包税制和国债制度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通过包收国家各种捐税、向国家放债，法国的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巨额收入，成为法国社会最为富有的阶层。但是，自路易十六即位后，为了缓和其财政危机，用各种手段从金融资本家手中获取金钱，使路易十一以来王权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迫使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也走上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道路。在工业部门中，由于封建行会制度的存在，使大批手工业作坊无法过渡到手工工场。因为受到封建制度保护的行会制度，对于工匠和学徒的数目、生产规模以及技术等都有严格的限制。路易十四时代制订的一系列工业法规，到18世纪不仅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使法国工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举步维艰，加之封建割据残余的存在，使各省之间的法律、度量衡、币制等都有不同，从而导致各地商业联系的困难。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赤贫状态，购买力水平极为低下，使国内市场日益缩小。18世纪以来，法国在对外战争中迭遭败绩，不仅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且丢失了许多海外市场。仅七年战争中，法国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大片殖民地以及在印度的殖民地均被英国占领。以法国王室为首的各级贵族，视法国工商业为敛财的重要来源，征收极重的工商业税，使工场主和商人所获利润大部分流入他们的手中，从而大大地限制了资本的积累。这一切，使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

革命前的法国，仍保持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的人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天主教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以及手工工场的雇工等构成了第三等级。

天主教会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天主教会竭力向人民宣传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鼓吹人们守天知命，不做丝毫反抗。对于一切反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异端”，则实行残酷的迫害。天主教会反对科学，扼杀知识，拼命地推行蒙昧主义。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解放人的思想，首先必须铲除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也是法国最大的封建主。教会土地占全国土地的1/10，僧侣也和其他的封建贵族一样，剥削雇农，榨取封建地租。高级教士大多出身贵族，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过着与贵族一样奢华的生活。但第一等级中的低级僧侣则大都出身于贫苦之家，他们收入菲薄，生活拮据，对高级僧侣抱有敌视态度，同情第三等级。

作为第二等级的贵族，分为两个阶层，一为“佩剑贵族”，一为“穿袍贵族”。所谓佩剑贵族主要指的是世袭的封建贵族。他们中的大贵族大多远离自己的领地，住在凡尔赛，靠领取年金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由于特权，他们垄断了军队、政府和教会中的要职。“佩剑贵族”中的中小贵族，则长年居住在乡间，尽管不能享受大贵族那样的奢侈生活，但由于直接剥削农民，成为农村中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代表。

“穿袍贵族”不是世袭贵族，他们的贵族头衔主要是靠钱买来的。因此，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穿袍贵族”主要任各级法院中的法官，并可父子相传。他们通过包揽诉讼榨取民财，同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佩剑贵族”歧视他们，也不允许他们出入宫廷。因此，他们对“佩剑贵族”心怀不满。

第三等级的成分较为复杂。其中资产阶级又有大中小之分。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包税商、军火商人、专卖商、银行家等。这些人与封建专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他们还花钱购买爵位，成为“穿袍贵族”。因此，他们不愿意推翻专制政府。但是，由于政治上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财产也得不到封建政府的切实保证，经济活动经常受到贵族或国王的干扰，因此他们反对革命而要求改良，只是希望通过在不触及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限制国王权力，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中产阶级主要是手工工场主和一般的商人等。他们深受封建专制政府的欺压和勒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他们极力要求消灭封建制度，建立保护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些人构成了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

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居民。这些人主要是小商贩和小作坊主等。这些人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又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对他们的无穷盘剥。但他们也反对无产者，害怕革命会使无产者摆脱旧日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危害他们的利益。

第三等级中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他们遭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而且还要向地主交纳各种苛捐杂税。此外，他们还必须向国王交纳所得税（收入1/20的土地税）、人头税、土地税；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经过层层盘剥之后，农民所剩无几，很难维持温饱。18世纪后期，法国进入了历史上的“封建反动”时期。国王又恢复了农民修筑道路和建造营房的徭役。地主则竭力提高封建地租，同时还强占农村公社的公有地，使广大农民更加贫穷困苦。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法国2300万农民中，竟有150万人沦为乞丐。因此，在第三等级中，农民

阶级最痛恨封建专制制度，最富有革命精神。尽管第三等级内部各阶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但在反对封建制度这一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因此，第三等级与国王为首的僧侣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

启蒙运动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适应资产阶级和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这是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使人们从封建专制的禁锢和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而发动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他们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以及教会的腐朽和反动性，指责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占有了社会的全部财富，而别人却呻吟在极端的贫困之中。他们反对宗教迷信，指出上帝是不存在的，《圣经》是编造出来的，显圣奇迹则是教士随意编造出来的谎言。他们宣扬个性解放，要求人所应有的全部自由。同时，启蒙思想家论证了摧毁封建制度的必要性，主张社会改革，并勾画出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

启蒙运动是在17世纪唯理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唯理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儿，尽管他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所提出的用人的理性，代替神的启示，用人的分析论证来代替对神的盲目崇拜的思想，对于打破天主教会的精神和文化垄断，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思想家提出以理性原则代替权威和传统的原则，提出对过去的一切，包括旧的传统宗教和国家政体都要用理智加以研究和批判。这种理智和批判的精神，就是启蒙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此外，启蒙运动的发生，还受到18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自然权力说、社会契约说以及分权理论的影响。启蒙运动在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使法国革命不同于英国革命，完全抛掉了宗教的外衣，采取了公开的政治斗争的形式。

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创始者是伏尔泰（1694—1778年）和孟德斯鸠（1689—1775年）。他们的学说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要求，属于资产阶级的温和派，成为大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指导思想。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他的著作浩丰，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多方面。他的代表作主要有《哲学辞典》、《路易十四时代》、《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等。伏尔泰无情地批判了作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天主教会，提出了“消灭丑行”的口号，公开反对教会所造成的宗教迷信、宗教迫害和人们的愚昧无知，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弊病，指出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就在于天主教会的欺骗。他痛斥天主教会是“九头鸟”，罗马教皇是“骗子”。天主教教士是“文明的恶棍”。他在政治上主张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将天赋人权交与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消特权，限制王权。但是，由于他站在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思想上又经常处于矛盾之中。他一方面批判天主教会，但又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不可改变的现象，一方面主张将“天赋人权”归还人民，但又认为人民是“群氓”，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需要“聪明人”的监护。伏尔泰的社会政治观点的两重性，反映出大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中的暧昧和妥协的态度。

孟德斯鸠出身贵族，曾担任过地方高等法院的法官。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等。孟德斯

鸠与伏尔泰一样，在反对天主教会的思想专制方面极为坚决。在其著作中，无情地批判和嘲讽了天主教会和教会的残忍和无能。同时，他也强烈反对特权阶层的专制和残暴。但是，他并不主张废除王权，认为法国应该效仿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他的全部政治主张都体现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在这部著作中，孟德斯鸠认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便可限制王权，因此，没有必要进行一场革命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大革命中的君主立宪派所利用，并体现在《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中。

在启蒙运动中，代表中产阶级的思想家是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中的经济学家魁奈。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有狄德罗（1713—1784年）、霍尔巴赫（1723—1789年）、爱尔维修（1715—1771年）等人。由狄德罗主编的《科学、艺术与工艺百科全书》反映了他们的全部政治思想观点，因此他们被人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是16世纪法国革命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代表。但是，他们的唯物论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他们认为自然世界是物质的，没有超自然的上帝存在。他们通过出版百科全书，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文化知识，以揭露宗教封建迷信的荒谬，抨击天主教会和教士的愚昧和残暴，并指出宗教是用来抬高国王身价压迫人民的。在论述社会现象时，他们运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封建制度是不合人性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合理的政治制度。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提出应该将王权限制到最小的限度，换言之，也就是实行君主立宪，但不必要采取革命的手段。魁奈（1694—1774年）是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经济表》等。他是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问题的经济学家。他极力推崇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的思想，并创造性地论述了再生产的理论。

启蒙运动中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是卢梭（1712—1778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的家中，早年由于家境贫寒，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深刻体验了底层人民的疾苦和心情。因此，他的思想较为激进和革命。其代表作主要有《爱弥尔》、《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忏悔录》等。卢梭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不平等及一切罪恶和不幸的根源。因此，在其著作中，他激烈地抨击了社会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现象。但是卢梭又不主张铲除私有制，而希望通过保留小私有制达到经济上人人平等的目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的理论。他认为，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应按社会契约的原则建立国家。他针对路易十六提出的“朕即国家”的谬论，提出国王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仆人，对不称职的仆人，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撤换他。“主权在民”的理论是卢梭政治思想中的基本原则。卢梭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不同，他极力主张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卢梭的思想对于后来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启蒙运动中，还出现了一批反映下层人民群众革命要求的思想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梅里叶（1664—1729年）、玛布里（1700—1785年）和摩莱里（生卒年不详）等人。这批思想家的思想中都带有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色彩。梅叶里在其代表作《遗书》中，痛

斥了私有制，指出私有制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是万恶之源，并将教士、投机商人、官吏统统称为“富足的懒虫”，称封建地主是“魔鬼”。他主张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应做有益社会的事，社会财富应由大众共同享受。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摩莱里在其著作《自然法典》中，提出应该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他并不主张通过革命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认为只要消灭社会上的偏见和谬误，就可以实现他的主张。玛布里的观点与梅里叶的观点大致相同。他认为只有消除社会不平等才能消除暴政和罪恶。在其著作《论法制或法的原则》和《论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中，玛布里描绘了他的理想共和国的图景：在这个共和国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一切人皆为兄弟，禁止占有财产是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法律”。但是，他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这一理想的国家，不能建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能建立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正是当时社会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现实绝望心情的一个侧面反映。

由于启蒙运动，18世纪被称为“启蒙时代”。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而且是在更高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启蒙思想家们将封建专制制度的神圣外衣——天主教和天主教会，以及在这一神圣外衣掩盖之下，封建统治阶级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统统放在理性主义的天平上让人们自己去思考和评断，从而暴露出它的虚伪和欺骗性。启蒙运动的哲学前提是社会应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启蒙思想家们提出既然根本不存在神授的特权，那么人就是生而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幸福、生存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任何人不可剥夺的。这种以人的自然权利来对抗和否定封建特权的思想，是启蒙主义运动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启蒙运动在提倡科学，反对蒙昧主义方面，也起了重大的作用。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狂热的倡导者和宣传者。启蒙主义思想家对于第三等级的胜利满怀信心，为未来的新的社会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从而为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动员人民投身于革命，推动法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和阶级派别的要求，但就整个法国革命的过程来说，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找到启蒙思想家影响的痕迹。同时，法国的启蒙运动，对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二节 德国

普鲁士的兴起 18世纪的普鲁士王国是以勃兰登堡邦国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勃兰登堡国的兴起始于12世纪中叶。当时萨克森公爵向东进行扩张，占领了勃兰登堡地区。13世纪中叶勃兰登堡脱离萨克森，发展成为勃兰登堡邦国，勃兰登堡伯爵也成为帝国七大选帝侯之一。1415年统治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侯爵利用婚姻关系、继承协定和其他手段扩大其版图，于1614年取得克累弗、马克、拉芬斯堡。1618年，波兰王国所属的采邑普鲁士公国（原条顿骑士团领地）划归勃兰登堡。这样，霍亨斯陶芬侯爵又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帝国的选侯之一，同时又是波兰的臣属普鲁士大公。1648年勃兰登堡又取得东波美拉尼亚以及曾为教会

领地的卡敏、敏登、哈尔贝斯塔德。后又占有马格德堡主教区。1655年勃兰登堡的威廉侯爵乘波兰同瑞典发生战争之机，宣布取消波兰对普鲁士的领主权，正式把它并入勃兰登堡国。

在勃兰登堡国扩张发展过程中，条顿骑士团的财政力量开始崩溃，土生土长的普鲁士、立陶宛、波美拉尼亚和波兰的贵族与自由民逐渐拥有土地所有权。在东普鲁士，由乡村绅士逐步形成社会集团“容克”。容克开始形成时其成员仅仅是小农场主，处于条顿骑士团统治之下，只能勤勉地进行生产经营，组织庄园农场，并征募被征服地区农民进行强制性的农业生产。16世纪欧洲的价格革命后，对谷物的需求使谷物的价格上涨，促使易北河以东容克农场的迅速发展，容克的经济、政治力量得到大大加强。许多容克建造了牢固的城堡，并建立了私人武装。甚至敢与邦国分庭抗礼。同时，其政治影响也在不断扩大，逐渐拥有地方行政领导权。三十年战争摧毁了农业生产，大量农民逃亡或被驱逐，他们的土地遂为容克占有，从未归还农民。19世纪初，德意志东部到处可见容克的庄园。

1653年勃兰登堡最后一届议会召开。议会批准选帝侯在此后7年内每年向农民和城镇居民征收75000塔勒赋税，使选帝侯得以保持一支常备军，此外他还拥有自由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为了获得容克集团的支持，大公腓特烈颁布1653年条令，给予容克在其领地内向农民征发劳役和地租的权力并享有财产、司法、治安等权力。这样，容克改变原先的封臣地位，取得了地方政治权力。一个新兴的土地所有者集团容克在旧贵族骑士的衰落之际崛起。

勃兰登堡在17世纪加强了官僚军事组织的建设。1604年在勃兰登堡已正式建立枢密院。1665年至1670年建立了负责军务的政府部门，即军事总署。选帝侯往各个城市派出税务委员，在农村建立税务署。各省建立了最高行政机构和军事专员公署。勃兰登堡的军队也有较快的发展。1640年，选帝侯腓特烈即位时，勃兰登堡军队仅4000人，到他在位后期，经过训练的常备军已增至3万人。

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形成 17世纪末，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查理六世在与法国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雇佣了勃兰登堡国选帝侯腓特烈的军队对法国作战，随后赐予他以国王的称号。1701年1月18日，勃兰登堡国改称普鲁士国王，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1688—1701年）改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1701—1713年）。这时的普鲁士不过是一个位于德意志东北的落后国家，其人口在选帝侯腓特烈在位末年只有100万，1713年腓特烈一世去世时，普鲁士王国人口不超过160万。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1713—1740年）和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皆实行专制主义。他们加强国家行政机构建设，实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工商业，力求使普鲁士变成为欧洲强国。

18世纪，普鲁士不断增强军队，发动战争扩张其版图，成为一个军事国家。腓特烈一世时期，普鲁士根据《乌特勒支和约》，获得西属吉尔兰德的领土，腓特烈一世加紧扩军，军费开支超过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士兵服役期限长达25年，军官皆为容克出身，常备军增至8.5万人，居欧洲第四位。腓特烈二世时普鲁士的军队扩展到20多万人，按

人口比例居欧洲第一位。1740年普鲁士夺取奥地利的工业区西里西亚。1772年普鲁士伙同俄、奥瓜分波兰，夺取西普鲁士。腓特烈三世时期又在1793和1795年两次参加瓜分波兰。18世纪末，普鲁士领土增加到30.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860万。

到18世纪后半期，普鲁士已是德意志境内最强大、最有活力的国家。这是和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所实行的“开明君主制度”分不开的。当时，普鲁士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容克庄园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德意志境内走在前列。普鲁士统治者追求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加强自己的权势。但是它不拘泥于传统的封建剥削方式，而是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视为国家富强的一种表现，这不失为一种颇有见地的眼光。正因为如此，腓特烈二世标榜开明君主制度，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建立友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鼓励并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而且继承父辈的传统政策，对军事工业尤为重视，采取免税甚至给予津贴的措施。为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统一币制、创办银行、建立邮政，并且修公路、开运河，以利商业。腓特烈二世还大力提倡发展文化艺术，重视教育，并建立了普鲁士科学院。在农业上提倡开垦荒地，将奥得河沼泽地辟为耕地，1763年国王发布指令，取消王室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农奴依附关系。1768年颁布命令，在西里西亚废除农奴制。1773年在东、西普鲁士取消农奴制。但是在这些废除农奴制的地区，贵族对农民的剥削仍旧十分残酷，地主还强占农村公有地。农民的反抗在18世纪末不断发生。

为了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在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对国家中央行政机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建设。1723年腓特烈一世将国务委员会改造成初具内阁形式的“最高财政、军事和领土委员会”，简称“总委员会”。由它负责管理国内政策、财政和军事。总委员会以下设立若干部，每个部设一名大臣和若干协助其工作的顾问官。分工负责管理司法、造币、征税等国家事务。后又建立负责国家日常事务的机构“战争和国内事务枢密院”。1713年又建立了财政总委员会，取代以前的财政机构，实行统一管理。18世纪普鲁士国家机构的建设有利于中央集权，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机构重叠庞大的弊病。与西欧国家的专制主义相比，普鲁士的专制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二点：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农奴制和优先发展军事力量；二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这一特征对19世纪的普鲁士以至统一后的德国政治，影响至深，使德国最终发展成为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三节 奥地利

近代初期的奥地利 奥地利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中领土面积最大的邦国，在德意志诸邦中具有重要地位。从1438年起，哈布斯堡家族取得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哈布斯堡家族因此既统治着奥地利，又是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16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除了原有的奥地利外，还领有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捷克和匈牙利、西属尼德兰（今比利时）、意大利的伦巴底、那不勒斯和撒丁以及现在南斯拉夫的部分地区。因此，奥地利是个多民族

的国家，有作为统治民族的日耳曼人、波兰和乌克兰地区的东方斯拉夫人、波希米亚地区的西方斯拉夫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区的南方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等。

哈布斯堡皇朝在境内推行大日耳曼政策，使民族问题长期困扰着这个古老帝国。奥地利皇帝同时兼任波希米亚国王，所任命的官吏大都是日耳曼人，还强行规定德语为国语，天主教为国教，教育全由教会掌管，大量捷克文书籍被焚毁。波希米亚是帝国境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统治者在这里极力维护行会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匈牙利，哈布斯堡皇朝派总督进行统治，也推行日耳曼化政策，而且强制推行农奴制横征暴敛，进行掠夺。

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民族压迫激起奥地利境内农民和非日耳曼民族的反抗。17世纪后半期，捷克经常爆发农民起义。1680年北部农民起义持续时间很长。1677年至1685年，匈牙利爆发了乔科里领导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起义，1703年又爆发了拉科西领导的民族大起义，起义持续了13年之久，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农民也参加了这次起义。1740年奥地利君主查理六世（1711—1740年）发布《国本诏书》，宣布其长女玛丽亚·特蕾西亚为王位继承人。这一诏书先后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但查理六世死后，普鲁士联合法国、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撒丁等国拒绝承认其女玛丽亚的合法继承权，发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取得了英国的支持，与普鲁士等国打得难解难分。最后，奥地利提出议和，于1748年签订《亚琛和约》。和约承认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继承权，但规定奥地利将西里西亚割给普鲁士，将一部分意大利土地割给西班牙和撒丁王国。战后，奥地利处于困难之中，特蕾西亚宣布将实行“开明专制”，进行改革，以振兴国家，巩固本家族的统治。

玛丽亚·特蕾西亚与约瑟夫二世改革 玛丽亚·特蕾西亚（1740—1780年）的改革奠定了奥地利新型国家的基础。为了对付法国和普鲁士，特蕾西亚首先进行军事改革。虽然奥地利从1649年起已组建常备军，但因其数量不大，大部分兵力是战时国王与各领主协同征集的，这种军队的组织方式不能确保奥地利在战争中获胜。为了维持一支较大的常备军，1748年特蕾西亚下令以“军税”代替各领地提供军队的惯例，即由每个领地每年应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的款项，国王用这些资金来装备和训练军队。由政府大量征召新兵，经过军事训练之后遣散复员，一旦需要时重新应召入伍。军队最初为10万余人，到80年代初增至27万余人。由于实行了赎免军役和代服军役的办法，贫民和小手工业者成为军队的主要成分。同时，效法普鲁士，实行近代的军事训练方法。不出身而以军功做为擢升军官的标准。还创办了军事学院，即“玛丽亚·特蕾西亚陆军大学”。此后军官都必须经过正式训练才能任职。

国内矛盾的困扰和对外受侮促使玛丽亚·特蕾西亚实行起开明君主制，进行了进步的改革。1749年建立了管理内政和财政的执政机构，60年代初又成立6人组成的国务院，加强了中央集权。在经济上，于1751年下令不准地主再任意驱赶农民、兼并土地，以保证纳税人的数量。1762年，下令统一货币，并发行纸币。1771—1775年，先后下令将农民服劳役的时间限为每周3天，每天不得超过10小时；国家减轻农民服马车运输的劳役数量；限制领主的司法特权；取消皇室领地上的农奴制。

为了改变技术落后的状况，特蕾西亚下令广召人材。1749年颁布命令，允许外国人自由迁居奥地利，给予免税和宗教自由，并制定了有利于外籍工厂主发展的市政法规。国家设立奖学金，奖励新发明和新企业的开办。同时，国家以官费派遣技师到国外深造，禁止熟练工人外流。

玛丽亚·特蕾西亚主持制定了新的刑法典和民法典。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由政府拨给学校巨额补助金，以使大学和部分中学脱离教会，并开设了一批培养专门人材的技术院校和女子师范学校。这些改革是在1753年起任首相的考尼茨公爵的帮助下进行的。

1780年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其子即位，是为约瑟夫二世（1780—1790年）他继续进行了改革，并有新的发展。他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重新划分全国的行政区，分为15个郡。更多的改革是在经济领域。他鼓励工商业，建立一批国家手工工场，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尤其重要的是，他在1781年下诏取消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帝国其他属地的农奴制度，给农民以人身自由、婚姻自由和从事手工业的自由。

约瑟夫二世为使教会绝对服从于国家，下令封闭天主教寺院，没收其财产。在军队中，约瑟夫二世下令清除军官中那些出身名门的无能之辈，或让他们担任不重要的职位，并禁止出售军职。军官学校凭才能而不是凭出身招考，即吸收商人、工厂主、甚至手工业者的子弟，以建立军官骨干队伍。这些措施提高了奥地利军队的战斗力。

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使奥地利的国力有所增强。但是这一改革缺乏强有力的支持，缺乏阶级基础。贵族反对他的改革，那些希望凭借奥地利君主国对各民族的奴役谋取利益的富商、银行家们也反对改革。这些人与贵族形成了强大的反对派集团。只有工厂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教师、青年官吏支持他的改革。1790年约瑟夫二世去世后，改革成果几乎全部被反动贵族取消。此后，奥地利成为武装干涉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角色，变成了欧洲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之一。

第四节 俄国

彼得一世的改革 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成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野蛮、落后和保守的国家。它不仅工业、农业和商业远远落后于英、荷等国，军事力量也十分薄弱，没有正规的陆军，更没有海军，军队的装备供应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全国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文盲，各种技术人员奇缺。

1689年，彼得一世亲政（1682—1725年）。彼得一世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沙皇，被后世尊称为“彼得大帝”。为了加强俄国的国力，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国的落后面貌，并成为现代俄国政策的奠基者。1695—1696年俄国曾两度南下进攻亚速，以夺取黑海出海口，但遭到惨重失败。彼得一世痛感俄国的落后，决心进行改革、学习西方。1697年，彼得化名米哈依洛夫，参加了俄国的高级使团，遍访西欧的主要国家，学习参观。西欧之行结束后，彼得便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为了扫除改革的障碍，消除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大贵族集团的影响。彼得首先进行了政治改革。1698年回国后，立即对那些企

图政变的宫廷贵族实行严厉打击，并解散了在历次宫廷政变中充当工具的近卫军。1699年设立了由亲信组成的办公厅，1711年又建立了枢密院，作为中央最高权力机关，全面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取代已经名存实亡的贵族杜马。同时，在1701年和1719年，彼得还进行了两次地方行政改革。通过一系列政权机构改革，彼得逐渐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在政治改革的同时，彼得还进行了宗教改革，将教会变成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使教权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结束了俄国东正教会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

彼得一世改革的核心是军事改革。首先，彼得取消了雇佣兵制和贵族军队，从1699年开始实行征兵制，主要征集对象是农民，共征兵53次，俄国因此有了一支20万陆军、2.8万海军的常备军。为培养有才干的陆海军军官，彼得开办了各种军事学校，并选派有才干的贵族子弟出国学习，并打破贵族一入伍就是军官的旧习，规定贵族服役必须从士兵当起。以军功和才能作为选拔军官的标准，从而大大提高了各级指挥官的素质。海军建设是彼得整个军事改革的重点，1698年彼得建成亚速舰队，北方战争开始后又加紧创建波罗的海舰队，到彼得去世前，俄国已拥有各种舰只几百艘。

经济上他鼓励工商业发展，不仅国家办手工工场，也鼓励私人兴办。他将大批皇室农奴拨到工场，还允许企业主大量购买农奴，直至整村购买。彼得很重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1697年他化装出国考察，曾聘回几百名外国技术人员，还派人出国学习。彼得在位期间共建立手工工场240多家。为保护本国经济，对外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同时，为增加财政收入，对内实行重税政策，推行“按丁纳税”的人头税，严格要求“国无游民”。为此进行了人口调查，为各类农奴规定了纳税额。同时也规定了盐、酒、烟的高额间接税。

在文化教育和社会习俗方面，彼得注重学习西方。建立了各类学校、科学院、博物馆，同时办报纸，引进公历历法，简化俄文字母，采用活字印刷，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书籍。

彼得一世的改革在俄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为俄国的对外扩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俄国因此获得了北方战争对瑞典的胜利，成为欧洲的强国。但这一改革并没有削弱农奴制，反而使地主和商人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统治 从1725年到1762年的37年间，俄国政局不稳，曾发生5次宫廷政变，更换了7个沙皇。到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政局才稳定下来。叶卡特琳娜二世是日耳曼人，嫁彼得三世为妻。1762年她在近卫军军官奥尔洛夫兄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并处死了丈夫，成为沙皇（1762—1796年）。

为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和加强中央集权，叶卡特琳娜二世以加强农奴制来稳定贵族情绪，对身边的贵族官员大量赏赐农奴。经她赏赐出去的国家农奴就有80万人，仅对宠臣波将金公爵就赏赐10万人。一个普通的宫廷卫队士兵都可拥有29—45名农奴。农奴制已扩展到新扩张的领土之上，买卖农奴现象相当普遍，一名即将成年的女农奴售价只有10卢布。

18 世纪下半期，“开明专制”风行欧洲各国。叶卡特琳娜二世也以此为标榜，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人通信，企图在俄国和欧洲公众中树立其贤明君主的形象。

叶卡特琳娜二世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下令取消工业专利权，宣布工商业自由，而且允许贵族经营工商业。对外继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凡本国能够制造的商品不准进口，本国不能生产的急需商品则可免税进口。在各种政策的促进下，俄国工商业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 世纪 60 年代，手工工场已由彼得时的不足 300 家增到 700 家，90 年代更发展到 1000 家以上。其中多数属轻工业，以彼得堡和莫斯科为中心。其余也多集中在欧俄地区。重工业则集中在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地区。在生产大为发展的同时，俄国的商业与外贸皆有大幅度增长。叶卡特琳娜二世即位的 1762 年，俄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2092 万卢布，到 1784 年则增长到 6080 万卢布。

叶卡特琳娜二世强化农奴制的政策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1773—1775 年）。起义波及莫斯科以东的广大地区，乌拉尔山、顿河与伏尔加河一带。这次起义虽然遭到镇压，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

由于叶卡特琳娜在位时，国际环境对俄国极为有利。周边的国家除中国外其余如波兰、瑞典、伊朗、土耳其等都已衰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叶卡特琳娜二世对外发动了 6 次侵略战争，曾扬言如果能活二百岁，整个欧洲就会在俄国统治之下。叶卡特琳娜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吞并波兰和夺取黑海出海口。波兰地处波罗的海南岸，连接东欧和中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当时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的欧洲大国。波兰是俄国向西扩张的首要目标，所以历代沙皇都对它垂涎三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于 1763 年 10 月病故。次年，叶卡特琳娜二世派大军入侵波兰，将其情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扶上王位，为俄国独吞波兰开辟道路。1768—1774 年第一次俄土战争中俄国的胜利，使普奥两国迅速接近。为了阻止俄国对波兰的吞并，普奥以援助土耳其相威胁，迫使俄国同意三家共同瓜分波兰。1772 年，第一次瓜分波兰的协定在彼得堡签订，普鲁士得到但泽、佐伦除外的西普鲁士全省，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从此把所有领土连成一片；奥地利分得加里西亚，面积 8.3 万平方公里；俄国则占领了德维纳河、第聂伯河以东 9.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当法国大革命期间，波兰出现爱国主义者的改革，并爆发民族起义，俄国和普鲁士两次派出大军开进波兰，血腥镇压了爱国者的反抗和起义军，并于 1793 年和 1795 年又两次瓜分波兰（奥地利未能参加第二次瓜分），俄国吞并了 37 万平方公里，普奥各自占领 10.6 万和 4.7 万平方公里。至此，波兰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暂时消失了。

为了打开由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俄国与土耳其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1768 年第一次俄土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 7 年，俄国获胜，迫使土耳其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俄国夺得了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之间的草原地区，占领了亚速夫以及克里米亚的刻赤和叶尼卡尔。俄国的商船获得了在黑海自由航行和通过博斯普鲁斯与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土耳其被迫同意克里米亚汗国独立，1783 年该汗国被俄国兼并。1787 年第二次俄土战争爆发，土耳其又一次被打败，于 1792 年签订

了《雅西和约》，除再次确认 1774 年签订的条约外，俄国又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南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大片土地，从而巩固了自己在黑海北岸的地位。叶卡特琳娜二世夺得黑海的出海口，为俄国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

1788 年因叶卡特琳娜企图夺取芬兰，爆发了俄瑞战争。战争在陆上和海上同时进行。陆战俄国获胜，海战瑞典占上风。因此时俄国正进行第二次俄土战争，为了集中力量同土耳其作战，俄国被迫同意议和，恢复战前状态。

在 80 年代，叶卡特琳娜还宣布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属于俄国版图，从而使俄国成为地跨欧、亚、美三洲的大帝国。俄国在 18 世纪后半期的迅速发展，表明当时的俄国还处在上升时期，叶卡特琳娜二世也不失为俄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之一。

叶卡特琳娜二世晚年仍念念不忘对外侵略扩张，妄图建立一个包括 6 个都城（彼得堡、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君士坦丁堡、阿斯特拉罕）的俄罗斯帝国，而且还妄想入侵波斯、印度和中国。1796 年她中风突然去世，称霸世界的计划遂成为泡影。

第五节 17 至 18 世纪欧洲的局部战争

英荷战争 荷兰是 17 世纪的海上强国，独立前就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尼德兰地区，尤以其航海业、渔业和商业最为著名。16 世纪末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使荷兰脱离西班牙而独立。其后荷兰的工商业、航运业以及海上殖民活动进一步发展。依靠血腥的殖民掠夺，荷兰迅速强盛起来，并取代西班牙、葡萄牙掌握了海上霸权，成为船只遍航世界、运销各国商品的“海上马车夫”。

荷兰实力的增强，使英国与它的矛盾迅速尖锐起来。17 世纪中叶荷兰拥有的船只超过英国的 10 倍，商船的总吨位占了世界的 $\frac{3}{4}$ ，相当于英、法、西、葡 4 国的总和。雄厚的海上力量，使荷兰垄断了世界商业大权。1602 年，荷兰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以残暴、欺骗、贿赂和背信弃义等手段强占殖民地。在东方，荷兰控制了包括爪哇、苏门答腊、摩鹿加群岛、锡兰岛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并将魔爪伸向印度、日本，一度霸占了我国领土台湾。荷兰的殖民势力也伸向了美洲，于 1613 年，在北美洲的哈得逊河口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在南美洲占领了安第斯群岛中的一些岛屿。1652 年，在非洲占领了控制欧亚海上交通的要地——好望角，为它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取得了中继站。

荷兰的海上霸主地位，不仅同葡萄牙的殖民势力抗争，而且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也是一个直接的障碍。在印度，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受荷兰的排挤，活动范围很小。在印度尼西亚，两国贸易公司常常在海上发生冲突，后来荷兰把英国人的势力赶出。在波罗地海、地中海和西非沿海，荷兰商人到处排挤英国商人。甚至在英国本土沿海，英荷也经常发生冲突，因为荷兰人在英国周围海域捕鱼，破坏了英国捕鱼业。到了 17 世纪中叶，英国与荷兰在海上的冲突，只能诉诸于武力，用战争解决问题。

1650 年，英国国会通过一项针对荷兰的重要法令，规定非经英国政

府许可，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1651年，又颁布了著名的《航海条例》，对专营海上转运贸易的荷兰是一个沉重打击。荷兰和英国关于废除《航海条例》的冲突，导致了1652年至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战争中双方展开几次规模很大的海战。每次海战往往有二百多艘战船，3万名水兵和6千到8千门大炮参战，战争结果荷兰人战败。根据1654年4月在威斯敏斯特签订的和约，荷兰被迫承认了《航海条例》。166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新的《航海条例》，同时双方由于在殖民地问题上冲突迭起，又引起了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和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年），均以荷兰失败而告终。

英荷战争是近代初期两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也是争夺航海和殖民地霸权的商业性战争。由于战败，荷兰的经济受到破坏，航运业和渔业遭受严重打击，丧失了其欧洲大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再无力同英国相抗衡。英国则通过战争击败了阻止它向外扩张的强大对手，经济实力和海上力量大大增强，从此以欧洲强国和海上霸主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为其进一步向法国欧洲霸权的挑战奠定了基础。

俄瑞北方战争 对外实行领土扩张是俄国的传统政策。彼得之前实行的是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到17世纪末，这已经不能满足它的要求了。它需要水域，需要将注意力转到海上。长期以来，俄国缺乏出海口。1584年在白海建成了阿尔罕格尔斯克港，因冬季封冻，每年通航时间较短，距离西方也过远。俄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同西方有更多交流，解决出海口问题成为急务。当时，北欧强国瑞典控制着波罗的海，东部沿岸也是它的领土，俄国边界与海岸尚有很大距离。南方黑海沿岸则在土耳其手中。1695—1698年，彼得曾两次出兵攻打土耳其均遭失败，后又寻求同盟者共同对土作战，也未成功。这时发现，北方的丹麦、波兰同瑞典的矛盾很深，于是彼得将力量转到北方，于1699年同丹麦、波兰结成反瑞典的“北方同盟”。1700年瑞典先发制人，出兵攻打丹麦，迅速取得胜利。随后便进军波兰。俄国急忙派兵参战。这一战打了21年（1700—1721年），史称北方战争或俄瑞战争。

开始时俄军以3万人围攻纳尔瓦的8000名瑞典军队，但历时3个月久攻不克。瑞典援军赶来后，只用几个小时就几乎使俄军全军覆灭。由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轻视俄国，转而去攻波兰，使彼得获得了一年喘息时间，重整军备，修筑工事并大力进行改革。彼得的所有改革基本上都是在战争期间进行的，反过来又支持了战争。再建的俄军于一年后开往前线，取得一些胜利，于1703年攻占宁斯克茨堡。该城经征发农奴劳役大规模修建后，于1712年被定为首都，即为彼得堡。俄军还占领了涅瓦河口的科特林岛，建立起海军基地，即后来的喀琅施塔得要塞。接着，攻下了纳尔瓦、大都，占领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大部地区。1706年瑞典征服波兰后，移军攻打俄国。1708年打败俄军进入俄国境内。但瑞典军没有进军莫斯科，而是南下乌克兰，结果在1708年9月底被俄军抄了后路，援军被歼，瑞典军攻势遂停止。

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成为战争的转折点，俄军大获全胜，使俄、波、丹同盟再次恢复，并使普鲁士参战。虽然瑞典有法国、土耳其的直接参战和英国的支持，但彼得利用外交手段，拆散了土耳其、法国、瑞

典联盟，军事上，俄国也步步进逼。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瑞典终于被迫在 1721 年签订了《尼斯塔德和约》。根据和约，俄国获得了芬兰湾、里加湾、卡累利阿、爱沙尼亚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目标终于实现。沙俄从此成为东欧大国，向着争夺欧洲霸主的道路迈进。

英法的争霸战争 1688 年政变后，英国改变了斯图亚特复辟王朝亲法政策，利用一切机会打击法国的霸权，结果使英法关系恶化。从 17 世纪末到整个 18 世纪，英法矛盾成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两国之间为争夺海洋和殖民霸权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激烈斗争，主要战争有 4 次。

第一次战争是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8—1697 年）。由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野心勃勃，不断扩张领土，对其他欧洲国家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因而成为欧洲许多国家共同反对的主要对象。1686 年，荷兰联合奥地利和布兰登堡组成反法的奥格斯堡联盟。西班牙、萨伏依、瑞典，巴伐利亚、萨克森等随后也加入联盟。1688 年，路易十四以其弟媳是已去世但无子嗣继位的帕拉丁选侯查理之妹为由，要求占领该选侯国的大部分土地，遂导致同奥格斯堡联盟之间的战争。英国积极支持联盟对法作战。法国虽在陆战取得胜利，但海战败于英国，被迫签订《里斯维克条约》，退回了以前从西班牙手中夺去的许多土地，其殖民势力遭到初步打击。英国则巩固了战时侵入地中海的位置，取得了对法国海军的永久优势。

第二次战争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 年）。1700 年，西班牙国王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二世死后无嗣。他在位期间，查理二世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奥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根据亲属关系，有权继承王位的法国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发生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英国害怕西班牙在欧洲的属地，特别是广大殖民地被法国夺去，参加了反对法国的一方。这次战争表面是争夺王位，实际上是英法两国争夺海上和殖民地的霸权。

根据查理二世的遗嘱，西班牙王位要由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蒲继承。1701 年初，菲力蒲来到西班牙，被宣布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1701—1746 年）。路易十四即颁布特殊敕令，承认腓力五世有继承法国王位之权，并派军队占领了西班牙的尼德兰国境要塞，两国之间的贸易税宣布废除。事实上，西班牙的统治权已落到了路易十四手里。英国、奥国与荷兰不愿法国过于强大，故先后对法国宣战，战争在意大利、西班牙、西德意志和尼德兰四个战场展开，英法之间主要是海战。开战之初，英国海军消灭了西班牙军舰 17 艘和法国军舰 24 艘。1704 年，英国海军炮击并占领直布罗陀要塞。在陆地上，法军最初取得了胜利，但不久便连吃败仗。最后，在不利于法国的情况下，于 1713 年签订了《乌特勒支条约》。和约承认路易十四之孙菲力蒲为西班牙国王，但规定法、西两国不得合并；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大片属地：那不勒斯王国、撒丁、一部分托斯坎纳、米兰公国和西班牙的尼德兰割让给奥地利；英国获得了法国在北美的哈得孙湾、纽芬兰、新斯科舍等殖民地，占有了直布罗陀，获得了向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供应黑奴的垄断权。

第三次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9 年）。1740 年，奥皇查理六世死后无男嗣，其长女玛丽亚·特蕾西亚据 1713 年《国本诏书》承

袭帝位。普鲁士、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萨克森、撒丁等拒绝承认其帝位继承权，发动了这场战争。英、荷、俄等则支持奥地利。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法普联盟与英奥联盟的争霸战。法国参战是为了瓜分奥的领土，争夺欧洲霸权；英国则是为了打击强敌法国，争夺法国的殖民地和称霸世界。法国在战争中耗费了大量金钱和人力，但海上实力仍被英国摧毁。1748年签订《阿亨条约》，玛丽亚·特蕾西亚虽保住了帝位，但须将西里西亚割给普鲁士，将一部分意大利土地割给西班牙和撒丁王国。普鲁士占领了西里西亚后成为欧洲强国。法国海上势力进一步削弱。

第四次是七年战争（1756—1763年）。这是英法争夺北美、印度和殖民霸权的一次决定性战争。战争以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以法国、奥地利、俄国、西班牙、瑞典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同时进行。英国的战略重点是打击法国，全力摧毁法国的海上力量和夺取法国的殖民地。战争一开始，法国就处境不利。在欧洲战场上，普军拖住了法国大量兵力，并取得对奥军的胜利；在海上，法国海军屡屡败北，最后被英海军彻底击溃于英吉利海峡；在北美和印度战场上，法国也惨遭失败。1762年，俄国退出了战争，法国无力再战。1763年，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和《胡尔贝茨堡和约》七年战争遂告结束。法国丧失了在北美的广大殖民地，在印度的势力则几乎完全被排除。

七年战争，使英法间的长期争霸告一段落。英国从此成为海上霸主，并取得了欧洲的霸权。

参考书：

乔明顺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第三章。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二章。王荣堂、姜德昌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第六章。

刘祚昌、光仁洪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第五章。

胡洽坤主编：《简明世界近代史》第二章。

管敬绪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二章。

复习题：

1.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内容和影响。
2. 18世纪法国等级制度的概况。
3. 普鲁士国家及容克阶层形成的过程。
4. 普鲁士专制主义的特点。
5. 彼得一世改革及其对俄国历史的影响。
6. 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俄国的对外扩张。

第三章 北美独立战争与美利坚 合众国的建立

第一节 独立战争的背景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概况 在欧洲殖民者进入北美之前，美洲居住着约 100 多万生活在氏族制度下的印第安人。自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相继侵入北美大陆，对美洲的印第安人进行了极为野蛮的掠夺和杀戮。

1607 年，英国王室的特许公司“伦敦公司”派出的远征队在北美东海岸登陆，设立了英国的第一个殖民点詹姆斯城。此后在该城基础上，发展成为弗吉尼亚殖民地。1620 年，102 名英国的清教徒，为了逃脱本国的宗教迫害，乘“五月花号”船，到达北美北部的马萨诸塞，建立了新普利茅斯殖民地。1664 年英荷第二次战争后，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新尼德兰，改名纽约。到 1733 年，英国在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陆续建立了 13 个殖民地。它们是北部的马萨诸塞、罗德岛、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中部的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特拉华；南部的弗吉尼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由于这 13 个殖民地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立的，因此带有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根据各个殖民地的政治特点，主要分为皇家殖民地、业主殖民地和自治殖民地 3 种类型。皇家殖民地由英王任命总督统治，业主殖民地则由业主指派总督统治，但要受英国法律的节制。自治殖民地由居民自己选出总督统治，但必须依照英国国王颁布的特许状中的条款进行统治。

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主要有白人、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白人主要是英国移民，此外还有少数的欧洲大陆移民。黑人主要是奴隶贩子从非洲贩来的奴隶。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的黑人奴隶约有 50 万人，至于土著的印第安人，从 17 世纪初，即白人殖民者第一天踏上美洲的土地开始，便遭受到野蛮的屠杀。虽然他们曾经进行过英勇的抵抗和斗争，但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印第安人是无法与由火枪火炮武装的白人侵略者相匹敌的。加之，印第安人各部落之间又缺乏必要的联系，因此逐渐被各个击破，不得已逃入西部。

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成分复杂，既有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以及半封建的经济，又有奴隶制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在北部的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和罗德岛。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得极快。其中造船业、冶炼、铁器制作和纺织业最为发达。此外，面粉加工、玻璃制造、锯木等行业也有相当规模。到 18 世纪中期之后，北美殖民地的工业生产在宗主国的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以造船业为例，1774 年英国商船的总吨位中的三分之一是由北部殖民地制造的。

北部殖民地还以罪恶的“三角贸易”闻名。所谓三角贸易，是指北美的商人将西印度群岛的蜜糖运至北部殖民地加工成甜酒，然后将甜酒运到非洲换取黑奴，再将黑奴运至北美大陆和西印度群岛贩卖，可获几倍的高额利润。这些利润大多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为北部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条件。此外，北部与其它殖民地和欧洲的商业贸易也十分繁荣。

封建和半封建经济因素集中在中部的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等州。这种经济形式主要是从英国移植过来的。在殖民地开拓之初，英王曾将大片的土地赠给一些移居到殖民地的贵族，形成了大地主。大地主通常将其地产分成许多小块出租，收取地租。但是，这种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经济在殖民地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北美殖民地的主要人口是自由小农。该地区农业经济发达，小麦出口量较大，故有“面包殖民地”之称。

北美的奴隶制是具有特殊性的种植园经济，主要集中在南部的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在经营方式上，几近古代的奴隶制。在每个种植园中都役使着大量的黑奴，这些黑奴对于奴隶主来说，仅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奴隶主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北美的种植园奴隶制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伴生物而出现的。种植园的产品大部分变成商品进入市场，它与欧洲市场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所生产的烟草、蓝靛等主要销往欧洲。因此，这种奴隶制度实际上是种植园主为攫取最大值的利润，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采用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对古代奴隶制的简单重复。除了黑人奴隶制度之外，北美还存在着白人契约奴制度。契约奴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愿契约奴，另一种是强制契约奴。前者大部分是那些因到北美没有旅资而借贷，到目的地之后，以无偿劳动偿还旅资的贫困白人。此外，还有一部分是无力偿还债务，被法庭判给债主的契约奴，期限一般在5—7年。后者主要是那些因犯罪被判在北美服苦役的罪犯，期限一般在7—10年。契约奴在契约期满后获自由，并可领取一小块土地，成为自由农民，但必须向地主交纳代役租。在17世纪中叶之前，契约奴制度在北美极为流行，此后，黑人奴隶制逐渐取代了契约奴制。

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在18世纪中叶之后，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各地区之间的商业交流日益频繁，统一的民族市场逐渐形成。尽管北美移民来自欧洲的许多国家，但大多数移民是英国人，英语成为共同语言。在日益频繁的商业交往中，文化事业也发达起来。从17世纪30年代起，北美殖民地先后兴建了哈佛、耶鲁、普林斯敦、宾夕法尼亚等大学。这些大学的毕业生遍及北美各地。此外，各个殖民地还逐渐兴办了图书馆、报馆等。公路、航运也日渐畅通，邮政事业也发展起来，使各地之间的文化信息交流日益密切。共同的地域、语言和文化，逐渐使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特征。到18世纪中叶，美利坚民族形成了。

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尖锐化 北美殖民地各州除了总督和英工设置的管辖机构外，还设立了由殖民地居民选出的州议会，但实际上各州的政治经济大权则完全操在后者手中。

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后，英国仅将它看成是一个原料供应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因此，对于殖民地独立经济的发展，始终采取控制政策，从17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以制裁走私为名，派军舰在北美沿海巡弋，使北美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大受影响。此外还颁布了一系列控制北美殖民地生产和对外贸易的法令。如1660年英国颁布《列举商品法》，1663年颁布《主要商品法》，1699年颁布《羊毛法令》，1733年颁布《糖税法令》，

1750年颁布《制铁条例》等。以上法令，或是禁止殖民地对外出口某些商品以及殖民地各州间某些商品的贸易，或禁止生产英国国内可以生产的利润较大的商品，或是禁止殖民地对外贸易时使用它国货船，而必须用英船运载。这些法令不仅极大的束缚了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了殖民地的对外贸易。英国当局这种作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北美殖民地永远保持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的状态，以利于本土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本国工业的发展。英国当局的作法，引起了殖民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利用议会不断向英国殖民当局抗议，而下层人民则用武装起义和暴动的形式来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剥削和压迫。1676年，弗吉尼亚的农民在纳撒尼尔·培根的率领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1688年，波士顿爆发起义；1689年新英格兰发生暴动；1712年，纽约爆发起义；1768年，宾夕法尼亚又爆发起义。这些起义和暴动沉重打击了宗主国在殖民地的统治，而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更使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763年，英法之间的“七年战争”结束。从战争中摆脱出来的英国，为了弥补由于战争而造成的损失，进一步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搜刮。此时，英国工业革命正在进行，急需大量的工业原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因此，英国当局对殖民地经济在“七年战争”期间的发展，深感不安，于是，又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控制措施。

1763年，英国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北美殖民地的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广大地区为英王室的私有财产，禁止任何人移居开垦，否则以“非法占地”论罪。这一法令的目的在于保证英国殖民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永久控制权，保证英国皮毛商人在该地从印第安人手中收购皮毛的专利。这一法令颁布后，在北美人民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北美下层人民普遍希望能够到西部去开垦土地，土地投机商则渴望到西部去从事土地投机，南部种植园主也希望去西部发展种植园经济。然而，这一法令使这些人的希望统统破灭，此后，殖民地各阶层反英情绪益发强烈。

1765年，英国政府颁发了《印花税法》。该法令规定，凡殖民地的商业合同、广告，以及一切文字证明文件甚至包括报纸等，都必须贴印花，方能使用和发行，英国政府的这一行径，几乎侵害了殖民地所有人民的利益。因此，《印花税法》一颁布，工人、农民、商人、种植园主纷纷行动起来，走上街头，抗议英国这一无理的征税法令，并组成了群众性组织“自由之子社”和“自由之女社”，领导人民反对《印花税法》。在反对《印花税法》斗争期间，波士顿、纽约等地的人民闯入税务机关，焚烧了大批的印花税票，后又提出“宁穿土布，不失自由”的口号，抵制英国的丝绸的倾销，使英国商人蒙受了几十万英镑的损失。同年10月，纽约等9个殖民地联合举行了反印花税的代表大会。在会上，代表们通过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及其不满原因的宣言”，指出，只有殖民地的议会才有权征税，而殖民地在英国国会并没有议员，因此英国国会无权在殖民地征税。同时要求英王允许殖民地的代表参加英国国会，否则殖民地将以抵制英货的行动来反对《印花税法》。在殖民地的强烈反对下，英国不得不废除了《印花税法》。

1767年，英国又颁布了《汤森德税法》，规定输往殖民地的颜料、玻璃、纸张等商品必须征税。这一税法使北美人民刚刚平息下去的反英

情绪又高涨起来。波士顿人民首先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府，宣布不接受《汤森德税法》。弗吉尼亚人民则成立了抵制英货委员会。为了推行《汤森德税法》，英国政府派来了军队。1768年，英国军队在波士顿与抵制英货的人民发生了冲突，遂使北美人民抵制英货的运动更加高涨。1770年3月5日，英军再度与波士顿人民发生冲突，当场开枪打死了群众数人，这就是“波士顿血案”。血案之后，殖民地各地人民纷纷举行示威，抗议英军的暴行。波士顿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葬礼，迫使英军退出了波士顿。英国国会也不得不撤销了《汤森德税法》。

波士顿血案使殖民地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英国政府的凶恶面目。1772年，马萨诸塞州的反英志士在塞缪尔·亚当斯的领导下，首先成立了反英组织“通讯委员会”，不久弗吉尼亚等5个州也成立了相同的组织。“通讯委员会”的宗旨是将这些州的反英力量联合起来，沟通各地的反英斗争情况，统一指挥行动，筹备军火，准备武装反抗英国的统治。

1773年，英国政府为了帮助东印度公司卖掉库存的茶叶，授予该公司在北美直接销售茶叶的专利，这一做法将使殖民地的茶商损失极大。同年11月，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货船抵达波士顿港口，波士顿人民举行示威，要求该货船驶离港口。当货船拒绝示威群众的要求后，愤怒的人们于12月16日将该货船上的茶叶全部倾入海中，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波士顿倾茶事件之后，英国政府遂颁布法令，封闭波士顿港口，禁止该港口对外贸易，取消马萨诸塞州的自治权，任命北美英军总司令盖治将军为该州总督。同时派兵前往波士顿镇压。此外，英国重申1765年的《驻兵条例》，英军可自由在殖民地任何地区、任何房屋驻扎，并宣布英国官吏犯罪只能送到英国去判罪。此外，还颁布了《魁北克法令》，宣布俄亥俄河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入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禁止北美人民向西占地等。这些法令被北美人民称为“不可容忍法令”，进一步激起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浪潮。

第二节 独立战争的进程

独立战争的开始 1774年5月27日，弗吉尼亚议会呼吁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共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计，得到了各殖民地的响应。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佐治亚除外）的代表会议在费城召开，史称“第一届大陆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多数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提出不与宗主国彻底决裂，但必须以英国接受不经殖民地同意不得征税的要求为前提。少数极端保守的代表则极力主张殖民地应永远隶属英国。大陆会议期间，殖民地人民到处举行示威，并在通讯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抵制英货的运动。在广大殖民地人民群众的推动与压力下，大陆会议通过了《权利宣言》。《权利宣言》提出，反对英国的高压政策，取消英国在殖民地的各项税收法令，取消对殖民地工商业的限制，实行殖民地内部自治。此外，会议还通过了给英王的请愿书。但是英王乔治三世拒绝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请愿书，并宣布将用武力来解决北美殖民地的问题。

1775年4月18日夜，英军得知波士顿附近的康科德藏有殖民地民兵

的大量武器，遂派兵前去搜查。次日，当英军进行到列克星敦附近时，遭到民兵的伏击，英军狼狈逃走。列克星敦的战斗，标志着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独立战争的开始。史称“列克星敦的枪声”。“列克星敦的枪声”掀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

“列克星敦的枪声”鼓舞了北美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信心，武装斗争在殖民地各处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10日召开。在会议上，大部分代表仍主张与英国和解。只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大陆会议最后才勉强同意承担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的任务，任命乔治·华盛顿（1732—1799年）为总司令，领导民兵武装抗击英军。

乔治·华盛顿（1732—1799年），出生于弗吉尼亚的一个大种植园主家庭。曾参加过七年战争。因战功晋升为上校。后当选为弗吉尼亚议会的议员。独立战争中，华盛顿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卓绝的勇气，领导北美殖民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他去世后，被美国人民称为“合众国之父”。

第二届大陆会议虽然领导了人民的武装斗争，但是大多数代表仍然主张一旦英王让步，就立即放下武器实行“和解”。然而，殖民地人民则用英勇的战斗，使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迅速向前发展。1775年6月17日，英军发动了对波士顿附近的班克山民兵据点的进攻。据守在班克山的3000名民兵英勇战斗，击退了英军数次进攻，后来因弹尽援绝，才撤离阵地。此后，华盛顿率领民兵包围了波士顿，驻扎在波士顿的英军被迫撤退。随着战场上的胜利，北美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期间由汤姆士·潘恩（1737—1809年）所写的小册子《常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潘恩出身贫苦家庭，1774年来到北美。1776年1月，他所写的《常识》出版。在这本小册子中，潘恩强烈抨击了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批判了那种依赖英国的殖民地思想，陈述了英国统治对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种种害处。他指出，现在已经不是辩论的时期了，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最后的争端。他满怀激情地向人们呼吁，“站起来吧，接受自由”。潘恩的小册子一发行，便被抢购一空，人们都被潘恩的思想和热情所感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居民都读过这本书。《常识》在唤起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促使殖民地人民将独立作为自己战斗的唯一目标的宣传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独立宣言》 随着殖民地人民反英武装斗争的飞速发展，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的时机日渐成熟。1776年4月，北卡罗来纳的代表在大陆会议上提出独立的要求。随后，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州的代表也起来响应，宣布独立。6月7日，弗吉尼亚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应马上宣布独立。7月2日，大陆会议通过了这个议案，并指定托马斯·杰弗逊等5人负责起草《独立宣言》。

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杰弗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一个政府“企图把人民压抑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宣言历数了英国政府对殖民地所犯下的种种罪状，宣布北美十三州殖民

地从此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从属关系，废止与英国的一切政治联系。在宣言的草案上，杰弗逊谴责了奴隶制度，认为北美的奴隶制度侵犯了黑人的“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但是由于南方奴隶主代表的强烈反对，才被迫删除。

《独立宣言》是一个洋溢着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伟大的历史文件，是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旗帜和号角。它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宣布了主权在民和人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一宣言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的蓝本。马克思对这一文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它为“第一个人权宣言”。

《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因此7月4日成为美国的国庆日。同时，宣言也极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的斗志，使独立战争成为每一个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事业。

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 北美独立战争是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业和军事强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实力以及广大的殖民地。当时的美国，人口不足300万，军事力量仅有2万多名装备一般的民兵和仓促建立的数万大陆军。然而，由于这场战争关系到每个殖民地人的命运，殖民地的每一个人都自觉加入了这场战争。因此，就整个参战人数来讲，北美殖民地又占有绝对的优势。加之本土作战，拥有地利之便，从而越战越强。英国殖民军队尽管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但军心涣散，士兵厌战。虽然拥有9万之众的军队，但由于战线较长，经常疲于奔命。在大陆军和民兵的游击战和歼灭战战术结合的攻击面前，束手无策。因此，英军的失败，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北美独立战争自1775年4月的列克星敦的枪声开始到1781年10月战争结束，历经6年多的时间。在战争开始的最初两年，北美殖民地军队处于守势。而英军则制定了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将南北中各个殖民地分割开来，逐个消灭各州的民兵武装和大陆军。英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新英格兰。1776年8月，英军从海陆两面进攻纽约，目的是占领纽约后，沿哈得逊河北上，切断新英格兰与其它的殖民地的联系。在英军的进攻下，纽约失守，华盛顿向新泽西撤退。次年9月，大陆军的另一个重要据点费城又被英军占领，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此时，英军的另一支部队从加拿大沿哈德逊河南下，企图完成对大陆军的包围，由于不断遭受民兵和大陆军的骚扰和进攻，于1777年9月只好退守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新英格兰地区的民兵和大陆军以优势的兵力很快将这支英军包围起来。同年10月17日，这支英军的司令柏高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部投降。这就是著名的萨拉托加大捷。萨拉托加大捷粉碎了英军的战略计划。此后，美军由战略上的守势逐渐转为攻势。因此，这次战役成为独立战争的转折点。

独立战争爆发后，北美人民的正义事业受到国际上的进步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与英军作战中，约有7000多名欧洲进步人士以志愿军的身份参战，其中有法国的拉法叶特、波兰的科斯秋什科等。与此同时，大陆会议也展开了与欧洲各国的外交活动。1776年3月，大陆会议委派富兰克林出使法国，利用英法之间矛盾，促使法国对英作战。萨拉托加战役后，富兰克林加紧活动，使法国于1778年2月承认北美独立并与美

国缔约，并于同年6月对英宣战。1779年及1780年西班牙和荷兰也先后参加对英战争。此外，俄国和普鲁士也组成了针对英国的武装中立同盟。不久，奥地利、瑞典、丹麦等国也组成了“武装中立联盟”。法、西、荷三国的海军不断进攻英国的船舰，使英国失去了海上优势。

此后，北美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北美大陆军由最初的几万人增加到15万人，而在北美大陆的英军只有11万人。英军在北美大陆的北部和中部已经完全处于守势，只是在南方由于王党部队的支持，英军尚能组织进攻。1778年12月，英军占领南部殖民地佐治亚，次年5月又攻占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重镇查理斯顿，又于1780年8月在坎姆登附近击败大陆军。尽管大陆军的正规部队在南部不断受挫，但南部的民兵游击队却十分活跃，不断给英军以重创。1780年10月，南部民兵游击队在王山战役中又歼灭英军的一支部队。

1781年5月，在南部的英军主力在康华里将军的指挥下，进入了弗吉尼亚，并大肆蹂躏弗吉尼亚的沿海地区。同年8月，华盛顿率领大陆军主力北上，在拉法叶特指挥的法国志愿军团的援助下，将康华里率领的英军团团围在约克镇。9月，法国海军在约克镇附近的海面击败英国的支援舰队，切断了龟缩在约克镇的英军与外部的联系。1781年10月19日，弹尽粮绝的7千英军，在康华里的带领下，被迫向大陆军投降。由于这支英军是在北美英军的主力，它的覆灭，成为北美独立战争结束的标志。

1783年9月，美、英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将从法国人手中夺来的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也划归美国，使美国的领土由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万平方公里。并确认美国的疆界为北起加拿大，东至大西洋，南达佛罗里达，西迄密西西比河。

第三节 独立战争后的人民斗争

谢司起义 北美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在独立战争中曾付出重大牺牲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但没有因此摆脱贫困的境地，反而遭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和压迫。窃取了独立战争胜利果实的大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本阶级的政策。

为了转嫁战争负担，美国各州政府强迫广大劳动人民交纳比从前还要沉重的赋税。仅以马塞诸塞州为例，各种税收的总和，竟达农民总收入的2/3以上。大陆会议曾于1777年做出决定，给参加独立战争的士兵们分配土地，并发给土地证券。战后由于物价的持续上涨和货币贬值，回到家乡的士兵无法生活，只好将土地券出卖给土地投机商和大资产阶级。1784至1787年间，美国国会先后颁布了3个法令，规定西部土地的所有权归邦联政府，并由政府负责出售。出售的最小单位为640英亩，每英亩售价1美元，合计640美元，一月之内付清。这对于当时的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件望尘莫及的事情，从而完全剥夺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购买土地的机会。此外，美国各州还颁布了债务法令，凡在归定期限内无法偿还债务者，将受法律制裁。严酷的生活现实，终于使下层劳动人民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独立战争后不久，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州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和暴动，规模最大的是1786年由丹尼尔·谢司领导的农民起义。

丹尼尔·谢司（1747—1825年）出身于贫苦家庭，独立战争期间，因战功晋升为上尉。战争结束后，谢司回到家乡，也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1786年夏，谢司在康科德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者主要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谢司提出“重新分配土地和取消债务”的口号，受到四方的贫苦人民的拥护，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500人。起义者到处攻打法院，烧毁债务诉讼档案。谢司起义震动了邦联政府的统治。1787年1月，政府要求和起义军谈判，起义者对政府开始放松警惕，以为谈判便可以解决问题。政府则趁此机会调兵遣将，准备一举歼灭起义军。当政府援军开到后，政府马上停止了谈判，并将起义军包围。谢司率领部分起义者突出重围，来到西部。谢司本想重振队伍，但终因缺乏人力物力，只好作罢，起义失败了。

谢司起义极大地震动了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加强国家机器，防止人民的起义和暴动。为此，他们强烈要求放弃1781年邦联政府颁布的《邦联条例》。根据这一条例，美国只是一个由13个独立州组成的松散的邦联，每个独立的州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邦联不设国家元首，邦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各州派代表组成的邦联议会，各州只有一票的表决权。一切重大事务，均需经13州中的9州同意，方能解决。议会的常设委员会是由每州一名代表组成的各州委员会。同时，邦联议会既没有征税权，也没有对外贸易权，因此无法颁布全国统一的关税，致使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北美大陆，严重威胁着美国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尽管“条例”规定国会有发行货币、债券、宣战和组织武装部队的权力，但这一切权力由于没有足够的财政基础支持，实际上形同虚设。而各州由于拥有自己的军事、财政、外交权力，使邦联政府根本无法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独立战争中邦联政府发行的大量公债，也由于以上原因，无法偿还。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旦爆发全国性的起义，邦联政府根本无力镇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各州开始酝酿制订一部能够体现统一国家的宪法，以建立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1787年宪法 1787年5月25日，美国各州代表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经过长达4个月的讨论，于9月17日通过了美国联邦宪法。

1787年宪法总的原则是三权分立。根据宪法规定，美国是一个按照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总统掌握行政权，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总统既是美国政府的最高行政首脑，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他有权力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任命高级官员，缔结国家条约，但须经参议院同意。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在紧急时期有采取宪法外措施的权力。总统如犯有叛国、贿赂等罪行时，应受到弹劾和免职。国会是国家最高的立法机关，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众议院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出，参议院议员由各州立法会议选出，任期均为两年。国会拥有最高立法权，但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总统批准才能生效。国会拥有征税、征兵、货币发行、宣战、批准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以及批准总统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审判弹劾案等权力。国会决议如经总统否决，经国会众、参二院再以2/3多数票通过，也可直接生效。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终身任职。高等法院有权根据宪法解释一切法律和条约，如

它认为某项法律违宪时，可以宣布无效。

1787年宪法完全体现了大资产阶级和大种植园主的意愿。在这部宪法中只字没提人民的民主权利，只字没提废除黑人奴隶制度。在各州制订的法律中，都不同程度的对下层劳动人民以及黑人和印第安人的选举权进行了限制，遭到广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因此，1789年，国会对宪法提出10条修正案，即《人权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宗教信仰、集会、请愿的权利以及人身、财产、住所、文件的不可侵犯权等。这一修正案于1790年通过，于次年开始生效。

1788年宪法生效，美国选出了国会，选举华盛顿为美国的第一届总统。

美国1787年宪法的颁布，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这一宪法使美国成为真正的统一国家，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和共和政体，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就历史发展趋势来说，这部宪法是一部进步的历史文献。作为第一部成文的资产阶级宪法以及它所确立的三权分立和制衡的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的君主超越法律的现象，也防止了新政府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对于200多年来美国政局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欧洲各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的建设和宪法的制定，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北美独立战争的意义 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使北美人民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美洲建立起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次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战争，也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胜利，不仅使北美人民从宗主国的殖民枷锁下挣脱出来，而且消灭了北美大陆上的封建残余，如长子继承制和嗣续限定法、代役租、贵族称号以及白人契约奴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北美独立战争给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了榜样。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下，拉丁美洲人民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也开展起来。同时，也给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以极大的推动。

但是，北美独立战争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美国下层劳动人民没有获得真正的选举权，真正享有选举权的只有资产阶级。这次革命没能消灭美国南部的黑人奴隶制，也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美国南部与北部沿着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发展。因此，这就决定了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内战爆发的必然性。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三章。

乔明顺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二章。

王荣堂、姜德昌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第五章。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第五章。

刘祚祥、光仁洪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第四章。

[美]帕尔默、科尔顿著：《近代世界史》第八章。

复习题：

1. 北美独立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
2. 评价《独立宣言》。
3. 《1789年宪法》的原则和实质。

第四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革命的开始与君主立宪派的专政

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和三级会议 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路易十六是一个同他的前辈一样昏庸的国王，整日耽于淫乐，不理朝政。王后玛丽·安东尼奢侈无度，使王室的开支不断增加。路易十六时期，法国为了打破英国的海上优势和殖民霸权，卷入北美独立战争，耗费了巨大军费，从而使国债比路易十五时期增加了三倍，达20亿锂。尽管国家出现了巨大的财政危机，拥有巨额财富的第一二等级仍然享有免税权，使国家税源大受影响。为了摆脱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先后任命经济学家杜尔果、日内瓦银行家内克等人进行财政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取消第一、二等级的免税特权，教士和贵族必须向国家交税，取消对工商业的一些限制，减轻农民负担等等。但是这些改革先后由于第一、二等级的反对而失败。法国的财政已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财政危机的同时，法国又爆发了空前的工商业危机。1786年，英法两国订立了贸易条约，根据条约，英国商品可以享受低税率的待遇。此后，大批物美价廉的英国货物涌进法国，造成了法国的棉织品、皮革、制帽等传统工业减产，许多手工工场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的后果。1788年和1789年，法国农业由于自然灾害，连年歉收，造成粮价空前上涨。广大下层人民在承受无尽的苛捐杂税的同时，已无法经受上述的种种灾难，纷纷起来反抗。仅在1789年春，法国城乡就爆发了300多起人民起义。最有影响的是巴黎圣安东地区的工人起义。起义者与前来镇压的军队战斗了两天。此后，各省的人民起义和暴动也此起彼伏。预示着革命风暴的到来。

路易十六面对财政危机和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企图召开已有175年没有召开的三级会议来挽救其统治危机。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的各阶层群众也希望召开三级会议，企盼会议迫使路易十六接受改革。

1789年春，法国全国开始举行三级会议的选举，路易十六为了缓和人民情绪和拉拢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宣布将第三等级中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600名）。选举代表期间，各地人民群情激愤，撰写了大量的陈情书。陈情书的内容大多是要求制定宪法、废除封建特权和大土地所有权、保护私有财产、实现工商业自由、归还公社土地等等。资产阶级也为自己大造舆论。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贵族撰写文章和小册子，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的是自由贵族米拉波所撰《对普罗旺斯人的呼吁》、罗伯斯庇尔写的《对阿图瓦人的呼吁》、以及修道院长西哀耶斯所写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在《什么是第三等级》一文中，西哀耶斯写道：“什么是第三等级？是一切！它在政治等级中有何作用？没有。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有所作为”。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参加会议的第一等级的代表291人，第二等级的代表270人，第三等级的代表578人，第三等级的代表多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些同情第三等级的教士和贵族的代表，如西哀耶斯、米拉波等人由第三等级选出。大会开幕后，国王致简短的开

幕词，其内容只能归纳为一条，第三等级要出更多的钱，不许进行任何改革。然后，财政总监内克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但内容空洞，没有任何要改革的新意。之后，国王掌玺大臣宣布，各个等级只能按传统的方式开会，每个等级只能有一票表决权。如果这样，第三等级尽管代表人数多，但对表决将不会起到作用。为此，第三等级的代表强烈反对这种投票方式，提出三个等级必须在一起开会，投票时应以人数计票。为此，会议陷入僵局达一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巴黎市民成群结队的来到凡尔赛，聚集在会议大厅的回廊里，表示对第三等级的热烈支持。根据西哀耶斯的提议，第三等级的代表于6月17日宣布，第三等级单独举行会议，称为国民议会，选举巴伊为议长。国民议会召开之后，便通过了国王征税不合法，偿还国债，国民议会的法案任何人无权否认等决议。6月20日，路易十六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只好转移到网球场上开会。在会上，在巴伊的带领下，代表们激动地宣誓“永不脱离国民议会，将在形势需要的任何地方召开会议，直到宪法的制定并在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巩固”。这就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网球场宣誓”。此后，第一二等级的代表也纷纷参加了国民议会。7月9日，国民议会改名制宪议会。从此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攻占巴士底狱——革命的开始 制宪议会召开后，路易十六表面顺从，暗地却在调兵遣将，准备以武力解散制宪议会。由于当时巴黎驻军同情第三等级，国王只好从外省调兵。7月上旬，镇压军队陆续开到，路易十六露出了真面目。7月11日，路易十六免去被再起用的内克的财政总监的职务。由于内克采取的措施较为温和，所以比较受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支持。内克去职后，路易十六又任命狂热的王党分子德·布罗伊元帅主持军务，德·布勒杜伊为财政总监。布勒杜伊一上台，便扬言，只要国王需要，烧毁整个巴黎也在所不惜。这一切说明路易十六镇压制宪议会的决心已经下定。

7月12日，内克被免职的消息传出，巴黎人民愤怒了，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当游行队伍正在行进的时候，突然遭到国王的龙骑兵的血腥镇压。7月13日清晨，巴黎所有教堂敲响了警钟，巴黎的市民纷纷手持各种简陋的武器，走上街头去攻击军队，并攻占了武器库。深夜，巴黎的大部分地区已控制在起义者的手中，原三级会议的选举人会议代表借起义之声势，迫使原巴黎市政府同他们组成新的市政机构——常设委员会，并决定建立一支由12000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7月14日，起义群众包围了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座落在圣安东工人区的出口。里边关有大批的政治犯，监狱塔楼上架设的大炮，对准了市区。当群众发现一队龙骑兵悄悄开进巴士底狱时，便开始了进攻。监狱内的守卫负隅顽抗，激起起义群众的更大愤怒。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巴士底狱被占领。至此，起义群众控制了巴黎整个市区。

7月15日，巴伊当选为巴黎市长，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的自由派贵族拉法叶特成为“国民自卫军”的司令。

路易十六看到大势已去，被迫下令撤军，承认制宪议会，他的解散制宪议会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巴士底狱的被攻陷，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为了纪念这一光荣的日子，法国人民把7月14日作为法国的国庆日。

巴黎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在整个7月下旬，各省的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他们烧毁了贵族的庄园和一切地契及封建文书，夺取了土地和森林，这就是法国史上著名的“1789年大恐慌”。在各个城市里，市民纷纷仿效巴黎革命，捣毁了一切旧政权的市政机构，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和国民自卫军。这一事件，史称“市政革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和市政革命使法国的封建统治政权陷入了瓦解的状态。

八月法令 巴黎人民攻陷了巴士底狱之后，制宪议会获得了合法地位，并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制宪会议的代表成员十分复杂，除了第三等级的代表外，还有第一和第二等级的代表。会议中占优势的则是主张君主立宪的金融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西哀耶斯、巴伊、米拉波、拉法叶特等人。在君主立宪派的领导下，制宪会议、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贵族领主。8月4日夜，在制宪会议上，自由派贵族诺阿耶、埃吉永发言，建议贵族放弃部分特权。被农民运动吓得禁若寒蝉的贵族地主，纷纷上台发言，表示要放弃封建特权，全部废除封建制度。每一个发言的人，都在发言中标榜自己是为了“祖国”忍受牺牲和为了“民族博爱”而放弃自己个人的利益。这一夜，法国历史上称之为“奇妙的一夜”。

从8月4日夜至11日，制宪会议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统称为“八月法令”。八月法令的内容主要是宣布取消特权等级的免税权、司法权、教会的什一税等等。至于封建剥削的主要内容，如租赋和年贡，则需农民以地租30倍的价钱赎买。从八月法令的主要内容上看，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与此同时，制宪会议颁布的另一些法令，如取消行会制度和工业法规、粮食自由买卖、废除内地税卡、统一度量衡和币制，则对于发展资本工商业确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工商业资本家的欢迎。

八月法令颁布之后，各地的贵族并没有认真执行，而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在八月法令中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涉及到。至于赎买封建义务则更是一纸空文，因为没有一个是农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此，八月法令之后，农民运动继续发展。

《人权宣言》 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和原则，制宪会议从革命爆发后，便委派西哀耶斯、米拉波等人负责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并于8月26日颁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的基本政治内容和思想是18世纪以来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和思想再现，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全文共十七条条款。

《人权宣言》首先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保护人权口号的提出，受到了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和特权制度压迫之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拥护。

《人权宣言》针对封建专制制度下一切法律皆以国王意志为转移的情况，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制原则。宣言宣称：“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上的保护与处罚对于所有的公民都是一样的。

此外，宣言提出了“主权属于人民”和“分权”的原则。所谓分权，也就是孟德斯鸠所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立法权和司法权与君主的王权脱离，限制君主的权力。

宣言宣布了“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在最后一句中，宣言宣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人权宣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蓝本，集中表达了18世纪以来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主张，并将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权宣言》的发表，对于当时的法国革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给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人权宣言》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宣言所宣称的自由、平等的原则，实际上是建立在财产贫富不均的基础之上的。它所说的自由，只不过取消了封建专制制度下人对人的从属关系，代之以新的人对人的从属关系，即人民大众对资产阶级的从属关系。所谓平等，只不过是消灭了封建的门第不平等的现象，代之以新的财产上的不平等。至于“主权在民”更是一句空话，因为政权已经操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之下，广大劳动人民要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是完全不可能的。

制宪议会的措施 《人权宣言》颁布之后，制宪会议开始讨论有关法国宪法等问题。但是，路易十六不甘放弃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拒绝批准“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而且还向巴黎和凡尔赛调动军队，企图发动政变。10月5日，当这一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涌到凡尔赛，向国王示威。此时，巴黎粮荒极为严重，许多买不到面包的妇女加入了游行队伍。在凡尔赛王宫前，游行的人们大喊“面包，面包”。与此同时，巴黎的工人在《人民之友》报的号召下，也携带大炮向凡尔赛进发。当天下午，游行队伍包围了王宫，惊恐万状的国王不得不公开宣布承认“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次日清晨，游行群众又一次冲击王宫，遭到国王卫队的枪击，从而引起游行群众的极大的愤怒，并与国王卫队发生冲突。群众高呼“国王回到巴黎去”。在压力面前，国王只好答应群众的要求。10月6日下午，王室回到巴黎。随后，制宪会议也迁到巴黎。

制宪会议迁到巴黎后，在人民群众和一些革命团体的推动下，颁布了一系列反封建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1789年底至1790年底，制宪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改造法国天主教会和拍卖教会土地的法令。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并予以拍卖，以教产为抵押发行财政券；将教会土地分小块出售，付款期为12年（后改为4年）。但是拍卖的土地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买去。根据制宪会议《教士公民组织法》和《教士宣誓法》等法令，法国教会将脱离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废除旧教区，一律按新的行政区划分教区，教职均由公民选举产生，属于政府公职人员系列，旧教会的职事，如出生、死亡、结婚登记等，均由国家管理。这样，法国的教会完全国家化和世俗化了。此外，所有教职人员必须对宪法和《教士公民组织法》宣誓，否则将放弃教职。大批教士拒绝宣誓，宗教界分裂为同意宣誓的宪政派和拒绝宣誓的反抗派。为了改变旧日的松散和混乱的行政区域划分，同时也为了加强地方的政权改组和建设，1789年12月，制宪议会通过了由西哀耶斯起草的法案，将全国划分为83个省，省下设市、县，均设议会与政务厅，行政官员由选举产生。这一措

施有利于国家统一，进一步消除封建割据残余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1790年春，制宪议会又通过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由选举产生的法令，并宣布进行司法改革。1790年6月，制宪会议又颁布了废除贵族制度的法令。法令规定永远废除世代相承的贵族头衔，今后也不再授予任何人此类头衔，所有法国公民都必须使用其家庭的真实姓氏。为了扫除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制宪议会颁布了废除内地税和入市税，取消行会制度和工业法规，取消许多特许公司，如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等法令。这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是在为最后制订宪法做准备。以上各项措施后都成为宪法中的条款。除以上反封建的法令外，制宪议会也制定了一些反人民群众的法令。最典型的是1790年10月通过的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的戒严法和1791年6月通过的《勒·霞不列法》。后者规定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罢工，违者将课以罚金和判刑。以上两个法令暴露了君主立宪派的阶级局限性。

政治俱乐部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国内的政治生活日益活跃，各种政治派别通过各种政治集会，都在竭力向人们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在此基础上，法国政坛上出现了各种政治俱乐部。

最具影响力的俱乐部是“宪法之友社”。因它经常在雅各宾修道院集会，又被称为“雅各宾俱乐部”。最初这个俱乐部成分十分复杂，既有大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等立宪派分子，又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下层劳动人民。雅各宾俱乐部在外省也设有许多支部。1791年后，以大资产阶级为首的立宪派退出了俱乐部，俱乐部逐渐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组织，但是，俱乐部仍分为两派。一派是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其成员多是来自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又被称为吉伦特派。该派尽管主张建立共和国，但又反对群众参加革命。另一派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1794年）出身于阿拉斯的一个律师家庭，本人也是一个律师。罗伯斯庇尔同卢梭一样，反对大私有者，维护小私有制，同情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处境。在革命之前，他便在下层劳动人民中宣传革命，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1788年，它当选为阿拉斯第三等级的代表，参加三级会议。在制宪会议里，罗伯斯庇尔经常发表演说，坚决主张摧毁封建制度，依靠人民的力量建立共和国，激烈地批判了大资产阶级主张君主立宪的行径。因此，罗伯斯庇尔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护，并在革命的后期起过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俱乐部是哥德利埃俱乐部，它的正式名称是“人权之友社”，因其会址设在哥德利埃修道院而得名。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多是城市贫民，因而成为下层劳动人民革命活动的中心。这一俱乐部的宗旨是通过舆论手段，揭露各种损害人民利益的人和事，争取民主和扩大民主力量。该俱乐部的领导人主要有马拉、丹敦、阿贝尔等人。

马拉（1743—1793年）是一位杰出的医生、科学家和政治家。1774年，马拉在英国出版《奴隶制枷锁》一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和封建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1789年，他创办了《人民之友》报，并以此为阵地，同王党和君主立宪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大力宣

传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承担革命主力军的任务。丹敦（1759—1794年）是一名律师。他同马拉一起，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演说家。他的生动热情的演说，吸引了许多人参加革命，在推翻君主立宪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丹敦的宣传起过很大的作用。

此外，大革命爆发后，在巴黎和外省也建立了许多俱乐部，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巴黎的“社会小组”，其领导人是卢梭的狂热信徒彭维尔，成员多为下层劳动人民。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不仅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同时还要求平分财产，使每个劳动者都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这一俱乐部代表了一些主张实现原始共产主义原则的下层人民的利益。

各种政治俱乐部的出现，反映出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法国思想和舆论界的活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为法国大革命的继续发展创造了舆论条件。

革命的深入与《1791年宪法》 1791年6月20日夜，路易十六偕同王后偷偷离开巴黎，企图逃往德国。但是在途中被人认出，随后在瓦伦被群众截住押回巴黎。这一消息传出后，巴黎数万人上街游行，要求审判国王，成立共和国。但是，制宪会议一味地为国王开脱，并说国王是被人拐走的。7月15日，制宪议会通过了一个为国王恢复名誉的决议，这一决议使巴黎群众更为愤怒。哥德利埃俱乐部于当日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号召人民不承认国王，指斥国王是法国人民的叛徒，并征求各俱乐部的意见。在讨论这一请愿书时，哥德利埃俱乐部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不同意这一请愿书的成员退出了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出现了分裂。上述不同意请愿书的两个俱乐部的成员，其中包括巴伊、拉法叶特、巴那夫等人，与早在1790年春就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并另外成立“1789年社”的立宪派分子，后来成立了斐扬俱乐部。至此，法国政坛逐渐变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雅各宾派，另一个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君主立宪派的斐扬派。

7月17日，数千群众响应哥德利埃俱乐部的号召，在马尔斯广场集会，要求国王退位，成立共和国。制宪会议下令镇压，拉法叶特率兵前往，造成死伤数百名的惨案。50多名群众被军队打死。这一事件标志着大资产阶级立宪派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分裂，立宪派已公开地背叛了革命和人民。尽管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在革命初期，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封建的措施，客观上为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扫清了道路，也为未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限制专制王权，自由发展资本主义之后，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必然要压制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防革命深入，危害其切身利益。马尔斯广场事件充分暴露出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的阶级局限性，说明君主立宪派已不可能使革命深入发展下去，他们已由革命的领导阶层变成了革命的障碍。

在镇压了共和运动之后，制宪议会加紧了制定宪法的工作。1791年9月3日，制宪议会正式通过了宪法，这就是《1791年宪法》。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国家。立法权属于一院制的立法议会，立法议会是国家最高的主权机关。行政权属于国王，对高级军政和外交官员有任命权，对立法议会的法案有“搁置否决权”，但国王在即位一月之内必须宣誓

效忠国家和法律，否则以放弃王位论处。国王命令须经有关部长副署方能生效，部长则必须接受立法议会的监督。司法权属于由选举产生的法院，实行司法独立原则。任何由宪法产生的权力机关均无权更改宪法。此外，宪法还规定新教徒与犹太人与其它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1791年宪法》是对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制宪议会各项反封建措施和法令的概括和总结，是君主立宪派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一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将国王变成了君主立宪派手中的工具，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但是由于行政首脑（国王）并非民选，使这一宪法带有很大的妥协性。

《1791年宪法》尽管将《人权宣言》作为序言，但是在正文关于选举资格的规定中，按照财产资格，又将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低于财产资格的人将成为没有选举权的“消极公民”，从而剥夺了广大下层人民的选举权。这一规定不仅与《人权宣言》的平等原则相悖违，同时，也与宪法本身关于“主权属于国民”的原则相矛盾，具有明显的反民主的倾向。

立法议会及其派别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次日（10月1日）按照宪法选出的立法议会召开，标志着法国正式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立法议会是由“积极公民”选出的，因此在全部745个代表中，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制宪议会的决定，制宪议会的议员不得当选为立法议会的代表，因此，许多特权等级的代表无法通过立法议会干扰立法工作。

在立法议会中，斐扬派占264个席位，构成了议会中的右翼，并得到各省地方政府、军队的支持。占有345个席位的中产阶级代表，其政治态度暧昧，但多数时候比较倾向于斐扬派。议会中的左派仅占有136个席位，其代表多是来自雅各宾俱乐部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的成员。但左派内部并不一致，占优势的是代表各省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左派中势力较弱的是雅各宾派中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因在议会中座位最高而被称为“山岳派”。

立法议会始终进行着激烈的政治论战。斐扬派从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立场出发，拥护宪法，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吉伦特派不满足于现有的革命成果，希望法国能够进一步民主化，并倾向于共和制度。但是，吉伦特派不希望人民群众进一步参加革命，因为他们害怕人民革命会损害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雅各宾派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决要求团结广大的人民群众进一步革命，把实现法国民主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进行到底。因此，这一派在社会下层中拥有广泛的拥护者。

对外战争的开始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大批的旧贵族逃到国外，并以德国的科布棱茨为麇集的中心，进行政治上军事上的准备，并和国内的王党势力遥相呼应，妄图消灭革命，卷土重来。随着法国革命的影响在欧洲日益扩大，欧洲的各个君主专制国家的君主也都蓄谋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以消除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带来的威胁。1791年8月27日，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国王在庇尔尼茨发表宣言，宣称法国必须解散议会，恢复国王的权力，否则欧洲各国将共同援助法王，对法国

发动战争。在巴黎的路易十六，也频频向欧洲各国发信，要求欧洲各国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

面对外国军事力量的威胁，掌握政权的斐扬派仍然希望与欧洲各国和解，避免战争。吉伦特派是强硬的主战派，认为战争可以缓和国内的矛盾，并可以带来扩大国外市场的好处。雅各宾派不主张立即进行战争，认为当务之急应肃清国内的王党分子，巩固革命成果。

1792年3月23日，路易十六鉴于斐扬派的政治影响日益削弱，免去斐扬派内阁全部成员的职务，授权吉伦特派组阁。路易十六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还包藏着这样的祸心，他期望主战的吉伦特派发动战争，将引起全欧洲的封建势力对法国的进行干涉，使法国战败，从而恢复其王权。

4月20日，吉伦特内阁通过了对奥地利宣战的决定。28日，法军在拉法叶特、罗尚博、吕克内等统帅下，向奥军发起进攻。不久，普鲁士加入奥军阵线，长达20年的对外战争开始了。

战争初期，尽管法军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奥军，但是由于指挥军队的高级军官多为王党分子，不愿作战，一味延误战机，加之国内王党不断向奥军传送情报，王后甚至将军队的调动计划秘密送往奥地利，以致法军屡次失利，普奥联军侵入法国，直逼巴黎。路易十六自以为国外干涉必然得逞，遂又免去吉伦特派内阁全体大臣的职务，重新任命斐扬派分子组阁。

前线的失利和国王几近叛卖的行径，激起了巴黎人民的强烈义愤。6月20日，巴黎群众举行示威，高呼“召回爱国者部长”的口号，并冲进了王宫。面对现实，吉伦特派的代表开始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国王。吉伦派的代表维尼奥在立法议会上公开指责路易十六“使祖国的力量瘫痪了”，是所有阴谋活动的根源。7月11日，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共同抵抗外国干涉，保卫祖国。这一号召得到了人民的广泛响应，各地纷纷组织了志愿军，奔向巴黎和东北前线。马赛的义勇军高唱着由卢日·德·里列所作的《莱茵军歌》，步行27天来到巴黎。这首歌不久便风靡法国，这就是著名的《马赛曲》，1879年，这首歌被定为法国的国歌。

第二节 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

1792年8月10日革命 前线的失利和国王及其工党的叛卖，引起了人民的极大的愤慨。此时，雅各宾派开始利用人民高涨的革命情绪，进行了广泛的反对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宣传，同时加紧进行武装推翻国王的准备。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从6月份开始，便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演说，揭露国王与外敌勾结的阴谋，谴责立法议会不对祖国不负责任的态度，并号召人民起来再次革命，废除国王，取消立法议会，建立国民议会。雅各宾派的革命口号得到了巴黎和各地人民的响应。

7月25日，普奥联军司令布伦瑞克发表宣言，声称如果法王受到丝毫侵犯，巴黎将受到“军事惩处直至毁灭”。这一消息传到巴黎后，群众愤怒到了极点。在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巴黎的人民武装和各地的志愿军开始酝酿起义并成立了秘密指挥部，从而有了统一的领导。8月9

日夜，巴黎各区的人民武装在秘密指挥部的布置下，以警钟为号，准备起义。午夜 12 时，法兰西剧院区响起了钟声，起义开始了。次日晨，各区的起义队伍包围了王宫，经过激战，消灭了保卫王宫的瑞士雇佣军，俘虏了国王。

起义开始后，巴黎各区的人民代表来到市政厅，接管了政权，并宣布成立领导起义的巴黎公社。随后，巴黎公社的代表来到立法议会，提出废黜国王，召开国民公会的要求。在武装压力面前，立法议会通过决议，接受了巴黎公社的全部要求。还规定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 21 岁的男性公民按两级选举制选出。同时，立宪议会还任命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作为内阁，其成员主要是吉伦特派分子，雅各宾派只有丹敦担任了司法部长。19 日，法军指挥官拉法叶特和拉梅特叛逃，标志着斐扬派完全投到王党的阵营中。

1792 年 8 月 10 日的革命，结束了君主立宪政体，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吉伦特派的统治和瓦尔密的胜利 8 月 10 日革命之后，吉伦特派掌握了政权。它在巴黎公社和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采取了一系列较之斐扬派激进的政策。8 月 15 日，立法议会宣布国王及其家属成为人质，并调整了法国军队中高级军官的人选，撤换了一大批斐扬派军官的职务。此外，吉伦特派通过立法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土地政策。新的土地政策规定：农民可以逐渐分期地赎买没有废除的封建义务；凡是贵族地主不能提供原始证据的土地，农民可不再承担租赋和封建义务；领主占有的农村公社的土地必须退还，按户分给农民；将逃亡的贵族地产租给农民无限期的使用等等。新的土地政策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的热情。

吉伦特派在完全控制了巴黎的局势之后，立刻暴露出其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他们置外敌于不顾，却将矛头对准了以雅各宾派为首的下层革命群众。吉伦特派认为，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的任务应是消灭“无政府状态”。换言之，就是要广大人民群众不再参加革命，以防对新政权造成威胁。8 月 10 日起义之后，吉伦特派视在 8 月 10 日起义中起决定作用的巴黎公社为眼中钉，多次试图解散它。因为它的存在，实际上象征着巴黎存在着两个政权，这是工商业资产阶级所不愿看到的。

正在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候，8 万普鲁士军队在布伦瑞克率领下，于 8 月 19 日越过德法边境，直趋巴黎。9 月 2 日，普军攻陷凡尔登，巴黎陷入危急状态。

巴黎公社在祖国危急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革命领导中心的作用。在罗伯斯庇尔、丹敦等人的领导下，大批武装公民加入军队开赴前线，同时在巴黎处决了大批王党分子，以防内患。

9 月 20 日，法军与普军在瓦尔密发生激战，普军大败，从而解除了巴黎的危险。几天后，法军乘胜进军，解放了美因兹、法兰克福等城市，使法国转危为安，又一次保住了法国革命的成果。

共和国的建立 1792 年 9 月 21 日，即瓦尔密战役的次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9 月 22 日，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在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占有 165 个席位，构成了国民公会中的右派。中产阶级占据了 500 多个席位，是国民公会中的中间派，但多数时候倾向于吉伦特派。他们因坐于会议厅的低处，因此又被称为“平原派”或“沼泽派”。雅各宾派占有 100 个席位，构成了国民公会中的左派。

由于平原派的支持，在国民公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被选举担任委员的都是吉伦特派分子。吉伦特派执掌了国民公会的大权之后，继续排挤雅各宾派。他们诬陷雅各宾派领导人民对反革命的镇压是“九月屠杀”，说马拉等人是“刽子手”，又诬蔑罗伯斯庇尔想当独裁者等。由于马拉、罗伯斯庇尔等人及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吉伦特派转而又想用武力来对付雅各宾派。1792 年 10 月，吉伦特派从吉伦特省和其它几个拥护他们的省调来了 16000 名国民警卫队，借口保卫国民公会和防止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实际上是想强行改造巴黎公社，镇压雅各宾派。这支国民警卫队一开进巴黎，便举行游行示威，高呼要取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敦的头，要取一切拥护他们的人的头的口号。但是不久由于马拉等人深入国民警卫队，在士兵中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从而把他们变成了雅各宾派和人民的支持者，吉伦特派的阴谋又一次落空，1792 年 11 月，巴黎公社实行领导人改选，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拥护雅各宾派，激进的雅各宾党人肖美特和阿贝尔被选为公社的正副检查长，使公社的大权仍操于雅各宾派之手。

1792 年 11 月初，国民公会在巴黎公社的要求下，才开始讨论对国王的处理问题。吉伦特派借口根据 1791 年宪法，不能审判国王，极力袒护国王，拖延对国王的审判。11 月 20 日，在王宫的墙壁里发现了路易十六的秘密文件柜，里边藏着大量与外敌和叛乱分子勾结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吉伦特派才不得不同意对国王进行审判。但是，在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仍然想为国王开脱罪责。通过激烈的辩论，国民公会于 1793 年 1 月 14 日投票表决是否应对国王审判和处死。投票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议员同意审判和处死国王。1793 年 1 月 21 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忿激派的革命活动 1793 年春，法国经济由于战争的原因，陷入一片混乱。与此同时，欧洲各封建国家继续对法国进行战争威胁。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等 7 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3 月，西部的旺德省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王党叛乱。为了维持浩大的军费开支，但又不愿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吉伦特派采取了大规模发行纸币的办法，致使物价飞涨。一些不法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和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因而巴黎的日常生活品极为短缺，粮食价格猛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极为艰难，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普遍限价和打击投机商的活动。到 1793 年春，限价运动波及到整个法国。在限价运动中出现了反映平民要求的忿激派。

忿激派的领袖是扎克·鲁等人。扎克·鲁（1752—1794 年）出身贫寒，长期在下层人民中间生活，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1791 年初，他来到巴黎担任了一个区的代理牧师。为了寻求消灭贫困的道路，他加入了哥德利俱乐部，并投身于政治运动之中。在普遍限价的运动中，扎克·鲁及其战友瓦尔勒到处发表演说，攻击国民公会不顾人民死活，只想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要求政府采取恐怖措施，打击奸商，保证人民的生活。

忿激派的革命活动愈演愈烈，在许多城市里都出现了暴力行为和强迫商人按群众自己定的物价售货的行动。

忿激派并不主张普遍地消灭私有制，只是希望能建立一个平均分配所有财产的共和国，使每个人都有一份不多的财产，借以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这是一种近于幻想的平均主义思想。

吉伦特派对忿激派的活动始终采取的是镇压政策。雅各宾派在忿激派运动出现之初，也持否定态度。但是当第一次反法联盟从四面攻入法国，王党叛乱日渐猖獗的情况下，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领导人意识到，要想保卫革命果实，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当时情况下，满足广大人民实行普遍限价和打击奸商的要求，则是团结人民的最好的办法。因此，自1793年春起，雅各宾派逐渐转向忿激派。罗伯斯庇尔等人在国民公会中提出了“粮食最高限价法案”，并使该法案于5月4日在国民公会上通过。这一法案成为雅各宾派与忿激派联盟的基础。

第三节 雅各宾派的专政

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起义 1793年春是法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在前线，法军节节败退，法军的前线指挥官，吉伦特派分子杜木里埃将军也叛国投敌。然而，吉伦特派并不想保卫祖国，却将全部力量用于镇压人民运动。

1793年4月13日，吉伦特派逮捕了马拉，并将他送交法庭审判。巴黎和外省的雅各宾俱乐部发动群众声援马拉，使法庭不得不将马拉释放。5月18日，吉伦特派通过国民公会又组织了一个负责治安事务，实际上是一个特务组织的“十二人委员会”，其成员都是吉伦特派，该组织负责调查巴黎公社副检查长阿贝尔和忿激派领袖瓦尔勒。外省的吉伦特派分子也不断掀起反雅各宾派的暴动，甚至与王党勾结在一起。5月底，在马赛、土伦、里昂等地的吉伦特派分子发动了暴动，杀害了大批雅各宾党人。

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吉伦特派的这种行径几乎等于叛卖。因此，法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吉伦特派的统治了。为了挽救革命和保卫祖国，必须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雅各宾派发出了暴动的号召。5月29日，巴黎各区的雅各宾派代表在主教宫召开会议，成立了领导暴动的秘密委员会，并决定在5月31日清晨举行暴动。

5月31日清晨，暴动开始。巴黎各区代表来到国民公会，提出解散“十二人委员会”，逮捕22名吉伦特派代表等要求，但国民公会只同意了解散“十二人委员会”的要求。

6月2日，传来了里昂吉伦特派分子残杀雅各宾党人的消息，巴黎群众又一次愤怒起来。在马拉的呼吁下，8万武装群众携带大炮包围了国民公会，要求立即逮捕“十二人委员会”成员和22名吉伦特派的代表。在炮口之下，国民公会不得不接受群众的要求，逮捕了这些吉伦特派代表。吉伦特派的统治被推翻了。

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人民起义，使政权转到了雅各宾派的手中，把法国革命推进到最高阶段—雅各宾派专政阶段。

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和1793年宪法 1793年6月，雅各宾派掌握政权之初，便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形势。反法联军在法国境内屡败法军，许多省爆发了吉伦特派和王党分子组织的反革命暴乱，英国海军封锁了

法国的所有港口，妄图在物资方面窒息雅各宾政权。7月13日，雅各宾派的主要领袖马拉，被吉伦特派派来的刺客杀死。在经济方面，雅各宾派也遇到了重重困难。吉伦特派垮台之前所面临的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等问题，在雅各宾派掌权之后更加严重，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在危难面前，雅各宾派采取了一系列团结人民，调动一切力量对付外敌的政策，逐渐摆脱了危机，使革命继续沿着上升路线发展。

雅各宾派首先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革命开始以来，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都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农民对于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府逐渐失去信心，甚至在王党分子的引诱下参与叛乱。因此，雅各宾派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不会将革命引向深入，也无法维持政权的生存。

1793年6月3日，雅各宾派刚刚执掌政权，就颁布了第一道土地法令，规定将没收的逃亡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出售，地价分10年偿清。6月10日法令规定：各地被贵族地主侵占的公社公有地，均按当地人口平均分配。7月17日，雅各宾派又颁布法令，宣布全部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解除农民所担负的一切封建义务，销毁所有地契和封建文书，凡私藏此类文件者处以重刑。

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使数十万的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成为新政权的坚强支持者。同时，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也使大多数农民摆脱了贫困境况，对于扩大国内市场，发展法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新的土地政策，使广大农民的命运与新政权联系在一起，大批农民自愿参军，抗击外敌的侵略以保卫自己的革命果实。从而使雅各宾派政权得以胜利地粉碎国内外敌人的多次进攻。

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和团结人民，雅各宾派政府又于1793年6月24日通过了新的宪法，即《1793年宪法》。这部宪法的基本原则是由罗伯斯庇尔确定的。这一原则就是实现人民的平等权利和保证人民群众参加政权。这部宪法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宪法宣布公民享有思想、信仰、宗教、请愿、结社、出版等一系列自由和民主权利，并取消了“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的区别，规定凡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

宪法规定，最高立法机构是立法议会，通过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一年改选一次。立法议会的一切决议，须经选民在基层会议上批准。最高行政机关是执行会议，由立法议会从各省的立法议会提出的候选人中，任命24人组成，但共和国的全部行政长官必须在执行会议成员之外任命。

此外，宪法的前言部分附有罗伯斯庇尔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宣言》，又一次强调了人的天赋权利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重申了每个公民所应享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

这部宪法比1791年宪法又前进了一步，是近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对当时欧美各国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法国对敌斗争十分尖锐，这部宪法并没有付诸实行。

雅各宾派的统治与对外战争的胜利 雅各宾派执掌政权之后，仍

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巴黎的物价仍旧飞涨、投机商人的活动更加猖獗、人民生活仍然十分困难。然而雅各宾派仍然坚持所谓经济自由的原则，不肯真正实行生活用品的普遍限价政策。代表下层劳动人民利益的忿激派又开始活动，要求雅各宾派政府惩治不法商人、实行普遍限价政策。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9月29日雅各宾派政府颁布了《普通最高价格法令》，并重申了5月4日颁布的《粮食最高限价法案》。《普通最高价格法案》规定了粮食、生活用品等39种商品的最高限价，规定粮食、烟、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全国统一。但是该法案也规定了工人的最高工资的数额，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工人的利益。

尽管雅各宾派实行了最高限价政策，但是忿激派的行动使雅各宾派感受到了威胁。因此，雅各宾派将扎克·鲁等忿激派的领袖先后收捕入狱，扎克·鲁在监狱中自杀。雅各宾派对忿激派的镇压，说明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在取得政权之后，将劳动人民长期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为了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进攻，雅各宾派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从1793年6月底开始，为了巩固政权，雅各宾派强化了国民公会的权力，使它集立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并重新改选了公共委员会，由坚强的革命者圣·鞠斯特和古通负责。为了肃清国内的敌人，保证对外战争不受干扰，雅各宾派于9月17日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实行革命的恐怖措施。王后玛丽·安东尼特以及在6月2日起义中被逮捕的吉伦特派的议员们统统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在打击王党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同时，雅各宾派对一些仅仅对革命抱有畏惧和冷淡心理的人，和未能履行选民职能的人以及一些仅有一点不法行为的普通商人，家中储有少量食物的人，也统统列入嫌疑犯的名单，加以杀戮。这样，就使这一措施带上了扩大化的倾向。然而，作为革命非常时期的政治恐怖和经济恐怖措施，在打击王党和各种反革命分子、制止奸商的各种罪恶行径，保证抗击外敌进攻取得胜利等方面，则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巩固革命政权，雅各宾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军队的各方面建设。首先，扩大武装部队的人数。1793年8月23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全国动员令》，规定“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并规定了从儿童到老年各种年龄段和性别的人的义务。这一法令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征集了42万人。到1794年初，法国军队的数量已达到120万人。其次，在军队内部实行改革和清洗，把一些贵族军官和不忠于革命的将领统统撤换，从出身平民阶层的下层军官和士兵中，挑选可靠和有能力的人担任各级军职。此外，由公安委员会负责将正规军和志愿军合并，使其服从统一号令和指挥，并统一待遇，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磨擦，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再次，积极组织军火生产。雅各宾派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使法国的军火生产产量迅速上升，在一年之内便增加了4倍。

雅各宾派政府的各项措施，在战场上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从1793年8月至年底，法军在各个战场上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793年8、9月，政府军平定了马赛和汪德省的王党叛乱。10月，

政府军攻克里昂，从而摧毁吉伦特派在南方的反革命叛乱的中心。10月份以后，各省的叛乱相继平息下去，雅各宾派逐渐控制了全国各个省份的政权。

在对外战争方面，法国军队在10月16日在法比边境的瓦迪尼打败奥军，12月19日大败英军，收复土伦，并先后将意大利和西班牙侵略军逐出国土。至1794年初，法国境内的外国侵略军全部被肃清，法军开始将战线推到境外。

粉碎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和欧洲反法联盟军队的入侵，使雅各宾派渡过了重重危机，保卫和巩固了革命政权。

雅各宾派的分裂和热月政变 雅各宾派在夺取政权之后，采取了政治和经济恐怖统治。其实质和特点，按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种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即“平民方式”，也就是一种特殊的战时体制的资产阶级专政措施。雅各宾派在取得对外战争胜利，政权巩固之后，开始试图恢复和建立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秩序。从1794年春开始，雅各宾派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用过激手段对付投机商，放宽对物价的限制，解散各种革命俱乐部，改组巴黎公社，严禁工人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游行，违者送交法庭审判。在农村，由于对富农的限制很少，尽管很多农民分得了一小块土地，但农村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很严重，而雅各宾派也不再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现象。但是，尽管经济恐怖措施一再放松，但并未取消，资产阶级仍旧不能自由经营。因此，雅各宾派在巩固政权之后，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逐渐扩大，并反映到雅各宾派内部，使雅各宾派内部逐渐出现了不同的政治派别，造成了雅各宾派的分裂。

雅各宾派的核心仍旧是罗伯斯庇尔派。这一派一直坚持实行革命专政和最高限价政策，从而打击和压制资产阶级上层，保护小私有制。这一派所代表的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雅各宾派内部的左派是阿贝尔派。他们攻击雅各宾派政权软弱，要求进一步实行恐怖政策，甚至主张处死一切投机商，打击所有大、小商人，要富人承担所有国家财政税收的负担。他们还要求取消宗教信仰，以“理性”代替天主教，并强迫国民公会颁布了“信仰理性以代替天主教”的法令，以及要求将王党和各种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没收分给革命者并指责雅各宾派政府没能解决平民的生活问题，对工人实行最高工资限额是对工人利益的侵犯等等，阿贝尔甚至号召人民“起义”，推翻雅各宾派专政。阿贝尔派在许多观点上接近于被镇压的忿激派，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要求，但是，有一些要求则是不切实际的。

雅各宾派内部的右派是丹敦派。这一派的主要成员和拥护者是那些利用职权，在革命战争中通过贪污受贿、承办军需而暴发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及发了横财的资本家和商人。丹敦本人就是一个暴发户。他们害怕恐怖政策继续实施会对自己不利，因此，主张结束恐怖专政，放松革命专政，宣扬“人道”，指责罗伯斯庇尔派残忍好杀。

执政的罗伯斯庇尔派对上述两派都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先后将丹敦、阿贝尔等人送上了断头台。

在镇压了阿贝尔和丹敦派之后，罗伯斯庇尔派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恐

怖政策。1794年6月10日，国民公会通过了改组革命法庭的法令，宣布简化审判程序，惩罚全部改为死刑，甚至可以不要任何证据便可“推理定罪”。自这一法令颁布以后，巴黎法庭在一个多月中，竟判处了1376人死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下层平民。

罗伯斯庇尔的这些措施，使一直拥护他们的劳动人民群众逐渐抛弃了他们。同时，国民公会中，残余的阿贝尔派和丹敦派也勾结起来，反对和孤立罗伯斯庇尔派，并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他们在国民公会上公开指责罗伯斯庇尔是“暴君”，“独裁者”。

1794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演说，指责反对派，并号召严惩这些政治阴谋分子。当天夜里，反对派拟定了政变计划，决定在次日发动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派的统治。7月27日（法国热月9日），反对派在国民公会上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古通、圣·鞠斯特等人的决议，将他们当场逮捕。当晚，巴黎公社将他们营救出来，但夜里反对派又纠集武装，重新逮捕了他们。次日（热月10日）罗伯斯庇尔、古通、圣·鞠斯特等18名罗伯斯庇尔派的领导人，没经任何审判便被送上了断头台，史称“热月政变”。热月政变颠覆了雅各宾派的政权。从此，法国大革命结束了。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1789年至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早期资产阶级中最为深刻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人民群众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从而使革命经历了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三个专政阶段，一直沿上升路线发展。

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这次革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超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

法国大革命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并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这次革命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因此，这次革命是一次欧洲范围的革命。

但是，应当指出，法国大革命，毕竟是一次以一种剥削方式代替另一种剥削方式的革命，不可能真正地、从根本上使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摆脱贫穷和困难的生活。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二章、第四章。

乔明顺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三章。

王荣堂、姜德昌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第六章。

刘祚昌、光仁洪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第五章。

[美]帕尔默、科尔顿著：《近现代世界史》第九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第六章。

复习题：

1. 法国资产阶级爆发的原因。

2.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几个阶段？为什么说雅各宾派专政是法国革命的最高峰？
3. 比较分析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特点。
4. 试析雅各宾派专政的性质及其失败的原因。

第五章 法兰西第一帝国

维也纳会议

第一节 督政府与执政府统治下的法国

热月党的统治 热月政变后，法国政权转到热月党人的手中。热月党人是反对罗伯斯庇尔派的阿贝尔派、丹敦派以及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公会中的平原派等派别的联合体，因此，既没有一个固定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政见。在国民公会中占上风的是以塔里安、弗雷隆等人为首，由原来的丹敦派主要成员组成的“新宽容派”。他们代表了那些在革命中发了横财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取消雅各宾派所实施的恐怖政策，废除最高限价法令。原山岳派、阿贝尔派的代表则主张维持恐怖统治，因为他们尽管反对罗伯斯庇尔，但对实行恐怖统治则是一致的。原平原派的代表，大多持观望态度。经过长时期的争执和较量，“新宽容派”在国民公会中占了上风。此后，国民公会中所实行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新宽容派的政策。新宽容派在掌握政权后，释放了大批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被逮捕的各类嫌疑犯，其中包括许多贵族和一些投机商。与此同时，新宽容派分子对各地的雅各宾派成员进行清查。1789年11月12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宣布封闭雅各宾派俱乐部。这一举动，标志着雅各宾派所实行的政治恐怖政策的结束。12月24日，国民公会又通过了废除普遍限价法令。随着雅各宾派的政治、经济政策完全被否定，吉伦特派在新宽容派的扶植下，又重新抬头。从12月开始，国民公会对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被逮捕的吉伦特派分子陆续宣布特赦。并将其中的一些原国民公会议员召回国民公会，恢复其议员职位。

随着最高限价法令的废除和革命恐怖政策的取消，投机商业活动又猖獗起来，使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又开始猛涨，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国家财政陷入困境。而金融资本家将大批信誉很高的硬币控制起来，使热月党政权在财政方面更加困难。然而，政府官员和国民公会议员的工资则增加了一倍。由于废除了恐怖政策，资产阶级又脱掉了革命时期简朴的伪装，重新过起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巴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为了购买每天配给的半磅面包，竟需日夜排队。在这种情况下，巴黎的下层劳动人民于1795年4月1日(法国共和国芽月12日)和5月20日(牧月1日)两次举行起义，这就是“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这两次起义实际上都属于饥民暴动的性质。起义者高呼“面包”和“93年宪法”的口号，攻进国民公会。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和组织准备，在热月党人的严厉镇压下，起义很快失败了。热月党人在镇压起义之后，解除了巴黎人民的武装，逮捕和流放了数千人，将一些雅各宾派的成员处死。

在镇压人民起义的同时，热月党人为了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王党叛乱和封建复辟活动也进行了无情的镇压。1795年6月27日，一支法国逃亡贵族的武装约4500人，在英国的支持下，在布列塔尼登陆，并占领了奥雷城，热月党政府急忙派军迎敌，并将敌人驱逐到基贝隆半岛。7月21日，政府军全线反攻，几乎全歼敌军。基贝隆战役之后，国内的王党分子和立宪派勾结起来，又开始策划叛乱。10月3日(共和历葡月12

日)叛乱开始。叛乱分子在勒佩勒蒂埃区成立了指挥叛乱的中央委员会,任命达尼康为叛军司令。这就是“葡月暴动”。热月党派巴拉斯指挥镇压叛乱的政府军。巴拉斯大胆任用拿破仑·波拿巴将军作为前敌指挥。拿破仑调来大炮配合作战,仅用几个小时便粉碎了叛乱。这次战役充分显露了拿破仑的军事指挥才能,使他获得了“葡月将军”的称号。战后不久拿破仑便被擢升为巴黎卫戍区的副司令,不久又取代了巴拉斯晋升为司令官。

葡月暴动被平息之后,国民公会从6月下旬便开始讨论制订,于8月22日通过的新宪法开始实施。

1795年宪法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宪法,正式名称是“共和三年宪法”。新宪法规定法国仍然实行共和制,但又删除了1793年宪法中的有关人民民主权利的条款,从而真正地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新宪法规定立法机关为两院制的立法院,由元老院和五百人院组成。行政权属于五人组成的督政府,由元老院根据五百人院提名选出,每年改选其中1人。督政府成员以3个月为期,每人轮流担任主席。督政府拥有内政、外交、财政和军事方面的广泛权力。

督政府的统治和巴贝夫密谋 1795年10月26日,热月国民公会解散,次日,新选出的立法议会开幕,选出了督政府,开始了督政府的统治时期。首届督政府由巴拉斯·勒贝尔、勒图尔纳、拉勒维里、埃·勒波和卡尔诺5人组成。督政府成立之初,发表了施政纲领,宣称在政治上要积极向保王主义开战,严厉镇压叛乱,摒弃一切党派意识和复仇情绪,创造国内的和平气氛;在经济上要恢复生产,振兴工商业,复兴科学与艺术等。但是,督政府执政后,便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和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为摆脱财政困境,督政府采取了无限制印制纸币的办法,结果造成货币的极度贬值,以至督政府在1795年12月规定资本累进税用粮食和黄金缴纳。同时,督政府又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债券。在国库日渐枯竭的同时,大资产阶级及其军政委员却在大量收受贿赂,大发横财。法国各军团的军需,统统被少数几个大商人和商业公司包揽过去。

大资产阶级和政客、军事将领奢侈淫靡的生活与劳动人民的饥寒交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运动。

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中。他曾积极地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在思想上比较接近忿激派和阿贝尔派,因此,在雅各宾派镇压了忿激派之后,开始反对雅各宾派。热月政变之后,转而拥护热月党,但不久又发现热月党人根本不是人民的代表,又变成了热月党的反对者。1794年9月,巴贝夫创办了《人民论坛报》,并以此为阵地,激烈地抨击热月党人的政策。不久,巴贝夫被捕入狱。出狱后,巴贝夫在巴黎成立了秘密组织平等会,密谋推翻督政府。

巴贝夫长期受法国革命前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一直主张消灭社会上任何不平等,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所谓的“平等共和国”。在这个平等的共和国中,社会的基本组织是国民公社。这个国家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这个共和国应废除财产继承制和私有制,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所能从事劳动,然后将劳动所得交给国家,由国家再重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公民。巴贝夫的思想尽管始终贯穿着原始共产主义精神,

但他与许多空想共产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主张通过暴力行动来达到建立革命政权的目的。1795年底，巴贝夫开始组织平等派运动。1796年5月，巴贝夫密谋起义，并决定5月11日开始行动。5月10日，因叛徒出卖，平等组织被破坏，巴贝夫及其战友60余人被捕，不久巴贝夫被督政府处死，巴贝夫运动遂告结束。史称“巴贝夫密谋”。

雾月十八日政变 巴贝夫密谋被镇压之后，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经济，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不久社会经济又重新陷入混乱之中，使督政府更难于应付的是国内日趋混乱和复杂的政治局面。

热月政变之后，雅各宾派虽然遭受到巨大损失，但其地下活动从来没有停止。巴贝夫密谋被镇压后，雅各宾派又开始积极活动，宣称要替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复仇，并促使民主运动重新抬头。与此同时，王党的叛乱活动也日益猖獗。他们不仅在全国各地煽动叛乱，同时也利用合法手段企图在议会两院获得多数席位，从而实现其恢复王政的梦想。1797年9月，督政府利用拿破仑的武力，逮捕了大批王党分子，并对两院进行清洗，解除了王党的威胁。1798年4月，两院重新选举，大批民主派人士进入两院，使督政府惊恐万分。5月，督政府宣布106名议员当选资格无效，并对民主派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史称“百日政变”。

督政府统治期间，欧洲敌视法国的国家结成第一次反法联盟，对法国构成威胁，其中最主要的敌人是英国与奥地利。1796年，拿破仑率领远征军进攻奥地利控制的意大利北部，连创奥军，迫使奥地利与法国签订了《康波福米奥条约》，承认莱茵河为法国的“天然疆界”，其左岸地区归属法国。第一次反法同盟遂瓦解。1798年5月，为了切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督政府派拿破仑远征埃及，拿破仑在埃及接连获胜。但是法国海军则被英国海军重创，使远征埃及的法军与本土失去联系。1798年底，英国、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又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并接连打败法军，逼进法国边境。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大资产阶级对内外交困的督政府日益不满，希望能建立一个足以稳定局势的强有力的政府，以保证其各方面的利益。这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正在埃及远征的拿破仑·波拿巴的身上。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出生于科西嘉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青年时代随父赴巴黎。曾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后又升入军官学校，参军后，历任尉官，校官。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革命，1793年拿破仑在土伦战役显示了军事天才，战后被擢升为少将。热月政变后，由于他在镇压王党和向外扩张中屡建战功，日益受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青睐。拿破仑既是一个杰出的军事人才，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权力欲的政治野心家。1799年8月，当他得知国内的情况之后，仅带500随从，于10月离开埃及，回到法国。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巴黎卫戍部队和第一军区司令，并立即与大资产阶级进行频繁的接触，策划政变。政变集团中的主要成员有督政官西哀耶斯和罗遏·迪科、前外长塔列朗、500人院议长吕西安·波拿巴（拿破仑胞弟）。巴黎大资产阶级出资1000万法郎作为政变的经费。11月6日，政变集团制定了废除共和三年宪法的计划。1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被元老院任命为巴黎及近郊武装部队司令。然后，在其拥护者的簇拥下到元老院，手执军刀，表示效忠共

和国。随后，西哀耶斯、罗遏·迪科、巴拉斯三位督政官宣布辞职，督政府实际上已瓦解。11月10日，两院迁至巴黎郊区圣卢克开会，波拿巴在会上宣布废除共和三年宪法，但遭到部分500人院的议员的反对，波拿巴被赶出会场。在西哀耶斯的劝说下，拿破仑决定动用武力。紧接着，波拿巴率士兵将反对他的议员驱散。部分元老院和500人院议员表决解散督政府，成立临时执政府。这一系列事件，史称“雾月十八日政变”。

执政府的统治 雾月政变后，临时执政府由波拿巴、西哀耶斯和罗遏·迪科三人组成，波拿巴为第一执政。临时执政府建立不久，便于1799年12月24日公布了新宪法，即共和八年宪法。宪法规定国家大权均由第一执政掌握，第二、第三执政只有咨询权。国家立法机关由元老院、立法院、保民院三院组成。元老院议员终身任职。元老院议员由执政府任命，元老院再从多级选举产生的候选人名单中挑选立法院和保民院成员。第一执政的辅佐机构为参政院。立法程序为：参政院提出法律草案，保民院讨论，立法院表决，元老院审议，第一执政签署颁布。根据宪法，波拿巴为第一执政，第二执政巴塞雷斯（原平原派政治家，著名法学家），第三执政勒布伦（原吉伦特派元老）。

波拿巴掌握政权之后，实行了一系列加强统治的政治、经济措施来稳定局势，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波拿巴首先在政治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在参政院下设立了12部，主管全国的行政工作。在全国实行省、县、市的行政建制，各级行政长官由第一执政亲自任命。地方自治基本被取消。同时，改组了法院，取消陪审制度，设立司法部主管全国的司法事务。军队是波拿巴政权的支柱。因此，他对军队的控制始终视为最重要的政权建设策略。他将全国的军队均控制在手中，同时还组建了一支忠于自己的近卫军。为了维护其正常的统治秩序，波拿巴建立了庞大的警察机构，将人民的日常生活，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反对派势力，实行了严厉的高压政策。波拿巴上台后，授意警务部长富歇，以1800年10月至12月有人三次对他进行暗杀为借口，对早已势单力孤的雅各宾派多次进行搜捕，并将许多民主派人士流放。与此同时，波拿巴对王党的叛乱活动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封闭了攻击执政府统治，为王党叛乱大造舆论的60多家报纸，平定了西部地区的王党叛乱。在暴力镇压的同时，波拿巴又采用了软的一手。允许在革命期间逃亡在外的一些王党和君主立宪派等反对派分子回国，以后又不断放宽条件。到1800年5月，波拿巴宣布，凡是愿意宣誓新政权者，既往不咎。这一作法大大缓和了矛盾，有利于拿破仑政权的巩固。

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波拿巴接手政权之时，法国财政一片混乱。为了迅速改变这一状况，执政府整顿和加强财政机构，由参政院派出专人监督各主要财政部门的工作。改革税收制度，由国家统一税收，健全货币制度，重建期票证券制度，改组证券交易所，支持商会的活动。采用十进位的公制，以统一国内市场，活跃经济。成立全国工业促进会，加强对工业的监督和领导，给私人企业提供补贴、厂房和机器设备，鼓励采用新技术。在农业方面实行保护小土地所有制的政策，扩大耕地面积，推广优良品种和新技术，从而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抵制英国商品的倾销，同时鼓励出口创汇。由于上述措施的实施，使执政府统治下的法国经济状

况日趋好转，国库收入增加，财政收支逐渐平衡，从而为稳定国内局势和对外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调整和改变宗教政策，利用宗教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波拿巴执政后，意识到天主教在法国的影响根深蒂固，同时也由于雅各宾派反宗教政策的教训，着手与罗马天主教廷和解。1801年7月与罗马教皇签订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是法国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恢复天主教会在法国的合法地位和活动，但教会服从政府的法令，教会承认大革命时期被出卖的教产的合法性，不再恢复什一税，大主教和主教由国家任命和支付薪俸，由教皇授职。此后，天主教会成为波拿巴统治的又一重要基础。

在军事上，打破第二次反法同盟对法国的包围和威胁。1800年5月，波拿巴率4万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在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对于法军的到来毫无准备。6月14日，法奥两军在马伦哥平原决战，法军以4万对奥军13万之众，却以少胜多。12月，由莫罗将军率领的法军在莱茵战线取得胜利，兵锋直逼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801年5月，奥地利与法国签订《吕内维尔条约》，法国依约占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并获得比利时和卢森堡。次年2月，法国在意大利建立了属于法国的意大利共和国，波拿巴兼任总统。第二次反法同盟遂瓦解。1802年3月，英国与法国签订了《亚眠和约》，英国退还了原属法国的殖民地安德列斯群岛和印度的法属殖民地，并允诺从地中海的马尔他岛和埃及撤军。这样，法国暂时解除了外部的威胁。

第二节 法兰西第一帝国

帝国的建立 短短的几年，路易·波拿巴凭借其超人的胆略和精力，使法国重新走向了稳定和繁荣。1802年5月8日，元老院宣布波拿巴连任10年第一执政。8月2日，元老院又宣布波拿巴为终身第一执政。波拿巴在获得终身第一执政后，下令制定一部宪法。8月4日，未经立法院通过的共和十年宪法颁布。宪法规定，第一执政有权向元老院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有权任命第二、第三执政和元老院候选人。这是法国重新走向君主专制的开端。但是，波拿巴对此并不满足，他希望能够戴上皇冠，确保其至尊无上的独裁地位。

早在1800年，拿破仑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原则得到法律上的确认，指定第二执政巴塞雷斯负责编纂民法典的工作。1804年3月21日，民法典正式公布，即著名的《法国民法典》。1807年民法典又被更名为《拿破仑民法典》。民法典共包括3篇35章281条。《法国民法典》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规范，明确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保障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固定了小土地所有制，规定了贸易自由和契约自由及法律效力。民法典还根据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确定了一切法国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权力。《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它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及其特权，肯定了革命时期对封建贵族和教士的财产剥夺，对于稳定法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起了极大的作用。

《法国民法典》颁布之后，拿破仑便授意元老院为他称帝进行活动。1804年5月4日，元老院宣称：元老院认为把共和国委托给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掌理，是法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此后，两院以“谄媚的热

情”通过了建立帝国的决议。5月18日，元老院发布了修改宪法的决议案，正式宣布法国为帝国，拿破仑为皇帝，称拿破仑一世。这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亦称拿破仑帝国。帝制在法国的复活，并没有改变拿破仑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拿破仑帝国实质上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帝国。

拿破仑称帝后，很快建立起一套帝国制度，包括宫廷体制、等级制度以及贵族称号，并创立了殿下、公爵以及帝国元帅的称号。

拿破仑战争 拿破仑帝国政权，始终伴随着对外战争。拿破仑战争最初具有保卫法国大革命胜利成果，反对封建复辟，反对欧洲封建专制势力干涉的性质。但在战争后期，这场战争又逐渐变成了对外侵略掠夺，夺取欧洲霸权的战争。

拿破仑帝国建立之初，英国对法国的敌视日甚。拿破仑为了打击英国，1805年在几个沿海港口设立了屯兵营地，并与西班牙组成联合舰队，准备渡海进攻英国。

1805年4月，英国又联合俄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组成了第三次反法联盟。10月20日，法军与奥军在德国境内乌尔姆相遇，拿破仑亲临前线指挥，一战歼敌3万余人，奥军败退。1805年11月21日，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加被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率领的舰队击败，拿破仑遂改变了在英国登陆计划，转而在陆上对奥军加强进攻。1805年11月，法军长驱直入，攻下维也纳。12月2日，拿破仑集中了优势兵力，在维也纳附近的奥斯特里支击溃了由俄皇和奥皇亲自指挥的俄、奥联军，俄奥联军死伤及被俘3万余人。此后，奥地利被迫求和。12月26日，法奥签订了《普莱斯堡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意大利的占领，割让威尼斯、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等地给法国占领的意大利，并赔款4000万法郎。1806年8月，拿破仑又迫使奥皇弗兰茨二世取消“神圣罗马帝国”，废除自己的德意志皇帝称号，并将德意志的21个邦组成了莱茵同盟，亲任保护人。不久，拿破仑又占领了南部意大利那不勒斯，至此，第三次反法联盟瓦解。

1806年9月，英、俄、普鲁士又组成了第四次反法联盟。拿破仑于10月出兵迎战。10月13日，法军与普军在耶拿展开激战。次日，法军大获全胜，普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10月27日法军攻入柏林，普鲁士军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全线崩溃。1807年2月，法军在普鲁士的艾劳附近又与俄军展开激战，双方皆遭受重大损失。同年6月14日，法俄两军在弗里德兰展开决战，俄军惨败。7月7日，法国与俄、普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和约规定：普鲁士将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土地割让给法国，并让出18世纪末占领的波兰领土；普鲁士军队必须减少到4万人，并赔款一亿法郎；俄国退出反法联盟，与英国断交，承认法国占领的全部领土。《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拿破仑在易北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上建立了威斯特发里亚王国，以其弟弟热罗姆任国王，将普鲁士退出的波兰领土组成华沙大公国，由其附庸萨克森国王兼领大公。

特拉法加海战后，法国海军已经失去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能力。因此，拿破仑放弃了武力征服英国的计划，采取了在经济上封锁和制裁的手段，即所谓“大陆封锁政策”。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敕令，宣布禁止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进行贸易，并封锁不列颠诸岛。

英国立即反击，也宣布用海军封锁法国及其盟国的港口。1807年10月27日，拿破仑又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加强了大陆封锁政策。11月和12月，拿破仑在米兰两次发布命令，没收任何国家和地区开往英国的商船及货物。1807年11月，法军占领了葡萄牙，次年3月，又占领西班牙，以达到彻底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联系的目的。

1809年，英国又组织了第五次反法联盟，参加这一联盟的只有英、奥两国。1809年7月，法军在瓦格拉姆战役中大败奥军，奥地利被迫又一次求和。1809年10月，在维也纳法、奥订立和约，奥地利赔款7500万法郎，又丧失了几个省份的土地。

从1800年开始，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国军队所向披靡，接连粉碎4次反法联盟的进攻，使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从而粉碎了欧洲各主要封建国家帮助波旁王朝复辟的阴谋，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沉重打击了各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拿破仑战争也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其侵略性质在战争后期愈发明显。法国每取得一次胜利，都要从战败国索取大量的赔款，并从占领地抢夺大量的金银财宝、艺术品运回法国。仅以普鲁士为例，在法军占领普鲁士和莱茵各邦的两年中，就榨取了近11亿法郎。同时，法国还将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并大量收取“血税”，大大影响了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在这场战争中，欧洲各国人民均遭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只有以拿破仑为首的法军高级将领和大军火商们发了横财。

拿破仑帝国的危机与崩溃 经过几年的侵略战争，法国成为一个拥有130个省，7500万人口的大帝国，并拥有众多的附庸国和同盟国。但是，这个大帝国在强盛的表面之下，却掩藏着深刻的危机。

首先，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十分激烈，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在占领地区的统治。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西班牙人民的反法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从1808年开始，持续了6年之久，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法国精锐部队，并牵制了大量的法国军队，有力地帮助了其它国家和人民反抗拿破仑帝国统治的斗争。

其次，拿破仑战争受到法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连年的对外战争，使法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法国军队士兵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连年抽丁参战，使大批农民在战场上死亡，致使家家几乎皆有阵亡的人，从而使农民的反战情绪达到顶点。对英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反使法国自食恶果。由于英海军封锁了通往法国的所有航程，使法国商船根本无法自由航行，致使港口萧条，对外贸易中断，国内原料短缺和货物积压，从而引起了1810年的经济危机，使资产阶级蒙受了巨大损失。由于经济危机，大量工厂倒闭，许多工人失业，加上物价上涨和警察官僚暴政的日益加强，法国工人对拿破仑政权的不满更甚。拿破仑政权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

随着战争的胜利和个人权力的日益膨胀，拿破仑走上了与旧制度妥协的道路。他像一般的封建君主一样，乞灵于宗教，极力将自己打扮成君权神授的正统皇帝。为了表示正统，他与发妻约瑟芬离婚，娶了哈布斯堡王朝女大公、奥皇之女，玛丽·路易斯为妻。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拿破仑大力加强贵族集团，封赐了1000多个贵族。拿破仑的亲族，多有

被封为仆从国国王。但其中许多人却始终没能与拿破仑一心一德。如拿破仑胞弟，荷兰国王路易，拒不执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又如其兄西班牙国王约瑟夫，其妹丈那不勒斯国王缪拉，都公然对抗拿破仑的命令。同时，其统治机器在帝国统治后期运转日益失常。一些才能卓著但有独立见解的官员逐渐被排斥，如塔列朗、富歇等人。起用了一批阿谀奉承，庸碌无能之辈。

1812年6月23日晚，拿破仑亲率60万法军及其同盟军队，渡过涅曼河，侵入俄国。远征俄国，是拿破仑帝国崩溃的起点。俄军在库图佐夫元帅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使法军在俄国境内长驱直入。9月14日，法军不战而进入莫斯科，但俄军留给拿破仑的仅是一座空城。次日，莫斯科发生大火，并持续了五昼夜，烧毁了全城四分之三的建筑物。此后，俄军在莫斯科附近集结了大量兵力，并于10月18日发起反攻。拿破仑急忙带领部队撤出莫斯科，一路上不断遭到俄国游击队的袭击。12月13日，拿破仑率军重渡涅曼河，只剩下5万军队。

拿破仑在俄国的惨败，成为欧洲大陆各国联合反抗法国统治的又一次契机。1813年春，英、俄、普、葡、西、奥、瑞典等七国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1813年10月16日，双方在莱比锡展开决战，参战的法军为15万多人，反法联军共有33万多人。战斗一直持续到19日。法军由于部队中萨克森军叛变，致使全线崩溃。12月，拿破仑率领残兵败将逃回法国。

1814年初，反法联军攻入法国境内。此时，法军已无力再战。3月30日，联军攻抵巴黎城下。已背叛拿破仑的前外交大臣塔列朗与联军进行联系。次日由沙皇亚历山大和普皇腓特烈率领的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法国元老院任命了塔列朗为首的临时政府，并于4月2日宣布废黜拿破仑。此时的拿破仑正躲在枫丹白露的行宫中策划反击。然而此时已众叛亲离，无兵可用。4月4日，拿破仑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温斯伯爵即位，称路易十八（1814—1824年）。5月30日，路易十八与英、俄、普、奥等七国签订了和约，即第一次巴黎和约。和约规定法国放弃一切在拿破仑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恢复1792年前的边界。同时还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定在10月1日在维也纳举行。

1815年3月1日，拿破仑乘法国国内对复辟的波旁王朝日益不满的时机，逃出厄尔巴岛，率领1000多人在法国登陆。拿破仑的许多旧部和不少反对波旁王朝的人纷纷投入拿破仑的军中。20日，拿破仑率军进入巴黎，路易十八仓皇出逃，拿破仑再度登上帝位。

拿破仑卷土重来，使欧洲各国的统治者极度震惊，正在举行的维也纳会议也被迫中断。各国匆忙成立了第七次反法联盟。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境内的滑铁卢，双方展开大战，拿破仑军队一败涂地。拿破仑又一次宣布退位，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死于该地。路易十八又回到巴黎。拿破仑的复辟只持续了百天，因此拿破仑重新建立的帝国，被称为“百日帝国”。

第三节 维也纳会议与神圣同盟

维也纳会议 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按照第一次巴黎和约的规定，反

法联盟各国在 1814 年 10 月 1 日召开会议，处理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欧洲问题。这次会议持续了 8 个月之久，直到次年的 6 月 9 日才结束。除奥斯曼帝国外，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世界近代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与会代表 216 人，其中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普鲁士皇帝威廉三世、奥皇弗兰茨一世、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累、奥国首相梅特涅、普鲁士首相哈登堡、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与会国代表虽然很多，但在会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俄、奥、英、普四个主要战胜国。为了满足各自的领土野心，四大国的代表在会议上各怀鬼胎，尔虞我诈，展开了激烈地争夺。俄国的野心最大，不仅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土，还想取代法国成为欧洲的新霸主。因此，俄国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在德意志保持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大国，以图他们互相牵制，从中取利。同时，它还要求占领华沙大公国，扩大在东欧的势力。为了拉拢普鲁士，沙俄在会上提议将萨克森划给普鲁士，以补偿它在波兰方面的领土损失，这样，就把普鲁士拉到了自己的一边。英国代表、外交大臣卡斯尔累则力图使英国在战时占领的法国、西班牙、荷兰殖民地得到会议的承认。为了削弱法国的势力，又极力要求把法国的疆域限制在 1792 年的边界以内。为了同一目的，英国又建议加强普鲁士在莱茵地区的势力，同时，竭力阻挠沙俄独霸华沙大公国的要求。奥地利代表、首相梅特涅从保持奥地利在德意志优势的目的出发，主张保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竭力反对普鲁士夺取萨克森和莱茵地区，同时也反对俄国在欧洲的扩张。这样，在维也纳会议上，俄普一方，英奥一方，为了各自利益吵成一团。法国代表塔列朗利用双方的矛盾，打着“正统原则”的旗号，要求肯定法国革命前的封建君主为正统王朝，应该恢复它的权力和领土。塔列朗的目的是利用“正统原则”来最大限度地保持法国的领土。这一原则受到了欧洲各个封建专制国家的欢迎，都想利用这一原则来保持自己的根本利益，以稳定欧洲的封建秩序。塔列朗充分施展其外交手腕，又与英奥勾结起来，极力反对俄普的扩张。在英奥的支持下，法国居然获得了第五强国的地位。1815 年 1 月 3 日，英、法、奥 3 国缔结了秘密同盟条约，共同对抗俄、普。最后双方由于拿破仑复辟而不得不互相妥协，在 1815 年 6 月 9 日匆忙签订了“最后总决议案”。

根据这个总决议，俄国获得了波兰的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波兰王国，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国王。此外，俄国还合并了芬兰和比萨拉比亚。

英国使战争中夺取的法、荷、西的殖民地在会议上合法化了，主要包括多巴哥、特立尼达、塞舌尔、毛里求斯、锡兰以及马耳他和圭亚那等地区，并获得了爱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这样，英国不仅控制了整个地中海，而且还由于占领了好望角，从而又控制了欧美经非洲到亚洲的航路，成为名符其实的海上强国。

普鲁士割占了莱茵省和威斯特发利亚省的一部分以及波兰的波兹南、但泽，使其势力范围扩大到莱茵河左岸和波罗的海南岸。

奥地利占有萨尔斯堡、提罗尔、伦巴底、威尼斯以及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带。

根据总决议，法国保持了 1792 年的疆界。拿破仑的“百日帝国”覆灭之后，反法同盟各国又于 1815 年 11 月 20 日与法国订立了新的条约。

根据条约，法国又割让出东部边界的一些地区，从而恢复到 1790 年的边界。同时，各战胜国要求法国交出军舰，赔款 7 亿法郎。在赔款付清之前，由反法联军占领法国东北部各主要要塞 3—5 年。

为了防止法国东山再起，主持会议的大国不顾弱小国家的利益，粗暴地干涉它们的民族自决权，将比利时和荷兰合并，称尼德兰共和国，将挪威和瑞典合并成为一个王国，瑞士定为永久的中立国。丹麦则又得到施勒斯维希和霍尔斯坦。从而在法国的北部和东部设下了一个屏障。

维也纳会议按照奥国首相梅特涅的建议，将德意志 35 个封建君主小邦和 4 个自由市组成一个奥地利代表主持的松散的邦联会议，因此，德意志仍然保持着四分五裂的状态。

意大利的封建割据状态仍然被维持着。奥地利占据了伦巴底和威尼斯，托斯卡纳为奥地利斐迪南大公的世袭领地，帕尔马为奥国公主（拿破仑的妻子）的世袭领地，摩德纳为奥国大公德埃斯特的世袭领地，撒丁王国控制了意大利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路卡成为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丝的领地。那不勒斯恢复了波旁王朝的统治，罗马则成为教皇的领地。由于意大利封建小国林立，奥地利实际上处于主宰地位。

维也纳会议在英、奥、普、俄四个大国的操纵下，为了达到消除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恢复和巩固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封建秩序，镇压欧洲的民主运动，重新分割欧洲领土的目的，不惜违反各个弱小国家人民的意愿，肆意践踏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用武力强行划分欧洲的政治版图，把许多被拿破仑征服的国家，又重新置于战胜国的统治之下，强行恢复垂死的封建秩序。这次会议就其实质来说，就是一次欧洲封建列强的分赃会议。

神圣同盟与四国同盟 为了巩固维也纳会议的成果，镇压随时可能爆发的革命运动，维也纳会议结束不久，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为了以基督教教义来保卫欧洲良好的政府，应该缔结新的公约，以便随时互相支援。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得到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响应。

1815 年 9 月 26 日，俄、奥、普 3 国在巴黎发表宣言，缔结了所谓神圣同盟。宣称根据基督教所有的人都是兄弟的教义，加入神圣同盟的国家将结成一种真正兄弟般的关系，在危难时患难与共，互相竭尽全力在军事和物质方面进行最大的支持。神圣同盟成立后，除英国与奥地利外，各欧洲国家几乎都在盟约上签了字。但英国在神圣同盟成立后，多次用信函的形式，表示支持这一同盟的宗旨。

神圣同盟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当时欧洲反动势力堡垒俄国。由于这一同盟并没有规定各个加入同盟国家的具体义务和责任，因此，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松懈的政治联盟。

1815 年 6 月 18 日，英、俄、普、奥四国在巴黎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对神圣同盟条约的一个补充。条约规定：四国将以武力维持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有关问题。1818 年法国在还清赔款后，也加入了这个同盟。此后，欧洲的一切问题，便由这五个国家主宰。

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所宣布的反动原则，违背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尽管以沙皇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声称和平已经确立，但不久爆发的欧洲革命运动，便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五章。乔明顺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四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第七、八章。

王荣堂、姜德昌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上册第七、八章。

刘祚昌、光仁洪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第五章。

复习题：

1. 拿破仑帝国是怎样建立的。
2. 如何评价拿破仑的历史作用。
3. 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政治形势的特点。
4. 神圣同盟破产的原因。

第六章 19 世纪前半期的欧洲

第一节 19 世纪 20—30 年代 欧洲的革命运动

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 早在拿破仑统治西班牙时期，西班牙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就领导了 1810—1814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颁布了 1812 年的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这部宪法自始至终贯穿着法国革命的精神。宪法宣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规定在西班牙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次革命还废除了宗教裁判所、领主裁判所、什一税等封建枷锁以及封建地主的一些权力。

拿破仑帝国垮台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重登王位。斐迪南在反法同盟和国内保王势力的支持下，推翻了 1801 年资产阶级革命所有成果，完全恢复了旧的封建制度。此外，他还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和反对派，在军队中实行清洗。同时，为了满足王室的挥霍，对广大下层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苛捐杂税不可胜数。

斐迪南七世的反动措施，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武装起义和暴动。

1820 年元旦，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黎亚哥中校在加迪斯率领士兵起义，起义军宣布成立革命政权，恢复 1812 年宪法。起义军受到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支持，并很快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应，许多地区和城市都出现了武装起义和暴动。

3 月 7 日，首都马德里爆发革命，迫使斐迪南七世宣布恢复 1812 年宪法，任命了主要由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的新政府，并召开新的议会。

1820 年 7 月 9 日，西班牙新议会开幕。在议会中占优势的是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保守派，他们主张以 1812 年宪法为准则，对国王的权力进行限制，但也没有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因此，新议会尽管实行了一系列废除封建特权和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阻碍作用的封建法规，但对农民群众关心的土地问题则根本没有触及，因此，引起了农民的极度不满。

1822 年，代表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激进派在议会中获胜，并于 8 月 5 日组成了新政府。新政府对保王党人掀起的叛乱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并软禁了斐迪南七世。但是新政府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样没有足够的重视，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西班牙革命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不勒斯、葡萄牙、希腊等地都爆发了人民起义，神圣同盟对此深感不安，决定武装镇压。1822 年 10 月，神圣同盟召开会议，决定由法国承担镇压西班牙革命的任务。1823 年 4 月，法国 10 万大军开进西班牙，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5 月 19 日，法军占领了西班牙，重新恢复了斐迪南七世的封建统治。黎亚哥等人被判死刑。西班牙革命失败了。

意大利革命 维也纳会议结束后，意大利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局面。境内的各个封建邦国和领地，秉承奥地利的旨意，对于任何要求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的言行，都给以残酷的镇压。政治上的分裂，也

给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国内关卡林立，币制、度量衡制度极为混乱，严重阻碍了贸易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使意大利的经济陷入一片萧条之中，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爆发了主要由烧炭党人领导的革命。

烧炭党人成立于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意大利南部，其成员主要是自由派贵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军官。烧炭党人主张实现意大利的自由和统一，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实行改革，驱逐外国侵略者。因此，受到意大利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

1820年7月，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烧炭党人首先在那不勒斯的诺拉城发动了军队的起义，起义的领导人是著名的烧炭党人古里叶里莫·佩帕将军。不久，起义的烈火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被迫宣布颁布宪法，召开议会成立由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的政府。那不勒斯的革命震撼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1820年10月，神圣同盟在西里西亚的特劳波举行会议，并发布了《特劳波协议书》，声称神圣同盟将以武力镇压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发生的革命。1821年1月，会议又移到意大利附近的莱巴赫举行，并决定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1821年3月，奥地利军队开进那不勒斯，将革命镇压下去，恢复了斐迪南一世的统治。大批的起义者被捕和被杀。

在那不勒斯革命爆发的同时，在北方的皮埃蒙特又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也是由烧炭党人发起的。国王被迫同意让位给自由派支持的王弟查理·弗利克斯，并以查理·阿尔伯特为摄政。阿尔伯特在起义者的压力下，被迫颁布了西班牙的1812年宪法。1821年4月10日，奥地利军队与撒丁王国的军队一起侵入皮埃蒙特，把起义镇压下去。

1820—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后，奥地利军队继续驻扎在那不勒斯和撒丁王国，意大利人民继续遭受着国内的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压迫。

希腊独立运动 希腊自15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8世纪后半期，希腊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促进了希腊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增长。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希腊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开始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共和国的活动。广大的希腊人民也与土耳其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

1812年，俄土战争结束后，土耳其日渐土微，希腊独立运动趁机又发展起来。1841年，希腊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在敖德萨成立了革命团体“友谊社”（希特里亚），其领导人是贵族出身的亚历山大·伊普西兰狄。

1821年4月，在伊普西兰狄的领导下，希腊人民掀起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人民武装解放了希腊的大部分领土。1822年1月，希腊革命者在厄比达鲁斯召开国民会议，宣布希腊独立，并制定了宪法。国民会议选举了马夫洛考尔达多为希腊共和国的总统。

土耳其统治者派遣了大量的军队镇压希腊人民的解放斗争，土耳其军队所到之处，对当地人民武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到1827年希腊的人民武装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停止。

在对待希腊独立的问题上，神圣同盟中的各个大国各怀鬼胎，采取

不同的态度。俄国希望希腊的独立运动进一步削弱土耳其，因而支持希腊独立。奥地利害怕希腊独立运动引起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因而力主镇压。英法为了使其势力渗入巴尔干，既不愿看到俄国在巴尔干势力的增长，也不同意奥地利武装镇压的主张。1823年，英国承认希腊为交战国，并两次贷款给希腊，奥地利对此极为不满。1827年7月，英、法、俄三国在伦敦签订了“希腊绥靖”公约，要求双方暂时停战，作为解决希腊问题的前提，但是遭到土耳其的拒绝。同年10月，英、法、俄三国舰队在纳瓦利诺海上歼灭了土耳其舰队。次年，俄国正式对土耳其宣战。连遭残败的土耳其不得不向俄国求和。1829年9月14日，俄土签订了亚得里亚诺堡和约，承认了希腊的独立。由于神圣同盟的插手。独立后的希腊仍然保留了封建的剥削方式。

比利时的独立 比利时原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一个行省。1794年，法军占领了比利时，将它又并入法国。因此，比利时在法国革命时期，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特权以及各种封建法规，使比利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拿破仑战争时期，由于拿破仑帝国的搜刮，比利时的经济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比利时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开始不断增长。维也纳会议之后，比利时被并入荷兰。荷兰政府对比利时的搜刮较奥地利和拿破仑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英国商品的大量输入，使比利时的经济更为恶化。

1830年，比利时爆发了经济危机。以此为契机，比利时人民拿起了武器，要求赶走荷兰统治者，宣布独立。1830年8月25日，起义首先在布鲁塞尔爆发，尔后迅速蔓延到全境。前来镇压的荷兰军队连吃败仗。起义者在各地成立了地方政府和自卫军。但大部分都被资产阶级所控制。9月末，在比利时人民的打击下，荷兰军队退出了比利时，同年12月，英、法、普、奥四国举行会议，承认了比利时的独立。

波兰起义 19世纪20年代，波兰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组织爱国协会和军事同盟会等，并与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旨是推翻沙俄对波兰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1830年11月，由青年贵族军官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军事同盟，经过长期准备在华沙发动了起义。响应起义的人民群众有数千人。沙皇尼古拉一世之弟康斯坦丁大公仓促逃离华沙。次年1月，起义者宣布波兰民族政府成立。2月，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大军进攻波兰。波兰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9月华沙失陷，起义失败。

波兰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俄国，致使沙俄武装干涉法国七月革命和比利时革命的计划破产。俄、奥、普被迫承认了法国的新政府和比利时的独立。至此，维也纳会议后建立的欧洲封建统治体系出现了缺口，神圣同盟从此名存实亡。

第二节 19世纪前半期的英国

工业革命 正当欧洲大陆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封建专制制度日趋瓦解的时候，在英国则进行着一场与法国大革命相比毫不逊色的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这就是英国工业革命。英国之所以成为欧洲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圈地运动由于得到国会的认可，更加激烈地进行。圈地运动的结果，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从而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利用圈地所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牧场又成了为工业生产的原料和食品基地。此外，海外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使英国的资本积累得以加速完成，也给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本。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强烈要求对已经陈旧的手工场的生产设备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以提高其生产效率。这一切都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来临，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 18 世纪中叶，首先在迫切需要革新技术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的新兴的棉纺织业中开始。

1733 年，工匠凯伊发明了代替手工投递梭子的“飞梭”，提高了织布的效率，但却使原始落后于织布的纺纱程序的矛盾更加突出。1765 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纱的“珍妮机”，将原来水平放置的单锭纺车改造成竖直放置的多锭纺车，使纺纱效率提高了十几倍。1768 年理发师阿克莱特利用木匠海斯的发明，又制成了水力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纺纱技术的改革。珍妮机纺出的纱精细但不结实，水力机纺出的纱结实但却粗大，又成为纺织业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1779 年纺纱工克普顿结合珍妮机和水力机的优点，发明了“骡机”。这种机器以水力为动力，同时可带动 300—400 个纱锭，纺出的纱细而韧，于是纺纱厂开始建立了。随着纺纱技术的不断进步，织布技术又相对落后了。1785 年牧师卡特莱特发明了织布机，使织布的生产效率提高了 10 倍，从此大规模的织布工厂纷纷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棉纺织业的相关部门，如净棉、漂白、染色、印色等行业、也相继实现了机械化。

利用水力作为棉纺织业的动力，受到了地理和季节的限制。因此，进一步发明适应性更强的动力机便被提上日程了。1769 年，哥拉斯哥大学的教具制造员詹姆斯·瓦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制造了单向蒸汽机。1782 年，他又试制成功双向蒸汽机。经过瓦特改进的蒸汽机很快成为适用于各种机器的动力机。到 19 世纪 40 年代，蒸汽机的使用推广到许多生产部门，机器工厂广泛地建立起来。从此英国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开始了社会化的大生产。

随着工业生产技术革命的发展，作为基础工业的冶铁业和煤炭开采业也出现了技术突破。18 世纪上半期英国出现了焦炭炼铁法。到该世纪 60 年代后，冶铁业开始采用在高炉加装鼓风设备的技术。这一方法很快被广泛采用，使英国的生铁产量由 18 世纪初的 1800 吨，增加到 1802 年的 25 万吨。1784 年，柯尔特又发明了搅拌炼铁法和钢的辗压精炼法，使锻铁生产率提高 15 倍。煤炭工业也出现了许多技术发明，如蒸汽抽水机、凿井机、曳运机等。由于技术上的突破，英国的煤产量由 18 世纪中叶的 500 万吨增加到该世纪末的 1000 万吨。

为了适应大工业的发展，从 18 世纪中期起，英国的交通运输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1812 年，英国仿造美国人富尔顿发明的汽船成功，1819 年，英国的第一艘汽船横渡大西洋。1814 年，史蒂芬逊发明了第一台实用蒸汽机车，1825 年，在史蒂芬逊负责建成的斯托克顿至塔林顿的英国第一条铁路上，这台蒸汽机车正式通车成功。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英国

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此外，这时，英国的水运网也基本形成，公路运输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工业革命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蒸汽机和各种工作机的普遍应用，也促进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1774年，机械师莫兹利发明了车床上的刀架，1797年又发明了可以自由移动的刀架，并将带动工件转动的脚踏板装置改为蒸汽机驱动的转动轮。这种装有滑动刀架的机动车床的发明，使机器制造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后，自动刨床、镗床、汽锤、钻床等工作母机相继发明出来，加上各种测量手段的改进和零部件的标准化和规格化，使机器制造业逐步形成，实现了以机器制造机器的目标，从而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完成。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一次生产力的全面革命，使英国的整个生产体系日趋社会化，产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成为近代世界最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由于工业革命，英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创造了过去多少世纪都无法相比的社会财富。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的海上霸权也得到了增强。由于工业革命，英国的经济地位有了极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

工业革命也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两个新的社会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产生了。从此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就充分表现为这两个阶级的激烈对抗，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遭受的苦难日益深重，对资产阶级的反抗愈加激烈。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提高，到19世纪30年代后，以英国的宪章运动为标志，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1832年的国会改革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他们对于被排斥在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之外的现状日益不满，强烈要求改革陈腐的选举制度。根据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国会议席分配和选区划分的选举制度，新兴的工业城市无权选出议员，对于选民和被选举人也有高额的财产限制，从而使广大的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甚至中、小资产阶级统统被剥夺了选举权。因此，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就出现了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以改革选举制度为目的的激进民主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工人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8万工人举行集会，遭到政府军队的镇压，造成死伤数百人的血案，这就是“彼得卢大屠杀”。血案之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企图扼杀民主运动。

19世纪20年代，要求国会改革的运动又重新开展起来，与前一时期的激进运动不同的是，工业资产阶级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参加这一运动的各个阶级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改革选举制度，推进民主进程，不仅要加入到政府中去，还必须改革国会。

1830年，工业资产阶级在银行家阿特伍得的倡议下，成立了“伯明翰政府联盟”。此后，此类组织在各个新兴城市纷纷成立。

工人阶级又一次积极地投身到运动中，成为运动的主力。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全国联盟”。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又成立了“全国政治协会”，大量吸收工人会员。

1830年，支持改革的辉格党在大选中获胜，辉格党领袖葛雷组阁，并提出国会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方案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将65个人

烟寥寥的“衰败选区”的 143 个席位，分配给新兴的工业城市、农村和爱尔兰、苏格兰。二是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规定城市中每年收入或支出达 10 英镑以上房租者，农村中每年依靠土地收入达 10 英镑以上的土地经营者，租地经营每年收入达 50 英镑或支付 50 英镑以上租金者，皆享有选举权。这一改革方案遭到了上院的强烈反对，但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之下，1832 年 6 月 7 日，上院不得不通过了这一改革方案。

1832 年的国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得以进入国会，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使英国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但是，广大的城乡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却一无所获。据统计，1832 年国会改革后，英国的选民为全国总人口的 1/22。严酷的现实，使工人阶级深刻地体会到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从此，英国工人阶级走上了独立斗争的道路。

宪章运动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财富，但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贫困。从 20 年代起，英国工人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抗议活动，并积极参与了当时由工业资产阶级领导的激进运动和 1832 年的国会改革的运动。但是，1832 年改革的实现，使英国工人阶级意识到，要想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1834 年，英国“全国工会大同盟”成立，会员达 50 多万人。“大同盟”成为英国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日、工会权利、罢工斗争的领导中心。“大同盟”仅存在了一年，就在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下瓦解了。“大同盟”的瓦解，使英国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单纯经济斗争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处境的，必须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段。

1834 年，英国国会公布了《新贫民法》，迫使工人走进工厂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这一法案公布后，便受到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强烈反对。英国各地都出现了反“新贫民法”的暴动。在反对《新贫民法》的运动中，英国工人阶级进一步成熟，更加认识到争取选举权是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关键。

1836 年，以伦敦的木匠洛维特为首的富裕的技术工匠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协会于 1837 年 5 月 8 日公布了“人民宪章”。《人民宪章》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凡年满 21 岁的男性公民皆有选举权；将全国划分为居民人数相等的 300 个选区，按选区人数比例选举议员；废除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议员领取薪金；国会每年改选一次；实行秘密投票。宪章运动由此得名。《人民宪章》的公布，标志着宪章运动的开始。

《人民宪章》公布后，得到了各地工人的热烈支持。许多城市的工人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使宪章运动很快变成了群众性的运动。

宪章运动开始后，由于手工业者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加入，使参加运动的人很快分成两个派别，一是暴力派，二为道义派。

暴力派的主要成分是矿工、绝望的手工业者和北部各城市的工人。他们主张用暴力实现人民宪章。这一派的领袖主要有奥布莱恩、奥康诺、琼斯等人。暴力派形成了宪章运动的左翼。

道义派的主要成分是技术工匠，多为伦敦工人协会的成员。由于他们多数游离于大工业之外，且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因此不主张采用暴力手段来达到实现人民宪章的目的，期望采取温和的所谓“道义力量”

来达到自己的目标。道义派以洛维特为首，并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虽然是运动的倡导者，但在运动的发展中，逐渐变成了运动的障碍，成为运动的右翼。

英国宪章运动共经历了三次高潮。1839年2月4日，第一届“英国工人阶级全国公民公会”（简称宪章派公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与会代表53人。大会通过了给国会的请愿书，要求废除一切反人民的立法，实现人民宪章。并决定于5月5日向国会请愿。请愿书公布后，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达120多万，形成了宪章运动的第一次高潮。7月12日，国会否决了请愿书，并派大批军队对抗议群众进行弹压。宪章派公会立即宣布在8月16日总罢工的决定，但由于道义派的阻挠和公会领导的软弱，不久又取消了罢工的决定。9月14日，宪章派公会解散。随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搜捕，宪章运动进入低潮。

40年代初期，英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和农业歉收，使宪章运动再次进入高潮。1840年7月，宪章派在曼彻斯特召开了新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其会员总数达5万多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1842年2月，宪章派提出新的请愿书。这次请愿书除了要求实现人民宪章外，又进一步提出废除“新贫民法”、缩短工作日等要求。参加请愿书签名的工人达330万人。5月2日，请愿书被送交国会，但又一次被国会拒绝。在“全国宪章派协会”的领导下，8月份在英国各地出现了罢工风潮。宪章派的领导在运动关键时刻再次退缩，遂使各地罢工相继失败。宪章运动又一次进入低潮。

1847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和1848年欧洲革命，使宪章运动又一次恢复起来。1848年4月3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再次向国会递交请愿书。在请愿书签名的人超过了500万。宪章派的领导人决定于4月10日组织群众到国会游行。英国政府调集大量的军队到首都，并将15万资产阶级青年组成志愿军，准备大举镇压示威群众。在紧要关头，宪章派领导奥康诺等人临阵脱逃。4月10日，他们劝导已经集合的群众回家。五月，英国政府宣布解散宪章派代表大会，接着又一次否决了请愿书，宪章运动失败了。

宪章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也缺乏一个用正确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的领导，工人中普遍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

英国的宪章运动尽管最后失败了，但是它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广泛的、群众性的独立斗争，对后来的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之提供了宝贵的斗争经验。经过宪章运动，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起来，使英国的工人运动进入了更高阶段。

第三节 19世纪前半期的法国

1830年七月革命 1815年拿破仑百日帝国覆灭后，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复辟王朝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于1815年8月，进行众议院选举，当选的众议员几乎都是贵族和高级教士，因而被讽称为“无双议会”。在路易十八王弟阿图瓦伯爵操纵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对革命分子和拿破仑的追随者加以残酷的迫害，许多人被处死刑。复辟王

朝的残酷统治，使法国人民和资产阶级又一次投身于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路易十八在新的革命的威胁之下，转而实行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并解散了无双议会。在这种情况下，君主立宪派又重新抬头。1816—1819年，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黎塞留公爵和卡德兹公爵先后组阁，并通过议会颁布了一些相对温和的法令。1820年，王储贝利公爵被刺杀，极端派王党分子控制了议会，严厉地镇压一切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出现了类似意大利烧炭党的秘密组织。他们主张用武装起义的手段推翻复辟王朝的统治。但因其内部组织松散，政见不一，组织的多次起义都被镇压下去。

1824年，路易十八死后，查理十世继位。查理十世与路易十八一样，对法国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人士，推行一系列旨在恢复革命前贵族和天主教会特权的政策。对革命期间土地和财产被没收的贵族，用国库的钱给予补偿，其数额竟达10亿法郎。为了筹措这笔开支，查理十世下令将公债的年息从5%减到3%。这一作法不仅受到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反对，也遭到持有大量公债的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此外，他还颁布了恢复天主教会在学校中的管理权的法令和反宗教犯罪法令等。

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又颁布法令，解散新议会，限制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实行新选举法，剥夺了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选举权。这些法令颁布之后，法国各阶层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查理十世的倒行逆施。七月法令成为七月革命的导火线。

1830年7月27日，巴黎的群众抗议行动演变成武装起义，七月革命爆发了。7月29日，武装的市民和一部分起义的政府军士兵占领了市政厅，尔后向国王居住的杜伊勒宫进发，很快将它攻占。在巴黎城外狩猎行乐的查理十世仓皇逃亡英国。

七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工人阶级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挥，革命果实被大资产阶级篡夺。他们拥立了金融贵族的代表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为国王，建立了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

七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又一次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打破了其恢复封建专制制度的梦想，巩固了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胜利果实，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

法国工业革命 18世纪后半期，在法国纺织工业中就开始使用机器。法国革命后，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被摧毁，机器的使用更为广泛。在纺织工业中，1790年生产中使用的纺织机仅有900架（“珍妮机”），到1805年，就发展到12500架。在同一年，贾科尔织机发明成功，使法国丝织业也开始广泛地使用机器。到1812年，仅里昂一地，就有12000架贾科尔织机。1810年，古拉尔发明了织麻机，麻织业的产量开始迅速增加。

复辟王朝时期，由于波旁王朝与大资产阶级的妥协，资本主义继续有所发展。纺织品的产量增加了两倍。在大陆封锁时期建立起来的冶金和化工工业也有所发展。1825年，英国取消了对欧洲大陆机器出口的限制，法国从英国进口了大量的机器。1820年，法国仅有蒸汽机39架，到1830年，就增加到625架。在这一时期，缫丝业也开始使用机器，大型的丝织工厂纷纷建立。铁的产量也由1818年的11万吨增加到16万吨。

采煤业的产量也比革命前增加了2倍多，达到200多万吨。

七月王朝建立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又有了更加显著的进步。到1848年，工业生产中使用的蒸汽机增加到4853架，铁的产量达到48万吨，煤产量达到400万吨。铁路的长度由1831年的39公里增加到1931公里。

在七月王朝统治时期，自然科学和技术也出现了许多重要发现和发明。如加斯帕尔发现了微分几何学和投影几何学，给工业和建筑制图提供了有利的方法。1845年，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利用数学理论成功地预测了海王星的位置，对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验证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技术方面，1834年，牟佩罗发明了多色印花机，大大提高了印染生产的工效。在同一年，尼埃普斯和代达格尔发明了银版照相术。

法国的工业革命使法国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仅次于英国的工业强国。但是，由于小土地所有制的普遍存在，限制了工业劳动力的来源，加上传统的、以手工业为主的工艺品和奢侈品工业生产，在法国工业中占较大比重，所以法国的机器使用仍然远远落后于英国。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他们要求参与政权统治的欲望更强烈起来，与金融贵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另一方面，近代工业的兴起，使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工人运动开始发展起来。

两次里昂工人起义 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其中工人尤甚。资本家利用机器生产的条件，大批的雇佣女工和童工，从而压低成人男性工人的工资，并导致大批工人失业。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费用也在不断上涨。路易·菲力普统治时期，生活费用的上涨指数竟达15%—20%，而工人工资却丝毫没有调整。因此，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剧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里昂工人起义。

里昂是法国的丝织业中心。19世纪30年代，这里已经有工人9万多人。丝织工人所受的剥削是最为残酷的。他们工作时间长达18个小时，所得工资仅能买一磅面包。1831年10月，工人掀起了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工人压力面前，资本家与工人签订了一个新的工资标准协议。但是，这一协议还没有开始执行，资本家便背信弃义，将其撕毁。10月21日，里昂工人开始罢工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进行到市政厅的时候，遭到国民自卫军的开枪射击。工人被迫拿起武器，举行起义。他们提出了“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英勇战斗。经过两天的激战，占领了里昂全城。但是，里昂工人没有与其他城市以及农民取得联系，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不久，七月王朝调来6万大军镇压起义。12月3日，里昂被攻陷，起义失败了。

1834年4月，里昂爆发了第二次织工起义。起义是由于政府实行高压政策，禁止工人罢工和审讯过去罢工的领袖而引起的。4月9日，工人走上街头，修起街垒，高呼“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我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的口号，与政府军展开了激战。起义持续了6天，4月15日，七月王朝又一次调来重兵，将起义镇压下去。

19世纪20年代的两次里昂工人起义，是法国阶级斗争的转折点。在起义中，工人阶级独立地提出了本阶级的口号，并为之进行英勇的战斗，

表明在法国，工人阶级已经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上升到历史的首要地位。

第四节 19 世纪前半期的德国

关税同盟 维也纳会议之后，德意志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根据维也纳会议的总决议建立的德意志邦联，由 34 个君主国和 4 个自由市组成，邦联的常设机构是邦联会议，由奥地利担任邦联主席。但是邦联会议并没有统帅邦联成员的权力，各君主国均有自己的外交军事方面的自主权，与独立的国家无异。在奥地利的支持下，德意志邦联各个君主国均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封建专制统治。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和四分五裂的状态，使德意志邦联内部税卡林立，各君主国贸易额锐减，极大地阻碍了德意志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819 年，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发动了促进德意志经济统一的运动。1819 年，各个不同君主国的许多工厂主和商人向邦联会议呈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取消邦联内部的各个税卡，尽快实现经济统一。这一要求受到了普鲁士、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君主国的支持。但却遭到了邦联主席、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拒绝。然而，由于德意志邦联的许多成员国出于本国的利益，强烈要求取消税卡，恢复内部市场，从而使德国的经济统一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

1834 年，普鲁士等 18 个德意志邦联成员国成立了“关税同盟”。在同盟内部，各加盟国家之间贸易和交通自由，取消关税壁垒，对外制订统一的进出口税则。关税同盟后来扩大到 34 个成员国，奥地利一直拒绝参加。关税同盟的建立，促进了德意志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统一，从而为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工业革命 德意志的工业革命开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后期。关税同盟成立以后，德国的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工业革命也首先从纺织工业开始。1834—1838 年，仅在萨克森一地就出现了 40 多家纺织工厂。到 1846 年，参加关税同盟的各个邦共有各种纺织厂 313 家，57 万多个机器纱锭，到 40 年代，德意志的冶金、采煤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仅鲁尔和萨尔地区，煤产量就达 300 万吨以上，生铁产量 20 万吨以上。这一时期，蒸汽机在德意志各邦也迅速推广。仅普鲁士一邦，就有蒸汽机 1139 台。铁路建设也随着工业的发展扩大了。1835 年，德意志仅有铁路 12 公里，到 1848 年，就已经达到 2500 公里，其增长速度，仅次于英国和比利时，居欧洲第三位。

德意志的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很大，但与英、法等国相比，仍远远落后。工业生产部门中，工场手工业和小手工业仍占居优势，机器制造业也没有建造起来。但是，由于工业革命，德意志的产业无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到 19 世纪 40 年代，德意志的产业工人已达 200 多万人，使德意志的社会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 西里西亚属于普鲁士，是德意志纺织业中心，亚麻布的主要产地。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德意志的纺织业开始由家庭手工业向机器纺织业过渡。但是由于普鲁士拒绝同欧洲各国签订贸易协定，使德意志的纺

织业受到沉重打击。为了同欧洲其他国家纺织品竞争，德意志的纺织业资本家采取了延长工时，降低工资的手段来降低成本，以便同外国产品竞争。许多纺织业工人由于不堪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双重压迫，纷纷迁居欧美各国谋生。从 30 年代末开始，德意志的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压迫的斗争逐渐兴起，其中最突出的是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

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主要是家庭手工业工人，他们受到了工厂主和包买商的残酷盘剥。40 年代初，欧洲农业连续三年出现了歉收，使广大织工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而工厂主却趁机大幅度的降低工资以降低生产成本。其中彼得斯瓦尔道镇的纺织厂厂主茨万齐格尔对工人的剥削最为凶狠，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仅为其它工厂的一半。彼得斯瓦尔道的工人对茨万齐格尔痛恨到极点，他们编了一首歌，叫《血的裁判》，在歌中他们痛斥茨万齐格尔的暴行。1844 年 6 月 3 日，一名工人在茨万齐格尔窗前唱这支歌，被茨万齐格尔毒打一顿后，送给了警察，这一事件成为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导火索。

6 月 4 日，愤怒的织工捣毁了茨万齐格尔的住宅和仓库，3000 多名工人组织起来，又向附近的兰根比劳镇进发，捣毁了另一人人痛恨的工厂主迪里希的住宅，并打跑了前来镇压的军队。6 月 6 日，普鲁士政府调动了大批军队前来镇压起义，工人们被迫撤离。

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表明德意志的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次起义充分地显示了德意志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了德意志其它地区工人群众的觉醒。在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后，德意志其它地方的工人也开始了罢工和示威活动。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六章。

王荣堂、姜德昌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第十一、十二章。

刘祚昌、光仁洪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第八章。

乔明顺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第四、六章。

管敬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七章。

复习题：

1. 简述英国宪章运动产生的原因、经过和历史意义。
2. 简述法国里昂工人起义的历史意义。
3. 试述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
4. 法国七月革命的后果。

第七章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

第一节 独立前夕的拉丁美洲

殖民制度 在欧洲殖民者侵入美洲之前，拉丁美洲的主要居民是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印第安人，他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美洲文明。

1429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的殖民者纷纷踏上美洲大地，以求寻找所谓“黄金之国”。最早侵入美洲的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几个世纪的殖民征服中，西班牙占领了除巴西以外的中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葡萄牙人则占领了巴西。此后，英、法、荷等国占领了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又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手中抢占了圭亚那，牙买加，海地等地。

西班牙、葡萄牙在拉丁美洲实行了极为残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殖民统治。到十九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建立起庞大的殖民统治机构。西班牙在殖民地设立了新西班牙、秘鲁、新格拉那达、拉普拉塔四个总督区。葡萄牙在巴西设立了13个总督府，后又合并为一个总督区。总督是总督区的最高统治者，总督之下设有省长。总督区的所有军事、行政、财政、司法大权皆由总督一人控制，总督则直接对国王负责。西班牙、葡萄牙封建专制政府就是通过这一严密的统治机构，将殖民地牢牢地控制在宗主国手中的。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经济上对拉丁美洲殖民地实行了多种掠夺制度。入侵美洲之时，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制度正处于鼎盛阶段。因此，西、葡两国对美洲的殖民政策带有浓厚的封建特点。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内盛行委托监护制。所谓委托监护制，实际上是将殖民地的大片土地和印第安人，按照西班牙本土的授产制，分配给到达殖民地的贵族、军官，他们以监护人的名义，对所授的土地和印第安人进行“监护”。教会在殖民地也拥有巨大产业。到19世纪初，教会已成为西、葡等国殖民统治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护制度下，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在霸占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起享有各种特权的大庄园。尽管殖民统治当局承认被“监护”的印第安人是“自由人”，但他们必须承担沉重的租赋和劳役，地位几同农奴。与授产制同时并存的还有大地产。大地产与授产制不同之处在于大地产主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大地产主是在授地基础上形成的。剥削手法与大授产制相同。

在葡属巴西和西属拉美等地区，还盛行一种更为残酷的奴隶制。殖民者不仅占有土地，而且占有印第安人的人身，使他们成为奴隶。印第安奴隶遭受着残酷的奴役，大批印第安人因劳累过度而死亡。为了补充劳动力，殖民主义者利用三角贸易，从非洲贩来大批的黑人奴隶，使拉美地区在17世纪后，成为世界最大的蓄奴区。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在到达美洲的第一天起，便开始疯狂地掠夺当地的金银。美洲盛产金银，因此，殖民当局到处寻找金、银矿，并利用印第安劳动力进行掠夺式的野蛮开发。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都宣布殖民地的金银矿产为王室的私产，但允许私人开采，每年提供相当数量的金银为税金。在殖民统治当局的鼓励下，在墨西哥、秘鲁等黄金和白银

产地，在 17 世纪以后，出现了大量的矿山。到 18 世纪，拉丁美洲的金银产量几乎占世界金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在矿山劳动的印第安人，都是通过不同的徭役征调来的。印第安人每年都要送一定数量的男子去矿山服劳役。在矿山服劳役的印第安人，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和受残酷的虐待，大部分悲惨地死去。印第安人称徭役制度“比任何天灾都可怕，比任何瘟疫都厉害”。

为了在思想上控制印第安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又把天主教做为殖民统治制度的辅助工具。在统治美洲的 300 年间，殖民统治者都是一手高举铁剑，一手托着圣经，在传播文明这一堂皇的口号下，强迫印第安人和黑人信仰天主教，借以用天主教的教义和十字架来束缚和麻醉他们，使他们失去斗争的意志。此外，天主教会还严密地控制着殖民地人民的教育和日常文化生活，天主教教规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于不信天主教和怀疑天主教教义的人，教会经常以异端的罪名将他们送进宗教裁判所，遭受监禁或烧死。在经济上，天主教会占有了殖民地最好的土地，此外还向殖民地征收什一税、婚丧和洗礼费等，成为殖民地最大的剥削者。因此，天主教会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

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西班牙和葡萄牙从宗主国的经济利益出发，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实行严格的控制。殖民统治当局，禁止殖民地种植亚麻、橄榄、葡萄、桑树等经济作物，从而保证亚麻布、丝绸、葡萄酒和橄榄油在殖民地有广阔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厚利的作物，如甘蔗、棉花、蓝靛、烟草、可可等，则强迫殖民地人民大量种植。这样，在拉美许多地区出现了单一作物制这一畸形的经济现象。在工业方面，西、葡殖民统治当局只把殖民地作为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禁止殖民地生产宗主国能够输出的产品，如禁止开采和冶炼铁矿石，禁止纺织棉花和毛呢等。在贸易方面，禁止殖民地与宗主国之外的国家直接贸易，也不准殖民地之间进行贸易交换。这样，殖民地的贸易全部控制在宗主国的商人手中。他们把大量质次价高的商品倾销到殖民地，从中牟取暴利。

殖民统治当局在殖民地推行的这种经济政策，严重地阻碍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

16 世纪以后，英、法、荷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崛起，并大肆向海外扩张，进行殖民侵略，做为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受到严重的挑战。为了保护自己的殖民利益不受侵犯，西班牙和葡萄牙宣布拉丁美洲为禁地，严禁英、法、荷染指拉丁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严禁其它国家和殖民地进行贸易。

为了打破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和商业垄断，英、法、荷等国采取了走私、海盗掠夺，甚至诉诸武力的手段。到 17 世纪末，拉美的走私贸易额竟超过正常贸易额的四倍，到 18 世纪末，西、葡对拉美的贸易和商业垄断已经基本被打破。海盗掠夺是英、法、荷等国打破西、葡两国贸易和商业垄断的重要手段之一。从 17 世纪初开始到 18 世纪末的 200 年间，数以千计的西、葡两国的商船被劫掠，从而使西、葡两国商人视与殖民地贸易为畏途。18 世纪后，西、葡两国与殖民地的贸易日益减少。除了走私与海盗掠夺，英、法、荷还用武力直接从西、葡

两国手中抢夺殖民地。自 16 世纪末以后，英国相继从西班牙夺走了巴哈马群岛、牙买加以及巴巴多斯等地。荷兰则占领了圭亚那，法国占领了海地。

18 世纪之后，西、葡两国由于封建统治日益衰弱，从而放松了对殖民地的控制，使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经济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发展起来。在一些城市里，出现了许多生产铁器、纺织品、玻璃、陶器等手工作坊。以墨西哥的开雷塔罗镇为例，该镇仅生产呢绒的手工工场就有 20 多家，此外，还有 300 多家小型作坊。秘鲁也拥有手工工场 400 多家。巴拿马、古巴、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的造船业也十分发达。殖民地生产的甘蔗糖、染料、棉花、兽皮、烟草也在欧洲市场日益畅销。在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的巴西，也出现了纺织、造船等许多手工工场。虽然，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因素举步维艰，发展缓慢，基础薄弱，但到 18 世纪后期，拉丁美洲已成为新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出口商品量是同期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的 27 倍。

随着殖民地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各方面矛盾日趋尖锐起来。

殖民地与宗主国矛盾的加深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霸权的衰落和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使拉丁美洲人民首先在经济上提出摆脱宗主国束缚，要求自由贸易的口号。18 世纪后半期，西、葡殖民统治当局在限制殖民地对外贸易等方面虽做了一些改革，但是远远不能满足殖民地人民的要求，这就促使殖民地人民走上了彻底摆脱宗主国控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

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前夕，殖民地共有人口 2000 多万，其中西属殖民地 1600 多万，葡属殖民地 300 多万。在近 300 年的时间里，印第安人、黑人以及来自西、葡两国的白人后裔，在共同的生活和劳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拉丁美洲的各个民族，而拉丁美洲的阶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

直接来自西班牙、葡萄牙的高级官吏、僧侣、大商人和大地主形成了社会的上层，被称为“半岛人”（因为他们大都来自比利牛斯半岛）。他们掌握着殖民地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宗教大权，是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统治者和压迫者。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后裔被称为“克列奥人”。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殖民地的地主，控制着殖民地的大部分土地，另外一些人则经营工商业和矿山，以及充当殖民地的中级官吏。这些人员虽然拥有宗主国的公民权，但在政治上受到来自宗主国的白人统治者的歧视，不允许他们进入殖民地社会的统治阶级上层。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克列奥人中形成了一个与海外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工商业资产阶级集团，他们对宗主国压制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日益不满，要求在经济上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进行自由贸易。因此，他们与宗主国殖民统治集团的矛盾也逐渐尖锐。在这一时期，他们中间出现了自称为“美洲人”的独立派，并成为后来独立战争的领导者。

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叫做墨斯提佐人，与黑人的混血后代叫穆拉特人，黑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叫桑保人。这些混血种人约占殖民地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大部分是小商贩、自由牧民和手工业者，他

们构成了殖民地社会的小私有者集团。虽然他们在法律上仍然被看成是自由人，但却享受不到真正的公民权利，并受到种族歧视，在经济上也受到盘剥压榨。因此，他们与宗主国的统治者有着极大的矛盾，在独立战争中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印第安人与黑人处于殖民者社会的最底层。印第安人尽管遭受到殖民者大肆屠杀，但到 18 世纪末，仍然有 700 多万人。他们大多数人是佃农和债务奴隶。黑人主要是种植园的奴隶，他们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承受着最严酷的奴隶制度的压迫。由于遭受的民族和经济压迫最深，他们对于殖民统治怀着刻骨的仇恨，因此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和斗争性，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在独立战争前，他们就不断掀起起义和暴动，反对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和压迫。

克列奥人、各种混血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之间，由于种族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也存在着不同的矛盾，而殖民地社会中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也交织在一起，使殖民地社会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但是，殖民地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压迫者，那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者。在反对共同的压迫，要求独立和自由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愿望，这也是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共同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各个不同民族和种族人民所形成的社会力量，汇合成为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的洪流，冲垮了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的统治。

18 世纪以后，欧洲的启蒙运动、北美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给拉丁美洲人民以极大的影响。18 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出现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在欧洲接受过教育，深受启蒙思想的学说和著作的熏陶，熟悉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如后来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争取独立的舆论准备工作中，以及在独立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米兰达、加马拉、纳利诺、罗哈斯等人。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将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潘恩的《常识》等翻译成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广为散发和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为独立战争的爆发，做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18 世纪末，西班牙卷入了法英之间的战争。1805 年在特拉法加海战中，西班牙舰队和法国舰队一起被英国歼灭，从此失去了海上的控制力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一起加入法国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以后，英国也加强了对欧洲西海岸的封锁，使西、葡逐渐失去了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在客观上促进了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发展。

第二节 独立战争

海地革命 海地原为西属殖民地圣多明各岛的一部分。17 世纪前期，法国侵入该岛的西部，不断扩大占领区。1679 年，西班牙与法国签订《里斯维克条约》把海地的西部割给法国，称法属圣多明各。

法国殖民者占领海地西部以后，在这里设立了总督以及庞大的殖民管理机构进行统治。法国在海地广泛地推行野蛮的种植园奴隶制，促使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为殖民统治者生产甘蔗、咖啡和棉花等经济作物。黑人奴隶的累累白骨为法国殖民统治者换来了巨额的财富。18 世纪末，欧洲市场上的蔗糖和咖啡，绝大部分是海地生产的，其出口贸易额占法

国殖民地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海地的种植园经济成为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之一。

革命前，海地的总人口约有 56 万人，其中法国殖民者，包括各级官吏、军官、传教士、大地主和商人等，约有 4 万多人。这些人控制着海地政治、经济命脉，掌握着殖民地的所有大权，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核心。黑白混血人和“自由黑人”约有 3 万多人。这些人虽然在法律上享有同白人一样的权利，但实际上仍受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和隔离，在各个方面都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因此他们与白人统治者有着极为尖锐的矛盾，强烈要求推翻白人殖民者的统治。黑奴占海地人口十分之九，约有 48 万人。他们处于海地社会的最下层，处境极为悲惨，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每天在白人监工的皮鞭下劳动十几个小时，夜晚像囚犯一样被禁锢在低矮的茅屋之中。对于任何违反种植园主命令的奴隶，主人可以任意采取各种残酷的刑罚加以处置，甚至处死。在残酷的折磨下，大批黑人奴隶仅仅劳动几年便失去劳动能力或者活活累死。

海地革命是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爆发的。1790 年，在文森特·奥赫的领导下，一部分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根据《人权宣言》中的自由、平等原则，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要享有与白人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的要求，但是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拒绝。在文森特·奥赫的带领下，混血种人与“自由黑人”发动了起义，但不久被镇压。

1791 年夏，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又一次发动起义。这次起义有大批的黑人奴隶参加，声势极为浩大。领导这次起义的领袖是杜桑·卢维杜尔（1743—1803 年）。杜桑原为一个种植园主的奴隶，后来给奴隶主担任马车夫。年轻时勤奋好读，很快精通法语，并开始研读启蒙学者的著作，深受法国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决心为争取奴隶解放而斗争。起义军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法国军队。在起义的过程中，杜桑成为一名卓越的革命家和起义的军事领导人。

海地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法国殖民统治者。在起义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起义的黑人奴隶们烧毁和破坏了 180 多个种植园，杀死了 2000 多名殖民者。大批的法国种植园主、官吏、教士和商人逃往西印度群岛的其他岛屿和圣多明各的东部西班牙属地。

正当海地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刻，盘踞在圣多明各岛的西班牙殖民者，认为从法国人手里收复海地，重建其殖民统治的时机已到，便于 1793 年以解放奴隶为借口，侵入海地，杜桑起初曾被西班牙人废除奴隶制的口号所迷惑，不久便识破了西班牙独占海地、恢复奴隶制的真面目，立即向西班牙入侵者发动了进攻，将西班牙侵略军打得溃不成军，被迫于 1794 年退出海地。西班牙退走后，英国认为正是霸占海地的好机会，遂出兵海地。但是，杜桑率领起义军英勇奋战，在 1798 年 10 月，彻底打败英军，使英国霸占海地的阴谋落空。英国被迫停战议和。1801 年 1 月，杜桑军队向东部西班牙属地进攻，赶走了西班牙殖民军。

1801 年 6 月，杜桑·卢维杜尔宣布海地独立，并颁布了宪法，宣布永远废除奴隶制，解放一切黑人奴隶，所有肤色的居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杜桑被宣布为终身执政。

1801 年 1 月，当时正在法国执政的拿破仑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企图再度控制海地，以海地为立足点，向加勒比海和美洲扩张，实

现建立法兰西海外殖民地的梦想，派遣 54 艘军舰和 3 万多士兵进攻海地，由拿破仑的妹夫勒·克莱尔将军指挥。法军在海地登陆后，遭到杜桑军队的英勇抵抗，使法军连连败北。勒·克莱尔在战场上未能取胜，遂又玩弄起和谈的阴谋，并用卑鄙的手段诱骗杜桑参加和谈会议，在谈判中将他逮捕，押送到法国。1803 年，杜桑·卢维杜尔惨死于法国狱中。

杜桑死后，海地人民和起义军并没有停止战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法军死伤过半，还有许多士兵染上了黄热病，勒·克莱尔本人也罹疾而死。1803 年 10 月，法军被迫投降，海地人民终于打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军队。

1803 年 11 月，海地人民通过了《独立宣言》。1804 年 1 月 1 日，海地正式宣布独立，称海地共和国。

海地的独立，对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拉丁美洲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拉开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帷幕。

西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 19 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中断了与拉丁美洲殖民地的联系。1807 年，拿破仑军队占领了葡萄牙，葡萄牙国王仓皇逃往巴西。次年，拿破仑军队又侵入西班牙，俘虏了国王查理四世，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登上了西班牙王位，至此，西班牙中央政权完全垮台。西班牙王宫的覆灭消息，成为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的信号，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独立和解放战争在西属殖民地爆发了。

西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主要有三个中心地区，即新格拉纳达、拉普拉塔和新西班牙总督区。

新格拉纳达的总督区的革命中心是委内瑞拉，也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最重要的战场。新格拉纳达的独立战争的最初领导者是米兰达(1750—1816 年)。米兰达出生于加拉加斯的一个克列奥资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参加过法国大革命，后又在欧、美各国从事委内瑞拉的独立活动。1806 年，他在纽约组织了一支远征部队在委内瑞拉的科罗登陆，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西班牙的统治，但不久失败，又逃到英国。

1808 年法军占领西班牙后，加拉加斯的克列奥人爱国者于 1810 年 4 月在委内瑞拉首府加拉加斯举行起义，驱逐了总督和其它殖民统治机构的官吏，成立了临时政府“洪他”(gunta，西语“委员会”之意)。次年初，米兰达回到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临时政府推选他为革命军的统帅。3 月 2 日，加拉加斯召开了新选出的国民议会。7 月 5 日，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委内瑞拉独立，成立以米兰达为首的委内瑞拉共和国(第一共和国)政府，并颁布了宪法。与此同时，在波哥大、卡塔纳赫、基多等城市也爆发了反对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不久，独立斗争的烈火在整个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燃烧起来。

委内瑞拉共和国政府成立以后，便遭到了西班牙殖民军队的进攻。尽管共和国政府在人力和物力都有一定的实力，但是由于共和国政府没有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措施，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加上共和国领导层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致使共和国军队连吃败仗。1812 年春，加拉加斯等地发生了严重地震，对于共和国政府更加不利。7 月，米兰达被俘，后死于西班牙狱中。第一共和国遂被颠覆。

第一共和国夭折之后，委内瑞拉的独立运动并没有停止。委内瑞拉的革命者在第一共和国领导人之一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的率领下，又重新举起了义旗。玻利瓦尔出身于加拉加斯的克列奥人家庭，青年时代曾到欧洲游历，并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第一共和国时期，玻利瓦尔曾担任主要领导人。1812年革命失败后，玻利瓦尔流亡到卡塔纳赫城，在当地的革命者的支持下，很快组织了一支军队，于1813年重返委内瑞拉，不久收复加拉加斯。1814年1月，玻利瓦尔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次年，在西班牙殖民军队和国内反动势力夹攻下，加拉加斯失陷，第二共和国覆灭了。

1815年拿破仑帝国瓦解之后，西班牙王室又重新恢复了权力。4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来到新格拉纳达总督区，很快攻下波哥大等城市，在新格拉纳达重新恢复了殖民统治。

此时逃亡在海地的玻利瓦尔，在海地共和国支持下，重新组织了一支革命军队，于1816年先后两次率军重返委内瑞拉。1817年初，玻利瓦尔在奥里诺科河畔安古斯图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在根据地，玻利瓦尔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措施，宣布废除奴隶制，并宣布没收西班牙王室和所有殖民统治者的土地，分给参加革命军队的士兵。这些措施受到了广大的奴隶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欢迎，他们纷纷参加到玻利瓦尔的队伍中。1818年10月，玻利瓦尔宣布成立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

1819年5月，玻利瓦尔率领一支精悍的军队，越过安第斯山，突然进入哥伦比亚。8月玻利瓦尔的军队在布亚卡歼灭了西班牙殖民军1600多人，随后解放了哥伦比亚全境。1819年12月，由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组成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成立，玻利瓦尔当选为总统。1822年5月，玻利瓦尔率领革命军又解放了厄瓜多尔。于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便成为包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的独立国家。至此南美北部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在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的人民独立和解放斗争进行的同时，以拉普拉塔地区为中心的南美南部地区，也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

拉普拉塔总督区由于经济落后，西班牙殖民统治一直很薄弱。1808年5月，西班牙被法国占领的消息传来，拉普拉塔地区最发达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民首先举行游行和暴动。由于群众运动的推动，社会上层的克列奥人革命者，召开了新的市议会，逮捕了拉普拉塔的总督。5月25日，又成立“拉普拉塔临时政府”，宣布独立。布宜诺斯艾利斯独立的消息传出后，拉普拉塔总督区的乌拉圭、巴拉圭两省也爆发了起义。1815年8月，巴拉圭宣布独立。乌拉圭等其他几省的权力也转到了克列奥独立派手中。

1816年7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的倡议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的几省区组成了“拉普拉塔联合省”，宣布独立。1853年改为阿根廷共和国。

拉普拉塔地区的独立战争是在圣马丁领导下进行的。圣马丁（1778—1850年）出生于一个克列奥人的家庭，曾在西班牙军中服过役。在服役期间，与拉丁美洲的独立派革命者有过频繁的接触，立志为拉丁美洲独立事业献身。1812年他离开西班牙，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独立

派军队中杰出指挥官。1814年，他出任临时政府的库约省省长职位。在此期间，他制订了越过安第斯山，进兵智利解放秘鲁的计划。同时，他积极备战，建立了一支拥有4000人的队伍。同年10月，智利革命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镇压，其领导人奥希琴斯率领残余部队与圣马丁会合，从而更加壮大了圣马丁的军事力量。

1817年1月，圣马丁和奥希琴斯分两路率领部队越过安第斯山，进入智利，出奇不意的向盘踞在智利的西班牙军队发起了进攻。2月12日，在恰卡布科战役中，西班牙军队全军覆灭。1818年2月，智利宣布独立。

智利独立后，圣马丁又开始着手进行解放秘鲁的工作。在英国人寇克兰的支持下，圣马丁组建了一支舰队。1820年8月，圣马丁率领舰队向秘鲁进发。登陆后，受到秘鲁人民的欢迎和支持。1821年7月，圣马丁的独立军攻进秘鲁首府利马，秘鲁宣布独立，独立政府授予圣马丁共和国“保护者”的称号。

秘鲁宣布独立后，原西班牙的利马总督带领2万多残军逃至东部山区，给独立后的秘鲁以极大的威胁。为了彻底消灭敌军，圣马丁与玻利瓦尔取得了联系，双方于1822年7月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举行会议。双方商定由玻利瓦尔负责出兵肃清秘鲁境内的敌军。这次会议后，圣马丁便辞去了在秘鲁的职务，离开秘鲁，最后隐居到欧洲。

瓜亚基尔会议之后，玻利瓦尔联合了南美一切力量，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1822年9月，玻利瓦尔率大军进入秘鲁。1824年8月6日，在胡宁平原，革命军与西班牙殖民军展开激战，西班牙军队在损失3000余人后逃走。同年12月9日，玻利瓦尔的战友苏克雷将军指挥部队在阿亚库乔地区包围了敌军。在这次战役中，歼灭了敌军9000余人，俘虏了秘鲁总督和十几名西班牙的元帅和将军，以及几千名士兵。

阿亚库乔战役后，独立军的另一著名领导人苏克雷率军继续向东南挺进，不久解放了上秘鲁。1825年8月6日，上秘鲁宣布独立。为纪念玻利瓦尔，定国名为玻利维亚。

新西班牙总督区的独立战争，与新格林纳达和拉普拉塔总督区的独立战争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一地区独立战争的中心是墨西哥。

1810年9月16日，在多洛雷斯镇响起了钟声。该镇主管神甫伊达尔哥（1753—1811年）向群众高声喊道：“你们愿意成为自由人吗？三百年前，可恨的西班牙人夺去了我们祖先的土地，你们愿意夺回来吗？”聚集在教堂门前的群众高喊“处死西班牙人！”“独立万岁！”这就是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多洛雷斯的呼声”。从此新西班牙总督区的独立战争开始了。

伊达尔哥成为这场斗争主要的领导人。伊达尔哥虽然是一个教士，但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十分崇拜卢梭。他痛恨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因此参加了克雷塔罗的革命团体。在9月16日以后，伊达尔哥聚集了600名印第安人组成了一支起义军，到处攻打地主的庄园和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机构。伊达尔哥代表起义军宣布，废除奴隶制度，要求奴隶主必须在10日内解放所有奴隶，归还印第安人的土地，废除所有强派给印第安人的苛捐杂税。起义军的措施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他们纷纷加入起义军，使起义军很快发展到8万人。9月，伊达尔哥的起义军逼进墨西哥城。

1811年1月，西班牙从本土调来增援部队，猛烈地进攻起义军。尽管起义军给敌人以重创，但由于缺乏作战经验，最后还是失败了。伊达尔哥率少数义军士兵向北撤退，中途由于叛徒出卖，被西班牙殖民军逮捕，于1811年7月30日英勇就义。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革命家和英勇的独立战士，墨西哥人后来称他为“墨西哥独立之父”，将9月16日定为墨西哥的国庆节。

伊达尔哥牺牲后，伊达尔哥的战友和学生莫洛雷斯(1765—1815年)在南部继续领导独立斗争。莫洛雷斯率领的起义军多次冲破了西班牙殖民军的围剿，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并解放了许多地区。到1812年8月，莫洛雷斯的起义军占领了除墨西哥城和韦腊克韦斯之外的所有南部领土。1813年9月，起义军在奇尔潘辛格召开了第一届墨西哥国会，宣布墨西哥为共和国，实行无限制的普选制。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又恢复了统治，并从本土调来大量的军队镇压墨西哥的独立运动。由于殖民军队的残酷镇压和克列奥人上层集团的叛卖，莫洛雷斯的起义军于1815年被打败，莫洛雷斯被俘，于同年底就义。此后，起义军在各地展开了游击战。

1820年，西班牙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墨西哥的克列奥人上层集团害怕西班牙的革命浪潮波及到墨西哥，遂策划独立，与宗主国西班牙脱离关系。他们任命反动军官奥古斯丁·伊图尔维德为殖民政府的最高将领，并授命他与起义军的主要首领高雷罗进行谈判。1821年2月，双方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双方联合起来，建立一支为独立而战的联军，保障任何人的身权利和私有财产以及天主教的特权；保证任何种族的人在政府中任职权利。不久伊图尔维德窃取了联军的指挥权，率领联军进入墨西哥城，宣布墨西哥独立。伊图尔维德控制了墨西哥的政权后，又于1822年5月自立为帝，自称奥古斯都一世，将墨西哥改为帝国。1823年高雷罗联合自由派势力发动起义，迫使伊图尔维德退位。1824年，墨西哥新议会宣布墨西哥共和国建立。

受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影响，中美洲各省于1821年也宣布独立。1823年又建立中美联合省。1838年中美联合省后又分成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五个国家。

葡属巴西的独立 在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葡属巴西也获得了独立。但巴西的独立道路与西属殖民地的独立道路有着明显的不同。

1807年，拿破仑军队占领了葡萄牙，葡萄牙摄政王约翰六世携王室成员逃到巴西，巴西暂时成为葡萄牙的统治中心。为了加强和巩固在巴西的统治，促进巴西工商业的发展，以保护王室和各级官员的商品需要，同时拉拢白人大庄园主集团，葡萄牙王室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这种措施尽管给巴西的大庄园主、大商人们带来了许多的好处，却没能丝毫改善殖民地下层人民的处境。为了换取英国的支持，葡萄牙王室将巴西向英国全面开放，英国商人逐渐垄断了巴西市场。由于英国商品的大量倾销，巴西本地的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排挤，甚至导致许多手工工场、作坊以及商店倒闭，引起巴西的有产阶级的强烈不满。1816年，葡萄牙王室又出兵侵占了乌拉圭，而沉重的军费负担，又落到了殖民地人民的头上。葡萄牙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巴西各阶层人

民的普遍反抗，一场推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早在 18 世纪末，巴西的民主主义者，牙医哈维厄(绰号“拔牙者”)，就曾领导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其宗旨就是要推翻葡萄牙王室的统治，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巴西共和国。尽管这一密谋后来由于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哈维厄也因此牺牲，但对巴西的独立运动影响极为深远。

葡萄牙王室迁到巴西以后，巴西的许多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黑奴起义，强烈地震撼了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统治。1817 年 3 月，以伯南布哥省为中心的巴西东北各省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主要是大种植园主、商人和军官。起义一直持续了 76 天。由于领导起义的克列奥上层分子不愿意废除奴隶制，因此得不到广大的黑人奴隶的支持，在葡萄牙殖民军的镇压下，这次起义失败了。起义的失败，证明巴西独立运动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广大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巴西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成熟，不能领导革命，这就为后来巴西独立的胜利果实被封建势力和克列奥上层集团所窃取，提供了客观条件。

1820 年，葡萄牙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新议会的要求下，国王若奥六世被迫回国。临行前，若奥任命其子彼德罗为巴西的摄政王，密嘱彼德罗，只要保住王位，不惜让巴西独立。若奥离开巴西后，巴西的独立运动又高涨起来。这时葡萄牙议会为了加强对殖民地控制，使巴西失去了更多的权利，同时要求彼德罗回国。巴西的克列奥人上层集团在何塞·博尼法西奥的策动下，开始加紧进行独立的活动。他们也怂恿彼德罗留在巴西，以便把独立运动引向君主立宪的道路，避免巴西爆发像海地那样的奴隶革命，从而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利益。1822 年 1 月彼德罗宣布，他将留在巴西。1822 年 9 月 7 日，彼德罗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12 月 1 日，彼德罗自立为皇帝，称彼德罗一世。1825 年 8 月，葡萄牙被迫承认巴西的独立。巴西的帝制一直持续到 1889 年才被共和国所代替。

拉丁美洲独立的历史意义 十九世纪初爆发的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这场运动推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拉丁美洲的封建关系，使拉丁美洲出现了 17 个独立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共和政体，形成了今天拉美国家的基本格局。

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是在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增长的情况发生的。资产阶级带着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参加这场运动。尽管运动的领导权一开始就掌握在地主、庄园主、商人及官吏的手中，但在这场运动中，西、葡在殖民地的封建法令、对殖民地的禁令、垄断制度以及贵族封号被取消，天主教会的势力也被大大削弱。除巴西之外，所有独立的拉美国家都明令禁止奴隶制，先后解放了黑奴。这些措施有利于各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使独立后的拉美国家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基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是在独立后掌握政权的土生地主、庄园主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使拉丁美洲各国的封建剥削制度长期保存，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使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对各资本主义列强依赖的地位。19 世纪中叶后，美、英、德等

资本主义势力逐渐渗透到拉丁美洲，于是拉丁美洲人民又担负起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参考书：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第九章。

王荣堂、姜德昌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上册，第九章。

刘祚昌、光仁洪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第七章。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三章。

复习题：

1. 拉丁美洲各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性质和历史意义。

2. 试述杜桑·卢维杜尔、玻利瓦尔、圣马丁的历史功绩。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诞生与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导源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西欧先进国家占居统治地位,英国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法国工业革命已经迅速展开,德意志的西里西亚、萨克逊和莱茵地区出现了机器生产。在西欧其他国家,如瑞士、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资本主义也有了显著发展,资本主义已进入大机器生产的时代。

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确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自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大约每隔十年左右危机循环一次,成为恶性循环。经济危机期间,工厂、银行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固有矛盾的逐渐暴露,使许多曾经为资本主义战胜封建制度感到欢欣,以及为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而讴歌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去思考资本主义这一被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称为体现理性、民主、将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社会,竟如此充满血腥与罪恶,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同时也为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提供了可能,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创造了社会经济前提。

无产阶级的贫困推动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他们已由仅仅为改善生活条件、反对个别资本家的一般的经济斗争,发展为争取整个阶级的政治权力、公开向资本主义制度宣战的政治斗争,直至举行武装起义。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同时也表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不能给无产阶级指出解放的道路,因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成为无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19世纪前期自然科学的发展 18世纪后期,近代自然科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英、法、德等国的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在其进行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使西欧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更使近代自然科学进入了全面的理论综合阶段。经典的自然科学在19世纪已达到了基本完善的程度。各门自然科学已从经验科学变为理论科学。科学开始走在生产技术的前面,使人类从蒸汽—机器时代,逐渐向以电气应用为中心的时代过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确立和巩固。

19世纪的自然科学主要在以英、法、德等欧美国家发展最为迅速。英国的自然科学在19世纪仍居于世界的前列,出现了道尔顿、法拉第、赖尔、焦耳、麦克斯韦、达尔文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法国在进入19世纪后,由于历届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鼓励科学技术活动的政策,使科学研究日益制度化和专业化,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19世纪中期,法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和成就,就已赶上和超

过了英国，出现了拉普拉斯、库仑，达兰贝尔，拉瓦锡、盖·吕萨克、卢布兰、居维叶、布丰、拉马克等学者，巴黎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德国的自然科学在 19 世纪 30 年代，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高斯、欧姆、楞次、迈尔、赫尔姆霍兹、克劳修斯、赫兹、施莱登、施旺等著名科学家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成就的。

自然科学的成就促进了该时代整个文化的科学化，特别是哲学的科学化。在 19 世纪前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学说，如关于星云假说、地质演化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元素周期率、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等。这些理论和学说，以实证知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自然图景，对康德、黑格尔的学说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的范畴内总结了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提出了对立面的渗透和统一、由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三个辩证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是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科学的进化论。

18 世纪末期，由于工业革命的迅猛展开，使提高蒸汽机的效率成为当时生产和交通运输的迫切需要。为此，西欧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本思想早在 17 世纪笛卡就已从哲学的角度提出。此后，莱布尼兹等人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述过同一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只局限于说明机械的守恒。第一位对蒸汽机进行精密的物理和数学分析的是法国工程师萨迪·卡诺（1796—1832 年）。1824 年，卡诺在其著作《关于火的动力及产生这种动力机器的研究》一书中，对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进行了最初表述，即“卡诺原理”，从而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此后，由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中的一系列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如意大利人伏打（1745—1827 年）发明电池，实现了化学能向电能的转化；英国人尼科尔逊（1753—1815 年），用伏打电池电解水，实现了电能与化学能的转化；丹麦科学家奥斯特（1777—1851 年）发现电流可使磁针偏转的磁效应，揭示了电能向机械能的转化；英国的法拉第（1791—1867 年）和美国的亨利（1797—1878 年）各自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证明了机械能也可向电能转化。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许多科学家分别从不同侧面，发现了能量守恒与转化的现象。

最早把能量守恒与转化思想作为一个普遍的自然规律加以科学的表述，并给出热功当量的科学家是德国医生迈尔（1814—1878 年）。他于 1842 年发表了《论无机自然界的力》一文。文中指出，力像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因，而一切因的首要性质是不灭性，力是在量上不可消灭，而在质上可以转化的实体。他还通过气体在不同条件下的比热变化推算出热的机械当量。以后他又多次发表文章从更广泛的角度阐明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

迈尔的发现一直在科学界受到了冷落。英国物理学家焦耳（1818—1889 年）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确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焦耳以毕生的精力从事热功当量的测定，用各种不同方法测定不同运动形式之间相互转化时的当量关系。从 1843 年他发表热功转化的第一个实验结果开始，此后 30 年间，他不断完善和精确热功当量的数值。从 19 世纪中期

后，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承认。1858年，恩格斯在与马克思讨论能量守恒定律时认为，应当把这条定律理解为物理学中的各种力的相互转化的关系。70年代，恩格斯又把这一定律改称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揭示了自然界中热、力学、电学、化学等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统一性，使物理学达到了空前的统一，成为牛顿力学体系建立以来物理学的最大成就。

细胞学说是德国科学家建立的。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1804—1881年)发表了题为《植物发生论》的文章。文中提出，细胞是一切植物结构的基本单位，也是植物借以发展的根本实体。1839年，德国动物学家施旺(1804—1881年)把这一学说扩大到动物界从而形成了细胞学说。施旺在其著作《有关动植物结构与生产一致性的显微镜研究》中提出：有机体的基本部分无论如何不同，但都有一个普遍的发育原则，这个原则便是细胞的形成。细胞是一切有机体构造和发育的基本单位，有机体的发育就是细胞的分化和形成的过程。

细胞学说的提出，证明了有机体在构造和发育上的统一性，消除了动植物之间的严格界限，科学地阐明了动植物胚胎发育中器官形成的机制。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人对生物界的认识一直受神创论的影响。生物学也只是按照神创论和目的论的信条来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18世纪中期，法国博物学家布丰(1707—1788年)最早提出了物种演化的观念，提出了大自然能够从一个原始的类型发展出一切其它的生物种类。但他又同时认为，这种物种间的变化是从最完善的生物逐渐下降到最不具备形状的生物的退化过程。

在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个提出科学进化论的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1704—1829年)。拉马克在研究无脊椎动物的过程中，发现了无脊椎动物的10个刚在构造和组织的复杂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等级和序列。在其著作《动物哲学》中，他在当时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讨论了生物的本质、物质的性质、生命发展的趋向以及环境、习性与变异的关系等有关进化的问题。他认为，生物是进化而来的，无脊椎动物与脊椎动物间在构造和组织上的联系就足以证明它们的进化次序。为了解释进化的原因，拉马克提出了生物进化的两条法则，即“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

拉马克认为，每一种生物都有一种内在的向上的要求，从而使生物为适应环境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发生变异。变异本身就是对环境的适应。生活习性的改变，使得某些器官较多的使用，而有些器官则使用较少。前者发生进化，后者出现退化，因此生物在器官上出现用进废退的现象。生物由于生活改变而引起的后天获得的习性，或器官的改变，可以在后代中遗传和加强，即获得性遗传。

尽管拉马克的进化论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他毕竟是第一个描写生物进化的自然次序的人，使生物进化的思想在他的手中获得了科学的形态。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9年)是19世纪科学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于1831年大学毕业后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海军测量船“贝格尔”号的工作，进行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在长期的考察生

活中，他日益接受了英国地质进化理论，并将之吸收到他的生物进化思想中去。1838年，达尔文又接受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一些较为科学的观点，对其生物进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在1839—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其进化论进行表述。

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有五点：（一）生物界存在着普遍的生存斗争。旧种灭亡，新种产生。（二）生物界普遍存在着变异性，但进化过程是连续的，不存在不连续的变异和突变。（三）相似的生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由共同祖先变化而来。（四）生存斗争是在不同的个体间进行的，由于存在着差异，那些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将有更多的机会保存下来，并繁衍后代，而那些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则容易被淘汰。自然界的这种留优汰劣的作用就叫做自然选择。（五）被保留下来的个体的有利变异通过世代遗传的不断积累逐渐形成新种。自然选择是这一系列观点的核心。

1859年，达尔文将其进化论的所有观点集中发表在《论通过自然选择或保存良种的物种起源》即《物种起源》一书中。

达尔文的学说标志着生物进化论的完成，他用自然界本身的作用说明了生物进化的事实和适应的原因，给生物学中的目的论和神创论以彻底的清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给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自然史的基础。恩格斯则把这一学说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列起来，认为一个说明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个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19世纪前期的自然科学的成就及三大发现，初步揭示了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英法空想社会主义 19世纪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代表早期无产阶级的利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寻求建立一种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利叶和英国的欧文。

克劳德·亨利·圣西门（1760—1825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学于启蒙学者达兰贝尔，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并立有战功。法国革命时，他主动放弃爵位，过起平民生活。革命后，他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说的所谓“理想社会”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因而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他的著作有《日内瓦书信集》、《实业家问答》、《新基督教》等等。

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切罪恶的渊藪，人类社会必将其抛弃而进化到平等、幸福的社会。但是圣西门又认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人类的理性，而不是阶级斗争。尽管他承认法国革命是一次阶级斗争，但在划分阶级的时候，却又把资本家、商人、银行家与工人统统划入所谓“实业家”的行列，认为社会之所以不合理，在于由贵族、教士、官吏组成的“游惰者”统治着“实业家”。他提出，社会改造的任务应该由“实业家”中的资本家等有产阶级承担，应该用“讨论、证明、说服”的办法，使“游惰者”放弃对社会的统治。在新社会里，人人参加劳动，人人平等地拿取自己的报酬。从这个观点出发，圣西门企图说服资产阶

级把私有财产交给社会共有，甚至把他的改革方案送给波旁王朝的统治者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等封建君主，梦想依靠“开明君王”帮助他实现这个改革计划。

圣西门离开了社会现实和阶级斗争来侈谈社会主义，也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因此，他所鼓吹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查理·傅立叶（1772—1837年）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早年曾从事多种商业活动，先后当过店员、交易所经纪人、推销员等。在多年的商业活动中，傅立叶目睹了资产阶级的诡诈与卑鄙，尤其在法国革命后，傅立叶看到了法国社会中日益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使他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罪恶。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傅立叶撰写了许多论文和著作，创立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的主要著作有《四种运动原理》、《文明制度的批判》、《新工业世界》、《家庭农业协作论》等等。

傅立叶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限制的竞争和经济危机，认为这些现象是造成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穷人并不能享受民主和自由。但是傅立叶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罪恶，都是由商业资本家造成的，工业资本家也是受剥削者。

傅立叶的理想社会是由一种叫做“法朗吉”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组织构成的。法朗吉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在法朗吉中，工农业生产已经结合起来，男女平等，人人参加劳动，普及免费教育，消除了脑体和城乡劳动的差别。傅立叶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反而主张资本家也可以参加法朗吉，并按其资本进行分配。

傅立叶和圣西门一样，把实现其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和资本家身上，反对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实现自己的主张。除了给统治者写信，呼吁他们接受他的主张外，他还在报纸上刊登声明，宣布每天中午12时在家中接待准备投资法朗吉的资本家，但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一个资本家去过他那里。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出身在一个贫苦的马鞍匠人家庭。早年曾当过商店学徒、工厂经理等。后来在新拉纳克纺织工厂任经理兼股东。

在拉纳克工厂时期，欧文实行了许多带有慈善色彩的改良措施。如不雇用童工、将工作日缩短、提高工资、改善住宅、开办子弟学校和公共食堂、提供治疗和养老金等。

欧文在经营工厂时期，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了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与他们所得部分之差额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由此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揭露这一事实。

欧文在其著作中，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财产，指出私有制、宗教制度和资本主义婚姻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欧文梦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财产共有、共同参加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公有制社会。1823年，欧文及其一些信徒在北美的印第安纳州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公社，取名“新和谐村”。在新和谐村中，欧文将其所梦想的计划统统进行实验。但到1828年，“新和谐村”便破产了。此后，

欧文又建立了一所合作社和“劳动交换银行”，但不久也都关闭了。

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英国被许多工人所接受，19世纪30年代，英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生产合作社和工会。1834年，欧文当选为英国“全国工会大同盟”的主席。

欧文与圣西门、傅立叶一样，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不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幻想依靠统治阶级和资本家的“同情”和“理解”来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因此，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必然要成为空想。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一些基本的原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因而主张阶级调和，幻想依靠资本家的帮助来实现未来的理想社会，从而使他们的主张必然成为永远不能实现的空想。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失去其进步意义，并成为工人运动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障碍。

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的古典哲学指的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在德国出现的资产阶级哲学体系，它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也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哲学发展的顶峰。

德国的古典哲学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18世纪下半期后，德国的资产阶级成长起来，但是德国资产阶级不敢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又害怕德国爆发英、法等国那样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而是力求在与封建制度妥协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反映在哲学领域内，就使德国的古典哲学成为一种包括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内，既具有革命性，又带有保守性的两面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青年时代在哥尼斯堡大学读书，后长期在该大学任教。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其主要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在康德著作里，他分别对认识论、美学和伦理学做了自己的阐述，推翻了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建立了一个先验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康德的基本哲学观点是承认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世界，亦即他所称的“物自体”，但是这个“物自体”是人所不能认识的“彼岸世界”，人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因此，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调和科学与宗教，知识与信仰，最终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之中。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年）出生于符腾堡邦斯图加特城的一个高级官吏家庭。早年在图林根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在耶拿大学、海德堡、柏林大学任教，并担任过柏林大学的校长。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历史哲学》、《美学》、《法哲学》、《哲学讲演录》等等。

黑格尔集德意志古典哲学之大成，建立起一整套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充分表现了德意志资产阶级那种既想变革封建制

度，又害怕在德意志爆发工人运动，转而又想与封建势力妥协的矛盾心理。黑格尔虽然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他又认为在客观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绝对精神”，客观世界仅仅是“绝对精神”的表现和发展。他用“绝对精神”来解释现实的社会生活，认为普鲁士王国的社会制度是体现了“绝对精神”的最好的社会制度。从他的哲学观点出发，黑格尔在政治观点上持极端保守和反动的态度。他反对革命和暴力，认为这样做是一种缺乏理性的表现。他主张资产阶级参政，但又同意保存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他的政治观点，充分体现了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

在黑格尔的哲学里，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及精神的世界想象成一个过程，认为它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黑格尔力图解释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关于对立统一、量变到质变、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思维的主观能动作用可以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辩证方法。这就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出生于巴伐利亚邦的兰茨胡特城的一个法学家的家庭中。费尔巴哈早年曾笃信上帝，并进神学院读书。后转入柏林大学读书，成为黑格尔的信徒，遂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成为无神论者，1830年，因宣传无神论被永远逐出大学讲台。1836年，他隐居农村，潜心哲学研究。随着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临近，德意志哲学界中的争论更加激烈。在这期间，费尔巴哈接受了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撰写了《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剖析，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创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理论。

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不依赖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空间、时间与机械运动都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他指出，人也是自然界的产物，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人的思想和意识是客观世界在大脑中的反映，物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不全面的。他在解释自然方面是唯物主义，在解释社会方面，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他不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反把人看成是一种自然物，看不到人的社会性。同时，在否定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同时，又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部分。因此，他的唯物主义，只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合理部分。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英国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初期。其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1723—1790年）出身于苏格兰的一个职员家庭。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曾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讲授文学、逻辑学与哲学。1776年，他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一书，奠定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在书中，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衡量价值的尺度，

并区别使用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概念。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工人、资本家、地主是当时社会的三大阶级，其基本收入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在分析上述三种收入的来源时，指出工资与利润、地租是成反比的，从经济上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和地主的对立，从而提出了剩余价值的问题。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亚当·斯密对于剩余价值的揭示没有接触到剩余价值是工人的无偿劳动这一本质问题，甚至认为工人与资本家都是商品价值的创造者，从而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同时，他还把阶级存在视为永存的“自然秩序”，否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出身于伦敦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早年曾投机商业活动，成为巨富，后致力于学术研究，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完成者。1817年，大卫·李嘉图出版《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书中修正了亚当·斯密价值学说中矛盾和不完善之处。指出地租、利润、工资的源泉都是劳动，地租、利润与工资的变化成反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和对立的。从而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与斯密一样，李嘉图认为阶级的存在是亘古不变的永恒现象，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总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劳动价值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有关问题，并揭示了阶级矛盾与对立的经济原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第二节 科学共产主义原理的初步创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 19世纪40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形成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客观条件，而马克思、恩格斯参加社会实践，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也是他们创造这一革命理论的必要前提。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里尔城。他的父亲是个崇拜法国启蒙学者的犹太律师。1835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他倾心学问，博览群籍，曾经深入钻研哲学和历史。这时他醉心于黑格尔的哲学，成为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积极分子。1841年大学毕业前夕，马克思撰写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的毕业论文，在耶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原想到波恩大学执教，但鉴于普鲁士政府迫害进步教授，便转入新闻界工作。1842年1月，被科伦自由派创办的《莱茵报》聘为主要撰稿人，10月就任主编。

在马克思任职《莱茵报》期间，莱茵省地主凭借着普鲁士政府的袒护，不断侵犯农民的利益。马克思不断发表文章为农民辩护。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莱茵报》成为具有鲜明革命民主主义色彩的报纸。在此期间，马克思不断深入社会，接触到下层人民的生活。他发现普鲁士国家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和自由的化身，而是反动暴力和专横的体现。为了深入理解这些现实问题，马克思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的言行，引起普鲁士政府对他的仇视和迫害，184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迫辞去《莱茵报》主编职务。不久，《莱茵报》也被封闭。

11月，马克思与少年时的女友，出身名门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1814—1881年）结婚。婚后不久迁居巴黎，从此开始了长期的侨居生活。在巴黎期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左派分子阿尔诺德·卢格创办了《德法年鉴》，抨击普鲁士的反动政府。这时，马克思和正义者同盟以及一些法国工人团体建立了联系。

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批判了普鲁诺·鲍威尔的宗教观，阐明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根本区别，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可能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还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是社会解放的力量。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马克思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发表的上述两篇文章，表明了他已经完全抛弃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标志着马克思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引起普鲁士和法国政府的恐慌。马克思在1845年1月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举家迁至布鲁塞尔。在那里，马克思被迫脱离了国籍，从此他成为没有任何国籍的“世界公民”。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生于莱茵省巴门市一个纺织厂主家庭。1837年，他的父亲强迫他退学经商。但他发奋自学，朝夕不辍。恩格斯生长在德意志工业发达地区，很早就了解工人的悲惨生活和资产阶级的伪善奸诈，逐渐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军役，利用闲暇在柏林大学听哲学课。1842年服役期满，前往英国曼彻斯特他父亲与别人合办的营业所经商。恩格斯趁机广泛接触工人，并和宪章运动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研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以及无产阶级的斗争，促成了恩格斯的思想转变。1844年他在《德法年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玛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两篇文章，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这两篇著作的发表，表明恩格斯已经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了。

1844年8月，恩格斯回国路过巴黎时，同马克思会晤，发现彼此的观点竟如此的接近。他们从此共同战斗，成为毕生的合作者。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剩余价值思想的萌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以后，在各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便开始对前人的理论成果进行批判吸收，开始了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的艰巨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9—11月间完成的《神圣家族》是他们共同合作的第一部成果。这部论战性的著作批判了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所宣扬的主观唯心思想和鄙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谬论，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得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著名论断。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能够而

且必须解放自己”的阶级。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这部著作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部著作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几个基本社会形态和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指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从一种社会制度发展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是社会生产力与现存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定引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描绘了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轮廓，如消灭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的差别等。

1847年，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书中批判了蒲鲁东鼓吹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揭露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的剥削实质，把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尚未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在同年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用具体的事实分析了资本家利润的来源，指出劳动者用劳动创造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同劳动本身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是资本家的利润。虽然，这时马克思尚未明确区分“劳动”与“劳动力”这两个概念，也没有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和科学地解释剩余价值产生的过程。上述两部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经过马克思多年的研究，终于成为完整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将之写入了划时代的著作——《资本论》中。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制定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萌生和发展，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发现和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科学发展迈出重要的一步。

第三节 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自1846年起，马克思与恩格斯越来越认识到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支，使广大的工人群众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心建立一个工人革命组织，以此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广大工人群众走上自觉的政治斗争的道路。

当时欧洲的工人运动尚处于分散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首先团结先进工人，批判各种错误观点，促使各国工人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所以，他们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作为建立国际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布鲁塞尔小组除马克思、恩格斯外，还有威廉·沃尔弗、社会主义者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年）等。“委员会”在巴黎、伦敦、汉堡、莱比锡等地成立支部，并和德意志、法国、

比利时、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建立经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利用这个组织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批判错误理论，彼此交换情报，从而为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了干部。同时，他们还还对当时颇有影响的国际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进行了争取和改组的工作。

正义者同盟的建立 正义者同盟是 1836 年由侨居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和工人组成。1840 年，这一组织在英、德、瑞士等国也设立支部，成为国际性的工人组织。但是，同盟由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指导思想十分混乱。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先后对在正义者同盟内部影响较大的威廉·魏特林（1808—1871 年）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派进行了批判。魏特林是德国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当过裁缝工人，1836 年流亡巴黎，加入正义者同盟。他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公民友谊团体。他也提出用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把革命寄托于少数人的密谋和流氓无产者的起义之上。魏特林于 1845 年来到布鲁塞尔，加入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但他不仅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而且还恣意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魏特林的猖狂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于 1843 年 3 月 30 日的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会议上，揭发了他的宗派思想和密谋活动，批判他攻击科学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申述必须广泛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的重要意义。通过这次深刻的批判，工人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魏特林陷于孤立。他无奈灰溜溜地流亡到美国。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魏特林以后，转向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真正社会主义”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和哲学家所鼓吹的一种思潮。其主要观点是鼓吹阶级和平，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道”代替阶级斗争，代表人物是海尔曼·克利盖（1820—1850 年）和格律恩（1817—1887 年）。克利盖自命为德意志共产主义者在美国的正式代表，大肆宣扬“真正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消灭贫困的出路是平分土地，鼓吹通过超阶级的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并乞求一些富人出钱在北美购买 14 亿英亩土地，无偿地分给贫民，成立起“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以实现“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1846 年 5 月 11 日，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对克利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且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决议，也就是著名的《反克利盖通告》。《通告》指出，平分土地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要求，决不是共产主义的纲领，特别指出克利盖想把通过平分土地把贫穷的无产者变为小私有者的方案，只是小资产者的梦想，因为平分土地后仍然还会出现两极分化，根本不可能彻底消除贫困。这篇重要文章对于肃清“真正社会主义”在工人中的恶劣影响，起了巨大作用。

1846—1847 年，格律恩在巴黎嚣张一时。马克思曾经称这个机会主义者“无非是一个文字冒险家，一个妄想利用现代思想从中取利的骗子手”。格律恩除了鼓噪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谬论外，还贩卖蒲鲁东的反动思想，诬蔑暴力革命。为了揭穿格律恩的阴谋，拨正巴黎工人运动的方向，恩格斯在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的同意下，到巴黎去领导

反格律恩的斗争。1846年8月，恩格斯来到巴黎，首先把先进分子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接着便开始了对格律恩和蒲鲁东谬论的批判。他主要揭露格律恩的反对暴力革命的谬论。在斗争中，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宗旨，即维护无产者的利益，暴力革命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用财产公有的方法消灭私有制。经过激烈的辩论，恩格斯取得了胜利。同盟巴黎支部以13票对2票通过了恩格斯所阐明的共产主义宗旨。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正义同盟中愈来愈多的领导者和成员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派遣代表约瑟夫·莫尔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同盟，答应以科学共产主义作为同盟的纲领，并根据他们的意见重新改组。马克思和恩格斯因而同意加入，并为同盟的改组作了准备工作。

1847年6月初，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马克思由于经济困难没有出席，恩格斯被巴黎的同盟成员推为代表前往参加。他和布鲁塞尔小组的代表威廉·沃尔夫按照和马克思制定的计划在会上指导了改组“同盟”的工作。

大会通过了主要由恩格斯和沃尔夫拟定的章程，规定同盟的目的是：“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

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旧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新章程还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定出代表大会是最高机构。这个章程分送各支部讨论，然后在下一次代表大会表决。这次大会又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就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847年11月2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德、英、法、比、波、瑞士等国共产主义者都派代表参加。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作为布鲁塞尔和巴黎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的新章程，又将同盟的目的条文改为“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又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大会结束后，他们在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由马克思执笔，于1848年1月底完成，2月在伦敦发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举世闻名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共产党宣言》全面论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重要文献。它由一个简短引言和四章组成。《宣言》的引言指出共产主义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一切反动势力和统治阶级都害怕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所以共产党人应该公开说明自己的意图和目的，以便动员无产阶级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

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说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斗争的过程，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

级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主要说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及其基本任务和最终奋斗目标，指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与无产阶级基本群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章又驳斥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种种诽谤和责难，阐明共产党人对一些问题的基本观点，探讨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的行动纲领：“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在《宣言》的第三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这些思潮的社会阶级根源及其本质。指出它们都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反动的社会主义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为复辟旧制度辩护的反动谬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幻想清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章里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错误，也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宣言》的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主要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策略原则，指出共产党人应当赞助一切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斗争中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宣言》的结束语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斗争道路，宣布：“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宣言》最后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伟大的口号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科学的战斗纲领，是一部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共产党宣言》是世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各国共产主义者共同的战斗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页。

同上书，第48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2页。

同上书，第504页。

参考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41—261 页。

列宁：《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78—383 页。

复习题：

1.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
2. 简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革命活动。
3. 概述《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

第九章 1848 年欧洲革命

第一节 革命形势的形成与法国革命

革命形势的形成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后，一度动荡的欧洲政局转向沉寂。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开展，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无产阶级队伍逐渐形成，现存制度和维也纳体系的根基被深深地动摇了；人口流动的加速，自由、平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又促使被压迫阶级、被奴役民族觉醒。因此，表面上平静的欧洲，实际上正潜伏着更大的危机。

1845 年发生了马铃薯病虫害及农业歉收，1847 年爆发了工商业危机，这两大国际性的经济事件，终于导致了阶级、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这时，各国资产阶级加强了对本国封建专制政权的攻击，群众愤懑情绪有增无已，革命形势在普遍形成中。

1846 年克拉科夫共和国爆发起义后不久，瑞士也发生内战。这两次革命终于打破了欧洲的沉闷局面。1847 年，政治局势普遍紧张起来。在法国，七月王朝空前孤立。资产阶级各主要党派团体竞相攻击现政权，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在德意志，反封建和要求民族统一的运动四处兴起。民主派发起了有各邦代表参加的大会，要求民主改革，呼吁实现德国的统一。普鲁士国王陷入困境，由于得到沙皇的 1500 万卢布的贷款才得以暂渡难关。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许多被压迫民族，正在酝酿新的革命。波兰、意大利、捷克、爱尔兰等地，民族革命和独立的浪潮此起彼伏。其中尤以匈牙利的斗争最为突出，在那里，民族主义者已争得国会的召开，民族运动正在步步高漲。到 19 世纪 40 年代在欧洲各国，革命都已提上了日程，但斗争的内容和任务则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民主革命是主要任务，即要求推翻封建制度或消灭封建残余。但更为普遍存在的是民族革命的任务。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如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是主要的目标，被压迫民族，则以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在许多民族又交织在一起，使得 1848 年欧洲革命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况。

除上述两类革命外，工人运动也很重要。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组织上也不统一，思想上受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影响，而且工人运动还主要限于英、法、德三国。所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能成为 1848 年革命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英国、法国、德国在欧洲所占的地位，这三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必然要对其它国家的工人运动产生极大的影响。1848 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撰写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对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行动策略，在理论上做了深刻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必然将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姿态，投入革命。

由于神圣同盟的瓦解，英国对欧洲大陆的革命采取的是设法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态度，因此对于欧洲大陆的革命宁愿坐山观虎斗，不愿卷入其中。因此欧洲的反革命力量以俄、奥、普三国为中心勾结起来，共

同镇压欧洲革命。其中沙俄政府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欧洲封建秩序和维也纳体系的保护者，俄国成为欧洲封建体系中最顽固的堡垒。因而，就整个欧洲大陆来说，欧洲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打击沙俄庇护下的普、奥封建王朝，摧毁维也纳体系。

法国二月革命 1830年7月革命后，以路易·菲力普为国王的“七月王朝”的残酷统治，把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1845—1846年的农业歉收和1847年的经济危机以后，人民生活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从1847年起，饥民骚动遍及全国，罢工运动广泛展开，战斗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法国。当时的工人阶级积极成立秘密组织，加强团结，准备为争取解放而斗争。

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由于纷纷破产也积极活动起来，他们以赖德律·洛兰和佛洛孔为中心形成《革命报》派，要求建立共和，实行普选，以及救济失业等社会改革。

这时，法国上层的危机表现在资产阶级的分裂上。掌握政权的金融贵族使用操纵公债、包办国家工程等手段，排挤、打击其他资产阶级，把他们推到七月王朝的对立面。其中有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以巴洛为首的“王朝反对派”，有在马拉斯特和拉马丁领导下，由中等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报》派。后者在当时有比较广泛的政治影响，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有选举资格限制的共和国，但反对任何社会改革。

劳动人民的不懈斗争和上层的分裂，说明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从1847年7月起，资产阶级反对派以举行宴会为名，在全国召开群众性的政治集会，鼓吹政治改革，要求降低选举资格。他们的号召得到群众的普遍响应。结果，宴会运动也就成了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导火线。

面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基佐内阁决定镇压。1847年12月21日，路易·菲力普在立法议会上公开拒绝改革选举法，并蛮横地禁止资产阶级反对派预定在1848年1月19日在巴黎举行宴会的活动。资产阶级震惧于政府的压力，乃将会期改为2月22日。基佐得寸进尺，仍然下令禁止。资产阶级再次屈服，宣布宴会停止举行。但是，巴黎无产阶级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仍然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活动。《改革报》派中的坚定分子，在工人的带动下，也行动起来。

2月22日晨，以巴黎工人为主体的革命群众在街头集合起来，喊着“改革万岁”和“打倒基佐”的口号，冲向立法议会的所在地波旁宫。反动政府凶相毕露，竟命令军队开枪射击，数十人不幸牺牲。第二天，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在革命团体的领导人阿尔伯等的领导下，和反动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惶惶不安的路易·菲力普急忙罢免基佐，企图玩弄舍车保帅的手法来保住自己的王位。但是，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高喊“打倒路易·菲力普”和“建立共和”的口号，继续战斗。

24日晨，起义者占领了巴黎各个重要据点，并向推勒里宫进军。路易·菲力普看到大势已去，丧魂落魄地逃到英国，起义人民焚毁了国王的宝座。资产阶级自由派议员力图维持君主政体，又策划立路易·菲力普的孙子为王。革命人民得知这一阴谋后，立即涌向波旁宫，迫使左翼议员和群众代表共同组织了临时政府。25日晨，工人群众促使临时政府宣布共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就此诞生了。

临时政府表面上是推翻七月王朝的各阶级的联合执政，实际上是资

产阶级专政。在其 11 个成员中有《国民报》派的拉马丁、马拉斯特等 7 人，其余是《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代表阿尔伯。《国民报》派占据了一切要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尾巴。所以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实际上落于资产阶级共和派手中。

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主要在于他们在革命前鼓吹革命，骗取到群众的信任。同时，路易·勃朗宣扬的借助资产阶级帮助以摆脱压迫和剥削的谬论，也起了很大的蒙蔽作用。这时的巴黎工人在路易·勃朗的影响下，普遍地认为只要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代表，便能实现自己的要求。所以路易·勃朗实际上帮助了资产阶级。

二月革命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各种俱乐部大量涌现出来，仅巴黎一地就大约有 300 个之多。其中知名的有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卡贝成立的“中央兄弟会”、拉斯拜尔组织的“人民之友俱乐部”等。这些俱乐部在团结先进分子、积蓄革命力量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同时，各地工人举行罢工、捣毁工厂，农民驱逐地方官吏。全国汹涌澎湃的群众斗争客观上都对巴黎工人起了支持作用。

对巴黎的工人来说，共和国的建立，仅仅意味着斗争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结束。他们不满足于一般共和国的成立，而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摆脱剥削的社会共和国。所以，2 月 25 日，共和国建立伊始，巴黎工人就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立即颁布劳动权法令。临时政府迫不得已宣布了“保障工人能够靠劳动维持生活”和“保证全体公民有工作”的法令。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对于劳动权的保证，只能是不能实现的虚伪诺言。

工人既然争得劳动权法令，便进一步要求设立实行劳动权的机构。2 月 28 日，又有两万工人涌向市政厅，要求成立劳动部和消灭剥削人的现象。临时政府趁机搞阴谋诡计，成立了一个由工人代表和雇主代表组成的专门常设委员会，去探讨改善工人状况的方案。特别任命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为正副主席。这样，资产阶级就把所谓工人阶级的代表逐出政府，自己掌握了政府的实权。劳动权法令的颁布和卢森堡委员会的成立，虽然无助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但终究给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打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使其有了社会共和国的痕迹。

巴黎工人的革命要求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他们唯恐工人的继续革命将触动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临时政府便阴谋筹划摧毁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它首先收买流氓无产者，组成 24 营别动队（每营 1000 人），作为它主要的反动武装。接着，临时政府又在国家工场这一问题上制造谣言，挑拨工人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3 月初，临时政府先后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地成立所谓的国家工场，把大批失业工人、小职员、中小学教师和破产的手工业者收容进去，每天发给两个法郎。只进入巴黎国家工场的就达 11 万人以上。资产阶级的阴谋，就在于他们故意安排这里的工人只从事植树、修路一类的非生产性劳动，但却恶毒地宣扬工人游手好闲，不愿劳动。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临时政府歪曲事实，把为供养官僚、警察和别动队而征自农民的 45% 的附加税，说成是为国家工场筹集经费，从而煽动农民、小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不满。资产阶级另一个诡计就是组织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府。临时政府阴谋趁自己的反动面

目还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匆匆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企图借助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误解，把工人代表和社会主义者都排挤出去。于是，擅自宣布于4月9日选举制宪议会代表。

但是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终究被人识破。“中央共和社”立即看穿了资产阶级所搞的制宪议会选举诡计，于是号召进行抵制。3月17日，巴黎工人再次游行示威，要求推迟选期，以便有充分时间向群众揭露资产阶级的阴谋。临时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只得把选期推到4月23日，并根据示威者的要求，把军队调出巴黎。这次示威显示出巴黎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资产阶级对他们更加仇视。不久临时政府又借口维持秩序，调回军队，准备对工人进行镇压。

6月起义 5月4日，新选的制宪议会开幕，临时政府解散，从此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

在这个议会中，资产阶级共和派占550席位，保皇派212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占100席，而工人只有18个代表。5月10日，制宪议会选出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负责行政。委员会的成员除赖德律·洛兰外，其余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分子（阿拉贡、巴约斯、马利、拉马丁）。这样，资产阶级反动派就更可为所欲为了。

制宪议会和执行委员会为了打击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不但否决设立劳动部的提案，还通过了禁止请愿的决议。他们的疯狂反扑激起巴黎工人的极大愤懑。5月15日，巴黎革命团体组织了15万工人和手工业者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劳动权，向资本家征税，并呼吁援助波兰人民的解放运动。制宪议会对于这些要求断然拒绝，完全暴露了这个政府的反动本质。工人为了表示与它分道扬镳，便推出布朗基、路易·勃朗、阿尔伯等来组织自己的政府。但是，这时的法国工人既无革命理论的指导，又没有自己的政党，所以建立自己政权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在成功之初，就遭到镇压，执行委员会调动军队逮捕了布朗基等人，驱散了示威群众。又下令解散卢森堡委员会和许多革命团体。

资产阶级政府利用镇压5月15日示威游行所造成的优势，继续向无产阶级进行反革命反扑。6月22日，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国家工场，责成其中18到28岁的未婚工人编入军队。其余则遣送到疟疾流行的索伦省做苦工。工人们不能忍受这样的虐政，于是举行大会，讨论对策。他们决定拿起武器，和反动派展开战斗。这时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战斗口号：“不是劳动而生，就是战斗而死！”“打倒人对人的剥削！”“社会共和国万岁！”

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处于优势地位。他们有统一指挥的反革命司令部；拥有25万多人装备优良的反动武装。在工人方面，优秀的领导者尚在狱中，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不予支持；装备不齐的45000多人孤军作战，没有后援。虽然如此，巴黎的无产阶级在这次起义中仍然表现了空前的英勇、坚决和机智，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进行了战斗。

巴黎工人为了争取主动，从6月22日晚到23日晨，在巴黎的东城修满了飘扬着巨大红旗的街垒。就在这个巴黎工人即将为生存而斗争的紧要关头，路易·勃朗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怯懦。他不是积极地鼓励工人去斗争，而是要人“立即放下武器”。他这种投降行为，

遭到工人严正斥责。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到 24 日中午，起义工人已经攻占敌人许多街垒，控制住大部分郊区。他们准备分四路向市政厅、推勒里宫和波旁宫挺进。起义者的胜利，吓得资产阶级惊骇万状。制宪议会急忙授予卡芬雅克军事全权，率领 30 万反动军去镇压起义。这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指挥大批炮兵，把无数的炮弹，倾泻在起义区内，又以压倒多数的兵力向起义工人进攻。但是，工人们毫不畏惧，坚定如一，始终以威武不屈的革命气概浴血奋战，但由于力量过于悬殊，从 25 日起，起义者的街垒相继失守。到 26 日下午，最后据点圣安东区陷落。具有伟大意义的六月起义遂告结束。

接踵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的疯狂暴行。11000 多工人惨遭杀害，25000 多人被判监禁、流放和服各种苦役。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巴黎。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

六月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这次起义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教训，使工人阶级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稍些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是空想。所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便被更多的工人领会、理解了。

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 六月起义的失败是 1848 年法国革命的转折点。从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便更加嚣张起来。为了对人民进行压榨，双手沾满工人鲜血的卡芬雅克被任命为行政首脑，他按照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指示，解散各地国家工场，封闭革命团体和报刊，把征收 45 生丁的附加税定为法律。这些倒行逆施的反动措施，不仅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对小资产阶级不利，从而引起了普遍的愤恨。

资产阶级共和派操纵的制宪议会，为了进一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11 月通过了第二共和国宪法，把立法权赋予 3 年改选一次的立法议会，将行政权授与由普选产生的总统。总统独揽军政大权，可以任免一切官吏。宪法还规定了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信仰等自由，但必须以受政府监督为前提。所以马克思指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

1848 年 12 月 10 日举行总统选举。资产阶级共和派由于其执行反动政策，遭到人民的痛恨，它的候选人卡芬雅克和拉马丁都落选了。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1808—1873 年）当选为总统。路易·波拿巴是一个典型的流氓政客、王位觊觎者，他一向贯于看风使舵，招摇撞骗。他在竞选中一方面用红色幽灵恫吓地主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标榜自己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由于希望靠君主制来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而拥护他。农民因为缅怀拿破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19 页。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4 页。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135 页。

仑一世抗击外敌，保卫了革命成果，而且又天真地把拿破仑和他联系起来，抱着淳朴的幻想，投了他的票。城市小资产阶级由于对共和派的各项政策怀有不满，也成了他的支持者。于是他就骗得了总统的职位。

资产阶级共和派不仅在总统选举中遭到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1849年5月15日立法议会选举时也一败涂地。他们获得的议席只有10个，而由波旁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三个君主派联合组成的秩序党却占据500席，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新山岳党”有180个候选人当选。所以，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政府中失去阵地，政权开始转到君主派手中。这是六月起义后法国政治上的显著变化，也是法国1848年革命沿着下降线发展的一个标志。

不言而喻，新山岳党是立法议会中唯一的民主力量，也是秩序党仅有的敌手。二者的冲突，势所难免。6月12日，新山岳党的领袖赖德律·洛兰首先弹劾波拿巴擅自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违犯了宪法。秩序党否决了这一弹劾案后，新山岳党人便于13日举行了20000多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和平示威游行。秩序党政府不仅派军队驱散示威群众，而且还把32个新山岳党议员送交法庭。赖德律·洛兰逃往英国。这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继资产阶级共和派之后，也在政府中失势，秩序党从此大权独揽。所以1849年6月13日事件，形成革命继续下降的另一个标志。

随着新山岳党的失败，秩序党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正统派拥护波旁王朝复辟，奥尔良派要恢复七月王朝的统治，而路易·波拿巴则力图自己称帝。1849年9月，波拿巴收买流氓无产者成立了反动组织“十二月十日会”，作为他的爪牙。10月，他罢免秩序党内阁，1851年1月又撤掉奥尔良派分子尚加尔涅所任巴黎卫戍司令的职务。他既掌握法国军政大权，也就为发动政变作出了必要的准备。

从1851年2月起，工业危机日益逼近，工厂倒闭，商业萧条，群众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强有力政府”，来防止革命狂澜的再起。波拿巴便乘这个机会发动了政变。12月1日夜，他调集70000多军队，占领了整个巴黎，解散立法议会，逮捕秩序党及所有反对他的议员。波拿巴的政变曾经引起工人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左翼的反抗，但都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1852年1月，他又颁布宪法，把法国全部权力授与总统，改总统任期为10年。1852年12月2日，又改共和国为帝国，自己称帝，改号拿破仑三世。这个帝国的建立意味着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和最富侵略性阶层的统治地位趋于巩固。从此，在法国便开始了较长的政治反动时期。

第二节 德意志革命

革命形势的形成与革命的开始 1845—1846年间的农业歉收和1847年震撼欧洲的工商业危机，严重地影响到德意志各邦，饥荒和失业笼罩了整个德意志，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处境更加恶化起来。工人罢工、饥民骚动和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到处发生，尤其是德意志南部的局势更为严重。奥地利的农民也行动起来，拒绝履行任何封建义务。匈牙利的民主主义者公开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举行起义。所以，整个德意志民情鼎沸，革命颇有一触即发之势。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也开始活动起来。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以汉泽曼和康普

豪森为首展开统一活动；资产阶级民主派要求在革命斗争中争得政治上的自由和国家的统一。捷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要求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匈牙利的自由派贵族要求哈布斯堡王室进行改革。

面对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运动，德意志各邦在国库空虚和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毫无对策，都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于是，巴黎二月革命迸发出来的火花，在德意志燃起革命的烽火。

1848年2月底到3月初，与法国毗邻的德意志西南各邦首先爆发起义。巴登、黑森、符腾和巴伐利亚的农民捣毁贵族城堡，焚烧封建文契，自行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城市劳动人民也和农民密切配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废除一切封建特权，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全德议会。势不可挡的革命浪潮威胁着封建贵族的反动统治。他们为了阻止革命前进，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纷纷颁布宪法，并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组阁，因而资产阶级借助于人民的力量，参与了西南各邦的政府。

三月革命 革命的洪流从西向东奔腾。1848年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工人、学生和资产阶级举行反政府的大示威，“打倒梅特涅！”“实行宪政！”“武装人民！”的口号响彻云霄。政府派军队镇压，促使示威群众掀起了武装起义。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政府军失败。奥皇斐迪南一世被迫罢免梅特涅，成立了自由派内阁，并同意成立大学生军团和国民自卫军，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资产阶级对于这样的革命后果，表示满意。但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认为这次革命没有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便和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巴黎的二月革命和维也纳的三月革命推动了奥地利境内民族运动的高涨。匈牙利人、捷克人都卷入反封建专制和反民族压迫的革命风暴中。3月15日清晨，匈牙利首都佩斯的工人、学生和小资产阶级在青年诗人斐多菲（1823—1849年）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中午，起义者把首都完全控制起来。资产阶级成立起公安委员会，掌握了佩斯的政权。3月17日，温和派贵族组成匈牙利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匈牙利在军事、财政上独立自主，并颁布了召开议会和废除劳役制的法令。但是所规定的选举制有很高的财产限制，从而剥夺了工人和农民的选举权。所谓废除劳役制，只是使约60万租种份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在农民中占人数最多的雇农和家仆仍然没有得到土地。所以三月革命后，工人和农民运动继续高涨，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武装起义。

巴黎的二月革命在布拉格也引起强烈的反响。3月11日，布拉格人民举行群众大会，讨论独立问题。以弗里奇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实现民族独立，废除封建剥削和争取工人劳动权等民主要求。在巴拉茨基领导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坚决反对社会改革，力图与封建贵族实行妥协，只希望在奥地利帝国的卵翼下享受民族自治。两派在会上展开激烈争论，最后群众把自由派压服下去。大会根据民主派的建议，向奥皇斐迪南一世呈递请愿书，要求成立议会与责任内阁，并进行社会改革。与此同时，在布拉格、布尔诺等工业城市爆发了工人骚动，要求改善他们的处境。农民反封建压迫的运动也加强起来。奥地利政府被迫发给失业工人微不足道的补助金，答应农民可以赎买封建义务，还准许捷克成立责任内阁。

奥地利境内的革命运动加速了普鲁士革命的爆发。从3月13日起，

工人、手工业者和学生所举行的大规模示威、集会震撼着整个柏林。16日，示威群众便和弹压的军队搏斗起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了用改革的诺言来阻止革命的前进，于18日颁布敕令，答应召集议会、制定宪法，并允诺尽力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又同意取消国内关卡，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被工人运动吓倒了的资产阶级听到国王敕令，欣喜若狂，额手称庆。他们成群结队地向国王致敬。但是国王的敕令并没有改善人民政治、经济生活的内容，特别是没有提到从柏林撤出军队，故而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于是群众当天包围王宫，首先要求把军队撤出柏林。腓特烈·威廉四世不但拒绝了这个要求，反而命令军队射击示威群众。革命的人民义愤填膺，立刻拿起武器，和政府军进行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国王被迫颁布诏书，宣布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和撤出城内驻军。3月底，普鲁士国王又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袖康普浩森担任首相，委任汉塞曼和一些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为各部大臣，从而资产阶级利用人民争得的胜利，打进了普鲁士政府。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参加了政府以后，完全背叛了人民。他们镇压工人运动，拒绝农民提出的废除封建义务的要求，起了“王朝盾牌”作用。

法兰克福议会 三月革命以后，德意志各邦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害怕人民的革命行动，便向封建贵族靠拢，既希望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运动，又企图通过改良的途径，来完成德意志的统一。

1848年3月31日，各邦议会代表团在法兰克福召开了所谓筹划统一的预备议会。自由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个议会中占居优势。他们否决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提出的宣布德意志为共和国、由议会掌握政权的建议，决议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全德国民议会来解决统一问题。各邦政府批准了这个决议，德意志按普选原则进行了议会的选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选举失败后，曾经在巴登发动人民起义。但是他们完全忽视了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而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不久便被镇压下去。

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开幕，史称法兰克福议会，其主要任务是解决德意志的统一及其政体问题。其中的代表大部分是拥护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个议会是作为典型的清谈馆而载入史册的。它崇尚清谈，害怕革命群众，既没有积极地去废除封建特权，也没采取任何措施来巩固三月革命的成果，只选出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担任帝国的临时摄政。但摄政仅是一个虚设的职位，约翰大公毫无实权，根本没有约束各邦王公的权力。此后，法兰克福议会开始制定帝国宪法。从而陷入漫无边际的宪法条文讨论之中。

反动势力的反攻 革命的失败 奥地利是德意志的一个顽固的反动堡垒。哈布斯堡王室所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不能容忍三月革命的成果存在下去，无时无刻不在策划反革命反扑。1848年4月25日，帝国政府抛出一个钦定宪法，要把君主专制制度巩固下来。这部宪法的颁布是对革命群众的初步挑衅，立即激起各地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14日，帝国政府又进一步挑战，强令解散国民自卫军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学生军。对于反动政府的反革命进攻，革命人民坚决抵抗。工人、广大市民和学生军于5月15日到17日举行游行示威，迫使政府撤销14日敕令，并答应召开由普选产生的议会。但反动政府是不愿屈服的，24日又宣布封闭高

等学校，26日下令解散学生军。政府的暴行激起26—27日的起义，工人和学生军筑起街垒，和政府军展开激战，迫使政府废除反动法令，并答应召开议会，重新制定宪法、放宽选举资格，以及从维也纳撤出军队。

7月22日，议会开幕，资产阶级自由派占据了多数席位，因而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从革命阵营中分裂出去。他们向皇帝效忠，表示愿意和封建贵族共同镇压工人革命。议会还颁布有关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法律，保证了地主的收入。反动政府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便肆无忌惮地向工人阶级发动了反革命进攻。8月19日，它竟公开宣布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工人的补助金。当23日工人抗议示威时，资产阶级自卫军向工人开枪射击，造成30人牺牲，300人受伤。这次流血事件，说明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就在这个紧要时刻，马克思来到维也纳（8月28日到9月6日），他参加了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会议，对维也纳的革命派分析了这次惨案的阶级实质，指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提醒他们要提防即将来到的反革命进攻，号召他们准备进行斗争。

奥地利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决战终于发生了。1848年10月3日，奥皇斐迪南任命耶拉契希为镇压匈牙利军总司令，前往扑灭匈牙利的革命火焰。这个反动部署，激起维也纳人民的义愤。10月6日，工人、手工业者和学生阻止奥军开往匈牙利的正义行动，发展成为反政府的起义。起义者攻下军械库，得到充足的武器，经过一天的激战，击溃了政府军，斐迪南落荒而逃。政权转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占优势的市议会里。

但是维也纳的革命人民既没有和农民建立联系，又不能得到其他城市的支持。10月25日，斐迪南在奥尔本茨集聚了6万多反动军队，开始向维也纳进攻。革命的人民不论男女老幼都奋勇抵抗，每一栋房屋，每一寸土地都经过激烈的争夺。但终因寡不敌众，11月1日维也纳被反动军占领。这次起义失败后，自由派内阁被解散。新奥皇弗朗西斯·约瑟夫又颁布反动宪法，恢复了专制统治。

奥地利反动政府在镇压维也纳人民的同时，还将矛头指向了匈牙利的革命。1848年9月22日，斐迪南一世正式发表声明，斥责匈牙利的独立运动。匈牙利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成立起以路易·科苏特（1802—1894年）为首的保卫祖国委员会，和奥地利反动派展开武装斗争。9月末到10月初，匈牙利革命军在农民的帮助下，连续击退奥地利侵略军，直逼奥地利边境。12月中旬，奥国政府派30000军队开始反攻。匈牙利人民奋勇抗敌，力战奥军。但匈牙利军队中的贵族军官不战而退，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搞破坏活动，致使匈牙利首都佩斯于1月5日陷落。科苏特积极组织人民，扩充军队，4月初开始反攻，大败奥军，4月14日正式宣布匈牙利独立。科苏特当选为政府执政。4月底，奥军全部被逐出境。

匈牙利革命的胜利，震惊了国际反动势力。各国反动派特别是俄国沙皇竭力主张镇压，1845年5月27日，沙皇尼古拉一世根据奥皇的请求，派遣140000军队从北面向匈牙利进犯。同时，奥地利军队从西部和西北部攻入。在这外敌压境的时候，匈牙利的反动分子猖獗起来。贵族和天主教僧侣勾结一起，大搞颠覆破坏。他们在军队中不战而退，在政府中迫害民主派，迫使科苏特辞职。由于他们的破坏，8月13日，匈牙利被

迫投降。科苏特出奔土耳其。

匈牙利革命的失败，固然与俄军的入侵有关，但主要的还由于匈牙利贵族的投降叛变。比较激进的科苏特也没有用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把农民普遍地发动起来。匈牙利境内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因为不满意匈牙利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歧视和压迫，所以也不积极支持匈牙利的革命运动，革命力量因而也受到一定的削弱。

维也纳5月起义推动了捷克革命的发展，工人、农民的斗争高涨起来。5月底，布拉格印刷工人首先罢工，随后郊区的纺织工人和面粉工人也发生了骚动。与此同时，农民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坚决要求废除一切封建义务，风起云涌的人民运动引起奥地利政府的恐惧，于是派兵前往镇压。6月12日，奥地利反动军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促使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民主知识分子反抗起来，他们在小资产阶级激进团体“列比里”的指挥下，筑起街垒，和反动军展开了战斗。附近数万农民曾经试图支援布拉格的起义，但被反动军队所阻，未能如愿，起义者孤立无援，苦战五天，最后失败。

布拉格起义被镇压以后，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甘心充当奥地利帝同的走狗，公开出卖民族利益，用尽一切力量支持哈布斯王室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

自1848年6月起，普鲁士的反革命封建势力也转入进攻。6月14—15日之间，反动政府的军队伙同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镇压了工人和手工业者的起义，夺走了他们的武器。6月20日康普豪森内阁被解散，成立起以反动官僚为主的内阁。新内阁竭力加强警察统治，公开迫害民主派，清洗出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军官和士兵。巴黎6月起义被镇压后，普鲁士反动派更加嚣张起来。

9月27日，普鲁士在柏林西郊纠集了约5万军队。11月初，普鲁士国王任命民主派的死敌勃兰登堡伯爵组阁，完全清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11月12日，柏林实行戒严，命令市民自卫团交出一切武器，封闭一切民主派组织和进步报纸。11月16日，普王把军队调回柏林，用武力解散了议会。随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钦赐了一部反动宪法，实际上恢复了君主专制。不久，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法律，所以，地主既没有丧失政治地位，也没有失去经济特权，仍然实行着封建统治和剥削。

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 革命的结束 当反动势力在德意志各邦取得胜利后，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了帝国宪法，规定：各邦仍然保持自己内政的独立，保留旧的国家制度和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只掌握全国的外交和军事大权。联邦院和人民院是立法机关。由议会选出的世袭皇帝是国家元首。统一全德的关税、币制和度量衡。保证人身、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农民的封建义务，必须赎买。不难看出，这部宪法满足了资产阶级的要求，也保留了德意志封建贵族的地位，所以，它是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派向封建贵族献媚、妥协的具体表现。

议会还根据宪法选举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德意志帝国皇帝。这时德意志封建势力在各地已经取得胜利。他根本藐视资产阶级这一“恩赐”，毅然拒绝接受。随后，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

诺威和萨克森等邦政府纷纷发表声明，对于这部宪法，拒绝承认。

德意志各邦封建王朝对于帝国宪法的拒绝，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怒。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各地掀起护宪运动，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积极参加了这场战斗，因为他们把实行宪法看作统一德意志的主要手段。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的人民首先发难。1849年5月4日，他们赶走国王组织了临时政府。虽然这次起义于9日被镇压下去，但在它的影响下，起义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莱茵河两岸。11月，普鲁士的巴门、易北菲尔特、佐林根、伊瑟朗等城爆发了武装起义。13—14日，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以及巴登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各地起义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力军是工人、革命军都是由工人群众组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持护宪斗争。他们和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各地劳动人民中间，积极地鼓动革命，并且还直接参加了易北菲尔特、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地起义的军事组织工作和战斗。他们竭力教育领导起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促使这些人采取坚决行动。他们建议在起义地区立即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共同保卫革命成果。但是，随着反革命势力的猖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越来越犹豫、动摇，迅速丧失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的勇气。因而拒不采纳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结果，起义先后都被普鲁士以及其他各邦的军队镇压下去。5月底，法兰克福议会迁往符登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被符登堡政府解散。恩格斯写道：“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

由于革命的失败，《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出版了第301号以后，也就停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转移到德意志西南部，6月初，马克思前往巴黎。恩格斯到了普法尔茨。8月马克思离开巴黎前往伦敦。11月，恩格斯也到了那里。此后，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便以英国为基地继续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德意志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软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以及资产阶级的背叛。这次革命失败的另一原因是缺乏统一的政治中心。各邦人民群众互不联系，分别斗争，从而也削弱了革命力量。

第三节 意大利革命

革命前夕的意大利 19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处于封建削弱割据和经济落后的局面。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在意大利建立了八个独立国家，即西西里王国、撒丁王国、以罗马为首都的教皇国、奥地利管辖的伦巴底——威尼斯王国和奥地利控制的托斯卡纳、摩德纳、巴马和卢卡公国。奥地利王室的控制、残酷的封建压榨和政治上的分裂，都形成意大利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意大利的全体人口中，有五分之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主要集中在撒丁王国和伦巴底，而且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居于优势。在农村，封建关系占着统治地位，农民被迫以极其苛刻的条件租佃地主的土地，地租

往往占收成的一半以上。

19世纪中期，意大利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是丝织工厂的纷纷建立，和工人人数的急剧增加。生丝需要量的不断增长，促使撒丁王国和伦巴底的地主经营资本主义农场，改用资本主义剥削代替封建剥削。这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渐趋一致，二者结成了联盟。

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清除境内的奥地利势力，消灭教皇世俗权力，打破封建割据局面，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自19世纪30年代起，在意大利民族运动中就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的领袖是热那亚的律师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年）。1831年，他在马赛成立了秘密团体“青年意大利”。参加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朱塞佩·加里波的（1807—1882年）就是其中的成员。“青年意大利”的政治纲领是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共和国。但是“青年意大利”的很多成员和大地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害怕农民革命，反对用革命的方法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他们这一弱点形成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资产阶级自由派主要由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所组成。他们坚决反对废除农民的封建义务。

工人和农民处于资本主义和封建的双重压榨下，迫切地要求获得彻底解放，坚决地反对奥地利侵略者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要求建立统一、民主的意大利。所以他们形成革命的主力军。1845—1846年的农业歉收和1847年的工商业危机，加深了他们的灾难。统治阶级也难以照旧统治下去。

革命的第一阶段 西西里人民的起义揭开了1848年革命的序幕。1月12日，深受封建剥削的巴勒莫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两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二世出动军队，对巴勒莫进行猛烈炮击。但起义者奋勇战斗，不但击退了反动军，而且于1月26日解放了整个西西里岛，成立了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控制的政府。

西西里的革命推动了整个意大利的人民运动的发展。2月初，各地的工人和手工业者都举行示威游行。慑于人民的威力，斐迪南二世、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托斯坎尼大公都先后颁布了宪法。资产阶级自由派参加了政府。

维也纳的3月起义推动了意大利革命进一步的高涨。3月18日，米兰的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职员和学生在农民的支持下，筑起街垒，和奥地利反动军队奋战五天，革命人民最后胜利，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成立了政府。在米兰起义的同时，威尼斯也掀起了人民革命运动。奥军被迫撤走，以资产阶级民主派曼宁为首的临时政府建立起来。此外，帕尔和摩德纳公国也爆发起义，推翻了反动政府。

反封建胜利的人民一致要求对奥宣战。各地革命人民纷纷组成志愿军，要求发给武器。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各邦的统治者从制止革命向深入发展出发，不得不发起对奥战争。3月23日，撒丁王国首先宣布对奥宣战，其他各邦也相继参战。志愿军在加里波的领导下，浩浩荡荡地奔赴战场。

当时奥地利境内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哈布斯堡王室自顾不暇，对意大利的反奥战争十分有利。所以，意大利革命军连战连捷。随着战争的

胜利，人民运动也高涨起来。1848年4—5月间，城市和农村的人民斗争空前高涨。都灵、米兰、那不勒斯、热那亚等城市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各地农民夺取村社土地，攻击地主领地，焚毁封建文书。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直接威胁着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伦巴底、巴马、摩德纳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了借助萨伏依王朝的力量以镇压人民运动，便与撒丁王国合并。不久，威尼斯也并入了。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忙于扩张版图和扼杀人民运动，对于反奥战争便采取了消极态度。教皇庇护九世和两西西里国王为了镇压人民巩固自己的政权，从前线撤回自己的军队。

意大利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心怀异志造成反奥战争的失败。7月22日，奥军司令拉得茨基调集70000军队在库斯托萨向撒丁军队发动突然攻击，撒军大败。8月9日，查理·阿尔伯特与奥地利签订停战协定，伦巴底、威尼斯、摩德纳与巴马等地又沦于奥地利统治之下。

革命的第二阶段 第一次对奥战争失败后，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通过民族战争来实现统一意大利的方案，主张召开制宪会议，以解决国家未来的政体问题；要求废除专制制度，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他们的号召在全国人民中得到热烈的响应。威尼斯首先发动。1848年8月11日，这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由曼宁领导在人民的支持下，宣布退出撒丁王国，建立共和国。23日，托斯卡纳的利沃诺城爆发群众起义，赶走统治者，政权转入以孟泰涅里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但以上两地的当权者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作少许改善。

罗马教皇是罗马人民的直接压榨者。人民群众对他非常不满。11月15日，罗马人民举行起义，袭击教廷，教皇庇约九世狼狈逃走。1849年2月5日，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开幕。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加里波的之提案，宣布罗马为共和国。3月又选出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掌握政权。共和国实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如把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取消教士的政治特权和对教育的控制；此外，还废除了极端苛杂的关卡税、商业税和手工业税等，豁免了小店主的债务。但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所领导的罗马共和国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镇压反革命分子，反而提倡所谓的“阶级和平和秩序”，放松对敌人的专政。结果造成革命的失败。

威尼斯、托斯卡纳和罗马革命的发展，使查理·阿尔伯特感到恐慌。他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于3月12日再次对奥宣战。3月23日，诺瓦拉一役，撒丁大败，和奥国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次反奥战争失败后，助长了意大利反动派的反动气焰。4月中旬，君主派在佛罗伦萨发动反革命政变，夺取了政权。5月25日奥军开进，把这个城市统治起来。3月29日，斐迪南二世进攻西西里岛，5月15日又恢复了对这个岛的反动统治。

罗马教皇是世界天主教的魁首，他的倾覆，引起欧洲列强对于罗马共和国的敌视。1849年4月，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两西西里王国都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加里波的指挥共和国部队沉着应战。但7月3日，罗马共和国终于败北。重新恢复了教皇的专制政权。罗马共和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拒绝以革命的方式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而未能发动广大农民投入战争。他们在战略上的错误是没有把战

争扩张到共和国外，所以不能联合各地的革命力量共同打击反革命势力。

罗马共和国被颠覆后，威尼斯还继续孤军奋战。但也因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敢广泛发动群众，8月22日陷落。威尼斯共和国的瓦解，标志着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结束。

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资产阶级不敢发动群众。资产阶级不愿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愿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农民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既然缺乏人民的支持也就无力完成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国家的统一。

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意义 1848—1849年的革命教育和锻炼了欧洲无产阶级，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进一步看清了资产阶级的真面目，认识了各式各样社会主义的荒谬。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通过这次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识破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反动本质，揭示出它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马克思指出：“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极其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否则，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建立起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遵循的一个普遍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具体分析各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阐明了有关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证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因为资产阶级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苛捐杂税的压榨以及对小土地的兼并，必然会加深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在1848年革命过程中，各社会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都暴露出来。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已经失去反封建的革命性。小资产阶级犹豫、动摇，只希望在革命进入一定的阶段便结束革命。而无产阶级所负的历史使命就是将这一革命进行到底，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些革命原理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

参考书：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18—146页。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6页。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21页。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2页。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同上书，第7卷，第12—38页。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同上书，第6卷，第288—299页。

复习题：

1. 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原因是什么？
2. 略述法国二月革命的经过？
3. 简述巴黎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
4. 简述德意志三月革命的过程。
5. 试述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革命活动。
6. 试论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意义。

第十章 19 世纪中期的欧洲国家

第一节 工业垄断地位形成 与确立时期的英国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由于 1832 年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的代表急剧增加起来。1846 年谷物条例废除以后，他们在政府中的势力更加增长。从 50 年代起，原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发展为自由党，代表地方阶级要求的托利党改名为保守党。随着工业资产阶级影响的增强，自由党在 1851—1874 年间曾经掌握内阁有 19 年之久。

英国工业在这个时期飞跃地发展。在 1850—1870 年间，生铁年产量由 229 万吨增至 597 万吨，煤的年产量从 5000 万吨增到 11220 万吨，棉纺织品生产总值从 2800 万镑增到 7100 万镑。从 1854 年到 1864 年，铁路增加 4000 英里，共达 12000 英里。促成英国经济繁荣的原因主要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掠夺，资本家把掠得的高额利润转化为资本，促进了工业的发展；19 世纪 50、60 年代英国极力向外侵略，从海外搜刮了大量财富，扩大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英国基于自己的工业发展到他国不能抗衡的地步，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结果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繁荣了国内经济。所以列宁说：“从 19 世纪中叶起，英国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

在资产阶级统治地位比较巩固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实行了所谓的自由主义政策，如允许外国革命流亡者在英国政府避难，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结社的自由等。推行这种自由主义的目的是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也是资产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

1867 年议会改革 自 60 年代初起，各地工人纷纷组织起来，展开选举改革运动。1865 年 5 月，工人群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成立了“全国改革同盟”，负责领导全国的选举改革运动。1866 年 7 月，伦敦工人在第一国际下不断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争取普选权。在伦敦工人的带动下，曼彻斯特，伯明翰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立即举行了 100000 以上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全国掀起了选举改革高潮。

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1867 年 8 月，国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把 46 个“衰败城镇”的议员名额分配给新兴城市，规定城市中每年交付 10 镑以上的房租而且居住一年以上的房客和缴纳济贫税的房主都有选举权，乡村中凡每年交 12 镑以上地租的租佃者以及每年收入 5 镑以上的土地所有者也获得了选举资格。经过这次改革，在拥有 2 千多万人口的英国，选民由 135 万人增加到 225 万人。但一般工人和城市贫民仍然没有选举的权利。

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 在英国的长期统治下，爱尔兰人民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陷于极贫困的境地，于是展开了英勇反抗。1858 年，流亡在美国的爱尔兰爱国者组成“爱尔兰革命兄弟会”，通称芬尼党。其成员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不久，芬尼党人在爱尔兰也展开反英活动。但他们的纲领只限于对成员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举行密

谋起义，所以从来没有吸引广大群众参加，也没有同英国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指出芬尼党的弱点，并对他们的革命性给以高度的评价。自 1856 年起，芬尼党曾经数次在爱尔兰起义，并且在 1866 年和 1870 年两次从美国攻入加拿大，试图从这里打击英国的统治，但均因没有广泛发动群众而失败。

第二节 法兰西第二帝国

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拿破仑三世为了维护少数大资本家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对内实行军事独裁，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在这个时期，法国强占了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参加撒丁王国的反奥战争，吞并了萨伏依和尼斯；向中国出兵，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还侵占西贡，对柬埔寨建立了“保护权”。拿破仑三世又远征墨西哥，妄图攫取墨西哥的财富。

第二帝国的向外侵略和对资产阶级的直接支持，为他们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资本家通过操纵公债、从政府借贷、包办各大城市的建设工程和疯狂的海外掠夺，获得了空前的财富。在这些年代，法国工业的总产量增加了将近两倍，主要工业部门如冶金和采煤业已广泛使用机器，最后完成了工业革命。1851—1865 年，煤产量从 450 万吨增加到 1350 万吨；铁产量从 44.5 万吨增至 138.1 万吨；钢产量由 1.4 万吨增至 11 万吨。1852 年法国共有机器 6080 台，1869 年增至 26221 台。但这个时期，货币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比工业资本增长得更快。1868 年，有 14 个国家从法国银行贷款。中小企业在数量上仍占优势。1866 年约有 300 万雇佣工人，150 多万企业主。在巴黎的 442000 工人中，只有 50000 工人在大企业做工。

各阶级对拿破仑政府的不满 拿破仑三世的军事独裁和大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引起各阶级的不满。捐税苛重和物价指日上升，造成工人阶级的生活极度困难，而且工人还时常受到罚款的处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对于波拿巴政权特别憎恨。帝国政府企图缓和工人的对立情绪，曾经拨款给工人修建房屋，并于 1864 年被迫废除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的勒·霞不列法。但工人群众立即识破拿破仑三世所玩弄的欺骗手段，更加深了对于他的仇恨。

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农民的生活也日益恶化。广大农民不仅缺少土地，而且担负着繁重的捐税。征自农民的赋税从 7 亿法郎增至 12 亿法郎。小农土地被兼并的情况也日趋严重。成千上万破产的农民举家迁入城市，成为劳动后备军。所以农民从生活实践中认识了拿破仑三世统治的反动阶级实质，抛弃了对他的任何幻想。

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在法国人数不少，但在资产阶级排挤下，破产者屡有增加。他们对于路易·波拿巴也非常不满。

一般的工业资产阶级对于波拿巴政权也抱着敌对态度。他们对于大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发财致富和波拿巴的专横跋扈以及帝国的关税政策都深表不满。第二帝国曾经为了少数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英国订立商约，减低关税，致使物美价廉的英国商品大量涌入，把不少法国工业品排出市场，于是大批资产阶级加入反对派的阵营。

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帝国危机的加深 1851年政变以后许多工人成立了秘密团体，罢工运动不断发生。1864年勒·霞不列法废除后，巴黎的印刷工人在欧仁·瓦尔兰的倡导下，首先成立了工会。接着其它行业的工会也相继组织起来。1864年9月，法国工人协同英国、德意志工人，积极地参加了第一国际的筹建工作。1865年1月，在巴黎和其他城市都成立了国际支部。第一国际的成立对法国工人运动发生了巨大影响。1867年国际巴黎支部领导工人举行反对拿破仑三世出兵罗马的示威游行，同年国际各地支部又领导了多次罢工。1869年，国际为了加强工人的团结，还组成有40多个工会参加的工会联合会。国际的积极活动受到帝国政府的迫害，和反动派的愿望相反，第二帝国对于国际的迫害，不但没有降低其威信，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

小资产阶级为了和波拿巴政权斗争，曾经组成了新雅各宾派。德勒克吕兹、皮阿等是这一派的知名人物。他们反对警察官僚制度，要求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主张建立世俗学校和进行其他民主改革。他们出版《觉醒报》，攻击第二帝国的暴政。

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借助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大肆活跃起来。他们在1865年立法团选举时，获得了350万张票，仅少于帝国的支持者100万张票。在各大城市，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力量更为雄厚。新当选的反对派以甘必大（1838—1882）为首，要求建立共和，实行政教分离，取消常备军，废除警官区。但他们坚决反对用革命手段同拿破仑三世进行斗争。

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活动，使帝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拿破仑三世为了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于1870年1月任命自由派奥里维埃组阁。但人民的不满情绪继续高涨，1870年1月12日，巴黎人民利用给被皮尔·波拿巴亲王枪杀的记者奈尔举行葬仪的机会，举行了竟有20万人参加的反政府示威游行。这个被人民唾弃的第二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第三节 德意志的统一

1848年革命后德意志的政治经济状况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德意志各邦都恢复了反动封建统治。

19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在德意志普遍发展起来。不过，由于地主阶级还继续在政治和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是沿着列宁所说的“普鲁士式的道路”发展的。这条道路的特点是：“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关系不是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适应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

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的发展以及德意志工业品市场的扩大，都给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仅50年代，工业品的产量就增加了一倍以上。1850—1870年间，德意志的煤产量从年产520万吨增至3400万吨；生铁产量从22.5万吨增加到139万吨；蒸汽机的动力由26万匹马力增加到248万匹马力；普鲁士的铁路从3869公里增加到

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5卷，第114页。

101523 公里。所以恩格斯说：1848 年革命后“它们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

资本主义经济愈加发展，国家统一的要求就愈加迫切。在当时的德意志，有两条不同的统一道路：“即或者通过革命，或者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通过革命，就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就是巩固普鲁土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由于无产阶级的软弱，普鲁士最后完成了自上而下的统一。

普鲁士王朝自上而下的统一道路 在德意志诸邦中普鲁士实力最为雄厚。它镇压了 1849 年维护宪法运动以后，俨然成为各邦反动统治阶级的保护人，因而充当了自上而下统一的承担者。1849 年 5 月，普鲁士邀请奥地利、萨克森、汉诺威等邦举行会议，提出了一个由普鲁士控制一切的统一方案。但遭到当时任德意志邦联议会主席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等大邦的反对。和平统一的道路既然受到阻碍，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就准备诉诸武力了。

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在进行统一以前，还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和资产阶级发生了所谓的“宪法纠纷”。1860 年，普鲁士政府向议会提出军队改革法案，要求把常备军增加一倍，同时追加军费 950 万塔勒尔。这时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与容克地主较量的地步，于是被资产阶级“进步党”控制的议会不仅否决了政府的提案，而且还要求内阁对议会负责，以削弱国王的权力。国王威廉一世曾经解散议会，但新选举的议会仍然和政府抗衡。威廉一世为了彻底击溃资产阶级的对抗，便于 1862 年 9 月任命反动政客奥托·俾斯麦担任了首相。

俾斯麦（1815—1898 年）是一个容克地主。他毕生维护容克的特权和君主政体。1848 年革命时，他曾经组织地主武装，准备援救普鲁士国王；他坚持用武力镇压革命，曾任普鲁士出席邦联议会的全权代表、驻俄、驻法大使。当议会再次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时，俾斯麦不顾议会的反对，就拨付大量经费来改组军队。他在议会上叫嚣：“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是演说，也不是多数票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而是普鲁士的武装”。这就是所谓的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的基本内容。1862—1864 年间，俾斯麦和普鲁士政府的专横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怒，一致谴责俾斯麦的暴戾。但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怯懦、软弱、害怕群众运动。他们只是在议会中吵嚷，而不敢发动群众举行革命。所以容克地主阶级便牢固地掌握了普鲁士政权，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把德意志统一起来。

第一次是对丹麦战争。1863 年末，丹麦吞并了霍尔施坦和施勒斯维希两个公国。普奥两国以此为借口于 1864 年 2 月对丹麦宣战。战争以丹麦的失败而告终。10 月签订和约，普鲁士吞并施勒斯维希。奥地利获得霍尔施坦。

奥地利是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最大阻力，所以对奥战争是不可避免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50 页。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292 页。

《德国史文献》，第 202 页，参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商务印书馆，1974 年版。第 324 页。

的。1866年6月，普鲁士出兵将奥地利势力逐出霍尔施坦，挑起了普奥战争。意大利为了收复威尼斯也对奥作战。战争开始以后，普鲁士军队很快占领德意志北部和中部各邦。7月3日，普军在捷克的萨多瓦村附近重创奥军以后，奥地利军队节节败退。经过拿破仑三世的调停，8月23日，普、奥签订了布拉格和约，规定：旧德意志邦联解散；奥国承认普鲁士成立北德意志联邦（由美因河以北各邦组成）；把施勒斯维希、霍尔施坦、汉诺威和法兰克福等地划归普鲁士。威尼斯归还意大利。经过这次战争，普鲁士于1867年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包括18个邦和3个自由市。普鲁士国王为联邦元首。奥地利皇帝为了增强国势，于1867年兼任匈牙利国王，组成了奥匈帝国。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统一完成，成立了德意志帝国。

第四节 意大利的统一

1848年革命后的意大利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不仅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还受着奥、法的压榨。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直接统治着伦巴底——威尼斯，间接控制着托斯卡纳、巴马和摩德纳。奥国和法国的军队还驻在中部的重镇罗马。这时自由派贵族掌握着撒丁王国的政权，保留着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而其他各邦都恢复了过去的封建专制统治。

撒丁王国、托斯卡纳和教皇领地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于1848年所建立的关税同盟，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成长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在北部各邦，使用机器的工厂企业日渐增多，特别是在纺织业方面尤为显著。19世纪50—60年代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有较快的增长。棉织品的产量增加了3倍，毛织品产量增加了2倍，丝织品产量增加了一倍。在意大利各邦中，撒丁王国的工业特别发达。这里首先建立了大型的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1851—1859年对外贸易上升了一倍。在农业方面，北部各邦也出现了不少资本主义农场。许多贵族地主剥削雇佣劳动、生产谷物和桑树等农产品。

但是，外国的侵入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决定了意大利市场的狭隘性。奥国商品的输入和封建领主的巧取豪夺严重地影响着意大利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所以，摧毁外国侵略者与国内封建势力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便被提到日程上了。

1859年对奥战争 1857年欧洲工商业危机发生以后，意大利的企业相继倒闭，失业现象极为严重，工人和农民都陷入深重的贫困和灾难之中，所以自1858年起，革命情绪便高涨起来。伦巴底曾经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奥运动。托斯卡纳、摩德纳和其它地区也都发生了骚动。

撒丁王国的首相加米洛·加富尔（1810—1861年），利用当时的革命形势，便策划反奥战争，1858年7月，他为了得到法国的军事援助，和拿破仑三世在普隆比埃尔缔结反奥军事同盟，约定法国出兵协助撒丁王国把奥国势力逐出伦巴底——威尼斯，使之并入撒丁。法国将得到萨伏依和尼斯作为报偿。这个协定表现出拿破仑三世的扩张野心，同时也说明加富尔所执行的统一路线是一条出卖民族利益的路线。

1859年4月29日，撒、法对奥战争爆发。加里波领导的义勇兵团

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法国和撒丁王国联军连战连捷。5月底解放了伦巴底许多城市，6月初攻克米兰，6月底奥军撤出伦巴底，退守威尼斯。

在对奥战争的同时，革命风暴席卷整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5月初，巴马爆发起义，公爵逃到国外，政权转入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6月中旬，属于教皇领地的罗曼纳、翁布里亚等地发生起义，成立临时政府。人民运动的高涨不但动摇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也震惊了拿破仑三世。他恐怕统一起来的意大利将成为与法国势均力敌的强国，于是背弃诺言与奥国讲和。1859年7月11日，法奥在维拉弗兰卡签订停战协定，奥国同意放弃伦巴底，由法国转交撒丁王国。但是威尼斯仍由奥国占领。托斯卡纳、巴马、摩德纳和罗曼纳完全恢复封建特权。这个协定保留了奥国在意大利的统治，把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保留下来。

维拉弗兰卡协定激起意大利人民强烈愤怒。意大利中部的人民坚决反对封建王朝复辟。他们组织起国民自卫军，准备奔赴战场。这时加富尔积极活动，劝说中部各邦与撒丁王国合并。他的倡议获得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1859年秋，托斯卡纳、巴马、摩德纳和罗曼纳等国制宪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加入撒丁王国，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遂完成统一。

西西里起义 千人红衫志愿军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虽然统一，但威尼斯尚在奥国的统治之下，教皇仍占据着所谓的教皇领地，南部还有两西西里王国独据一方。所以统一的征途上，仍然还有艰巨的任务。

意大利的全面统一战争是自西西里开始的。西西里的人民一向遭受极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贵族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农民在缴纳捐税和地租之后，几乎一无所留。1860年4月4日，西西里的首府巴勒莫首先起义，接着其他城市贫民和农民揭竿而起，与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激烈战斗。加里波的在撒丁王国闻讯后立即率领千人红衫军前往援助，1860年5月11日到达。

千人红衫军主要由工人、手工业者组成，其中也有不少小资产阶级和大学生。他们同西西里人民结合起来，在一个月內，就有5000人加入了这支部队。加里波的首先于5月15日在卡拉塔非米大败政府军。27日，攻下首府巴勒莫。7月初，解放西西里全岛。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组织了政府。加里波的接受了专政者的称号。

在群众的要求下，西西里政府废除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没收了王族的土地，取消或降低了一些关税，参加起义军的农民分得村社的土地，但并没有为所有的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不久农民又掀起反封建剥削的起义。自由派政府竟进行血腥镇压。

8月20日，加里波的率领16000人渡过墨西拿海峡，在卡拉布里亚登陆。那不勒斯各地的劳动人民群起响应，有40000多人立即投到加里波的的麾下。这支军队势如破竹，9月7日进入那不勒斯。10月1日，在沃耳土尔诺河附近一役，彻底击败西西里王国军队，基本上完成了南意大利的解放。

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以及加里波的的胜利进军，使南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惊慌失措。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借助于撒丁王国的军事力量来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于是邀请加富尔出兵南意大利，夺取政权。加富尔于9月中旬派兵南下，1860年10月21—22日，南意大利在地主

和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举行全民投票，确定了与撒丁王国合并。

意大利统一的完成 1861年3月17日，意大利第一届议会宣布成立意大利王国，并推撒丁王国维克多·厄马努埃尔为国王，定都在佛罗伦萨。1866年7月，意大利参加普奥战争，收回威尼斯。但是罗马仍在教皇的统治之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派兵占领，剥夺了教皇的世俗政权，从而意大利统一最后完成。1871年1月，首都迁往罗马。意大利统一后，在政治和经济上仍然保存着封建残余，意大利人民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和封建的双重压迫之下。

尽管如此，意大利统一的实现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民族的统一为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发展，创造了客观前提。

第五节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

农奴制的危机 19世纪上半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俄国地主为了增加谷物产量，广开财富来源，不断加重对农奴的剥削。农民的生活因而日趋恶化，生产积极性更为降低。这不仅影响农民份地的收入，也降低了地主土地的产量，从而造成农业生产的停滞不前。

在农奴制危机的情况下，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便涌现出来。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些地主从追求产量出发，便采用雇佣劳动制，以轮种代替三圃制，购置农业机器，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此同时，农民也发生分化，出现了富农阶层。他们雇工耕种，经营商业。所以农奴制度便处于逐渐瓦解的状态。

除了以上诸因素外，农民的斗争还冲击着农奴制。他们除了消极怠工，破坏地主财产外，还揭竿而起，浴血战斗。19世纪上半期，曾经发生过上千次的农民起义，使农奴制处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农奴制度下的工业 在农奴制度之下，俄国的手工工场有农奴制的和资本主义的两种。前者依靠农奴劳动，或由政府设立，或为业主开办，或是贵族地主经营；后者使用雇佣劳动，是由商人或富农建立的。19世纪上半期，使用农奴的企业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往往用鞭笞，带枷锁，坐监牢等强制手段，强迫农奴增加劳动强度。而农奴所采用的逃跑、放火、起义等手段和场主进行的激烈斗争，使农奴工场无法维持下去，于是纷纷倒闭，到1860年，能够幸存的已寥寥无几。在农奴工场衰落的同时，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场相对地发达起来。在加工工业中，1804年的自由雇佣工人占全体工人的48%，1825年升为54%，1860年达到82%。但是，资本主义的工场仍然受到农奴制的束缚，不易充分发展。例如，这时所谓的雇佣工人主要是缴纳代役租的农奴。他们所交的代役租实际上是场主所攫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降低了他们的利润率。

由于手工工场的发展和场主发财致富，俄国自19世纪30—40年代起也开始了工业革命。最初，俄国的机器主要由英国进口，后来机器制造业也发展起来，到1860年俄国有59所机器制造厂，其生产总额为795.4万卢布。俄国在农奴制下，广大农奴购买力极低，国内市场狭小，又缺乏真正的自由劳动力。所以即便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业的发展仍然非常缓慢。手工工场主出于掠夺剩余价值的需要，坚决要求废除农奴制度。

十二月党人起义 十二月党人多数是年轻的贵族军官。沙皇政府的

暴戾，贵族的专横和农奴制的落后，推动他们展开了废除农奴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十二月党人的第一个组织是 1816 年由青年军官莫拉维约夫创立的“救国协会”。但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不久瓦解。1818 年又成立了“幸福协会”，共有会员 200 人。他们把建立共和国当作奋斗目标。1821 年又重新改组，产生了“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南方协会的领导者是彼斯特尔，他曾经起草了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草案——《俄罗斯真理》。这部宪法草案宣布坚决地消灭农奴制和等级制，建立共和政体，规定地主有地一万亩以上者，没收一半，划为公有土地，并确立了宗教信仰、言论和出版等自由。北方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莫拉维约夫，按照他拟订的宪法草案，选举资格有高额的财产限制，提出解放农奴，但不给土地，这明显地表现出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阶级的局限性。其中以雪列耶夫为首的一派号召推翻沙皇制度，成立共和国。两个协会在主张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沙皇制度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

十二月党人经过一定的酝酿以后，准备于 1825 年 12 月 14 日趁臣民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 年）宣誓的机会，举行起义。这一天起义的军队按时开到参议院广场。虽然指挥官没有露面，但 3000 官兵也同皇家骑兵展开了战斗。尼古拉最后调来 10000 多军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半个月后，十二月党人又在南部发动起义，占领了华西里科夫城，也被沙皇军队击败。起义的主要领袖彼斯特尔、莫拉维约夫等 5 人被处绞刑，100 多人流放西伯利亚。十二月党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敢发动人民群众，只指望依靠军事密谋完成革命。但他们对沙皇专制的英勇斗争，增强了俄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沙皇政府的反动 面临着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和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尼古拉一世即位后，便“直言不讳、肆无忌惮地力图施行专制政治”。1826 年 7 月，他在“陛下办公厅”中特设“第三厅”，把政治警察的反动活动，置于自己亲身领导之下。同年，他颁布书刊检查条例，凡怀疑宗教诫规、不崇敬政府，批评君主制或提倡政治自由的任何作品，检查者都应禁止发表。沙皇政府为了巩固专制制度，还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机构。在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下，恐怖气氛笼罩了全国。

但是，人民群众是不屈服于沙皇政府的淫威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期间发生了 674 次农民起义。在农民起义的同时，还发生了工人骚动。在 1830—1850 年间，至少有 108 次工人骚动。此外，1830 年 9 月还发生了影响很大的波兰起义。第二年 9 月尼古拉调动了 12 万军队才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的反动还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尼古拉一世极力向土耳其侵略，阴谋向巴尔干扩张。1849 年又出兵镇压匈牙利的革命，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

革命民主主义者 农奴制的日趋危机和群众斗争的蓬勃发展，在思想意识上产生了强烈的反映，出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坚决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呼声。他们的杰出代表人物是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等。

赫尔岑（1812—1870年）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早年接受了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并受到十二月党人的影响。他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1829—1833年）曾经组织政治小组，宣传建立共和国的重要意义。后来，他用小说来揭露、攻击沙皇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的罪恶。1847年，赫尔岑不堪沙皇政府的迫害，流亡西欧。1857年7月，他和奥加略夫出版了《钟声报》。他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目睹者。革命失败以后，他认为在西欧已经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因而幻想在俄国利用村社，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当然，这样的“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美妙词句和善良愿望。”

别林斯基（1811—1848年）出身于一个贫苦的海军医生家庭。他靠官费进入莫斯科大学。但不久因写攻击沙皇制度的文章而被开除。他坚决反对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又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欺骗性。列宁对他评价很高，称他是俄国解放运动史上“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

尼古拉·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是牧师的儿子。他在彼得堡学习期间，曾经受到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影响。他作过教师，大胆地利用课堂宣传革命思想，以后从事文艺活动。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极其深刻地批评资本主义，提倡建立社会主义。但他和赫尔岑一样都同样把村社当作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不过，他又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不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有产阶级和政府的“善意”，而认为人民的革命是建立新社会的唯一途径。

尼古拉·亚·杜勃洛留波夫（1836—1861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和学生。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农奴制和专制政体，极力宣传社会主义。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辑过极有影响的《现代人》杂志。他们以这个杂志为中心，把许多革命者和革命团体有组织地团结起来。

革命民主主义者不仅制造革命舆论，而且还深入群众试图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50年代末，他们开办星期学校，招收劳动人民入学，和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活动对于促进俄国废除农奴制起了很大作用。

克里米亚战争 俄国和英、法向西亚的侵略，引起俄国和两国的冲突。这个矛盾的发展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1853年10月4日，土耳其在英法的怂恿下对俄宣战。战争开始以后，就形成了多瑙河流域，黑海沿岸和高加索三个战场。11月30日，俄国海军在黑海沿岸的西诺普以北击溃了土耳其的舰队，土耳其便处于不利地位。英法两国为了挽救土耳其的败局，制止俄国势力在西亚的扩张，于1854年3月28日对俄宣战。英法舰队在黑海、波罗的海和白海对俄国展开进攻。1854年9月14日，英法联军在黑海、波罗的海和白海对俄国展开进攻。1854年9月14日，英法联军在黑海北岸的耶夫帕托里亚登陆以后，克里米亚半岛便成了主要战场。1855年1月，撒丁王国也加入联军作战。经过将近一年的在克里米亚的战斗，俄军于9月11日被迫自塞瓦斯托波尔撤退。这是俄

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18卷，第10页。

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0页。

军基本上已经丧失战斗力的标志。虽然俄军以后在高加索战场击败了土耳其军，但难以挽回俄国失败的结局。1856年3月，交战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议定：俄国和土耳其都不能在黑海保有舰队；土耳其的基督教徒由欧洲各大国“共同保护”；俄国拆除黑海的要塞。此后，英法两国在巴尔干和西亚的优越地位便巩固起来。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封建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战争期间，人民的生活更加恶化，许多州都发生了农民起义，克里米亚战争后，群众运动继续发展。1858年在俄属欧洲境内的25个州都掀起农民起义的浪潮。在农民起义的同时，工人也发生多次斗争，仅1859—1860年间就发生28次工人骚动。这时革命民主主义者也积极活动，号召人民坚决斗争。震慑于群众的革命斗争，沙皇政府也承认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拯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改革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任务。甚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也对贵族宣称：这件事由上而下进行比由下而上要好得多。

农奴制的废除 在人民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废除农奴制已成为当务之急。1857年1月3日，沙皇召开了农民事务机密委员会，以后又在欧俄各州成立起由贵族代表组成的州委员会，拟定改革方案。1861年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废除农奴法令。这个法令包括一系列的文件，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在人身解放方面：农民获得了自由民的权利和地位，此后可以自由经营工商业，订立契约，拥有动产与不动产和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的权利；农民再不能被任意买卖，也不能随意被地主惩罚。

有关土地规定：农民缴纳赎金后可以得到一份土地。至于份地的面积，法令规定了最高和最低定额，如果份地超过最高定额，地主可以割去多余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割地”。这条规定就为地主掠夺农民的份地制造了借口。经过这次改革，地主平均割去了改革前农民份地的18%。

关于赎买手续：农民的宅旁园地可以自由赎买，须先向政府交纳60卢布的赎金，6个月后即可取得所有权。赎买份地则必须得到地主的同意。关于赎金的数额，规定为每年代役租额为赎金的6%，农民赎买时，必须先付赎金的20%—25%，其余部分由政府垫付给地主，农民再在49年内，分期向政府还本息。这样规定的赎金之高大大超过当时的实际地价，据统计，农民分到的土地共值6.5亿卢布，而赎金总额则高达9亿卢布。

2月19日法令公布后，沙皇政府又实行了一些改革。1864年成立县和州的地方自治局；实行法庭公开审讯；1870年成立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市杜马；1874年废除募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制。此外，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推行了一些普及教育的措施。这些改革都是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的。

1861年俄国农奴制的废除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资本主义逐渐在俄国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列宁说：“在俄国，农奴制崩溃以后，城市的发展、工厂的增加、铁路的修建越来越快了。农奴制的俄国被资本主义的俄国代

替了”。但改革后的俄国仍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劳动人民不仅受着资本主义的剥削，而且还受着封建残余的压榨，生产力仍然受到严重的阻碍。所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封建的双重剥削，就成了俄国人民斗争的艰巨任务。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九、十、十一章。

刘祚昌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第十一章。

管仲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九、十、十一、十二章。

胡洽坤主编：《简明世界史》第八、九章。

乔明顺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第九章。

复习题：

1. 简述 19 世纪中期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2. 试析德国实现统一的社会政治经济前提。
3. 德国统一的两条道路是什么？
4. 意大利是如何完成统一的？
5. 俄国农奴制废除的历史背景、性质、历史意义。

第十一章 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节 南北战争前的美国

领土扩张与西进运动 美国独立战争后，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掌握了政权。1789年，他们根据1787年的联邦宪法，建立起联邦政府，实现了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的联合专政。美国建国后不断扩充领土。1803年，美国趁拿破仑忙于对外战争的时机，以15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了面积有82.8万平方英里的路易斯安那。1810年强占西属佛罗里达的西部，1819年又以500万美元强购了佛罗里达的东部。1845年美国吞并了墨西哥的德克萨斯，1846年，迫使英国放弃北纬46°以南的俄勒冈地区。美国通过1846—1848年的对墨西哥战争，夺取了格兰德河以北的墨西哥领土，包括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5个州以及科罗拉多和怀俄明的部分土地。1853年，又威逼墨西哥出售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希拉河以南的土地。经过以上的扩张，美国就把国境线向西推到太平洋沿岸，幅员从19世纪初的89万多平方英里，增加到300多万平方英里。

美国扩张领土的过程也是屠杀印第安人的过程。1830年国会授权总统把所有印第安人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后来又强迫印第安人迁入荒僻的“保留地”。印第安人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曾和美国扩张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美国军队进行了上千次的所谓“征伐”，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遭到杀戮，如1850—1860年间，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因被屠杀从10万人减少到3万人。

美国新扩张的领土能迅速地与最早的13州融为一体，应归功于西进运动，西进运动是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同时也将东部工业化的成果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带往西部，把印第安人剿灭或赶走，使美国的广阔土地终成白人的一统天下。

美国西进运动兴起于独立战争后，终结于19世纪末。在18世纪后期，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西部土地的政策法令，有力地推动了西进运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785年出售公共土地的法令和1787年关于在西部建立领地及条件成熟后领地可以转为州的《西北条例》。

1840年以前，西进运动主要指越过阿巴拉契亚山的移民运动。移民们在当时主要靠牛车马匹的交通条件下，开发阿巴拉契亚山与密西西比河之间后被称为“老西部”的地区。他们循着印第安人的猎兽小路筚路蓝缕，历尽艰辛。

“老西部”被占领后，大批移民进一步越过密西西比河，进入密苏里河与堪萨斯等地的“中西部”，从这里又走向太平洋岸的“远西部”。1848年初，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大批美国东部居民与欧洲移民奔赴加利福尼亚。使加利福尼亚人口骤增，中西部的堪萨斯以西与加利福尼亚以东之间自然条件最差的大草原地带也被占领。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布：未开发的土地大多已被开发，边疆地带已不存在，西进运动遂告结束。

西进运动具有两面性。它既是广大白人劳动者征服自然，在西部土

地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印第安人杀戮、驱逐、侵占他们土地的过程。因此，西部经济的繁荣，完全是建立在印第安人斑斑血泪累累白骨之上。当然，西进运动对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功绩不可磨灭，对美利坚民族传统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工农业的发展 美国独立后，资产阶级通过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和掠夺西部土地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源源不断的移民又为大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联邦政府实行发明专利权、资助公路、铁路和运河的修建，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于是资本主义工业在北部和西部迅速发展起来。

美国的工业革命发生于 19 世纪初，也是先从棉纺织业开始的。1800 年美国有 8 个棉纺厂，纱锭不足 2 万个，而到 1860 年全国的纱锭总数就增加到将近 500 万个了。毛纺织业继棉纺织业之后也由工厂生产，而且较快地发展起来。自 1828 年起开始修建铁路，1840 年铁路总里程为 2818 英里，到 1860 年铁路线长度达到 30626 英里。冶金业和火车对煤的需要，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1820 年煤产量不足 5 万吨，到 1860 年已经增长到 1300 万吨了。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从 1810 年到 1860 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将近 9 倍。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新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如汽船、铁路和电报相继出现，促进人口移动，向西推进并横越大陆，使广阔的地域能联合在联邦政府之下，使来自欧洲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白人在这块新大陆上趋向同一而不是分散，使美国各新开辟的地区、各个不同部分的公民在语言、思想、习惯方面的差异不是扩大而是缩小，由于交通的联接，美国才成为民族的“熔炉”。

19 世纪上半叶，工厂制度在美国普遍建立起来，到 1860 年，手工店铺和“厂外包工”制度只在南部和西部边疆还有残留。企业股份公司出现了，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形成。1790—1860 年间的美国，虽然还未彻底摆脱对英国的依赖，但正在顺利地走向工业化，为内战后的经济起飞打下基础。

内战前，农业仍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部分，19 世纪 60 年代仍有 84% 的人住在农村。不过，新英格兰地区的农业此时已相对衰落，农村人口纷纷进入城市或向西迁移，而俄亥俄河流域的老西部成为新的农业区，并很快向商品农业转化。交通的改善，是实现转化的重要条件。伊利运河是老西部最重要的运输渠道，40 年代后的铁路的修筑使芝加哥迅即成为西部农产品市场的中心。农业机械的改善也促使农产品的增加。1837 年，迪尔发明了钢犁；1834 年，麦考密克的收割机获得专利权，并迅速推广开来。一台马拉收割机一天能收割 20 英亩，比用镰刀提高工效 20—40 倍。除犁及收割机外，还出现了脱粒机、割草机和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旧农具的改良和新机器的发明，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 1860 年，一个农业工人可养活自己之外的 3 到 5 人。农业的商品化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一些农民由于经营得力逐渐富裕起来，他们将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通过雇佣工人经营农场成为农业资本家。同时，也有一些农民由于天灾人祸而破产，沦为雇佣工人，在农业资本家的农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美国农业这种发展道路，被列宁称为与“普鲁士道路”相区别的“美国式道路”。

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 19世纪前半期，当北方资本主义工农业正迅速发展的时候，南方各州却依然保留着奴隶制种植园经济。18世纪，南方种植园经营的主要农作物是烟草、稻米和蓝靛。18世纪60年代，由于英国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美国北部工业的兴起，国内外市场对棉花的需求急剧增长，棉花价格飞涨，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南部种棉业的发展。大部分种植园纷纷改种棉花。棉花成为南部最重要的农作物。1850年，棉花生产已占南部农业生产总数的77.6%。1860年，美国供应了世界市场棉花需求量的三分之二，其中80%运销英国。

棉花生产的飞速发展，导致奴隶制的恶性膨胀和奴隶贸易的再度兴起。1860年南方各州的奴隶已达400万人，其中200万黑奴在棉花种植园里劳动。当时在15个蓄奴州的白人总共800万人，其中奴隶主就占38.4万多人，奴隶主既是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者，又是从事奴隶买卖的人贩子。种植园内，黑奴受到残酷的盘剥和虐待。大种植园流行监工制度，奴隶们终日在手执皮鞭的工头和监工监督下劳动，日工作量达16—18小时，吃的是极粗劣的食物，绝大部分青年奴隶往往不到壮年便因过度劳累就死去。黑奴没有自由，奴隶主可以任意惩罚、买卖甚至杀死他们。

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是一种特殊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它与古代的奴隶制不同，是植根于美国南方特殊的经济形态之下的一种畸形的社会制度。但是，它继承了古代奴隶制中最野蛮的剥削方式，甚至在残酷性和野蛮性方面超过了前者。但就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原料以换取大量工业品而言，它又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以奴隶劳动为基础，排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自由雇佣劳动，又与北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独立前，整个南方则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交通也很落后。

南部奴隶主对黑奴的残酷压迫，激起了黑人的强烈反抗。1822年，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黑人丹麦·维西领导黑人暴动，1831年，弗吉尼亚又爆发了由纳特·特纳领导的起义。虽然起义最后均被镇压，但却极大地震撼了南方奴隶主的统治。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北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废奴运动。19世纪30年代初，废奴运动团体相继出现。1832年“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成立。1833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1837年，参加“反奴隶制协会”的会员达20多万人。参加者包括工人、农民、北方的自由黑人，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黑人是废奴运动的主力军，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废奴运动的领导力量。废奴派在北方各地展开宣传鼓动活动，揭露奴隶制的罪恶。1831年，废奴运动活动家加里森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周报的发刊词中宣布“我将为我们的奴隶居民立即获得公民权而奋力斗争。”废奴运动中奴隶出身的黑人宣传家道格拉斯也脱颖而出，1838年，他从马里兰州逃到北方，在废奴派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痛斥种植园奴隶制的黑暗与反动。他还以大量事实批驳了白人种族优越论，在废奴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52年3月，在废奴运动的高潮中，进步作家斯托夫人发表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旧译《黑奴吁天录》）。小说生动地展现了黑奴的悲惨生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此书出版后第一年就在美国

印行了 120 万部。在英帝国范围内也销售了近百万部。这部书激发了广大读者从感情上痛恨奴隶制度，英国有 50 万妇女在声讨奴隶制宣言上签名。后来，林肯总统在接见斯托夫人时风趣地称她是发动南北战争的夫人。

废奴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运动，其领导力量是北方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广大工人、农民、妇女和黑人运动的主体。废奴派的宣传鼓动工作揭露了奴隶制的残酷和罪恶，激起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对南方奴隶制的仇恨和对黑人奴隶的同情，为奴隶制的废除作了舆论准备。废奴运动也起了反奴隶制的统一战线作用，它促进了北方各种反奴隶制力量的政治团结。19 世纪 40—50 年代，废奴运动发生分裂与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用暴力废除奴隶制。

北部的资本主义与南部种植园奴隶制是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内战前，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美国北部为了保护本国的工商业，要求加强关税壁垒，提高关税税率。南部的种植园经济主要同英国工业相联系，为了得到国外廉价工业品，对保护关税法深为不满，主张自由贸易，降低关税，1828 年和 1833 年双方发生两次关税冲突。南部反对联邦政府对各州重大事务的干涉，南卡罗来纳州甚至以脱离联邦相威胁。40 年代后，在民主党的操纵下，政府一再降低关税。

南北双方的矛盾斗争集中表现在对于西部领土的争夺方面，斗争的焦点是在西部地区建立自由州还是蓄奴州问题，北部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想把西部变为工业原料基地和销售市场。农民失业者和从欧洲来的新移民也要求开发西部“自由土地”，以求生存和发展，他们主张在西部废除奴隶制。南部奴隶主扩张领土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奴隶制种植面积，因为奴隶主为维护奴隶制经济，不断扩大新的地盘，极力要求在西部建立新的蓄奴州。

另一方面，对于西部土地的斗争，也涉及到在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之间谁掌握联邦政府的问题，因为西部各州正在建立之中，哪个阶级控制的西部新建州愈多，它在国会中所占的席位就愈多，因而在联邦政府的势力也就愈大。1818 年密苏里州加入联邦时，双方在该州应为奴隶州或自由州上发生了争执。最后双方于 1820 年达成妥协，通过了“密苏里妥协案”，商定密苏里州和缅因州分别作为奴隶州和自由州加入联邦；还规定：以后如有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必须同时有一个自由州加入；在北纬 36°30' 以北禁止奴隶存在。但奴隶主贪欲是没有止境的。1850 年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时，奴隶主控制的联邦政府又通过了新的法案，规定：加利福尼亚为自由州，把其余从墨西哥掠夺的领土以北纬 37° 为界，分为犹他和新墨西哥地区，将来是否禁止蓄奴，由将成立的各州居民决定。此后所有南部和北部各州都设立追捕逃亡奴隶委员会，逮捕所有的逃亡奴隶。从而否定了从前规定的奴隶如进入自由州，则被视为自由人的法律。

北部除围绕以上的问题和南部展开斗争外，还广泛地展开了废奴运动，参加者主要为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激进派。

堪萨斯内战和约翰·布朗起义 在废奴运动影响下，奴隶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有的逃亡，有的举行武装暴动，纵火烧毁种植园。种植

园主为了挽救奴隶制的危机，1854年迫使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规定：这两个位于36°30'以北的州究竟为蓄奴州或自由州，应由两地居民自行决定。这个法案推翻了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给奴隶主向整个西部发展的权利。接着，奴隶主组织武装暴徒，涌入堪萨斯，企图以武力控制选举，以达到建立奴隶州的目的。南方奴隶主的猖狂进攻，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北部的工人和农民也携带武器，进入堪萨斯，同奴隶主纠聚的暴徒展开搏斗。1857年奴隶主又发动新的攻势。他们唆使最高法院通过宣布斯科特案件的结果，申明奴隶迁往自由州居住，仍然是其主人的财产。这个决定无异把奴隶制伸张到北部的自由州，严重地限制了小农的发展，因而激起人民更大的怒火。特别是1857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失业的工人和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都渴望到西部获得小块土地。于是消灭奴隶制的呼声愈来愈高。这个判决案激起了北方人民特别是广大黑人的强烈抗议。50年代，南部各州不断爆发反奴隶制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布朗起义。约翰·布朗是一位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生于康涅狄格州一个贫苦白人家庭，曾积极参加“地下铁道”活动和堪萨斯内战。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对黑人斯科特案件的判决，使广大废奴派人士忍无可忍。判决竟声称，国会无权在领土上禁止奴隶制，密苏里妥协案是违宪的。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不论在美国任何地方，财产是不能被剥夺的。因此，黑人斯科特虽曾被主人带往自由州住过几年，仍不能摆脱“主人的财产”的地位，更谈不上获得自由。这一判决案实际上宣布奴隶制可在美国任何地方实行，从而引起约翰·布朗起义。

约翰·布朗计划在弗吉尼亚的哈泼斯渡口举行起义。利用当地奴隶种植园较多的条件，发动种植场的奴隶参加游击战，最后将起义烈火烧至南方，以至全国。1859年10月16日，他率领包括自己3个儿子在内的21人攻占哈泼斯渡口的军火库及附近的种植园。第二天即被民兵和联邦军队包围，由于力量过分悬殊，布朗起义很快被镇压，9人牺牲、6人被俘、7人逃走，布朗本人也在被俘之列。

1859年10月底，布朗被判处死刑，宣布其罪状是：图谋串通奴隶举行暴动，背叛弗吉尼亚州，犯了头等谋杀罪。宣判后，布朗在狱中写了最后的遗嘱：“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这个罪恶的国土的罪恶，只有用鲜血才能涤净。我曾经自以为不用流很多的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12月2日，布朗和他的5位战友英勇就义。反动统治者在刑场周围布置3000名士兵，如临大敌。

布朗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的意义和影响不可抹煞。起义为废奴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斗争方向，体现了废奴运动和南方奴隶起义的结合，也体现了黑人和白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奴隶制的革命精神。布朗的牺牲，鼓舞了废奴运动，将反奴隶制斗争推向新的高潮。布朗殉难这天，人民群众表现出深切的悲痛和同情，许多地方的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教堂鸣钟为布朗祈祷，南方发生多起奴隶反抗斗争。内战开始后，北方人民高唱《约翰·布朗之歌》奔赴战场，讨伐奴隶制。

第二节 南北战争

内战的爆发 南北战争爆发前夜，拥护还是反对奴隶制以党派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共和党成立于1854年，它由北部资产阶级领导，有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该党的基本纲领是：限制奴隶制扩张，反对奴隶买卖，“自由土地”开放给农民垦殖，保护关税等。民主党是1828年在民主共和党分裂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此后几经变化。该党的基本成分是西部新兴的棉花种植园主和南部旧有的种植园主，以及小农、边陲居民和工匠等。其纲领是反对国家主义，不赞成建立国家银行，不同意政府干预奴隶制的存在与发展。1860年，全国举行大选前，共和党推出林肯为总统候选人。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年）出生于肯塔基州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当过雇农、船工、店员、乡村邮务员、土地测量员。他自学成才，成为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林肯曾4次当选为伊利诺州的辉格党议员，1847年又出任国会议员。1860年的大选非同往常，它直接关系到奴隶制的命运问题。林肯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反对奴隶制，维护联邦统一。共和党竞选纲领宣称：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土地；实行“促进全国工业发展”的关税；制定自由土地法分给移民土地。这些主张迎合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拥护。此外林肯的寒门出身、品德也使他在劳动群众中赢得了威望和支持。11月6日，林肯以绝对优势当选。这一选举结果使南方奴隶主认识到把奴隶制扩大到西部去的希望不但破灭，而且还面临整个奴隶制崩溃的危险。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在林肯上任前发动叛乱。因为林肯当选总统就意味着奴隶制不可能继续扩张到新的领土上去，这无异于要把奴隶制于死地。

林肯当选后，南卡罗来纳于1860年12月20日率先宣布脱离联邦。接着，佛罗里达、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等州并入南方，建立一个从俄亥俄河延伸到巴拿马的奴隶王国。以上7州的代表于1861年2月4日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集会，宣布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简称“南部同盟”）2月8日通过这一部宪法，2月9日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备战活动加速进行，内战一触即发。

1861年3月4日，林肯就职。他在就职演说中还谋求和解，呼吁维护联邦统一。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内战终于爆发了。

南方叛乱分子第一个行动是夺取他们境内联邦的一切堡垒和军械库。联邦的军事据点建立在各个州的领土上，叛乱各州要求“收回”他们财产的权利。南卡罗来纳境内的萨姆特要塞的驻军进行抵抗，于是叛军于1861年4月12日炮轰这个要塞。萨姆特要塞陷落，标志着内战开始。4月15日，林肯发布关于征召7.5万名志愿军的命令。内战打响后，又有4个边境州：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阿肯色倒向南部同盟，南部同盟的首都移至弗吉尼亚的里士满；而特拉华、马里兰、密苏里和肯塔基等4个蓄奴边境州，经过一番斗争，继续留在联邦内；弗吉尼亚西部几个州的居民一直反对奴隶制，不愿脱离联邦，于是宣布成立西弗吉尼亚州，站在联邦一边。

内战的爆发是南北两种社会制度政治斗争的继续。南部联盟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永远保存和扩大奴隶制，北方的目的开始只限于维护联邦的统一，限制奴隶制的扩张。

内战的第一阶段（1861—1862年）从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北方处于优势。1860年，北方有23个州，人口有2200万。南方有11个州，有900万人（其中有黑人400万）。北方有充足的粮食和发达的工业，军队又主要是斗志昂扬的工人和农民所组成，并得到黑人从各方面的帮助。而南方工业薄弱，粮食不足，士兵多是被骗来的或者强征来的“白人贫农”，黑人又时时处于敌对地位。所以北部已经具备了胜利的客观条件。

内战第一阶段分东西两个战场进行。西战场以密西西比河和田纳西河为中心，东战场以波托马克河和弗吉尼亚州为中心。1861年7月21日双方在华盛顿以南的马拉萨斯进行第一次大会战。政府军开始进展顺利，后来南方军得到增援进行反攻，双方展开激战，政府军麦克道尔将军信心不足，下令撤退，南军趁势追击，政府军死伤1584人，失踪1312人。南军共计损失1982人。这次会战的失败使林肯政府抛弃了盲目轻敌思想，但在布署新的作战计划时又发生重大失误。11月林肯任命麦克累伦为联邦陆军总司令兼华盛顿军区司令，麦克累伦是民主党人，同情奴隶主。1862年初，林肯下令分西、南、东三路向南方发动攻势，格兰特将军率领的军队分别在西、南战场取得胜利，但在东战场担任主攻里士满任务的麦克累伦借口兵力不足，迟迟按兵不动，贻误战机。3月11日，林肯下令罢免麦克累伦的联邦军总司令职务。麦克累伦对此十分不满，口头上却表示要将功补过，4月，他率领波托马克军团在约克半岛登陆，发动了从背后进攻里士满的“半岛战役”。由于其所辖部队辎重超负，行动缓慢，5月14日抵达里士满外围时，南军已筑起道道防线，北部前来增援的军队在中途又被南军击溃。南部同盟军司令罗伯特·李抓住战机，于6月26日主动向麦克累伦部出击，经过7天激战，南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回里士满。然而麦克累伦没有挥军追击，反而下令撤退，从而失去了一次取胜的良好机会。半岛战役后，麦克累伦被解除了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

9月5日，南军在华盛顿以北渡过波托马克河，进入马里兰州，其目的在于割断联邦政府同西部的联系，然后攻打华盛顿、费城等大城市。在这紧急关头，林肯再次起用麦克累伦指挥波托马克军团，去粉碎南军的军事企图。9月17日，两军在波托马克河与安提塔姆河之间的阵地上展开一场大血战，南军兵败，18日，罗伯特·李将军率余部逃遁。内战第一阶段，政府军在东战场败多胜少，而西战场却捷报频传，打退了深入肯塔基的南方军队，在田纳西河流域一再取胜，1862年4月，联邦海军与陆军配合，攻占了南部最大的港口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已处于政府军控制之下。

内战开始后，林肯政府一方面为了调动北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内情。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反对南方奴隶主的分裂活动，维护联邦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回避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不敢触动《逃亡奴隶法》，甚至拒绝黑人参加联邦军作战。林肯政府的保守态度和东战场的连连失利，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1862年夏，纽约和其它城市都发生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工人农民要求政府清洗军队和国家机关中的怠工者，立即解放奴隶并将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群众的情绪如此激愤，一位新闻记者告诉国会某议员说：如果不废除奴隶制，人民就会起来用武器来说话。许

多人民纷纷来信，要求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消灭奴隶制度。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人民群众热切地希望总统用沉着的、坚决的手书写决定国家生存的语言：解放！”林肯政府里的激进派，以史蒂文斯和萨姆纳为首，不断在国会发表抨击军事失败和反奴隶制的演说，要求立即解放奴隶，废除《逃亡奴隶法》，武装黑人参加战争等。1862年上半年，众议院通过了一些局部解放奴隶的革命法案。激进派议员经常分析形势，对总统提出各种意见。

内战两年来，战场上的败绩、群众的压力、激进派同事的呼吁和国际形势的严峻，终于使林肯认识了形势，他认识到，为了达到拯救联邦的目的，只有采取顺乎民心的革命措施。经过长时期周密考虑，从1862年5月开始，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法令。

1862年5月20日，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它规定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不反叛政府或不与政府作对者，只要缴纳10美元证件登记费，就可以得到160英亩西部国有土地，连续耕种5年后，可享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这个法令意味着美国西部土地按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它杜绝了奴隶制在西部的扩张，保证了农业资本主义沿着美国式道路发展；同时也实现了西部农民渴望已久的愿望，使大批小农获得了土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人民参加反奴隶主叛乱的斗争，联邦军队的士兵们都勇敢地为实现《宅地法》而战斗。

1862年7月17日，国会通过《没收法案》。宣布叛乱者为国事犯，没收其全部财产，解放其奴隶；还授权总统使用奴隶来镇压叛乱，这对组织黑人部队起了保护作用。

林肯政府1862年9月24日公布了《解放黑奴宣言》。1863年1月1日生效。它宣布叛乱各州及地区的奴隶“从现在起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并保障这些人的自由”，“在获得自由的奴隶中”凡符合条件的人，“合众国将接收他们服兵役”，参加保卫合众国。

《解放黑奴宣言》使390万黑奴获得解放。1863年春，林肯政府正式招募黑人入伍，据统计有23万黑人加入了联邦军，为北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共有3.8万黑人官兵牺牲于前线战场。

除了上述重大措施外，林肯政府还严厉打击后方反战通敌分子，给予军法惩处。

整顿扩充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也是林肯政府采取的有力措施之一。1863年3月国会通过了《征兵法》，实行义务兵役制，联邦军队的数量从1862年的55.6万人增加到1863年的91.8万人。政府还清除了部队中立场不坚定的军官，依据个人才能和战绩选拔各级指挥人员。重用格兰特、谢尔曼、巴特勒、佛里蒙等一批年富力强的著名将领，使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国会还于1862年制定征收累进所得税法案，年收入600至1万美元的人必须缴纳3%的所得税，收入1万以上者缴纳5%，累进所得税使富裕阶层承担了较多的税额，这一法案缓解了内战军费开支的困难。

内战的第二阶段（1863—1865年） 内战转入第二阶段后，林肯

政府采取一系列进步措施竭力扭转战局，但截止 1863 年 5 月形势依然严峻。5 月 1 日，政府军将领胡克指挥波托马克军团，在钱瑟勒斯维尔一地以优势兵力、有利地形与南部同盟军展开会战，两军交战 4 天，南军司令罗伯特·李指挥有方，战术灵活，结果反而以劣胜优。5 月 5 日联邦军溃退到拉帕汉诺克河以北。此战失利，导致北部一时舆论哗然，人心浮动。6 日后联邦政府的军事形势开始发生转机。南部同盟军 6 月 20 日抵达宾夕法尼亚，次日与驻守葛底斯堡的联邦大军迎面相撞。7 月 1 日至 3 日双方共投入 10 万兵力，在那里展开内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联邦军凭借地利人和固守阵地以逸待劳，南部军队拼命进攻，屡攻不克，军队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只因北军过分小心谨慎，不敢乘胜追击，才使南军残部安然南归，但葛底斯堡之战成了南北战争军事上的转折点，此后南军无力进攻，只好转入战略防御了。

与此同时，西战场也在维克斯堡取得胜利。维克斯堡扼守密西西比河航道，是一座拔起于河面 200 英尺高的悬崖，易守难攻，格兰特将军率军先把要塞周围的各个据点打掉，然后把该堡团团围住，断绝据守堡上 2.5 万名南部同盟军的粮秣补给，迫使对方于 7 月 4 日不战自降。7 月 9 日，哈德逊港的南部同盟军也弃械请降。这样，联邦军就把密西西比河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把南部同盟的防线拦腰斩断，形成两个孤立无援的部分。

1863 年 11 月，联邦军又在查塔努加地区沉重打击了叛乱军队，收复了查塔努加。1864 年 3 月 9 日，格兰特出任联邦军总司令，他采取了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进攻的战略。5 月初，谢尔曼率军 10 万从查塔努加开至乔治亚州，与南部同盟约翰斯顿指挥的军队作战，9 月 2 日进占亚特兰大。11 月 15 日，谢尔曼统帅 6.2 万名大军，横扫乔治亚中部，兵抵萨凡纳城下，12 月 12 日在联邦海军配合下攻占重要港口萨凡纳。格兰特在东战场与罗伯特·李将军进行角逐鏖战，它牵制了南部军队的力量，对西战场联邦军的进攻起到了支援的作用。

1865 年初，谢尔曼与格兰特会师，对里士满实行包围。4 月 9 日，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在弗吉尼亚境内的阿波马托克斯小镇，率 2.8 万人向格兰特投降，4 至 5 月间，南部同盟其余各部也相继投诚。历时 4 年之久的内战正式宣告结束。

1864 年 11 月，林肯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1865 年 3 月 4 日，林肯宣誓就职。南方奴隶主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决定暗杀林肯，作垂死挣扎。4 月 14 日晚上，林肯总统在华盛顿福特剧院欣赏话剧《我们的美国亲人》时，被同情奴隶主、仇视黑人奴隶的演员蒲林斯刺杀，15 日晨 7 时 30 分死于医院。

林肯的遇害引起巨大的震动，美国人民悲痛地悼念他们的“船长”、忘不了他们“船长”的“坚定、威严、勇敢”，痛惜他们的“船长”在“船”已临近港口，已听到钟声和人们欢呼的时候“停止呼吸”。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在唁信中高度评价林肯的业绩，称他“是一个不会被困难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

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林肯逝世的消息传开后，美国各地人民走上街头，哀悼这位伟人。送葬仪式有 700 多万普通百姓参加。

南方的重建 内战结束后，全国政权为北部资产阶级掌握，但南部的民主党和奴隶主集团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并没有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还没有被彻底摧毁。在美国执政的资产阶级面前，有一系列南方政治改革和社会重建的问题需要解决，如原叛乱的南方各州重归联邦的条件问题，南部黑奴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以及南部的政权机构怎样建立等。1865 年至 1877 年被称为美国的重建时期。重建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总统的重建阶段”，这实际上是一个反动和倒退的阶段。林肯总统被刺杀后，继任总统职务的原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纠集共和党保守派和南方民主党联合，站到反动的奴隶主集团一边，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1875 年 5 月，约翰逊总统颁布通告，对叛乱的参加者实行大赦。根据这个通告，叛乱的参加者只要宣誓效忠联邦政府，就可以得赦免，恢复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包括战争中被没收的财产所有权，只是对奴隶的权利除外。以后 10 个月内，约翰逊又颁发了 7 项重建宣言，允许南方各州重返联邦，允许南方同盟的代表出席国会，原奴隶主恢复了对南方各州的控制权。到 1867 年 2 月止，归还给种植园奴隶主的财产大约值 20 亿美元。1861 年，掌握南方政权的各州原叛乱分子，相继制定《黑人法典》，重新奴役黑人。法典禁止黑人占用无主土地，强迫黑人以苛刻的条件在旧种植园里劳动，黑人被禁止携带武器，不能自由迁徙，不能担任陪审员；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不准黑人与白人同坐一辆车；甚至各级官员有权逮捕未满服役期离开主人的黑人。这些规定几乎全部取消了内战的伟大成果。1866 年，专门残杀黑人的法西斯秘密团体“三 K 党”在田纳西州出现，以后在南方各州建立了它的组织。约翰逊政府的反动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1865 年到 1866 年秋，田纳西、北卡罗来纳等地黑人召开代表会议。抗议约翰逊政府重建南方的反动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会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激进共和党人以斯蒂文斯为首把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它以 1865 年 11 月底成立的两院“重建南方委员会”为核心，共和党激进派采取了一系列较为革命的措施，开始了共和党激进派重建南方时期。

在激进派的努力下，国会决定推迟接纳南部各州代表。1866 年 3 月 13 日，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法案规定给予一切在美国出生的人以完全的公民权，而不论其民族与肤色，也不管他以前是奴隶还是劳工。4 月，两院重建南方委员会提出了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承认黑人具有公民权和投票权，并承认黑人与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凡剥夺黑人公民权的州，应当减少在国会中的代表。各州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同时剥夺南方同盟领导人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该法案 1868 年由各州批准，成为美国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从 1867 年 3 月——1868 年 3 月，又通过了 3 项有关重建的法案，将未经重建的 16 个南部州分为 5 个军管区，实施军管，对黑人参加政治活动予以保障，在军管时期，各州逐步建立黑人与白人共同组成的宪法会议，制定保障黑人选举权的宪法；各州逐步建立州议会，批准宪法第 14 条修正

案，然后依法请求加入联邦。激进共和党人的重建纲领的实施限制了原种植园奴隶主的权力，给予过去的奴隶以参政的机会。从 1867 年 3 月到 1868 年夏，南方各州举行了联邦和地方政权机关国会、州议会、郡和市议会的选举，随之而建立的南方诸州政府，实行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进步势力、非奴隶主白人居民和黑人代表共同执掌政权。有些黑人被选进议会和州政府，有的还担任了副州长。各州主要权力掌握在白人激进派手中。这一时期南方的政府被称为“黑白混合民主政府”。各州选出的国会议员先后被接纳进入国会。

各州民主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他们颁布了《黑人公民权利法案》，废除了《黑人法典》和过去的奴隶法，允许黑人担任法官和陪审员。此外，还废除了担任公职的财产资格限制。

南方各州政府奖励工商业发展，拨款资助铁路建设，对低利润企业实行免税。内战前，商人纳税要多于种植园主五、六倍，重建时期则提高了土地税。南卡罗来纳州政府收购了种植园主的一些土地，然后贷款低价卖给黑人。

各州都厉行教育改革，建立公立学校，实施普遍义务教育。公立学校免收学费，贫苦的黑人儿童有了就学机会。南部黑人中出现了学习文化的热潮。原来几乎全是文盲的黑人，到 1880 年文盲率降到了黑人人口的 70%。

由于没有用民主方式解决南方土地问题，因而最重要的黑人的经济来源问题没有根本改变。黑人获得自由后，仍然无以为生，很多人靠联邦军救济度日。最初几年，死于饥饿、疾病和暴力的黑人数以万计。结果大批黑人不得不给种植园主当佃农。他们每年要将收成的一半甚至更多上缴给种植园主。这种谷物分成制实际上是奴隶制残余。黑人低下的经济地位就使民主政权缺乏牢固的基础。

民主重建的失败 南方种植园主采取各种方式破坏民主重建事业。他们利用“三 K 党”这一恐怖组织依靠暴力手段扼杀新政权。“三 K 党”最早出现于田纳西州，从 1866 年后，在南方各州迅速蔓延，在整个南方重建时期，三 K 党活动猖狂。仅北卡罗来纳一州，就有 4 万多名三 K 党徒，该州立法会议的民主党议员多为三 K 党成员。1867—1877 年三 K 党人至少杀害了 5000 人。南方民主党人还利用共和党的分裂，乘机向民主政权进攻。1872 年，联邦国会通过《大赦法案》，许多叛乱分子重新获得政治权利，南方各州民主党人陆续夺取州议会与州政府。到 1875 年，民主党已在多数南方州选举中获胜，黑白混合政权岌岌可危。

1876 年大选中，共和党的贪污腐败使其威信扫地，加之其本身的分裂，一部分共和党投向民主党；而民主党已从内战失败中恢复过来，能够抓住共和党的要害向他挑战。共和党面临严峻局势。大选结果，除了 4 个州的 20 张选票发生争议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票略多于共和党候选人海斯。1877 年 2 月，两党达成协议，有争议的 20 票给海斯，海斯当选为总统，但必须同意南方结束军管，恢复地方自治，保证民主党在联邦政府的发言权。于是 1877 年 4 月，南方军管结束，军队撤走，民主重建南方的纲领以失败告终。

1877 年南北妥协的根本原因在于内战后美国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变成了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

的租佃制种植园经济，原来的奴隶也逐渐变成了一个主要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劳动阶级。此外，南部还产生了大批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新的工业资产阶级集团和金融商业资产阶级集团。这样，北部工业资产阶级与南部已经开始资产阶级化的种植园主，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日趋一致。北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大大加强，金融贵族集团正在形成，原来两种制度的矛盾让位于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同执政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对付这个矛盾，北方资产阶级开始赞成并采取和南部反动分子结成联盟的方式。实际上，两党在性质上已无重大区别，两党在新的形势下，有可能达成新的妥协。

民主重建南方的失败，不等于南方奴隶制的复辟。那些曾用刀剑砍倒的东西已借助法律消灭，主要成果已巩固下来，奴隶的解放体现在宪法第 13、14、15 条修正案中，南方的经济形态已缓慢地转向资本主义。不过与广大西部有所不同，南方的农业资本主义基本上沿着普鲁士道路前进。政治上，资产阶级保守派战胜了激进派，奴隶制残余有所保留，黑人摆脱了奴隶地位却又陷入种族歧视的灾难之中。

南北战争的意义 1861—1865 年的内战是两种不同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曾经指出：“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共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这次内战也是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北方资产阶级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摧毁了南部剥削奴隶的种植园经济，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使政权由奴隶主手中转移到工业资产阶级手中。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内战，5 年的内战与 12 年重建结束了 18 世纪末以来两种经济制度并存的局面，在美国领土上建立了统一的资本主义制度，消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并且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了西部土地问题。因此内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很快赶上并超过英国，占世界第一位。

内战也推动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是废奴派的重要支柱，是联邦军队的主力，通过内战的锻炼，工人阶级的觉悟空前提高，组织程度也加强了。经过两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美国，民主程度较高，发展工人运动的条件较好，内战后工人运动日趋高涨。

马克思、列宁都对美国内战的历史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过：“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列宁指出，美国内战具有“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

但是，美国内战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有其显著的局限性。如战后黑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没有得到真正解放，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也没有提高。

参考书：

马克思：《美国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365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1 页。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50 页。

刘宗绪：《世界近代史》第十二章。

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上）第十二章。

管仲绪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三章。

胡洽坤主编：《简明世界近代史》第十章。

乔明顺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第九章。

复习题：

1. 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2. 美国内战的原因和性质。
3. 对林肯在内战中的作用的的评价。
4. 内战中北方获胜的原因。

第十二章 日本明治维新

第一节 幕府统治的危机

幕藩体制与封建等级制度 1603 年德川家康在全国确立了统治地位后，日本历史进入了德川幕府统治时代。

在德川时代，日本最高统治者是幕府将军，幕府是国家的中央政权机关。幕府为了统辖其领地和直属城市，建立了一整套由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日本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毫无政治权力，并受到幕府的监控。

幕府之下是“藩”，藩主亦称“大名”，全国共有藩国 200 多个，职位世袭。大名必须效忠幕府将军，执行将军命令。战时向将军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藩主在藩内掌握行政、军事、司法、税收方面大权。根据与幕府关系的亲疏，大名又分为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外样大名。亲藩大名是德川将军的同族；谱代大名是在 1600 年关原之战之前臣服德川家的大名或旧臣；外样大名是关原之战后臣服的大名，往往被置于边陲之地。亲藩大名在将军无嗣情况下可以入继。谱代大名享有参与幕政权利，大名则不得过问幕政。

为了控制大名，幕府实行“交替参觐制”，把大名分为两部分，要求他们轮流到江户朝见将军，大名的妻子则长年留住江户作为人质，使之不能起反叛之心。在军事上幕府握有直属常备军，其兵力大约在 10 万人左右。以此保证幕府对各藩的控制。

将军、大名门下拥有大批家臣，称为武士。他们是世袭的职业军人，在德川时代，全国共有武士 40 万，高级门第出身的武士可以参加幕政和藩政，武士拥有冠姓和佩刀特权，杀死百姓可不受惩罚。高级武士拥有领地，下级武士从其主人处领取俸禄。这样就形成了以武士为基础、以将军为最高首领的幕藩领主的统治体制。

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幕府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将全国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就是武士阶层，属于统治阶级。农、工、商属于被统治阶级，占全国人口的 90%，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在等级制度下，人们从事的职业是固定的，世代相袭。在四个等级之外，还有“秽多”（从事制革、屠宰等职业）、“非人”（艺人、乞丐），他们被视为“贱民”，是社会的最低层，受到种种歧视和迫害。

幕藩体制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全部属于封建领主所有。幕府领地约占全国的 1/4，其余的分给各大名。幕府和大名对直属领地实行再分配，幕府将部分领地分给直属将军的“旗本”，大名也将部分领地分给自己的“陪臣”，“旗本”和“陪臣”则必须向将军和大名效忠。这种等级土地所有制保证了幕藩在政治上实行的等级统治。农民拥有世袭耕作权。取得领地的大名、旗本、陪臣有权收取封建地租年贡。地租以实物为主，部分缴纳现金。农民除了缴纳地租外，还为领主负担各种劳役，为了保证地税收缴和对农民的统治，各藩实行“五家连坐”制，每五户编为一组，如有一户滞缴租税或犯罪，其余四家负连

带责任。在封建领主统治下，农民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终生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巩固封建经济，政府还多次下令，禁止自由种植，以防止由于经济作物的栽培导致米产量下降，影响领主的年贡收入。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商品经济发展对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冲击。

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 18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因素慢慢地滋生和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发展。以江户为例，18 世纪中期，江户已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 17 世纪中期江户的人口为 15 万人左右，全国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达 50 多个。

城市的商品经济又影响了农业经济，从 18 世纪初以后，农村的自然经济逐渐地向商品经济过渡。随着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耕作面积的扩大，有的农民除上缴的农产品外，还出现了剩余，于是将剩余产品作为商品出卖。经济作物——桑、棉、菜籽、烟草、甘蔗等开始种植生产，逐渐出现了商品性农业区。如摄津、河内主要生产棉花；上野、常陆等地以养蚕为主；越后、伊势等地成为油菜籽的生产区。自给自足的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

在商业性农业发达地区，农村手工业发展起来，商业资本日益深入农村，手工工场也出现了。当时在日本农村盛行前贷制度。即农村商人以“换棉”、“出机”等方式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换棉商人以原棉供给农民，使之在家纺成纱或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付给工资。出机商人把织机借给农民，让其在家中加工，按成品多少付给工资。实际上这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手工工场。有一些批发商人、富裕的手工业者设立棉纺织工场，招募农家妇女为“机织下女”从事生产，建立以分工为基础的集中的手工工场。明治维新前，在丝织、陶器、酿酒、造纸、采矿、冶金等部门，都先后出现了集中的工场手工业。幕府和各藩为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也陆续兴办了官办的手工工场。据统计，1854 年，全国雇佣 10 人以上的手工工场约 300 所，1867 年已达 400 多所。手工工场的增加，更促进了商品经济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地区经济的专业分工，这就加速了商品交换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但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规模不大，在生产中还不占统治地位。

同欧洲国家相比，日本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水平较低，规模较小。原因在于幕府对手工工场一直采取压制政策。为了维护日益瓦解的封建经济，19 世纪 40 年代后，幕府对手工工场的禁令不断。如 1842—1843 年，幕府多次发布命令，禁止工场主雇佣工人，限制织机数量，勒令进城作工的农民返回农村等等。因此，封建幕藩统治制度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自 19 世纪初，美、英、俄等国便谋求打开日本的大门，和日本建立通商关系，都遭到幕府的拒绝。1842 年，幕府慑于中英战争的后果，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妥协，曾允许外国船只在日本某些港口加煤上水。1854 年，美国决定用武力强迫日本开国，派海军准将柏利率领 10 艘军舰，冲过浦贺，在神奈川河口停泊，迫使幕府签订“日美和好条约”，对美国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日本须供给美国船员食物煤炭，美国可在日本派驻领事，并获得最惠国待遇，从此美

国打开了日本大门。不久，英、俄、荷等国援美国先例，和日本政府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858年6月，美国再次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日本被迫开神奈川（后改为横滨）、长崎、岳库、新泻、函馆五港通商，承认了领事裁判权，降低了关税，规定出口税为5%，美货入口除酒类抽35%外，其余绝大多数只抽5%。7月至9月，俄、荷、英、法等国先后又与日本缔结基本上与日美条约内容相同的条约。

日本开港以后，便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自1860年到1867年，输入增加了13倍，输出增加了2.5倍。由于外国工业品充斥市场，手工工场和手工业者受到严重排挤，破产和失业者比比皆是。西方商人利用日本黄金价格较低的机会，用白银套购黄金，攫取暴利，结果日本黄金大量外流，引起物价暴涨，农民和城市贫民由于生活困苦，起义更加频繁。1859—1867年共发生了96次农民起义，全国各地也爆发了空前未有的市民暴动。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乘日本人民起义所造成的危机，愈加对日本进行侵略。1862年，英、法两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驻兵横滨。1864年，英、法、美、荷4国组成联合舰队占领下关炮台，向幕府勒索300万美元的赔偿。1866年，这4国又强迫幕府修改税率，将主要商品的进口税一律降为值百抽五。西方国家的侵略加剧，使日本民族陷于空前的危机之中。

幕府统治的危机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自然经济解体，日本封建制度出现了危机。

18—19世纪上半期，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崛起，他们是日本资产阶级的的前身。在德川幕府时期出现的受幕府保护和扶植的特权商人，从幕府和大名手里花钱购买了某些商品的专卖权，从而取得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获取丰厚利润，成为大富商。其中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二十四家批发行）和江户的“十组问屋”最为有名。“十组问屋”每年仅向幕府交纳税金达万两以上。在京都、大阪等地还有称为“两替庄”（钱庄）的大高利贷组织，在大阪拥有20万两以上的“两替庄”就有50多家。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名、武士的生活也日益腐化奢侈，使其收入远不够挥霍，因此，不得不向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借债。元禄年间（1688—1703年）就有20多家大名向鸿池屋两替商借款。19世纪中期，大阪商人贷给大名的款额达6000万两黄金，其利息相当300万石大米。大商人、大高利贷经济势力迫使一些诸侯大名拜倒在他们脚下。而大商人们往往又通过经济力量来控制 and 影响藩政，以至形成“藩政疲弊，权落商人”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幕府有时采取打击政策。1789年幕府颁布“捐弃令”，宣布废除1784年以前商人对“旗本”、“御家人”的债权。1843年再次发布“捐弃令”，从而引起大商人大高利贷者不满，在后来的倒幕运动中，一部分大商人站在倒幕派一边。

德川幕府后期，日本各级武士约有40万人，连同家属有180多万。武士本来是依赖于封建制度的，由于幕藩逐渐减少禄米供给，武士的生活日趋贫困。中下级武士对上级武士产生了不满情绪——“恨主如仇”。

为了维持生活，一些下级武士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如医生、教师等，有的从事工商业活动，还有的上升为批发行资本家。这些人在经济利益上同资产阶级日趋一致，成为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在反对封

建幕府的斗争中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也有一部分下级武士过继给豪农、富商当养子，或同富商女儿通婚，转化为工商业者，从而直接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维护封建秩序的儒学受到新的思想流派——兰学的挑战。在德川幕府时代，“程朱理学”被推为官方哲学。程朱理学极力宣扬“上者贵，下者贱”、“上下不违，贵贱不乱”的封建伦理，从思想上对人民进行统治和奴役。1720年，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放宽了“禁书令”后，准许西洋自然科学书籍输入，随之在日本形成“兰学”，到19世纪初，兰学在江户、大阪、京都、长崎等城市的知识界得到传播。“兰学”是指用荷兰文来研究西方科学、文化，包括天文、医学、草木学、兵学。通过学习兰学，一些资产阶级化的武士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政治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思想，并且从新的经济地位出发，对幕府昏聩无能的统治，发出了改革的呼声。由于他们享有政治特权，在思想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方面都优于当时政治上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因此，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下级武士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成为倒幕斗争的领导力量。

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日本社会充满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广大自耕农和佃农受封建主、新兴地主和高利贷者的重重剥削。由于领主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于是他们大肆搜刮农民，提高地租、加重捐税。再加饥荒经常发生，逼得广大农民揭竿而起。据统计，1801—1867年共发生1169次起义，比整个18世纪还要多。这些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参加者达几万至几十万人。起义农民提出收回抵押土地，反对增加租税、杂税和赋役。他们捣毁地主庄园，打杀地主、政府官吏，把压榨农民的地契债务等文书付之一炬。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幕府和大名的封建统治，农民是反幕藩封建统治的主力军。

市民暴动接连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837年大阪发生的由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起义。大盐平八郎（1793—1837年）出身下级武士家庭，他目睹政府腐败和人民的疾苦，决心用武力去推翻恶政。1837年2月19日，他率300余人袭击富商住宅，夺取粮仓，把大米分给贫苦群众。起义发生后，政府急调军队镇压，起义终因寡不抵众而失败。大盐平八郎起义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由下级武士组织贫民进行的反封建压迫斗争。在这次起义的推动下，河内、越后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农民和市民的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幕藩封建统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灭亡。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幕府于天保13年（1841）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但是改革仍围绕着如何加强幕府统治而进行，因此遭到失败。一些藩在幕府改革的同时，也仿效幕府进行改革，均遭失败。而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藩由于实施了一系列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而强盛，经济、军事实力得到加强，成为后来倒幕运动的根据地。

尊王攘夷与倒幕运动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一部分下级武士改革派联合朝廷中的公卿、大臣，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掀起了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及其代理人——幕府的运动。

“尊王攘夷”口号原是由水户藩藩主及其近臣提出来的。这一口号原旨在于维护幕藩体制。自1853年后，随着幕府采取的媚外投降政策，

一些受兰学影响较大的西南各藩大名和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联合起来，他们借用“王政复古”之名，以行改革幕藩体制之实，反对幕府的独裁和卖国，重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进行反幕府的活动。1858年，当幕府奏请天皇批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时，以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和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为首的下级武士聚集京都，联合部分公卿挟持天皇，驳回幕府奏请，主持幕政的大老井伊直弼下令，逮捕倒幕派人士百余人，处死桥本左内、吉田松阴等7人，西乡隆盛流放大岛，史称“安政大狱”。幕府的镇压只能使矛盾更加激化。1860年3月，水户、萨摩藩武士在江户樱田门外刺死井伊直弼，又于1862年2月在坂下门外击伤老中安藤信止。樱田门事件使反幕府的斗争进一步高涨，尊攘派同一部分公卿、豪农、豪商结成反幕府同盟，于1863年初以天皇名义敕令幕府攘夷。

尊攘派原指望萨藩藩主来实现“尊王攘夷”大业，但萨藩藩主进入京都后却为自己夺取“雄藩”地位而奔忙。为了维持封建秩序，他甚至诬蔑尊攘派的活动是“浪人轻率之举”而加以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尊攘派提出抛开大名实行“草莽”横向联合。

1862年，长州藩武士在江户烧毁英国公使馆。同年，萨摩藩武士在横滨附近轰击英、法商船。7月，英国炮轰萨摩藩鹿儿岛，强索巨额赔款。同年，英、法两国又以保护侨民为名，驻兵横滨。在攘夷斗争中，长州、萨摩两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领导者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瑞等人，开始认识到不应该盲目攘夷，而应该开国进取，学习西方以实现富国强兵，适应新的经济关系。为了反对幕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必须推翻幕府的统治，“尊王攘夷”运动也就发展为倒幕运动，尊攘派变成倒幕派，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1863年，长州藩倒幕派首领高杉晋作执掌长州藩政，组建了一支由下级武士，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的奇兵队，积极从事倒幕运动。同年8月18日，幕府发动“八一八”政变，把倒幕派赶出京都。1864年8月，长州藩倒幕派久坂玄瑞率兵攻入京都，在皇宫的哈御门与幕府军展开激战，久坂兵败自杀。史称“禁门之变”。8月24日，在幕府策划下，天皇以追究“禁门之变”为由，下令诸藩征讨长州。9月5日，英、美、荷、法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长州藩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屈服，幕府不战而胜，藩政权为保守派掌握。

1864年8月，幕府联合萨摩藩的保守派，发动第一次对长州的战争。虽然幕府军胜利，但倒幕派的力量并未因此而削弱。1865年，长州倒幕派高杉晋作重新掌政，征募农民和市民入伍，再次组织奇兵队，积极筹划推翻幕府。不久，又与控制萨摩藩政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结成联盟。倒幕派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

1866年6月，幕府发动了第二次对长州战争。但许多大名看到幕府大势已去，都按兵不动。这时幕府直辖地和兵库、大阪等重要城市的农民和市民，又举行暴动，使幕府处于背腹受敌的地位，只得退兵。1867年安艺藩和土佐藩也加入了讨幕联盟，反幕势力更加壮大。10月反幕军开始东进，迫使将军德川庆喜辞职，还政天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岩仓具视等掌握了政权，三井、小野等商家在财政上予以支持。新政府决定彻底剥夺将军的权力，勒令他交还土地。这个决定引起

将军的反抗。

1868年1月3日，倒幕派以天皇名义发布了《王政复古号令》，声称“诸事皆本神武创业之初”，一切权力重归天皇。宣布废除幕府及一切旧的官制，建立由总裁、议定、参与组成的三职制的天皇政府。总裁由炽仁亲王担任，议定由公卿和藩主担任，参与由廷臣、藩士和平民担任。倒幕派中坚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都担任了“参与”。

新政府成立后，大久保利通提议勒令德川庆喜交出“兵马之权”和领地、领民。庆喜及其家臣拒绝，决心发动战争，同新政府决一死战。1866年1月，德川庆喜以“除君侧之奸”为名，亲率幕府军分两路从大阪出发，进军京都。西乡隆盛指挥的新政府军在京都郊外的伏见、鸟羽两地同幕府军展开激战，政府军击败幕府军，德川庆喜败逃回江户。1月31日，天皇政府下令征讨德川庆喜。2月25日，天皇下诏亲征，以炽仁亲王为东征大都督，西乡隆盛为参谋。同时命令各藩大名立即参加讨伐幕府的战争。因时为旧历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

内战开始后，幕府军节节败退。3月，西乡隆盛率领的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在英国公使的调停下，5月3日，德川庆喜献城投降，庆喜投降后，关东和本州北部地区的幕府残余势力仍举兵负隅顽抗，会津等藩还组成了反政府同盟。新政府乘胜进军，于1868年基本上平定了本州全岛。但幕府重臣本武扬率领8艘军舰北上，在北海道建立了“武士共和国”。1869年5月（阴历），经五稜廓一战，本武扬被迫投降。至此，幕府残余的反叛全部被平息，戊辰战争结束。

第二节 明治维新

明治政府的建立 1868年10月23日天皇睦仁将年号改为“明治”。这时明治天皇（1852—1912年）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政府的实权为改革派武士掌握。明治政府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明治初期首先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早在1868年4月，明治天皇就颁布了“五条誓文”，做为施政纲领。6月，发布《政体书》，实行“太政官制”（官是机构名称），规定一切权力归“太政官”，太政官之下设“议政”（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太政官制”采用了日本古代王朝使用的名称，而又模拟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大权掌握在行政官之手，行政官辅佐天皇处理政务，从而完备了天皇亲政体制。“太政官制”后来又进行了若干次修改，明治四年的修改，使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设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及参议总揽政务，下设内务、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工部、文部等省。在国家机构的调整中公卿和藩主逐渐被排除，下级武士改革派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人在政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些人成为维新的骨干，同时也形成了官僚专制的政治格局。

奉还版籍与废藩置县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明治初期推行“奉还版籍”（版，指土地；籍，指户籍）和“废藩置县”措施。下令各藩大名交出土地和对人民的封建领有权，任命大名为藩知事，以原领地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他们的俸禄。1871年7月，明令“废藩置县”，打破藩界，

将全国划分3府（东京、京都、大阪）72县，由中央任命府、县知事统辖。旧藩主迁居东京，仍由国家发俸供养。从而改变了过去由大名控制的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废除封建等级制度 1869—1872年间，明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宣布改变了原来的封建身分制，大名、公卿改称华族，一般武士改称士族，农、工、商和贱民称为平民。华族士族和平民可以通婚。废除士族佩刀制度。华族、士族仍由政府发给俸米，1876年，修改俸禄制度，制定以公债代替俸禄的条例，公债券一次发给领受者，他们之中有的用公债购买土地，成为新兴地主，有的投资工商业，成为资本家。士族每人领受500元公债后，成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城市贫民，少数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至此，封建武士集团宣告瓦解，取消了封建等级制，扩大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但是，封建武士道残余，等级界限并未彻底消除，贱民地位尤为低下。

地税改革 1872年，政府下令废除自1643年颁布的关于土地不得买卖禁令，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种植。同年，对全国土地实行丈量并颁发地照，确认了耕种者的土地所有权。

1873年7月28日，明治政府公布了《地税改革条例》和《地税改革布告》，宣布废除根据土地收获量定税及缴纳实物的旧税制，实行新的地税制。主要内容是：(1)全国各地，不论水旱田，统一按土地法定价格征税，税率为3%，丰歉之年不予增减。(2)新地税皆用货币交纳，由土地所有者承担。(3)土地所有者还要附加缴纳合地价1%的“村费”。1877年1月，由于农民的斗争，地税降至地价的2.5%。1881年地税改革基本完成。土地和地税改革彻底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权，确立了新兴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标志着近代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地税改革以货币地租代替过去的实物地租，这就有可能使地租转化为资本，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又为地主、富商兼并农民土地、产生地主阶级创造了条件。

建立近代军事和警察制度 1871年，明治政府从萨、长、土三藩军队中挑出精良士兵组成近卫军，作为天皇近卫军队。1873年又效法西方军事制度，实行征兵制，着手组织常备军，称“皇军”。日本军队虽然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来，但却继承了封建武士道精神，许多旧武士充当新式军队的军官，在军中强调忠君爱国的封建思想。

为了加强对国内革命力量的镇压，日本仿效欧洲国家建立起近代警察制度。1872年司法省设立了警保寮，统一指挥全国警察。1874年，警保寮归内务省掌管。日本政府还在东京设立了警视厅，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警察网络，警察派出所遍布全国的城市镇乡。

殖产兴业 明治维新的目标是使日本达到“富国强兵”。维新派们认为，要“富国”则必须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工业。所谓“殖产兴业”，就是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动用各种政策手段和国库资金，干预国家经济建设，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

1870年，明治政府成立了工部省。为了考察欧美各国的财政经济制度和工业生产发展状况，1871年底，派出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组成48人的使团赴欧美各国进行访问考察，另有59名留学生随行。1873年9月先后归国，历访美、英法、德等12个国

家。使节团归国后，大久保利通于 1874 年 5 月向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建议书》，主张依靠政府力量，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以推进国家的强盛。

从 1874 年起，为了推进工业发展，明治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如创办官营“模范工厂”引导民间兴办工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聘请外国技术人员等等，这些措施大大地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日本政府还十分重视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19 世纪 70 年代修建东京至横滨铁路，后来又鼓励私人兴建铁路。电报和电话等近代通讯事业在政府的经营下也发展起来。1877 年，日本引进了电话，首先在东京——横滨间使用，以后推向全国。1885 年前后，电报干线基本建成。近代通讯网络逐渐形成。

文明开化 在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19 世纪 70 年代初明治政府在国民中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所谓“文明开化”就是对民众进行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俗方面向西方学习的宣传和教育。在文明开化教育中，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起到了先锋作用，福泽谕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1834—1901 年）出身于低级武士家庭，青年时代热心于兰学。1860—1867 年间曾三次游历欧美诸国，深受西方思想影响。1866 年写了《西洋事情》一书，广泛介绍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此书出版后极为畅销。《西洋事情》一书使日本人大开眼界，耳目为之一新。福泽谕吉说：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使我国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大门。明治时代，福泽谕吉继续进行文明开化的宣传教育，他后来写的《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成为日本进行文明开化教育的教科书。

19 世纪 70—80 年代，学习西洋文明的风潮席卷了整个日本。孟德斯鸠、卢梭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出现了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1873 年，森有礼等人组织成立了学术团体“明六社”（因成立于明治六年，故名），发行《明六杂志》，宣传西方的文化思想。其参加者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给日本人的思想革新以很大影响。

然而，在“文明开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见。一些人认为西洋人的一切，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一切东西都是“文明”，都必须引进，甚至有人提出只要标新立异，便是文明开化。这种“文明论”思想不仅影响了一般民众，甚至在某些政府高级官员中也极为流行，有的人竟提出用英文代替日文，改良日本人种。一些有识之士对这种社会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木户孝允指出，这了防止出现上述弊端，必须兴办近代学校，实行教育改革。

1871 年，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统辖全国教育事业。1872 年，实行新学制，发展欧式教育，重视普及小学教育，日本把接受小学教育、服兵役、纳税定为“国民三大义务”，带有一定的强制性。1873 年，小学就学率为 28%，1902 年，达到 92%。日本也重视师范教育，1872 年，创办东京师范学校，1874 年设立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其他各地相继设立师范学校，解决师资问题。1877 年，创办东京大学，设立法、理、文、医等学部，日本把东京大学作为输入近代科学、培养造就科学技术人员的中心。为了学习欧美科技，用高薪聘请外籍教师，继而派留学生出国，以代替外籍教师。日本向西方学习，收到了成效，大大促进了日本近代

化的发展进程。

明治维新的性质及意义 明治维新是在封建制度趋于解体,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发展起来的条件下发生的。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过程中,从下级武士里分化出一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武士阶层,并形成了一个颇有力量的领导集团。他们与广大的农民、新兴的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了封建幕府的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政权,推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改革后的日本,仍保留了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天皇制的国家形式以及专制主义的统治体制,下层群众以及中小资产阶级并没有取得广泛的民主权利。明治政府虽然取消了封建等级制,但又保留了华族、士族、平民的差别。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武士道精神和封建“忠君”思想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上述的意义来讲,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明治维新不彻底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够成熟,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政治力量。而作为领导革命的下级武士改革派,他们虽然受到西方思想影响,要求变革,但尚未形成进行变革的系统思想和理论。此外,他们毕竟出身于旧的统治阶级,同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必定会影响革命的深入。

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影响。这结束了幕藩封建统治,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明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逐渐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使日本在大约半个世纪里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避免了日本沦为半殖民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国家。随着经济势力的发展,为了夺取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日本逐渐地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三章。

刘祚昌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第十三章。

胡洽坤主编：《简明世界近代史》第十二章。

管仲绪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五章。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

万峰：《日本近代史》。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

复习题：

1. 试述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2. 分析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
3. 试述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
4. 试析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

第十三章 亚洲人民的反封建 反殖民主义斗争

第一节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卡札尔王朝的统治与外国入侵 自 1796 年起，阿加·穆罕默德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卡札尔王朝的统治。在卡札尔王朝时期，伊朗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高级阿訇是王权的主要支柱。他们也是大土地所有者，除负责宗教事务外，还裁判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则由世俗法院审理。在国王之下，有由首相和各部组成的枢密院负责行政。地方设省和州，由总督和州长管辖。这些总督和州长实际上是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封建诸侯。国王与贵族几乎垄断全部土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对封建主保持着封建依附关系。他们被迫将收成的 4/5 上交地主。农民也从事织布、丝织、地毯等手工业。

19 世纪初，伊朗已成为英、俄、法等国的争夺对象。180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用收买和贿赂的手段，诱使伊朗国王缔结条约，准许英人在伊朗购买土地、自由贸易，免交进口税。1804—1813 年第一次伊俄战争后，伊朗被迫将格鲁吉亚等地割给俄国，赋与俄国在伊朗的自由贸易权，定关税为 5%，放弃在里海保有海军的权利。1826—1828 年第二次对俄战争失败后，俄国在伊朗又获得领事裁判权，得到 2000 万卢布的赔款和通商的种种权利。俄国对伊朗的胜利，引起英国的不安。英国为抵制俄国影响，进一步在伊朗扩大市场。1841 年强迫伊朗和它签订条约，得到领事裁判权，也规定英国商品只收 5% 的关税 豁免国内一切捐税，并在大不里士、德黑兰等地设立商业代办处。此后，奥、法、美等国也先后与伊朗缔结类似的不平等条约，伊朗从而沦为半殖民地。

19 世纪中期，伊朗许多地区出现了饥荒和瘟疫，大批人民死亡，幸存者则挣扎在死亡线上。人民生活的恶化加强了伊朗的阶级矛盾。下级阿訇、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不满封建地主的压榨，痛恨外国侵略者的猖狂掠夺，正是这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引发了 1848—1852 年反对封建压迫和殖民侵略的巴布教徒起义。

巴布教徒起义 巴布教是伊斯兰教中的异端。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其创始人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他 1820 年出生于一个小布商的家庭，1844 年自称为“巴布”，巴布之意为“门”，意即救世主的旨意，通过此门传达于人民，而他自己就是真主与人民之间的信徒。1847 年他写成《默示录》，后来成为巴布教的主要经典。巴布认为人类社会是以后的时代胜过以前的时代。各个时代有自己的制度和法律。随着时代的更替，旧制度和旧法律必须让位于新制度和法律。新制度和法律由真主遣派的先知制定。巴布宣称自己就是先知，他是穆罕默德的代替者。《古兰经》也应让位于《默示录》。巴布教的教义，与正统的什叶派教义相悖违，因此使巴布教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巴布主张把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家的财产，按巴布教徒原来财产的多寡分配给巴布教徒，他又提出废除刑法和苛捐杂税，保护私有财产，政府规定借贷利息、保护人身自由、改良邮政、统一货币等要求。巴布

的学说受到广泛的拥护。巴布原想对宫廷、大臣和地方长官宣传自己的学说，劝说他们接受实行，但政府 1847 年把他逮捕入狱，并开始镇压巴布教。

巴布教受到统治阶级的迫害后，便将主要的宣传目标转向广大人民群众，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推翻伊朗封建统治，建立新王国，摧毁私有制、没收并均分封建贵族和一切权贵的财产，废除苛捐杂税和劳役，实现男女平权。由于以上的主张反映了劳苦大众的愿望，巴布教迅速壮大起来。1848 年 9 月，巴布教徒乘伊朗出现王位之争，各州一片混乱之机，首先在马赞德兰省起义，平分财产，实行共餐制。王室屡次派兵镇压，均未得逞。政府最后使用欺骗手段，使起义者放下武器，但又背信弃约大加杀害。

王室的血腥屠杀并没有使巴布教徒的斗争停止。1850 年 5 月巴布教徒又在津章城发动起义。起义者英勇抗击王军的进攻，歼灭敌军 8000 人。7 月，国王为了报复，下令处决巴布。但巴布教徒继续奋战，1850 年 12 月才被残酷镇压下去。与津章城起义的同时，巴布教徒在西南部的尼里兹也举行了起义。在狱中的巴布设法与义军取得联系，号召教徒不要为其生死担忧，要为建立“正义王国”而斗争。事泄，伊朗国王下令将巴布处死于大不里士。起义者一直坚持战斗到 1851 年。后转入山中进行游击战。1852 年 8 月，巴布教徒在德黑兰谋杀国王未遂。伊朗国王以此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捕杀巴布教徒，使巴布教元气大伤，起义最终失败。

巴布教徒起义是伊朗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大规模的反封建斗争。起义的主要参加者是下层劳动人民，但领导权则控制在商人和阿訇的手中。由于领导者始终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和口号，因此未能广泛发动农民参加；各地起义者彼此间缺乏联系，各自为战，为王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起义者还往往轻信封建主的虚假谎言，自动放下武器，结果惨遭镇压。

巴布教徒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卡扎尔王朝的封建统治，使统治者在起义后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宽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矛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次起义在客观上也打击了外国殖民统治者，使这次起义同时又具有反抗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从而对亚洲其它国家人民的反封建、反殖民压迫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 19 世纪中叶亚洲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

英国对印度的侵略和掠夺 自 17 世纪末起，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由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起义和民族斗争不断发生，地方割据严重，逐渐分崩离析，迅速走向衰落，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葡萄牙、荷兰殖民者纷纷染指印度，继之法国和英国也卷入其中。角逐中，英国最终取得了对印度的控制权。自 18 世纪的后半期起，英国便开始对印度进行鲸吞蚕食。到 19 世纪的中期，英国经过一系列侵略战争，控制了全印土地的 2/3，人口的 3/4。其余的地区处于大约 500 个大小邦王公的统治之下。所有的王公都直接或间接受制于英国。英国实际

上统治了整个印度。

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印度的主要工具。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实行野蛮的税收掠夺。它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制度。1753年，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即英国没收了这些地区的封建主和公社的土地以后，把土地交给包税人柴明达尔。包税人向东印度公司交纳相当于1790年实际税额9/10的定额土地税。在孟买和马德拉斯的大部地区，土地私有制根深蒂固，英国殖民者于1820年实行“莱脱瓦尔制”，即农民租佃制。殖民者也承认这里封建主的土地所有权，确认在这些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为佃农。农民必须向殖民当局缴纳相当全年收成1/3到1/2的土地税。在印度中部的许多地区，英国殖民者实行“不固定柴明达尔制”。这个制度与固定柴明达尔制的不同，首先在于税额每隔25年到30年更换一次，亦即调整一次东印度公司和柴明达尔所占的剥削比例；其次，不固定的柴明达尔由中小封建主充任，而不是另外委任的包税人。

英国在加强税收的同时，还加紧使印度成为英国商品销售市场。从1814年到1835年，英国输出到印度的棉织品从不足100万码增加到5100万码以上。从1818年到1836年，英国对印度输出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19世纪中叶，印度已经成为英国工业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英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从印度掠夺了大量原料和粮食。1833—1848年间，印度输英的原棉额从3200万磅增至8800万磅，羊毛的输出额从3700磅增至370万磅，大米和小麦等谷物的输出量也大大增加。

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殖民掠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农民在他们的榨取下，失去了维修印度农业不可少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力量，结果造成饥馑不断、居民大批死亡。英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沉重地打击了印度的手工业，印度的手工业者由于英国工业品的竞争，纷纷破产。一向非常繁荣的纺织中心如达卡、苏拉特和穆希达巴德，都衰落下去，致使饿殍遍及印度平原。

印度民族起义的背景和酝酿 殖民者为了侵占更多的土地，广开财源，曾经推行兼并政策，攫取各邦的土地。殖民当局发布命令。规定没有直系后嗣的王公死后，其领地即归东印度公司。当时的总督戴贺胥用这种手段先后并吞萨塔拉、那格浦尔以及詹西等十多个邦，还剥夺了马拉特王公所继承的领取年金80万卢比的权利。英国的蛮横掠夺激起许多邦王公的愤恨。

起义前夕，英印军队约有24万人。其中的印度士兵20万人，受着4万英国军官的严密控制。印度士兵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多数属于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也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英国侵略印度的初期，殖民当局为了利用印度士兵征服印度，对他们给予比较优厚的薪饷，还让家属享受某些特权。但1849年吞并旁遮普后，殖民当局便减少薪饷，取消特权，英国军官对印度官兵更加蛮横无理。这一切更造成印度士兵的不满，使印度士兵成为“印度人民过去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

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情绪，笼罩着整个印度。社会各阶级都在秘

密酝酿反英起义。从 1856 年起，在乡村开始传递烤薄饼，作为举行反英起义的信号。印度教婆罗门和伊斯兰教学者在各地进行反英宣传，敖德、德里、米鲁特、巴特那和加尔各答等地出现了反英的秘密组织。在印度士兵中间，组成军官委员会，传递荷花，作为起义的信号。各部队的印兵在节日互相邀请，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在夜间秘密集会，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涂油子弹问题成为民族起义的导火线。1857 年初，殖民当局发下的子弹涂有牛油和猪油，士兵使用时必须用牙咬破包装纸。这无异蓄意要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士兵都触犯各自宗教的禁忌。士兵对于殖民者这样的恶毒用心极为愤恨。1857 年 3 月 29 日，第 34 步兵团士兵曼加尔·潘迪，怀着对殖民者的满腔怒火，开枪打死 3 个英国军官，被处绞刑。这个事件加速了民族起义的爆发。

起义的过程 这次大规模的起义是在德里附近的米鲁特开始的。1857 年 5 月 10 日晚，这个城的第三骑兵连首先起义。印度警察和人民立即参加，第二天起义者攻入德里，拥立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为印度皇帝，并成立行政会议，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起义立即迅速发展起来，仅月余之间，就有 40 处士兵起义。声势所及，将近全国的一半地区。

起义爆发后，英国殖民者惊慌失措，连忙从各地抽调援军，首先攻打起义的主要中心德里。1857 年 6、7、8 月中，起义军屡战屡胜，英军节节败退。但起义军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即缺乏统一指挥，内讧相继，封建贵族阴谋投敌。英国殖民者利用起义军的内部矛盾，挑拨离间，使其力量分裂。9 月中旬，英军发动猛烈攻势，攻下德里城。以巴哈杜尔·沙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向侵略者屈膝投降。英军大肆奸淫掠夺，犯下滔天罪行。

德里陷落后，起义的中心转移到敖德首府勒克瑙，1858 年 3 月，英军集中 9 万装备精良的兵力，向勒克瑙发动攻势。由于掌握起义军领导权的王公的内讧，英军在兵力和装备上又占优势，勒克瑙终于陷落。3 月末，英军开始进攻印度中部的起义中心詹西。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亲自指挥詹西军民同英军激战 8 天，不得已退守瓜辽尔，6 月 18 日，她在与英军决战中壮烈牺牲。从此，起义军由于实力严重削弱，放弃阵地战，转入游击战。当时起义军还有 15 万人左右，人地两熟，给养供应方便，可以灵活作战。起义军应利用以上的有利条件，及时袭击敌人。但起义军由于领导人的内部纷争，没有发挥自己的特长，争取胜利。而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加强军事镇压，另一方面拉拢印度王公和他们订立同盟，共同镇压起义。到 1859 年底，反英战争完全结束。

1857—1859 年的印度起义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掌握领导权的封建贵族的叛变投敌。起义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没有提出明确的反殖民统治和反封建相结合的纲领，也未能制止封建贵族的背叛活动。另外，印度长期的封建割据、错综复杂的种族、种姓、宗教等矛盾，阻碍着起义者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而英军利用分化瓦解手段，最后把各地起义各个击败。起义虽然失败，但它严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加强了印度人民反英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第三节 爪哇人民的起义

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掠夺 荷兰殖民者从 16 世纪末开始侵入印度尼西亚。1602 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在印尼实行殖民统治。东印度公司在所侵占的各岛上，让原来的封建主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行使行政和司法职能，仍然保留着旧有的统治权。东印度公司对印尼人民的掠夺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征收赋税：在公司直接统治的地区，实行实物定额税制，即强迫农民将收获物的 1/5 缴给公司。在公司间接统治的地区，推行强迫供应制，即公司以极低价格，强制收购一定量的某种产品。此外，还征收市税、酒税、人头税等苛捐杂税。（二）控制生产和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印尼的主要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如它为了榨取巨额利润，对于香料、咖啡的种植和出口都有限制，公司以低价强迫购买，再以高价在欧洲出售，严禁印尼人自由买卖。（三）贩卖奴隶：东印度公司经常把战争俘虏和地方封建主所出售的农民卖为奴隶，以攫取高额利润。

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掠夺，严重地破坏了印尼的经济，激起印尼人民的反抗，使其难以维持下去。此外，公司以外的资产阶级还要求取消公司的垄断权，以便直接参与对印度尼西亚的掠夺。因之，1800 年，东印度公司被迫解散，荷兰政府对印尼进行直接统治。

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军于 1811 年占领印度尼西亚。英国宣布印尼所有土地归英国政府所有，废除垄断贸易和国内关卡，鼓励发展私人企业，于是英、美等国资本家大量向印尼投资。1816 年按英荷条约，印尼又归还荷兰以后，荷兰恢复了垄断制度，极力排挤外国势力，实行保护关税，禁止他国种植园主承租土地。为了保证荷兰的优越地位，荷兰于 1824 年又组织了尼德兰贸易公司，进一步实行垄断贸易。荷兰不但恢复了过去的赋税制度，而且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捐税，如门户税、庭院税、牲畜税、过桥税等。荷兰殖民者的残酷榨取激起各阶级的不满，终于酿成爪哇人民大起义。

1825—1830 年的爪哇人民的起义 日惹苏丹的王子蒂博尼哥罗（1785—1855 年）是这次起义的领袖。他曾团结不少殖民统治的反对者，策划驱走荷兰人，建立一个伊斯兰王国。荷兰殖民者发觉他的密谋以后，1825 年 7 月围攻他的住宅，企图置他于死地。蒂博尼哥罗于是以圣战为号召，发动起义。成千上万的爪哇农民投到他的旗帜下，组成强大的起义军。有的封建地主也积极响应，参加了起义。起义军以燎原之势席卷爪哇大部分地区。10 月，蒂博尼哥罗建立了伊斯兰王国。起义军采取游击战术，袭击敌人，荷兰军伤亡甚重。1826 年末，起义军的领导层中发生内讧。蒂博尼哥罗和阿訇奇阿依·摩佐因争夺宗教的领导权发生矛盾。荷兰殖民军趁机挑拨离间，奇阿依·摩佐竟背叛投敌，因而起义军受到削弱。1828 年 3 月，起义军在爪哇北部失败以后，开始走向衰落。1830 年 3 月，蒂博尼哥罗不得已同荷军举行停战谈判。但荷方背信弃义，将他扣留，终身幽禁于苏拉威西。爪哇人民的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

坚持 5 年的爪哇起义，歼灭了 15000 多名荷兰殖民军，惩治了许多人民痛恨的殖民者，耗费了 2000 万盾军费。荷兰血腥镇压爪哇人民起义

后，变本加厉地剥削印度尼西亚人民。从 1830 年起，荷兰殖民当局推行“强迫种植制度”，即强迫印尼人民以 1/3 到 2/3 的土地种植欧洲所需要的甘蔗、咖啡、蓝靛、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殖民者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出售。到 1870 年，荷兰殖民者利用这个制度搜刮了约 8 亿盾。荷兰的疯狂掠夺造成印尼连年饥荒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四章。

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第十四章。

雷斯涅尔等：《东方各国近代史》第一卷。

管敬绪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八章。

复习题：

1. 试述伊朗巴布教起义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2. 试析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第十四章 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第一节 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创立的历史条件 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184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转移到英国，马克思侨居伦敦，恩格斯回到曼彻斯特。在这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里，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表现出悲观失望情绪，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坚信革命高潮必将来临。

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个科学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1857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危机首先从美国开始，很快就波及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引起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

在英国，1859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规模浩大的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一年以上，最后终于取得胜利。工人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工会运动的发展，英国原有的许多小工会开始合并为较大的工会。1860年成立的伦敦工联委员会，成为英国工会运动的领导中心。

在法国，从60年代开始，工人运动又恢复起来。一些大城市先后建立了工人互助会或工人联合会。德国工人群众经过不懈的斗争，得到了成立工人组织的权利。1863年，在莱比锡召开了全国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美国的工人运动也日益高涨。1857年，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南北战争时期，工人群众积极支持北方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战争。1863年，美国建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60年代，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开展了有组织的活动和斗争。

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加强国际团结的必要性。60年代，英国工人反对本国政府干涉美国内战的斗争和各国工人支援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都增强了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支援和联合行动的愿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日益被千百万工人群众所接受。1862年，法国工人代表乘到伦敦参加世界博览会的机会，同英国工人商谈了加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的问题。这不仅是英、法两国工人的共同愿望，而且也是欧美各国工人的普遍要求，从而为国际工人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了重大发展，接着又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着重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是马克思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点。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又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同1848年革命的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法国布朗基派的领袖、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导人和优秀的工会工作者，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他们进行帮助，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和推动

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艰苦的理论研究工作和革命实践活动，在理想上和组织上为第一国际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因此，可以说，第一国际的建立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马克思、恩格斯努力奋斗的结果。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国际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1863年6月，波兰爆发了反对沙皇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直接促成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建立。

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和沙皇俄国的血腥屠杀，引起了欧洲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强烈反响。英国工人为了抗议沙皇镇压波兰起义，声援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于1863年7月22日，在伦敦举行了群众大会，法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通过会议，两国的工人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会后，英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发出了呼吁书，要求两国工人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并建议召开各国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1864年9月28日，为了讨论支持波兰人民的问题，英、法、德、意和波兰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马克思以德国工人代表的身份应邀出席。会上，一致同意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当时简称国际（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才称为第一国际）。大会选出国际的领导机构——临时中央委员会（后改称总委员会），马克思作为德国代表被选入总委员会，担任德国通讯书记。

第一国际成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为此，1864年10月5日，总委员会成立一个由9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成员中除马克思外，还有英国工联主义者、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和意大利马志尼主义者的代表。在起草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和章程时，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起草委员会对几个草案争论不休。最后，起草委员会决定交马克思修改。

马克思充分考虑到当时欧洲和美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工人还未能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实际情况，因而在起草《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两个文件过程中，一方面坚持了革命原则；另一方面，又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阐明了第一国际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是第一国际的两个纲领性文件。

《成立宣言》以大量的材料和通俗的语言说明：资本主义的“繁荣”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只会使有产阶级更加富有；生产技术和交通工具的改进，都不能消除劳动人民的贫困，这就再次表述了《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阐明的重要原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根本对立，以及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导致它的灭亡。《成立宣言》庄严地宣布：“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再次提出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伟大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同章程》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任务和组织原则，强调工人阶级的伟大目标是达到本阶级的彻底解放。要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就要加强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亲密联合，就要进行斗争。它规定：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是大会闭幕期间“国际”的权力机关和执行机构。这就体现了“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于11月1日被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并决定立即公布《成立宣言》，把《共同章程》提交第一次

代表大会讨论批准。这表明第一国际从成立时起，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已经是国际的指导思想。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国工人阶级都把协会作为自己活动的指导中心，并先后在本国成立第一国际的支部。

国际活动的开始 各国组织的发展和巩固 第一国际成立后，总委员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各国成立支部，并引导各国工人开展经济和政治斗争。

在英国，“国际”总委员会依靠伦敦工联发展“国际”的组织，逐渐吸收了某些工会参加“国际”，到1865年英国已有19000个“国际”会员。在法国，托伦等人于1865年成立了巴黎支部，到年末，法国支部约有500人。由于普鲁士反动政府禁止德国人参加外国团体，但经过“共产主义者同盟”老盟员的努力，在日内瓦建立了德国支部。此外，“国际”先后在比利时、西班牙和美国建立了支部。到1866年9月，“国际”在各国已经建立了20多个支部。

“国际”在努力发展自己组织的同时，还积极支持欧洲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1866年，巴黎的铜业工人，伦敦的缝纫工人和编筐工人、日内瓦的建筑工人、比利时的沙勒鲁阿煤矿工人先后举行罢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采取了各种措施发动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使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马克思非常注意把工人阶级的斗争从单纯的经济斗争引上政治斗争的轨道。“国际”成立后，总委员会立即在伦敦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声援美国人民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斗争和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纪念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这些活动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也扩大了“国际”在欧美无产阶级中间的影响。1865—1867年间，英国人民重新掀起改革选举制度的斗争。在马克思的建议下，总委员会成立了“选举制度改革同盟”，并且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结果不仅促使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投入政治斗争，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在英国工人中的威信。

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第一国际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与反对国际内部各种机会主义流派分不开的。1870年以前，国际曾经进行了反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1865年9月25—28日，第一国际在英国伦敦召开了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蒲鲁东主义者建议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实际上是企图把马克思、恩格斯排斥于“国际”之外。他们还反对会议讨论马克思提出的支援波兰问题，主张无产阶级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会议否决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建议，通过了必须恢复波兰独立的决议，并且肯定了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活动的必要性。

1866年9月3—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0人，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批准《共同章程》，并制定“国际”的行动纲领。马克思当时正忙于《资本论》的写作，因而未能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受总委员会的委托马克思特地起草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他根据《共同章程》的基本思想，为“国际”制定了一条共同的行动纲领。

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派了一个由 17 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他们提出了违反《共同章程》基本思想的《备忘录》，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反对罢工，反对组织工会，反对 8 小时工作制。日内瓦代表大会否决了蒲鲁东主义的主张，讨论和批准了《共同章程》，并根据马克思起草的《指示》精神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如工人必须参加政治斗争；工会应该成为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有力工具；指出生产合作社是改造社会的手段之一，但它本身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大会还强调各国工人阶级应当在罢工中相互支援，把各国工人分散的斗争联合起来。此外，大会号召为实现 8 小时工作日而斗争，要求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权利等等。这些决议表明，大会肯定了马克思为“国际”制定的行动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一次很大的胜利。

1867 年 9 月 2—8 日，“国际”在瑞士洛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 71 名代表，其中蒲鲁东主义者占多数。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把日内瓦代表大会已经讨论过的问题重新提出，企图推翻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但是，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大会虽然在某些次要问题上作出了有利于蒲鲁东主义的决定，如关于建立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的人民银行的决议。但是在讨论关于政治斗争问题时，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在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交通邮电事业的国有化，蒲鲁东主义者则主张土地私有制。经过争论，双方相持不下，于是大会决定把这个问题留交下次大会讨论。

1868 年 9 月 6—13 日，“国际”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共 99 人，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第一次参加了国际大会。

布鲁塞尔大会对已经迫在眉睫的普法战争进行了讨论，并且通过决议，号召各国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反对战争。大会讨论的最主要问题是关于所有制问题。以法国代表昂利·路易·托伦（1828—1897 年）为首的蒲鲁东主义者顽固地坚持土地私有，但是大会不顾蒲鲁东主义的激烈反对，按着马克思在总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决议。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对主要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鉴于马克思主义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鉴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于 1867 年出版，大会通过了专门决议，祝贺并感谢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并号召各国工人学习这部伟大的著作。

从 1864 年“国际”成立到 1868 年布鲁塞尔大会，为第一国际活动的前期。在这 4 年期间，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性质和任务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对待民族独立运动的态度问题以及所有制等问题上展开了斗争。结果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不断扩大，蒲鲁东主义的影响逐渐缩小，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胜利结束，标志着蒲鲁东主义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反对英国工联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同时，对工联主义也开展了斗争。

工联是英国熟练工人组成的工人联合会，是少数上层工人的经济互

助团体。工联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是英国工人联合会的领导集团推行的改良主义方针政策的总称。由于英国的职工会是“国际”初期的主要群众基础，工联领导集团中许多人是第一国际的发起人，因而反对工联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时期里占有很突出的地位。斗争主要围绕下述问题进行的。

关于工人运动的道路问题。英国工联主义者反对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而罢工，提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的反动结论。他们还认为改善工人处境的根本手段，是工人代表同企业主或政府进行谈判。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总委员会上作了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中批判了英国工联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工人组织工会和为提高工资开展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也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应当夸大经济斗争的作用，因为从根本上说，这“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痛根”。

关于选举改革问题。英国工联主义者不坚持实行普选的主张，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实现普选权的要求，决定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成立暂时的联盟，参加当时的选举改革运动。但是，由于英国工联领导人和资产阶级一起同政府谈判，双方妥协，结果使轰轰烈烈的选举改革运动半途而废。

关于爱尔兰问题。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867年斗争又进入新的高潮。工联领导人竭力拥护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反对爱尔兰脱离英国而独立。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反动政策，抨击了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号召英国工人阶级积极支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一国际内部同工联主义的斗争形成对工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国际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开始 第一国际内部在战胜蒲鲁东主义之后，又出现了巴枯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一国际后期（1869年以后），同巴枯宁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年）出生在俄国贵族地主家庭。1849年曾参加德意志革命，后被捕引渡回国。在被拘禁和流放西伯利亚期间，曾多次写信给沙皇，表示忏悔，背叛了革命事业。1861年逃往英国，1864年混入第一国际。到60年代后半期，巴枯宁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错误思想体系。

巴枯宁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巴枯宁认为，社会主要灾难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于国家，因此他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巴枯宁认为依靠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的自发暴动就可以实现“社会清算”，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他扬言“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反对集中，反对任何纪律和权威。1867年，巴枯宁到了瑞士，第二年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国际团体，并且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申请以独立的工人组织的名义加入“国际”，国际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拒绝它加入。但是，巴枯宁采用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表面上宣布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解散而加入国际，同时暗中将它保留下来，使它成为

反对总委员会的工具。从此，在“国际”内部，就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

1869年9月6—11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共有9个国家的78名代表，这次大会围绕继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马克思认为，要消灭私有制，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巴枯宁认为，财产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只要废除继承权，自然就会消灭私有制。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深刻批判了巴枯宁主义的反动实质，使巴枯宁企图篡夺“国际”领导权和强迫巴塞尔大会接受其反动纲领的阴谋未能得逞。

巴塞尔大会以后，巴枯宁分子纠集工联主义分子和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恶毒攻击和咒骂马克思和总委员会。为了回击巴枯宁分子的挑衅，1870年1月1日，马克思为“国际”总委员会起草了《致日内瓦瑞士罗曼语联合委员会》的通告信，3月28日又起草了《机密通知》，向各国支部揭露了巴枯宁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并把他们对总委员会的种种诽谤逐步进行了驳斥，马克思在《机密通知》的结尾满怀信心地指出：巴枯宁“这个极端阴谋家的手法，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很快就要完蛋了”。

当时国际总委员会准备展开一场反对巴枯宁主义的大规模斗争。但不久普法战争爆发，法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国际”的主要注意力转到这些紧迫的问题上。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只得暂缓进行。

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分子为夺取国际领导权，竟暗地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恢复起来，与国际对抗。为了打击巴枯宁集团，1871年9月17—23日，总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秘密代表会议，通过了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决议，这对巴枯宁主义者是个有力的打击。

但是，巴枯宁派不甘心失败，他们在瑞士桑维耳耶举行代表大会，攻击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反对伦敦会议的决议。从彻底击败巴枯宁分子出发，第一国际于1872年9月2日在海牙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首先肯定了伦敦会议关于无产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并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决定正式列入“国际”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大量确凿材料证明，巴枯宁集团自加入国际以来就制造分裂。大会决议把巴枯宁及其同伙开除出国际。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国际加强迫害，使之在欧洲活动极为困难，大会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往美国费城。

第一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意义 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第一国际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总委员会考虑到以后的工人运动应当通过在各国内国建立政党的道路进行。“国际”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此，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城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告“国际”解散。

第一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领导下，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原则教育和团结了欧美无产阶级，在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中，制订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树立了维护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伟大范例，并在组织上为无产阶级政党创立了民主

集中制的原则。第一国际培养出许多优秀干部，他们以后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者和组织者。第一国际通过革命实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所以，第一国际的历史功绩是不朽的。

第二节 巴黎公社

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最初是由拿破仑三世挑起的。19世纪60年代之末，法国第二帝国处于严重的危机境地。拿破仑三世的反动军事统治，激起人民的普遍不满，他的疯狂向外侵略，也引起各阶级的反对。拿破仑三世为了摆脱困境，企图发动对普鲁士战争，以转移人民的视线，缓解国内的矛盾。另外，他还策划通过战争掠夺莱茵河左岸德意志的领土，阻止德意志的统一，以扩大法国的影响，取得在欧洲的支配地位。

在普鲁士方面，进行自上而下的统一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它已经通过1864年的对丹麦战争和1866年的对奥地利战争，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把美因河以北的诸邦统一起来，只有西南部的4邦还在联邦之外。俾斯麦为了完成统一，必须与法国一战，消除统一的阻力。另一方面，他还指望战败法国，夺得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所以普法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普法战争的导火线，是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1868年西班牙革命推翻了女王伊莎白拉的统治，俾斯麦企图让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堂兄利奥波德继承王位，以便控制西班牙，置法国于背腹受敌的境地。对此，拿破仑三世极为惊恐，提出抗议。几经交涉均未达成协议，终于法国在1870年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

普法战争爆发后，法、德无产阶级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7月23日，马克思为国际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指出：拿破仑三世企图用对外战争来延长他的反动统治，因而在法国方面是侵略性的战争，而在普鲁士方面是防御性的。马克思号召法国工人起来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同时告诫德国工人防止这场战争失去防御性质，变成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宣言》进而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加强团结，根绝一切战争。

战争开始不久，拿破仑三世反动统治的腐朽和虚弱就暴露无遗。法军屡次败北，主力被分割为两部分：巴赞元帅统率的法军被围困在麦次要塞；拿破仑三世和马里·麦克马洪元帅（1808—1893年）指挥的部队逃到色当要塞。9月1日，色当一战，法军惨败。拿破仑三世率领86000名法国官兵投降，成了普军的俘虏。

9月4日革命 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以后，群情激愤。人民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7月4日，巴黎工人，市民和国民自卫军涌进波旁宫立法团会议厅，宣布推翻了帝制，恢复了共和。当天，立法团的一小撮保皇分子和共和派组成临时政府。保皇党人特罗胥（1815—1896年）成为这个政府的首脑。临时政府为了骗取人民的信任，自称为“国防政府”。实际上，它时刻准备着向普鲁士投降。

9月4日巴黎革命以后，普军继续向法军进攻。国际总委员会针对普法战争的新形势，又发表了由马克思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

言。指出：色当投降和 9 月 4 日的巴黎革命改变了普法战争的性质，普鲁士由防御战争变为侵略战争；法国从侵略战争变成反侵略战争，德国工人阶级应该制止侵略战争，使法国得到光荣的和平；另一方面，又指出法国工人阶级在反对普鲁士侵略的同时，不要对“国防政府”抱有任何幻想，应利用一切机会，加强自己阶级的组织，建立自己的政党，以便为将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作准备。

由于“国防政府”实行不抵抗投降政策，普军长驱直入，不久便侵占了法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从 9 月 19 日起包围了巴黎。对于普鲁士的侵略，法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拿起武器，奔赴战场。9 月底，巴黎成立了 194 个新营国民自卫军，其中主要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成为当时捍卫巴黎的主要力量。

“国防政府”不仅向敌人投降，而且还玩弄借刀杀人的诡计，派遣国民自卫军进行无准备的出击。它的卖国阴谋激起人民的愤怒，巴黎人民先后于 1870 年 10 月 31 日和 1871 年 1 月 22 日两次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

“国防政府”为了借助俾斯麦的帮助共同镇压人民的革命行动，1871 年 1 月 28 日，同普鲁士签订了临时停战协定；条件是：法国解除正规军武装，交付 2 亿法郎赔款，并限期召开国民议会，批准普鲁士提出的“和约草案”。2 月 21 日，国民会议在波尔多召开，推出工人阶级的死敌、卖国贼路易斯·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 年）为政府首脑。他上台后便加快了卖国投降的步伐，26 日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规定：法国赔款 50 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大部分洛林与普鲁士。

梯也尔完成卖国勾当之后，便着手对付巴黎人民。他取消了国民自卫军的微薄薪饷，拒绝了巴黎人民延期交纳房租的合理要求，下令封闭革命报刊，将国民议会从波尔多迁到凡尔赛，以便向巴黎进攻。

巴黎无产阶级在反革命进攻面前，毫不畏惧，决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871 年 3 月 15 日，国民自卫军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号召军民加强团结，为建立“民主社会共和国”而斗争。这个委员会掌握巴黎无产阶级的军事和政治领导权，既是国民自卫军的战斗指挥部，又是巴黎革命人民的政权机构，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3 月 18 日革命 蒙马特尔事件引起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1871 年 3 月 18 日凌晨，梯也尔派军队去偷袭国民自卫军的主要停炮场蒙马特尔高地。当反动军打死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要拖走大炮时，受到革命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的包围。他们齐声劝说凡尔赛士兵不要为卖国贼服务。这些士兵在群众的感召下，倒戈起义，并枪毙了两名反动军官，3 月 18 日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战斗的号角吹响以后，国民自卫军带领巴黎人民奋起战斗，一鼓作气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及其他政府机关。曾来巴黎督战的梯也尔和一些高官显贵，都逃出巴黎，龟缩在凡尔赛宫里。晚上 10 点钟，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随即迁入，红旗飘扬在巴黎上空，3 月 18 日革命胜利了。

但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由于没有执行正确作战方针，未曾立即关闭城门，占领敌军所放弃的炮台，致使梯也尔仅有的一个师逃出巴黎。中央委员会还认为应首先进行公社选举，放过了进攻凡尔赛的最好

时机，马克思认为这是它“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

3月26日，巴黎举行公社选举。广大的工人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积极参加选举。当选的公社委员会共86人，其中资产阶级控制的选区所选出的21人不久退出，当选的布朗基被关在狱里，所以实际上公社委员只有64人。公社委员按其政治派别来说，约有三分之二属于“多数派”，其余属于“少数派”。

“多数派”主要是布朗基主义者，还有新雅各宾派成员。“少数派”的核心是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把革命看成是少数人的密谋活动，漠视社会经济改革工作，主张实行革命专政。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居于领导地位。其中重要人物为艾米尔·维克多·杜瓦尔（1841—1871年）。新雅各宾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力图保存小私有制，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专政机构。这一派的优秀人物是德雷克吕兹（1809—1871年）。“少数派”主要负责经济工作，他们中的右翼坚持蒲鲁东主义旧的传统，左翼摆脱了蒲鲁东主义一些影响，但仍然受着蒲鲁东主义的束缚。欧仁·瓦尔兰（1839—1871年）就属于这个派别。

公社的革命措施 巴黎公社摧毁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它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公布和实施了大量政治、军事、经济和文教方面的革命措施。

公社首先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取缔了反动警察，打碎了司法机构和审判制度，建立了新的民事法庭和审判制度，改造了监狱。

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摒弃了三权分立的政权形式，而由立法、行政统一的公社行使权力。公社委员会是由普选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下设执行、军事、公安、司法、财政、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联络、教育、社会服务等10个委员会。公社委员兼任各委员会委员。

为了防止国家工作人员由“人民公仆”变成为“人民老爷”，公社采取了两项措施：公社的公职人员由普选选出，可以随时撤换；取消高薪制，国家公职人员的最高年薪不得超过6000法郎，即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

在社会经济方面，公社采取了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措施：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交给工人合作社管理；取消面包房工人夜班制；禁止当铺拍卖过期的典当物品，所有当来的20法郎以下的物品，一律无条件地退还原主；废除对工人的罚款和克扣工资；成立救济贫民的专门机构；设立劳动就业登记处；把逃亡资本家的住宅分给无住房的工人。以上规定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

在文化教育方面，公社也采取了一些革命性的措施：实行政教分离，没收教会所有的财产；把教士和修女一律驱出学校；实行义务国民教育，兴办职业学校，实行男女教师同工同酬。这一系列的文教措施，都是公社的伟大创举。

巴黎公社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热烈欢迎外国革命者参加自己的战斗行列。许多匈牙利人、波兰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和俄国人等都参加了公社活动。其中如匈牙利工人弗兰克尔当选为

公社委员，波兰的杰出革命家杜布罗斯基、符列勃夫斯基为防卫巴黎的司令员。公社明确表示反对侵略战争，毅然拆毁了拿破仑一世纪纪念战争的胜多姆广场上的“凯旋柱”。

巴黎公社采取以上正确措施显示出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

英勇的保卫战 巴黎公社既然是无产阶级政权，必然受到国内外反动派的反对。自公社诞生之日起，梯也尔、沙皇亚历山大、俾斯麦等就企图把它扼杀于摇篮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

梯也尔逃到凡尔赛后，竭力拼凑反革命武装，准备进攻巴黎。从4月2日起，凡尔赛军便从巴黎西面发动进攻。公社军分三路抗击，打退敌人，但是公社方面损失惨重。此后，战斗一直在西南城郊进行。5月10日，凡尔赛和德国正式签订和约后，德国不仅释放了10万名法国俘虏，以加强凡尔赛的军事力量，而且还允许反动军经过德军防线，从北面进攻巴黎。5月中旬，凡尔赛军对巴黎发动了总进攻。5月21日，凡尔赛军在奸细指点下，从巴黎城西南方的圣克卢门，闯进了巴黎，一场可歌可泣的保卫巴黎的战斗开始了。

为了保卫公社，巴黎工人和广大群众拿起武器，很快筑起500多个街垒。但由于众寡不敌，5月22日，进入市区的敌军已达10万人，全城四分之一地区落入敌人手中。23日，凡尔赛一部分军队通过德军驻地，由北部和东北部侵入市内，杜布罗夫斯基率军在蒙马特尔高地杀敌，不幸壮烈牺牲。24日，公社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市政府失守，战斗转移到东部工人住宅区。在这里的战斗中，许多妇女与符卢勃列夫斯基领导下的公社军并肩作战，为完成崇高事业而捐躯。5月25日，公社被迫由第十一区迁到第十二区，被凡尔赛军包围起来。5月27日，在贝尔—拉雪兹神甫公墓，200名公社战士与5,000名凡尔赛匪徒展开了肉搏。晚上，这些英雄们被逼困在墓地的一堵墙边，高呼着“公社万岁”慷慨就义。为了纪念先烈，这堵墙被称作“公社社员墙”。5月28日，数千名公社战士在瓦尔兰领导下，于工人住宅区同敌人展开最后一场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巴黎公社被扼杀在血泊之中。

接踵而来的是梯也尔匪帮的大逮捕，大屠杀，大流放。凡是穿着红条裤子的人（国民自卫军制服的标志），凡是右肩有带枪痕迹的人，相貌像工人的人，有嫌疑的妇女和儿童，都难逃出敌手。巴黎公社的英雄儿女，不论在监狱里、法庭上，还是在刑场上，都充分表现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充分表现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国际”会员、公社委员瓦尔兰受尽折磨、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公社副检察长费烈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地控诉凡尔赛政府的滔天罪行。公社女战士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年）在法庭表现了惊人的英雄气概，在怒斥敌人后，慷慨就义。

凡尔赛匪帮先后杀了30000人，逮捕了50000人，巴黎的大屠杀，充分反映了反动阶级的野蛮和残暴。在革命烈士血迹未干的时候，公社委员、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1816—1887年）以满腔热血，写下了气

壮山河的诗篇《国际歌》。17年后即1888年，法国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1848—1932年）为《国际歌》谱上歌曲。从此，这首歌曲就成为激励全世界无产阶级奋起战斗的战歌。

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巴黎公社失败了。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还不很高，分散的小生产仍占优势，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还有很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尚未占统治地位，还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因而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如革命发生后，没有趁梯也尔反动军队土崩瓦解的时机，直捣凡尔赛反革命巢穴，给了敌人以重新纠集反动军队的机会；公社没有及时坚决地镇压反革命分子；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甚而允许凡尔赛反动政府提取款项，作为镇压公社的费用；公社对于工农联盟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及早去发动、领导农民运动，促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的影响，同工人建立联盟，结果，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公社对普鲁士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轻信了它的“中立”。由于以上的错误，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公社的历史功勋永远记在劳动人民的心间。

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 为了捍卫公社的革命原则与回击敌人

的攻击和诽谤，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便在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获得了总委员会的批准，并于6月中旬在伦敦用英文发表。这部光辉的著作，精辟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

巴黎公社的革命的主要经验教训，可以归纳为四点：

（一）因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要解除工人的武装，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镇压，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武器，坚持暴力革命。巴黎公社的成立证实了这一重要规律。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子手里”，又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恩格斯也曾说过：“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巴黎公社的实践证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途径。

（二）巴黎公社革命的伟大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学说。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如果不打碎它，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巴黎公社正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说：“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不仅如此，巴黎公社还进一步提供了如何用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旧国家机器的经验，发现了“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4页。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3页。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解放的政治形式。”

(三) 巴黎公社革命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否则，不可能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马克思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时，就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公社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联盟的必要性。公社领导人由于对工农联盟问题认识不足，没有采取有力

的措施去争取农民，加以巴黎被包围和凡尔赛政府的封锁与对公社的诽谤，未得建立起工农联盟，结果，陷于孤军作战，遭致失败。

(四) 巴黎公社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保证革命的彻底胜利。正由于公社的领导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他们不懂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从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它用自己的光辉实践有力地证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掘墓人和新世界的创造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巴黎公社而揭开了新篇章。马克思说：“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巴黎公社的实践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宣告了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的破产。在公社革命的过程中，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措施，都不符合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证明了以上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正确。公社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

公社的经验教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 1848—1849 年革命的理论，在巴黎公社革命中得到了实践和检验。如无产阶级如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政权形式等问题，巴黎公社都创造了经验。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五章。

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第十六、十七章。

管仲绪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十七章。

吴于廑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第四章。

巴赫等：《第一国际》。

朱庭光主编：《巴黎公社史》。

复习题：

1. 第一国际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2. 试述第一国际的主要历史功绩。
3. 为什么说巴黎公社是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
4. 试述巴黎公社的历史功绩和意义。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8 页。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 年 4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94 页。

第十五章 第二次技术革命 及其影响

第一节 第二次技术革命

第二次技术革命产生的历史条件 19世纪末期(1871—1900年)是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促进了工业的高速发展,而工业的高速发展又促进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从而引起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19世纪50—60年代,在欧洲、北美和日本成功地开展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扫除了历史发展的障碍,为工业化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更加适宜的政治环境;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通过长期对内对外的剥削、掠夺,也已为工业的大发展准备了必需的资金。因此,自19世纪中叶起,便有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迅速发展工业的道路。

世界各国工业化自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以来,一直都以轻工业为重点,重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随着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社会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断增长。重工业作为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也日益显示出来。到19世纪中叶,优先发展重工业已经成为各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而各国工业发展的重心,也开始逐步从轻工业转移到重工业。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新阶段。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在19世纪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有重大的成就和突破。在物理学方面,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提出发电机的理论基础,使电力工业得以建立。在生物学方面,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德国动物学家施旺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胞学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正式出版《物种起源》,提出科学的进化论学说。在化学方面,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奠定了无机化学的基础;有机化学的绝大多数重要原理也在1828年到1870年的约40年间基本确立,物理化学也在19世纪形成并发展起来,从而推动了化学工业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新突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要求的新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广泛地运用于工业生产,从而引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它从19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基本完成。

电力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电能的应用和电力工业的发展,是近代科学史上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中心内容。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电力作为新的能源逐步取代蒸汽动力而占据统治地位。1820年丹麦的奥特斯发现了电流导线可以使磁针偏转,这就是电流的磁效应,揭示出电能向机械能的转化。183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从而提出了电磁感应定律,表明机械能也可向电能转化,提供了发电机理论基础。1873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发表了《电磁学通论》。这是一部系统总结电磁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其科学价值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样的。

电磁学的发展，促进了电能的应用，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电气发明。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发明了自激式直流发电机。1870年比利时克拉姆制成了环状电枢自激式发电机。这种发电机由蒸汽或水力带动，从而把机械能转变为电能。1873年克拉姆又发明电动机，又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实现了使用电能推动工厂机器运转的目的，从而大大改变了动力设备和生产过程。

电的早期应用主要在照明方面。19世纪，出现一系列新发现。1809年，英国的戴维发明了利用碳棒之间的电弧光照明的电弧灯，开创了电照明的历史。英国人斯旺经过30多年的研究制成用坚韧的碳丝做灯丝。1879年美国爱迪生在多次试验后用炭化棉丝作灯丝材料制成了耐用的真空灼热碳丝白炽电灯。从80年代起，电灯开始逐渐代替油灯。

1882年爱迪生研制成当时世界上容量最大的一部发电机，即“巨汉”发电机。并建立世界上第一座直流发电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用照明系统。同年，法国电气技师德普勒发明了高电压远距离输电方法；使供电像供水一样方便，电力的使用开始普及。

19世纪80年代后，电动机开始用于交通方面。在工厂和矿山，电动机开始代替蒸汽机带动各种机械，为机械化提供了动力，使工厂、矿山等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电磁理论普遍的推广，也促进了电讯事业发明。1825年英国电学家斯特金利用电流磁效应发明电磁铁。1836年，英国科学家丹尼尔改进了伏特电池，使它能可靠地提供恒稳电流。在这期间，英国的惠斯通、德国的韦伯、美国的莫尔斯等人分别利用电流的磁效应和电磁铁，以伏特电池或丹尼尔的电池供电，发明和制成了多种实用的电报机。莫尔斯还发明了把文字符号化为电报电码，即“莫尔斯电码”。1845年，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架设了第一条有线电报线路。到1870年已经有了一个广泛的电报通讯网。电报的发明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以及重要的商业和军事作用。它大大加速了人们之间的信息联系，使整个世界距离缩短。1876年，美国人贝尔首先获得了电话机的专利权。1878年，经爱迪生改进的电话机在波士顿到纽约之间200英里的距离，通了第一次长途电话。到1880年，美国已经有48000门电话机在使用。1889年，美国又发明了自动电话交换台。后来，电话普及到许多国家，1879年在伦敦和巴黎，1881年在柏林、彼得堡等都成立了电话局。1891年，爱迪生发明了活动电影机，4年后，法国就制成了无声电影。1895年和1896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和俄国人波波夫，分别成功地进行了无线电传播实验。20世纪初，这一先进技术被美国引进。1906年，美国人德福雷斯特在英国人弗来明制成的二极管的基础上，发明了三极管，使无线电通信技术发展到了电子管时代，电子工业蓬勃兴起。10年后，美国实现了大西洋越洋长途电话通讯，接着建立电台，普及收音机。1908年，英国人斯文顿提出了电视的设计原理；1923年，美国人运用此法从华盛顿向费城播送了哈丁总统的传真照片；1925年，制成了光电显像管和第一台实用电视机。美国成为最早进入所谓“电讯时代”的国家。

化学工业的建立 化学工业的建立是第二次技术革命中一项重大成就。在这个领域，德国的科学家维勒、李比锡、凯库勒、霍夫曼建立

了不朽的功勋。1877年，德国建立了国立化工研究所，在有机结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煤焦油的综合利用，出现了染料工业、制药工业和香料工业。1886—1900年14年中，德国六家公司在染料技术上的创造发明(专利)达948项，英国有86项。1867年，瑞典诺贝尔研制成信号雷管和地雷，并发明了甘油炸药。80年代又经过改良，制造出无烟火药技术。这些发明被广泛用于开矿、筑路和军事，促进了军事工业的发展。到1909年，英国生产的染料满足不了本国纺织工业的需求，90%的染料靠从德国进口。德国从1900年开始大量出口合成染料，每年从中净得外汇1亿马克。合成染料极大地开发了人们的智慧。在德国先后合成了尿素、电石、尼龙、人造丝、DDT、橡胶、除草剂等。化学工业在美国也很发达，1869年，约·黑特发明了赛璐珞；1906年，美籍比利时人贝克兰德发明了电木；1916年，美国已经在工业生产中实际采用了“热裂法”，提高了精炼石油的产量。20世纪初，在分子理论指导下，合成化学工业在许多国家蓬勃兴起。

炼钢技术的发展 在1713至1735年期间，由于英国的达比父子发明了焦炭炼铁方法，使炼铁技术有了重大进步，产量有所增加。相比之下，炼钢技术则严重落后，而熟铁和铸铁作为结构材料的严重缺陷也日益突出。

1847年美国匹兹堡的糖锅制造者凯利在自己开办的铁工厂里，实验了一种新的炼钢方法，即所谓空气沸腾法。其特点是给炼钢炉中的铁水吹入空气，这样不仅可以除去铸铁中所含的碳，并由于铸铁中的碳快速燃烧而获得高温，就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把铸铁炼成钢。英国人贝塞麦(1784—1898年)也几乎在这同时发明了与其相同的方法，并于1855年取得了美国专利。贝塞麦的转炉炼钢法又经过了许多人的改进，先在英国试用，后被引入法国。1862年德国的阿菲尔德·克虏伯在埃森炼钢厂采用贝塞麦转炉法开始炼钢，以后又被美国大规模引入。美国高炉以优质矿石和煤炭炼成理想的酸性转炉钢。但贝氏炼钢法由于要靠气化炉料提供热能，对铁矿石成分要求过于严格。为克服这一缺点，1865年，法国冶金学家比埃尔·埃米尔·马丁(1824—1915年)在吸收英国科学家威廉·西门子和弗里德里希·西门子两兄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发明了装置有蓄热室的平炉炼钢法，解决了这一问题。1875年，英国冶金学家西德尼·吉尔克里特·托马斯(1850—1885年)针对西欧大多数国家铁矿含有高磷的情况，发明了碱性底吹转炉炼钢法，又成功地解决了炼钢过程中脱磷的难题。上述发明，使以往单纯靠体力和经验进行的落后炼钢法，转变成为可以大量生产的近代科学炼钢法，极大地促进了炼钢工业的飞速发展。

动力技术的革命 工业动力对工业全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反映近代工业技术水平的主要标志，因而是第二次技术革命重点突破的领域。自从瓦特改进的蒸汽机问世以来，汽力一直成为主要的工业动力。但是，随着工农业、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地区的不断扩大，以及工业专门化和生产过程连续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传统的蒸汽机由于存在着一系列缺陷，已无法适应新的需要。为了创制更为理想的动力机，开辟更为理想的新能源，科学家们曾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876年，德国人奥托(1832—1891年)根据德罗夏四冲程循环理论，成功制成了第

一台四冲程内燃机（亦称汽油机）。随后，德国工程师狄塞尔（1858—1913年）经过多年试验，于1897年又制成了大功率的柴油机。内燃机的发明，除了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了更方便、更经济和功率更大的动力机外，还立即引起了交通工具的巨大革新。1886年，德国工程师戴姆勒经过10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与其合作者迈巴赫在自己的工厂里，开始研究一种空气冷却的高速汽油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用白炽灯管点火，装有迈巴赫发明的汽化器，于1883年制造完成。由于改用汽油燃料，实现了内燃机的小型化和高速化，发动机的转速已从煤气机的200转/分提高到900转/分左右。同年，戴姆勒制成了第一台摩托车，次年，他又用一个只有1.5马力的汽油发动机驱动木制轻便游览车。这个有4个轮子的车辆采用传统马车的形式，于1887年3月4日从坎施达特驶往斯图加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汽车。与此同时，另一位德国发明家本茨于1886年在曼海姆制造了一台三轮汽车。这两个发明几乎在同一时间展现在公众的面前。1890年本茨从生产3轮汽车转而生产4轮汽车，采用了差动的传动装置和水循环冷却系统，并于1893年首次进行成批生产，1899年已达到年产500辆。在90年代，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也开始制造汽车。但产品大多数都是用手工小批量生产的一种轿车，供富人消遣之用。经过逐渐地改进，才出现了新的车架结构，从马车形式过渡到近代汽车的结构形式。

对于汽车的发展来说，充气轮胎的发明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1839年英国人古德伊尔把巴西的天然橡胶与硫磺混合起来，发明橡胶的硫化法，由此在美、英等国开始兴建第一批橡胶工厂。1845年，汤姆森在爱丁堡获得带有阀门和外胎的车辆轮胎的专利权。1888年邓禄普获得了充气轮胎的专利，并首先用于自行车上，后又用于汽车制造中。汽车应用充气轮胎又促进了橡胶工业，使天然橡胶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原料。

汽车的普遍应用，彻底改变了城市交通的状况。迅速飞驰的汽车逐渐代替了城市中缓慢的马车，成为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由于公路网的兴建，道路建筑和桥梁建筑业的发展，使城市和乡村、生产和社会的联系大大增强，农村的闭塞情况得以开始消除。汽车的作用在20世纪变得日益重要。

内燃机的发明也使铁路运输的状况得以改变。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一道把蒸汽机车逐渐从铁路上排挤出去。内燃机的发明也使人类腾云驾雾的梦想变成现实。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驾驶的由一台16匹马力的4缸汽油发动机驱动的木架双层飞机，首次试飞成功。尽管只飞行了59秒，高度3米，航程仅260米，但它却表明飞行时代的开始。

内燃机特别是柴油机发明以后，很快成为农业生产的动力，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很久以来，尽管有人曾试图把蒸汽作为动力的拖拉机用于耕作，但由于其过于笨重未能成功。在内燃机发明以前，已经有了许多农业机械的发明，但其动力仍然是马匹，显然不能推广应用，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拖拉机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农业动力落后的状况。1910年拖拉机成批生产，促进了农用工作机的制造和应用，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美国从1890年至1930年，农业机械的价值增长了6倍多，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4倍，农业人口由约占总人口的60%降低到

30%。

第二节 生产的集中与垄断的形成

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 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最直接的经济后果，便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迅猛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业生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美国和德国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从1859至1899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由18.8亿美元增至114.07亿美元，增加近5倍。生铁的产量在1860年时只有84万吨，1900年猛增至1401万吨。钢产量在1860年只有1.2万吨，1900年则达到1035万吨，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煤的开采量，1860至1900年间由1820万吨增加到2400万吨。机器制造业在20世纪初年其产值已相当于欧洲各国产值总和的一半。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的各个新兴工业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石油开采最为显著，开采量从1860年的50万桶增加到1900年的6362万桶。90年代，由于电动机在工业中的普遍应用，电力工业也得到飞跃的发展。到1902年全国的发电量已达60亿度。汽车工业在19世纪末的年产量不过几千辆，1914年猛增至56万辆以上。化学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轻工业的产量虽然有很大增长，但其速度远不如重工业快，逐渐退居第二位。轻重工业的比重，1860年为2.4 : 1，1900年已改变为1.2 : 1，重工业的产值已开始接近轻工业的产值。工农业的比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889年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约2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化已基本完成，美国开始由农业国转变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国家。

在19世纪最后30年，德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从1870至1900年，工业生产总产值增加了约2.7倍。煤的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1.49亿吨，铁产量由139万吨增至852万吨。德国的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也极为迅速，其中电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新兴的化学工业也开始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化学工业几乎还是空白，但在1870—1900年30年间，酸、碱等基本化学原料的产量增加了7倍，染料的产量增加了3倍，跃居世界首位。电气工业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德国取得的又一巨大的经济成就，其总产值在1891—1913年间增加了28倍。同美国一样，德国尽管轻工业绝对产量仍呈发展趋势，但其发展显然落后于重工业。至20世纪初，重工业在德国的整个工业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这一时期，俄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俄国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迅速，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完成的转变。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特别迅速地发展，比俄国还要快10倍。

这一时期，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则缓慢下来。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在1870—1900年只有1.6%，与19世纪中期相比下降了一半。由于英国的工业力量主要集中在纺织、煤炭和冶铁等几个旧工业部门上。到19世纪70年代后，这些生产部门的技术与设备都已陈旧落后，既耗费原料，又不能进行彻底的改造。以至使整个工业发展速度

无法加快。因此生产的增长速度相当缓慢。但钢铁业和造船业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钢产量从 1870 年的 22 万吨增至 1900 年的 498 万吨，造船吨位量从 34 万吨增为 93 万吨。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也开始建立起来。1913 年汽车产量已达 3.4 万辆。在动力方面，80 年代出现了利用硬煤生产煤气的瓦斯工业和电力工业，1912 年全国电站安装容量达 90 万千瓦。1900 年英国开始试制人造纤维，到 1913 年生产了 700 万磅人造丝。但英国新兴工业部门的规模很小，其产值在 19 世纪初年不到工业总产值的 1/10。因此，新兴工业部门的增长抵偿不了旧工业部门发展的滞缓，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下降。

在 19 世纪后 30 年，法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始终没有显著的提高。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在 2.1%—2.6% 之间徘徊，但重工业的发展比较快，特别是钢铁产量增长得最为明显。1870—1900 年生铁产量由 118 万吨增加到 424 万吨，钢产量由 8 万吨增加到 157 万吨，煤产量由 1318 万吨增加到 3340 万吨。作为法国主要工业部门的纺织工业，由于普遍采用蒸汽动力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取得显著的发展。1863 年棉花消费量只有 5.9 万吨，1900 年增为 15.9 万吨。电力、汽车、造船、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也开始建立起来，并取得很大成就。但这一时期，法国工业中的中小企业仍占很大比重，轻工业也还居于重要地位，工业基础仍很薄弱。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急剧变化。19 世纪 70 年代，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居第一位的是英国，到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就已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20 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二位。法国和英国一样，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俄国和日本的地位虽有显著提高，但它们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很小的。

生产的集中与垄断组织的形成 19 世纪最后 30 年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代。在生产上则表现为重工业的兴起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由于企业的规模扩大，要求的资本也越来越多，于是股份公司这种早已出现的集资经营方式开始得到广泛的发展。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与生产迅速地集中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也加速了大资本吞噬小资本的进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美国为例，美国产值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1904 年约 1900 个，占企业总数的 0.9%，而它们拥有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25.6%，它们的产值占总产值的 38%。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俄国、日本生产集中的速度也极快，大企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但英国和法国因生产增长的速度相对缓慢，技术装备陈旧，新工业部门比较薄弱，生产集中的速度与程度明显落后于美国 and 德国。特别是法国，工业中小生产者仍占很大的比重。但是，这两个国家工业生产集中的趋势，也在明显地加强。

生产的集中引起了垄断组织的产生。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已开始出现个别的垄断组织。1873 年的经济危机使许多中小企业破产，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集中，于是垄断组织发展起来。但这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中尚不占统治地位。一直到 1900—1903 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垄断组织才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

遍发展起来，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所谓垄断组织，一般是指资本主义大企业间为了独占生产和市场、以攫取高额利润而联合组成的垄断经济同盟。垄断组织有多种形式，生产同类商品的大企业，并通过签订关于产品价格、销售市场、生产规模等协定建立的垄断组织称为卡特尔；同一生产部门的少数大企业通过签订统一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建立的垄断组织称为辛迪加；由若干生产同类商品的大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大企业合并组成的垄断组织称为托拉斯；共同依赖某一大金融资本集团的不同经济部门的大企业、大公司和银行联合组成的垄断组织称为康采恩。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正式进入垄断阶段。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不同，垄断组织发展的程度和形式也有很大的不同。以德国和美国为例，德国是典型的卡特尔国家，美国是典型的托拉斯国家。这些垄断组织往往将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总量的十分之七八集中在自己手里。

工业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也促进了银行业的集中和垄断。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通过多种渠道溶合起来，形成金融资本，进而控制了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成为各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

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上的盲目冲突，实现局部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通过垄断，许多中、小企业被合并成大型企业，许多分散的资本家被合成集体的资本家。这就使那些拥有巨资的金融资本家或集团，有可能用以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进技术革新和设备现代化，对市场信息作出大致的估计，把生产领域集中并比较有计划地进行生产，从而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垄断组织在形成之初，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垄断组织是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产物，必然加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剥削性和侵略性。垄断组织垄断市场和价格，势必降低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垄断组织的形成，同时意味着对劳动人民的掠夺的加强。由于垄断资本的形成是大生产通过暴力、欺诈的行为及种种卑鄙丑恶的手法吞并小生产而形成的，无数小私有者在这一过程中成为牺牲品。这在美国最为突出。垄断的形成，必然伴随着食利者阶层的出现，他们靠海外投资及向外国放贷（如法国对俄国放贷），坐享超额利润及高利息的收入，因而成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阶层。垄断资产阶级的胃口更大，它不但继续要求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及原料供应地，而且也要求扩大资本输出地，因此导致了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更多的国家、地区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垄断资本是战争的根源。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的争霸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七章。

吴于廑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第六章。

管仲绪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二十三章。

胡洽坤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五章。

复习题：

1. 试析第二次技术革命出现的历史原因。
2. 试述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主要成果。
3. 试析垄断组织出现的原因。
4. 试析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影响。

第十六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节 英国

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和殖民帝国主义的形成 19 世纪中叶，有“世界工厂”之称的英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但 70 年代以后，英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下来。从 1870 年到 1913 年，英国工业总产量在世界上的比重，由 32% 下降为 14%。19 世纪 90 年代被美国超过，20 世纪初被德国超过，落为世界第三位。1913 年，英国的钢产量为 778 万吨，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和德国的 1/2。与此同时，对外贸易由于美、德的竞争，在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1871 年的 22%，下降为 1913 年的 15%。农业原料和食品也越来越仰赖于从国外输入。

英国工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英国起步较晚，且步伐较慢，英国的大部分工厂建于工业革命早期。到 19 世纪中期后，这些工厂的设备日显落后。但是英国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一直未遇对手，故对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不感兴趣，也不愿由于更新设备而遭到损失。他们安于现状，并把大量资本投资于殖民地，以获取超额利润。大量资本的输出，影响了国内投资的扩大，迟缓了工业的发展。而美国、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 19 世纪后，纷纷开始采用先进的技术及设备，生产力飞速发展，使英国不可避免地在世界市场上受到激烈的竞争。许多国家对英国商品实行抵制，采取了关税保护政策。这样，自 19 世纪 70 年代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被迅速地打破，从而也影响了英国工业的发展。

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虽然丧失，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英国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掠夺殖民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弥补由于工业垄断地位丧失所带来的工业利润的减少，19 世纪末，英国疯狂地抢夺殖民地。到 1914 年，英国殖民地面积的总和已达 3350 多万平方公里，比本土大 110 倍，人口接近 4 亿，为本国人口的 9 倍。由于其殖民地遍布五大洲，故有“日不落帝国”之称。如 19 世纪 80 年代，以罗德斯为首的垄断组织德·比埃尔公司，就是在掠夺南非的金刚石和黄金的过程中形成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以及纺织业中的一些垄断组织，也都靠掠夺殖民地发展起来。到 20 世纪初，在冶金、化学、煤炭、造船、水泥等业中，也都出现了垄断组织。1902 年，英国已有 57 家托拉斯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此外，铁路公司、航运公司和保险业也都被垄断组织所控制。

19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1875 年国外投资为 14 亿英镑，1905 年增加到 20 亿英镑，到 1913 年高达 40 亿英镑。超过了德、法资本输出的总和，其中 1/2 是通过生产投资的途径投在殖民地和自治领。

英国向殖民地输出大量资本，促进了银行资本的集中。1875 年英国有 120 家银行，1900 年减为 98 家，到 1913 年只剩下 61 家了。1914 年，五家最大的银行控制了全部银行存款的 40%。英国银行资本投入殖民地的

铁路、工矿业和对外贸易，形成金融资本。

由于殖民地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已经成为英国的生命线，其政治经济的支柱，原料供应地和商品的倾销市场，所以列宁称帝国主义为“殖民帝国主义”。

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轮流执政 随着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资产阶级无论在对外扩张或对内镇压方面，都需要强化军事官僚机器，因而国会的作用日益缩小，而内阁的权力逐渐增强。长期以来，英国资产阶级建立了两个政党即自由党和保守党。自由党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用微小改良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保守党代表土地贵族和银行家的利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镇压工人运动，推动侵略政策。随着金融资本的形成，两党之间的差异明显缩小。

自 1868 年起，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这一年，自由党的格拉斯顿组阁。格拉斯顿（1809—1898 年）出身于商人家庭。在 30 年代开始从政。40 年代保守党分裂，格拉斯顿成为该党左翼“皮尔派”领袖之一。1859 年脱离保守党，进入帕麦斯顿内阁担任财政大臣，成为工业资产阶级在政府中的代表。1867 年成为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上台伊始，70 年代初，格拉斯顿内阁实行国民教育改革，推行初级义务教育，规定 5—12 岁儿童必须接受教育。又实行文官考试制度，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设立内政部，监督地方自治机关等一系列改革。格拉斯顿内阁的改革使 19 世纪以来的英国国家上层建筑改造基本完成。格拉斯顿内阁的改革尽管具有极大的保守性和鲜明的阶级特征，但还是引起保守势力的不满。1873 年自由党在议会中由于爱尔兰教育问题遭到保守党议员的反对。次年大选时，保守党击败自由党，竞选胜利。由狄斯雷利组阁。狄斯雷利是犹太人，青年时代便开始从政，40 年代保守党分裂时，成为下院中保守党议员领袖。1868 年 2 月，狄斯雷利接任保守党元老德比之位继任首相。是年大选，保守党一败涂地。在格拉斯顿组阁期间，狄斯雷利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格拉斯顿的改革，并不断标榜保守党是真正维护大英帝国现有政治体制和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表。鉴于前车之鉴，狄斯雷利也不断宣称保守党将在再度执政时进行社会改革。他笼络工人贵族，对工人施以小恩小惠，修改“主人和仆人法”，使工人和雇主在形式上处于平等地位。

狄斯雷利政府为了弥补丧失工业霸权所造成的“损失”，加紧殖民地扩张。1875 年，英国趁埃及政府财政危机的时机，收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将近半数的股票，取得了这个运河的控制权。1878 年，英国从土耳其取得地中海东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塞浦路斯岛。由于对外疯狂地进行殖民扩张，狄斯雷利内阁造成 800 万英镑的预算赤字，引起国内不满。1880 年国会选举时，自由党提出“和平和财政紧缩”的口号，击败了保守党，格拉斯顿重新执政。

格拉斯顿第二次组阁后，于 1884 年进行了第三次国会改革，将选民由 250 万扩大到 450 万，占英国 3600 万人口的 1/8。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和妇女仍没有选举权。格拉斯顿执政时期仍然推行向外侵略政策。1882 年，用武力占领埃及，又以埃及为据点进一步占据苏丹。宣布阿富汗为保护国。

由于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日益丧失，不少资产阶级要求放弃“自由主义”政策，加强军事官僚机构。自由党内部出现了以约瑟夫·张伯伦

为首的反对派。1886年，他脱离自由党转向保守党，使保守党的势力增强。保守党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加紧殖民地扩张，因而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1886—1905年间，除三年（1892—1895年）外，都是保守党执政。

在这个时期，保守党完成了地方自治改革，大大增加了军队和警察的人数；在对外方面，实行保护关税，疯狂地扩张殖民地。到90年代末，英国又在非洲和亚洲占据了大面积的领土。1896年完成了对肯尼亚的占领，1898年强租了我国的威海卫和九龙，1900年又伙同其他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1899—1902年，英国在南非发动英布战争，置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于英国统治之下。由于英德矛盾的尖锐，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成同盟，1904年，与法国缔结协约。

张伯伦所主张的保护关税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大部分工商资产阶级担心将导致粮食和原料等输入品的价格提高，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害怕保护关税会使物价上涨。1906年选举时，自由党利用社会上对保守党的不满，击败了保守党，取得胜利，从此到1915年，都是自由党执政。自由党在无产阶级展开激烈斗争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1906年，实行矿工八小时工作制，又通过养老金法，但规定只有70岁以上者每月最高才可领5先令养老金。1911年，通过“议会法”，削减了贵族院的权限，又通过“国民保险法”，包括健康保险及失业保险。

在对外方面，自由党政府仍然进行殖民侵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为了与德国对抗，1907年和俄国签订协约，英国还大量增加军费，积极准备对德战争。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宪章运动失败后，英国工人走上了以经济斗争为主的工联主义道路。究其原因，主要是19世纪60、7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工业垄断地位所获得的巨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在工人群众中散布工联主义，阻碍了工人运动的正常发展。最典型、最能体现工联主义思潮的工人组织是19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模范工会。该组织是由能够交纳高额会费的熟练工人组成。其宗旨是利用征收高额会费等手段维护各行业中少数熟练工人的经济利益，使之在工人间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日常工作中，新模范工会以福利主义为口号，将会员的目光引向纯粹的为争取提高福利待遇为主的活动，阻止会员用激烈手段解决劳资纠纷，更不允许会员参加政治斗争。工联主义的盛行，严重侵蚀了英国工人的思想，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和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建立。此外，被新模范工会排斥在外的一些工人，则接受了自由党或保守党的宣传，加入它们的一些外围组织，成为它们的选民和支持者。尤其是自由党的一些改良主义措施，一度曾迷惑了许多工人，许多工会组织成为自由党的基本支持者。随着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英国再次陷入了经济危机，广大工人又沦入困苦的境地。工联主义工会无力组织工人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影响日衰。19世纪80、90年代，由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运动和大陆国家工人政党组织的影响，英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活跃，一些社会主义团体成立起来。

1881年，亨利·汉德曼（1842—1921年）等成立了“民主同盟”。1884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同盟”。汉德曼曾著有《大家的英国》一书，

其中有两章是转述《资本论》的内容，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汉德曼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将导致其自动崩溃，因而反对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他因鄙视工联主义而放弃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他在同盟会中的独裁作风和错误观点，招致盟员的强烈不满，威廉·莫里斯、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因而退出了“同盟”，于1884年创立“社会主义同盟”。

“社会主义同盟”通过机关刊物，以诗文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揭露政府的腐败。但不久以莫里斯为代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占了上风，艾威林夫妇等退出。1889年，“同盟”解散。

在“社会主义同盟”成立的同时，肖伯纳（1856—1950年）、韦伯夫妇、赫伯特·威尔斯等成立了费边社。费边社的名称源于古代罗马共和国汉尼拔战争时期的罗马大将费边（即法比乌斯·孔克托尔）的缓进战术。该组织的名称表明了其改良主义的色彩。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主张阶级合作，宣传用“改良”、“渗透”、“渐进”等方法改革英国社会，认为用和平的手段实行企业国有化，就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策略上，费边社反对依靠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主张依靠“有知识和教养的精英”来从事它们的事业。在长期的活动中，费边社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实际上是由庸俗政治经济学、庸俗进化论、功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构成的一个大杂烩。但是，由于费边社成员的宣传，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费边主义的影响已超过工联主义，对英国的工人运动起了不良影响。

19世纪80年代，由于英国工人生活日益恶化，英国工人掀起了巨大的罢工浪潮。1886年伦敦失业工人的示威游行揭开了罢工的序幕。1888年又爆发了伦敦东头火柴厂700多女工的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胜利；1889年，煤气工人展开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减少了工作日，增加了工资，并在斗争过程中建立起煤气工人联合会。这是英国工运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会。同年，汤姆·曼（1856—1941年）和爱琳娜·马克思等人领导伦敦工人大罢工。经过4个多星期的斗争，资本家最后接受工人条件：每小时工资增加六便士，每日雇佣时间不得少于4小时。码头工人也成立了工会。通过这一系列的斗争，新工联纷纷成立。这些新工联与旧工联不同，它们接受非熟练工人和低工资工人参加，富有了一定的战斗精神，反对与资本家妥协，主张用罢工手段改善工人生活。新工联会员迅速增加。在1900—1913年间，从195万多人增加到398万人。

新工联运动为工人政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893年1月，在英国北部的布莱德福成立了独立工党。领导人是矿工凯尔·哈第（1856—1915年），他宣布党的纲领是实现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当前的斗争任务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不久，费边社分子便掌握了党的领导权。改良主义在独立工党内占了上风。拉赛姆·麦克唐纳（1866—1937年）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

英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工人群众由于生活日益恶化，不断罢工。1900年南威尔士铁路工人罢工数月之久。铁路公司竟提出控告，法院则判处铁路工会赔偿资本家23000英镑。这个判决实际上是对工人罢工权

利的剥夺，在工人中引起强烈不满。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建立自己的政党。1900年2月，工联领导集团召开有工联、独立工党、费边社和社会民主同盟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会上组成“工人代表委员会”，决定在国会选举时提出自己的候选人。1906年，这个委员会改称“工党”。

工党的组织形式是集体加入，许多工会、独立工党、社会民主同盟和其它工人组织都入了工党。在这个党中，独立工党和费边社分子掌握着领导权，主张单纯的议会斗争，强调改良，反对革命，在议会中支持自由党。麦克唐纳又成为这个党的魁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工人工资下降，失业严重，罢工斗争与年俱增。1910年，出现了新的罢工浪潮，有515 000工人罢工，1911年增加到96万人，1912年，猛增到146万人。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要求成立能够领导斗争的政党。1911年9月，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左派代表会议，通过了建立“英国社会党”的决议。但这个党在汉德曼的影响下，犯有宗派主义和害怕群众的错误，没有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这个时期，英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工联主义的影响下，还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

爱尔兰人民的革命斗争 英国自1801年正式吞并爱尔兰后，便对爱尔兰进行残酷的压榨。在19世纪的后半期，英国300多个地主霸占了爱尔兰600万英亩土地，使500万爱尔兰人处于无土地的困境。因此，爱尔兰人民反英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和自治问题。

芬尼党运动失败后，爱尔兰人民仍然坚持斗争。1879年，前芬尼党成员迈克尔·戴维德成立了“土地同盟”，有25万人参加，要求废除英国在爱尔兰的土地占有权，使佃农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在同盟的号召和领导下，各地农民进行“杯葛”运动，就是联合起来断绝和英国人的一切关系。农民还焚烧庄园、杀死地主，与英国人进行不懈的斗争。与农民运动发展的同时，爱尔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也展开温和的自治运动，其领袖为187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的巴涅尔。土地斗争和自治运动客观上联系在一起，给英国统治者极大的威胁，1881年英国政府逮捕了戴维德和“土地同盟”成员1000多人。结果激起爱尔兰人的更大规模的反抗，迫使英国政府释放被捕者，延期征收欠租，停止驱逐农民。

20世纪初爱尔兰的民族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国会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终于在1914年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英国地主为了阻止“自治”的实现，曾经在爱尔兰北部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叛乱。爱尔兰人民组织志愿军与之对抗。但随着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爱尔兰的斗争才缓和下来，爱尔兰的自治也没有实现。

第二节 法国

法国经济的发展和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 19世纪后半期，法国

源自“Garls·Boycott”。汉译为“波伊柯特”或“杯葛”。杯葛为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地主的代理人。因反对土地联盟而臭名昭著。土地联盟的领导者号召农民与拒绝减租的地主断绝关系，“杯葛运动”由此得名。

同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但其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德国。法国工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普法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损失达 130 亿法郎。战败后又赔款 50 亿法郎，还将盛产煤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割给德国，元气大伤，发展生产困难，法国缺乏重工业所需要的煤铁资源，影响了整个工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美、德、英三国，居于世界第四位。

虽然法国工业的发展相当迟缓，但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也出现了垄断组织。如 13 家最大的炼铁企业联合组成辛迪加；万德尔、什尼德尔、马林、奥姆古尔等公司控制了铁矿、煤矿、冶金、机械等重工业部门；久尔曼、新戈丙等垄断组织控制了化学工业；10 家煤炭公司控制全国煤产量的一半。麻织辛迪加垄断了麻织产量的 90%；帕特电影公司垄断了电影业。这些垄断组织的形成标志着法国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法国银行资本集中较快，作用显著，是法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特点。20 世纪初，法国共有 266 家银行，其中法兰西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家贴现银行、信贷总公司等 4 家大银行，控制着全国存款的 70%。其中以法兰西银行为最大，它有发行纸币，支配商业债务的垄断权力。

随着银行资本的迅速发展，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日益融合，形成财政资本。法国金融资本家把大量资本输出国外，对国内工业投资很少。法国的资本输出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20 世纪初，法国资本的输出额达 350 亿法郎，1914 年，增加到 600 亿法郎。法国对外投资与英国不同，英国主要把资本投到其殖民地的工业中去，而法国主要以借贷资本形式，借给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殖民地。它曾将资本输往俄国、南美各国、巴尔干和土耳其。法国的输出贷款，给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息。1903—1913 年法国的高利贷利息收入每年高达 80 亿法郎。所以法国依赖借贷为主的食利阶层特别庞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多达 200 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总数约 500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8，所以列宁称法国为“高利贷帝国主义”。

共和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政局仍然动荡不安。在国民议会中，各派保王党人占有多数席位，分别推举自己的王位代表人，准备恢复帝制；资产阶级共和党代表不多，主张共和制，广大人民群众则坚决反对复辟，拥护共和。1871 年 8 月 31 日，国民议会推举奥尔良派保王党人梯也尔担任总统。他的反动使共和党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增强，保王派于 1873 年为了挽回颓势，又推出色当败将麦克马洪为总统，准备发动政变，恢复帝制。

共和派在人民的支持下，经过长期斗争，于 1875 年 1 月 30 日，使国民议会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从此法国的共和制才得以确立。这部宪法规定总统任期 7 年，由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选出，有统帅军队、签订条约、任免高级官员等权。参议院议员任期 9 年；由选举人团选出。参议院有复议和批准众议院通过的法律权，从而权力很大。

共和党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前者代表大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由中小资产阶级组成。1879 年 1 月，温和派的格雷维（1813—1891 年）被选为总统。温和派上台之前，曾对人民许下不少诺言，如取消参议院，

政教分离，实行累进税等，但一旦执政后，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他们适应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要求，提高粮食和工业品的进口税，致使生活费用高涨，劳动人民因生活困难不断举行罢工斗争，但都遭到政府的镇压。

共和党温和派的反动政策，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保王党人、反动军人和教权派企图利用人民的反抗情绪推翻共和国，因而发生 1887—1889 年的布朗热的阴谋政变。布朗热是个政治阴谋家，曾任陆军部长，他与保王党和教权派勾结，宣传修改宪法，对德复仇，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在 1889 年议会补充选举时，骗得 24 万张选票当选。他阴谋发动政变，复辟君主制，但阴谋败露，畏罪逃往比利时自杀身死。

资产阶级的统治日趋腐败，“巴拿马丑闻”就是一例。1879 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公司，由于贪污和经营不善而破产了。1892 年国会调查这个案件时，许多要员、部长和议员因为受贿对于舞弊者进行包庇。这个贿赂丑闻内幕被揭露出来。共和党政府的威信愈加降低。

保王党利用人民群众的愤懑情绪，挑起德雷福斯案件。德雷福斯是犹太人，任陆军参谋部大尉军官。1894 年保王党人诬告他把军事秘密文件卖给德国驻巴黎的武官。共和政府判他终身苦役。保王党借机煽起反犹太人运动，攻击共和国的腐化。1886 年，查明真正罪犯是保王党人埃斯特哈斯。但政府拒不重审德雷福斯案件。以工人为首的民主力量抗议政府迫害无辜，保王党继续煽动反犹太人运动。妄图借机推翻共和，恢复帝制。经过激烈斗争，民主力量终于胜利。1899 年，德雷福斯获释出狱，保王党复辟的妄想成为泡影。

一系列的事件使温和派共和政府遭到人民的唾弃。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便用激进派代替温和派执政。1902 年，激进派米尔·孔勃内阁，实行政教分离，排除天主教对政治、文化的干预。但 1906 年，负有盛名的激进派领袖克里蒙梭组阁以后，又拒绝取消参议院，反对征收累进税等民主改革，这就完全暴露了激进派的反动面目，在群众中失去信心。垄断资产阶级又组成激进派与所谓“社会主义者”的内阁，即布里安内阁。参加者布里安（1862—1932 年）、米勒兰、维维安尼等人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实际上都是执行反动政策，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的金融寡头的走卒。

大战前夕，法国资产阶级面临国内人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希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以便加强统治，准备战争，1913 年，选举共和党的右翼普恩加莱为总统。他当政以后，立即疯狂备战，把兵役延长到 3 年，增加军费为全部预算开支的 38%。普恩加莱的上台标志着法国进一步走向帝国主义战争。

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准备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因而 1893 年与沙俄订立军事同盟，与“三国同盟”对抗。与此同时，法国为大量输出资本，疯狂地进行殖民地扩张。1881 年，法国借口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边界纠纷，武装占领突尼斯。1883 年侵略越南，挑起中法战争。1894 年，占领马达加斯加，1895 年，强租我国广州湾。90 年代，法国对中非和西非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占领了塞内加尔、几内亚和达荷美等地。1900 年法国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20 世纪初，法国又占领了摩洛哥、西非和赤道非洲。法国通过以上侵略行径，建立了一

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其殖民地面积，仅次于英国，居资本主义列强的第二位。

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法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到 70 年代末期，又重新发展起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无产阶级方面，儒尔·盖德（1845—1922 年）和保罗·拉法格（1842—1911 年）起了显著作用。盖德是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的拥护者，曾创办《平等报》批判蒲鲁东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青年时代一度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领导下，1879 年在马赛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法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为党的党纲写了总纲，强调：只有在无产阶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为法国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

工人党成立不久，以保尔·布鲁斯（1844—1912 年）和贝努瓦·马隆（1841—1893 年）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纲规定的奋斗目标，主张把党的活动限制在当时可能争取到的范围内，因此被称为“可能派”。1882 年，“可能派”在圣·德田代表大会上，操纵多数代表要求修改党纲的总纲部分。23 名盖德派代表坚决反对，退出会场，单独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他们坚持党的革命纲领，保留下法国工人党的名称。“可能派”另组成“社会革命党”，拟定了一个机会主义纲领。

盖德派与可能派分裂后，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同可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同时，继续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886 年 1 月，盖德和拉法格领导了加兹维尔矿工的大罢工，取得胜利。1891 年 5 月 1 日，在拉法格的宣传组织下，佛尔米城工人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警察向示威工人开枪。打死 10 人，伤 20 多人，拉法格被捕。政府的暴行引起工人的愤怒，提高了拉法格的威信，他被选为众议员，政府不得已将他释放。盖德派领导工人斗争，增强工人对这一派的信心，1893 年众议员大选时，盖德等 12 名工人党代表被选入众议院。

盖德派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使他们错误地夸大了议会斗争的作用，甚而把争取议会多数席位当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他们在组织上同改良主义者米勒兰、饶勒斯等组成“社会主义者”议会党团，片面地强调议会斗争的重要性。盖德派为了争取农民的选票，主张维护农民私有制。恩格斯为了纠正盖德派的错误，写了《法德农民问题》，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并阐明农民唯一得救的途径是走合作化道路的真理。

在盖德派执行错误路线的同时，改良主义者日益嚣张起来。1899 年，资产阶级激进派瓦尔德·卢梭组阁。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加入内阁，担任工商部长。米勒兰一方面实行微小改良来麻痹工人的斗志，另一方面残酷地镇压工人，米勒兰的入阁在法国社会主义组织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饶勒斯为首的一伙公开赞成米勒兰的入阁，形成“入阁派”，以盖德和拉法格为首的社会主义者谴责米勒兰是工人阶级的叛徒，组成“反入阁派”。

米勒兰入阁事件引起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公开分裂和重新组合。

1901年，盖德派和布朗基派联合组成法国社会党。1902年，饶勒斯派和可能派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2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建立统一的社会党。于是法国社会党和法兰西社会党于1905年合并称为“统一社会党”。但饶勒斯控制了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权。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迷恋议会斗争，使统一社会党执行了机会主义的路线，引起工人的不满。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利用工人群众对统一社会党的不满，夺取了工会的领导权。1906年法国总工团在亚眠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亚眠宪章》，宣扬工团是工人的唯一组织，是劳动反对资本的组织，也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组织，总工团将代替任何形式的国家。工团主义者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主张工人从事政治斗争，错误地认为经济总罢工即所谓的直接行动，是唯一有效手段。他们给法国的工人运动造成很大的损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劳动人民革命情绪不断增长。1906年，法国共发生1300多次罢工，1907年南方的葡萄农要求政府改善经营条件，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908年巴黎附近德拉维尔城掘土工人举行罢工，同前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战斗。1909年巴黎邮电工人举行两次大罢工。1910年40000铁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而罢工。在大战前夕，法国工人、农民和士兵对政府普遍不满。但是当时法国无产阶级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都遭到失败。

第三节 德国

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形成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位，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这个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德国统一的最后完成。统一后的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原因是：政治上的分裂消除，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从法国攫取的50亿法郎赔款，用于发展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和鲁尔矿区联结在一起，构成了重工业的基地；德国产业革命较晚，易于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因此，19世纪70、80年代，德国完成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工业跳跃式地发展起来。1870—1900年间，钢产量由17万吨增加到667万吨；煤产量由3400万吨增加到近15000万吨；铁路线由约19000公里增到50000公里。机器制造业、造船业、电气工业和化学工业都有迅速的发展。20世纪初，德国在工业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1873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垄断组织的形成。1879年德国有14个卡特尔，1890年增加到210个，1896年约有250个，1911年已达600个。垄断组织控制了工业生产，形成德国经济生活的基础。20世纪初，莱茵——威斯特发里亚煤业辛迪加垄断了全国煤产量的一半；德意志铁业协会几乎控制了德国全部生铁工业；在军事工业方面，克虏伯公司占据统治地位，在化学、电器、光学和精密仪器等新工业部门，从一开始就由垄断企业经营，随着工业垄断组织的发展，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柏林9家银行控制了全国资本的83%。银行资本与工

业资本结合，形成了金融资本。例如，德意志银行拥有资本 30 亿马克，控制着 200 多家工业企业。德国垄断资本的形成，标志着它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容克贵族在保存封建残余的基础上，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成为许多公司和银行的股东。大工业资本家也购置大批地产兼为大土地所有者。于是容克贵族便和垄断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操纵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普鲁士容克贵族既然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他们在德意志帝国也就占据了统治地位，一切军政要职都被他们所包揽。1871 年通过的宪法规定：普鲁士的国王为帝国的皇帝。皇帝的权力极大，有统率帝国军队、签订对外条约、任免国家官吏等大权。宰相由皇帝任命，只对皇帝负责。

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联邦议会由各邦政府派代表组成，在 58 名代表中，普鲁士占 17 名，而 14 票就可否决任何提案。帝国议会由普选产生，但通过的法案必须经过联邦议会的同意和皇帝的批准方能生效，实际上并不具有立法权。

德意志帝国沿袭了普鲁士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传统，疯狂鼓吹沙文主义、黩武主义和盲从精神。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马克思指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

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在经济上的紧密结合和政治上的联盟，使德国成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

德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俾斯麦充当第一任宰相。他大权独揽，坚决执行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路线，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措施。他的对内政策的核心是强化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抑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但尽量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如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马克，成立拥有货币发行权的帝国银行，统一全国的法律和度量衡制度，建造和整顿铁路网，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等等。这些措施使容克地主阶级满意，也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

普鲁士容克地主对于德意志帝国的控制，引起西南小邦天主教贵族的不满。他们在议会中组成“中央党”，要求各邦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和天主教会的不受干预。俾斯麦为了打击中央党，便针锋相对地采取压制措施，迫使议会通过一系列反对天主教的法律，如 1872 年颁布学校监督法，不许天主教插手文化教育。1873 年又通过“五年法令”，剥夺教会对教士的处罚权，并将宗教教育纳入国家监督之下。此后又发布法令，剥夺了教会对世俗婚姻的限制权力，并由政府直接干预主教教区的教务行政，又取消了国家对天主教教会的津贴。封闭不少天主教堂，从各方面削弱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俾斯麦把这次冲突渲染为“文化斗争”。这场斗争究其实质来说，是一场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分离主义势力、巩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1—22 页。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44 页。

固国家统一的斗争。但是，由于天主教势力的根深蒂固，中央党仍然坚持活动。俾斯麦为了集中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力量镇压工人运动，1878年和中央党妥协，相继取消了以前颁布的反天主教法令，天主教又恢复了以前的地位。

此后，俾斯麦将注意力转向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方面。1878年10月，俾斯麦借口两次谋刺德皇威廉一世事件，颁布了《非常法》，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解散群众性的工人团体，封闭进步报刊，逮捕和放逐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公布后两个月中，就有521名社会主义工人党人被监禁起来。俾斯麦在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又实施了一些迷惑工人的社会立法，如《疾病保险法》、《残废和老年保险法》等。但是德国工人并没有屈服于俾斯麦的高压政策，也没有被他的小恩小惠所欺骗。他们在斗争中经受了非法和合法斗争的锻炼，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

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是推行所谓“大陆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在于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旨在彻底孤立法国，建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他为了准备新的对法战争，竭力防止法国与俄国建立联盟，免得德国处于东西两线作战境地。1879年，德国与奥匈帝国结成反法、反俄同盟。1882年，意大利加入，形成了“三国同盟。”

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较少，从80年代起，便急于进行殖民地侵略。资本家们建立“德意志殖民协会”，大肆鼓吹殖民扩张，并着手向非洲发展。1884年德国夺取了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置多哥和喀麦隆于自己“保护”之下。1885年，占领了东非的桑给巴尔岛和坦噶尼喀地区，建立了所谓德属东非殖民地。此外，德国还在南太平洋夺取了新几内亚东北部和马绍尔群岛。但德国的殖民地掠夺远远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强烈要求更大规模的海外扩张。而俾斯麦为了加强帝国在欧洲的地位，不愿在殖民地争夺上与英国发生冲突，因而对德国的殖民扩张一直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1888年6月，威廉二世即位后，不满意俾斯麦的跋扈，二人时常发生磨擦。1890年《非常法》实施期满，议会企图改变强硬手段，决定不再延长。威廉乘机诡称反对镇压政策，迫使俾斯麦于1890年3月辞职。其实，威廉二世的对内政策，和俾斯麦同出一辙，都是实行恐怖统治。此外，威廉二世还竭力迫害境内的异民族，并用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毒害人民。

19世纪90年代，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愈益要求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于是威廉二世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世界政策”，以代替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威廉二世的外交部长、后来的宰相毕洛夫公开叫嚷：“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只满足于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日光下的地盘。”于是德国在亚非各地加紧侵略扩张，1897年，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和青岛，次年又取得在山东建筑胶济铁路和开采矿山权。1900年，德帝国主义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1903年，德国与土耳其订立条约，得到建造巴格达铁路的权利。这条铁路建成后将成为德国向近东侵略的工具。

德国的向外侵略，不仅引起与英国的尖锐矛盾，而且也影响到俄国的利益，俄德关系也紧张起来。20世纪初，德国为了向外侵略疯狂扩军

扩战，准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德国的统一为工人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德国工人分为以李卜克内西等为领导的埃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德国既已统一，两派在统一道路问题上的分歧即不复存在。所有工人为了和政府进行斗争，需要团结起来。特别是拉萨尔派由于他们的影响日益减弱，更希望借助合并以摆脱困境，所以，1873年以后，便主动向埃森纳赫派提出合作的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两派的统一，但告诫埃森纳赫派的领袖们不要拿原则作交易，必须把统一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然而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醉心于合并，无视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告，竟于1875年3月同拉萨尔派共同起草了一个浸透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的纲领草案。1875年5月22—27日，两派在哥达召开合并大会，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称社会民主党）”，通过了这个纲领，亦即《哥达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十分愤慨，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马克思随即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于《哥达纲领》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同时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针对《纲领》所宣扬的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达到社会主义的主张，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又着重批判拉萨尔的超阶级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只能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又驳斥拉萨尔派庸俗的社会主义，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及其分配原则，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哥达纲领批判》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光辉典范。但是，李卜克内西等当时还不能接受马克思的批评，竟对广大党员封锁了《哥达纲领批判》。

虽然《哥达纲领》有严重的错误，但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还是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后，其力量不断壮大。1876年，它拥有党员近4万人。1877年国会选举时，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50万张选票，12名代表被选进国会。《非常法》的颁布是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严峻考验。在全国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党内拉萨尔主义者惊慌失措，声明自行解散党；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束手无策；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赫希伯格、施拉姆和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年）组成所谓“苏黎世三人团”向敌人公开投降，声明服从《非常法》；莫斯特（1846—1906年）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不顾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主张立即举行暴动。

在党处于严重危机关头，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帮助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导人制定正确的路线，帮助他们采取合法斗争和非法

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187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同上书，第12页。

斗争相结合的策略。结果，党在正确的指导下，通过各种俱乐部和协会等合法组织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创办秘密刊物，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1889年5月党领导鲁尔区9万矿工进行罢工。1890年，德国发生了200多次罢工，沉重地打击了俾斯麦的反动统治。党在议会斗争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1890年获得142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了35个席位，成为议会中大政党之一。

反非常法胜利后，党在群众中影响空前增强。1890年10月，在哈雷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恩格斯察觉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滋长的危险性。1891年1月31日，在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沉重地打击了机会主义者。同年，党在爱尔福特召开代表大会，通过“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纠正了“哥达纲领”的许多错误观点，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但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恩格斯写了《爱尔福特批判》，批判了党内合法主义谬论。

德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日益增长的军费负担和物价的不断上涨，使广大工人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从而工人运动高涨起来。1903年萨克森12万纺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10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1/10，但由于工会领导的叛变而失败。1905年，鲁尔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25万多人。1906年，全德共发生了3626次罢工。1910年，工人不仅为改善生活而斗争，而且还展开争取普选权的运动。1912年许多城市的工人示威游行，和警察发生冲突。

罢工的频繁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冲击的开始。但是，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分裂为左中右三派，未能领导和组织工人群众向统治阶级发动革命。

左派的领导是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倍倍尔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他们积极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但左派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低估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在组织上又没有同右派脱离关系。

中派以考茨基、哈泽为代表，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借口维护党内“团结”，迁就右派，甚而为他们辩护。

右派的代表人物是伯恩斯坦、福尔马尔(1850—1922年)等人。他们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宣传“和平过渡”，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者。

1913年倍倍尔逝世后，党的领导权为右派谢德曼所篡夺，德国社会民主党丧失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蜕化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党。

第四节 美国

美国内战后经济的发展和托拉斯帝国主义的形成 在19世纪的后半期，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内战中

北方的胜利，为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宅地法》的实施使西部地区得到开发，扩大了国内市场；欧洲大量资本的输入，为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美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便于应用欧洲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外国大量的移民，以及黑奴的解放，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美国自然资源丰富，盛产煤、铁、石油等重要物资。此外，这一时期的美国对教育和科技极为重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奖励科学发明。1869年起，美国开始实行学位制，培养出大批优秀的理工科人才，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各种重要的发明不断出现。到1890年，美国政府发出的专利证明达40多万份。这些有利条件，使美国经济在短期内便处于领先地位。

1860年，美国工业居世界第四位，到1892年即跃居第一位，工业产量约占欧洲各国生产的总和的1/2。1860—1900年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6倍。其中煤、铁、钢和石油产量的增长尤为突出。1870年，煤的产量为3310万吨，1900年增为26970万吨；钢产量1880年为120万吨，到1900年为1020万吨；石油开采量，1870年为2亿加仑，1900年增至27亿加仑。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1/3以上，超过了英、法、德、日4国的总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加速了美国农业的发展。从1880年到1900年，美国开垦的土地面积，超过了英、德、法三国土地面积的总和，再加以采用先进农业技术，美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增加了2/3。

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同样发展着。特别是19世纪最后30年的3次经济危机，更加速了集中的过程。托拉斯是美国垄断组织的普遍形式。美国第一个托拉斯是“美孚石油公司”，这个1870年建立的公司，在1882年形成了托拉斯，控制了石油生产的9/10。随后在其它工业部门都相继出现了托拉斯，到1904年，在工业、交通、公共事业中组成了445家托拉斯，到20世纪初，形成了洛克菲勒、摩根、梅隆、杜邦、库恩—罗比、芝加哥、克利夫兰、波士顿8大财团。大托拉斯控制了95%的石油，钢铁的66%，金属工业77%，化学工业81%，汽车制造业、制糖业和烟草业的80%。托拉斯掌握了美国的经济命脉。

美国高度集中的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形成巨大的财政寡头。20世纪初，在美国形成8大金融寡头集团。其中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居于支配地位。他们通过花旗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控制了112家银行、运输、保险和商业公司，占有了全部国民财富的1/3。据1913年统计，占全国人口总数2%的垄断资本家，拥有全国财富的60%。而占65%的劳动人民，只占国民财富的5%。

一小撮金融寡头通过托拉斯支配着美国经济，控制着美国政治，并对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进行渗透，所以列宁称美国为典型的托拉斯帝国主义国家。

美国的两党政治和对内对外政策 美国内战后，两党制进一步确立起来。由于垄断资本的发展，金融寡头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原来代表北方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变成大工业家和金融家利益的代表；民主党则从南方种植园主的政党转变为南方新兴工业、农业资本家的代表。它们都成为垄断资本家统治压迫人民的工具。

美国内战后，共和党居于优势地位。从内战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共和党执政有 40 年之久。从 1868 年起，共和党人格兰特任两任总统。在他任职期间，联邦政府采取与南方妥协政策，赦免南方叛乱领袖，撤消对南方的军管。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贿赂公行，人民深为不满。1877 年格兰特任满后，由共和党人海斯、加菲德和阿瑟相继为总统。1883 年国会通过“文官制度条例”，规定用考试办法任用公务人员。1884 年大选时，共和党因声名狼藉而落选，民主党的克利夫兰被选为总统。克利夫兰清洗了联邦政府的共和党人，促使国会通过减低关税法，招致许多资产阶级的不满。1889 年，共和党的哈里逊上台后，又颁布了麦金莱法，大大提高了关税率。由于社会上反托拉斯呼声的高涨，1890 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凡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订立合同、联合、或以阴谋限制州际或对外商业和贸易活动者”，均属非法，但托拉斯仍然有增无减。让人民更为不满的是资本家利用反托拉斯法以限制工会的活动。

1893 年民主党克利夫兰第二次当选总统，曾经镇压铁路工人的大罢工。1897—1913 年共和党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先后任总统。其中罗斯福影响较大。他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曾经进行了所谓的“反托拉斯战”。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控制托拉斯的作用。他还采取措施保护森林、发展水陆交通。

1912 年总统选举，民主党威尔逊当选。他镇压了 1913 年科罗拉多矿工的罢工，颁布了安德伍德法案，降低了一百多种商品的进口税。这个法案之所以通过，主要在于美国已经成为第一位工业强国，不需要实行保护关税了。威尔逊政府还规定了海员的最低工资和铁路职工的八小时工作日。1914 年国会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禁止企业的董事的兼职，不许一个企业占有同行企业的股票，但也没有触动托拉斯的根本利益，因为法令规定法院在处理劳资纠纷时，以不损害资本家利益为前提。

美国自建国以来，主要致力于国内的发展，对外采取孤立主义。内战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和西部的开发，资产阶级要求开辟海外市场和原料供给地，美国便迫不及待地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于是积极扩充军备，兴建海军。在 1886—1893 年间，军费由 1700 万美元增到 3000 万美元，军舰由 3 艘增至 12 艘，美国海军实力由世界第 12 位，跃居第 5 位，美国把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亚洲和拉丁美洲。

美国内战以后，便开始向亚洲侵略。1866、1867、1871 年，美国 3 次侵犯朝鲜，遭到朝鲜人民的英勇抵抗。1882 年，美国军舰又一次进犯朝鲜，打开了朝鲜国门。尔后强逼朝鲜开辟三个商港，获得领事裁判权。1893 年，美国在夏威夷发动政变，建立傀儡政权，1898 年将这个岛国正式吞并。美国为了夺取具有重大经济和战略价值的古巴和菲律宾，1898 年发动了第一次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1895 年，古巴发生了由何塞·马蒂领导的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起义军与 20 万西班牙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沉重打击了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美国趁机插手古巴事务，引起西班牙政府的不满。1898 年初，西班牙驻华盛顿的公使迪皮伊·德·洛姆写给在古巴的一个西班牙记者的信被一个美国密探得到。因信中有对美国总统麦金莱不恭的言辞，美国便

就此事发出一阵战争叫嚣。同年2月15日，停泊在哈瓦那港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爆炸沉没。美国方面将责任归于西班牙，并在23日向西班牙宣战。美国海军先后在马尼拉湾和古巴的圣地亚哥附近海面将西班牙海军击败。6月，美军占领马尼拉，7月占领波多黎各。7月22日，西班牙求和，美西战争结束。8月，西班牙在美国起草的协议上签字。西班牙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割给美国。

接着，美国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针对中国已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的情况，美国于1899年宣布“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表明：美国谋求依靠其经济实力，挤进列强的势力范围，取得侵华的机会均等。1900年，美国又积极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

美国对外扩张的重点是拉丁美洲。19世纪80年代，美国打出泛美主义旗帜，企图独占拉丁美洲。1889年，美国策划召开了第一次泛美会议，成立了泛美联盟，会址设在华盛顿，由美国操纵，使之成为美国侵略和奴役拉美人民的工具。20世纪初，罗斯福和塔夫脱对拉丁美洲分别推行“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大棒政策”的具体应用是夺取巴拿马运河区。巴拿马原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领土。1903年，美国唆使巴拿马分离主义分子发动叛乱，成立巴拿马政府，宣布独立。美国取得在运河地带设防和驻军权。“金元外交”是以援助弱小民族为招牌，通过奴役性贷款对它们实行控制。美国就是通过玩弄这样的手段，掌握了圣多明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的经济命脉。美国加紧对加勒比海的侵略，强迫这个地区变为美国的“内湖”。

1913年威尔逊上台后，仍然执行侵略拉丁美洲的政策。在1914和1916年，两次武装干涉墨西哥内政，曾把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海地置于美国保护之下。

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由于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人队伍急剧壮大。19世纪60年代，美国产业工人只有150万人，到20世纪初增加到1000多万。工人的生活极其困苦，工作日一般长达14到16小时，劳动强度很大。伤亡事故不断发生，矿山经常发生矿井坍塌和瓦斯爆炸。当时又没有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很多工厂实行实物工资和公司商店制，工人受着更残酷的剥削。

自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工人展开反资本主义的斗争。1873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工人多达400万人，铁路工人的工资下降25%，其他行业的工人的待遇愈加降低，工人展开罢工斗争。1877年，美国工人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大罢工。这次罢工的主力是铁路工人和矿工。全国主要铁路干线陷于瘫痪。匹兹堡工人占领全城有7天之久，圣路易斯的罢工群众控制该市长达两周。纽约、新泽西、费城的罢工工人与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工人大罢工吓坏了统治阶级，联邦政府派大批军警才镇压下去。

8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为了要求实现8小时工作日，全国各地35万工人于1886年5月1日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这次罢工波及11000多个厂矿企业，震撼了美国各界。185000工人争得了8小时工作日的权力，其他工人的工作时间也略有减少。虽然，美国工人在这次斗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但芝加哥工人遭到残酷镇压。5月3日，资产阶级民团打死了6名工人，5月4日，13000名工人在干草市场举行大会，声

讨资产阶级罪行，破坏分子投掷炸弹，军警开枪射击，打死7人，伤200多人，数百人被捕，7名工人领袖被判死刑。虽然美国和世界工人抗议美国政府的暴行，要求释放无辜工人，但法庭仍然绞死了4个工人领袖。1886年5月1日的罢工运动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决议，规定“五一”为国际劳动节。

开展罢工运动的同时，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869年成立的“劳动骑士团”在70、80年代发展起来。这个组织最初是个秘密性的团体，1878年正式公开。它在“一人受害，大家关心”的口号下，不论种族、性别和信仰，希望将所有的工人团结在一起，其基本成员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这个组织曾经参加过多次罢工斗争。1881年，由于机会主义者特伦斯·包德利（1849—1924年）篡夺了领导权，反对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劳动骑士团失去了工人的支持，19世纪末便瓦解了。

1881年，美国6个全国性的行业工会在匹兹堡举行代表大会，建立“美国和加拿大有组织行业与劳工会联合会”。1886年改名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劳联成立初期，主张争取8小时工作日，领导了1886年“五一”大罢工。但是劳联在机会主义者塞缪尔·龚伯斯（1850—1924年）的领导下，用高额会费限制非熟练工人和黑人参加，1900年参加者只有57万人（当时美国工人有750万人）。劳联领导竭力宣扬阶级合作，提出工人应得“公平工资”，资本应得“公平利润”的口号，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所以劳联的出现，严重阻碍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发展起来。早在1857年，德意志移民左尔格和魏德迈在纽约建立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1867年，成立了第一国际支部。第一国际解散后，1876年7月19—22日，社会主义者在费城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美国社会劳动党”。第二年12月改名为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其成员90%是德国移民，他们同美国其他工人组织联系很少。另外，党内以左尔格和魏德迈为首的革命派不占优势，以帕吞为首的拉萨尔主义者占了多数，他们把党的主要任务局限于议会斗争。因此社会主义工党内部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19世纪的后半期，农民运动也高涨起来。60年代成立的农民协进会，到70年代已发展到150万人，全国有21,967个分会。通过这个组织积极展开反对资本家剥削、铁路公司侵占土地和提高运费的斗争，并提出“把农场变成自给自足”的乌托邦式的口号。这一运动实质上是一次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内战期间，美国政府曾发行了大量背面印有绿色花纹的纸币。这种纸币在战后迅速贬值。大批农民在内战中负债累累，本应用这种纸币偿还，但1870年，政府宣布回收这种纸币，让农民用硬币偿还债务，将绿背纸币的贬值损失转嫁给农民。1875年，一些农民组织联合成立了“绿背党”。要求建立低值货币制度，继续保持绿背纸币的流通。绿背党还积极参加政治和竞选活动。1878年，一部分工会与绿背党合流，组成绿背劳工党。党纲中不仅有农民的要求，而且也体现了工人的愿望。这个党曾经在国会中获得10个议席。

1892年，西部与南部的农民适应斗争的发展，又组成了平民党。其

纲领为：将铁路、电讯等公共事业收归国有，实行 8 小时工作日和累进所得税，重新分配铁路公司和投机商的土地。该党以反托拉斯为主要目标。参加者不仅有农民，还有工人和小企业主，平民党积极参加竞选活动。1892 年，有 40 名党员被选为国会议员，4 人当选为州长，总统候选人韦弗得选票一百多万张。但是，平民党成分复杂，内部分裂，农业资本家窃取了领导权。因而逐渐倒向民主党，到 20 世纪初，便销声匿迹了。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垄断资本家为了谋取高额利润，采取生产组织科学化以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榨取工人血汗。1893、1903 年又发生两次经济危机，美国工人生活的进一步恶化，又促使了工人运动的高涨。1898—1905 年，共发生 1200 次罢工，参加者有 200 万人之多。1906—1913 年，罢工的人数达 530 万人。随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高涨，社会主义运动更发展起来。

1907 年成立的美国社会党引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1912 年，社会党党员发展到 125000 人，有不少人被选为州议会议员，在总统选举中，其候选人尤金·德布斯（1855—1926 年）获得 90 多万张选票，给美国两大党很大的威胁。此后，社会党发生分裂，以西尔奎特为首的右派，公开投降资产阶级，把议会斗争当作唯一的斗争方式，左派德布斯等人主张必须把议会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结合起来。但德布斯等人的主张受到西尔奎特派的攻击，德布斯也被排挤出党，社会党便蜕化为机会主义政党。

劳联的机会主义路线激起工人群众的不满，比尔·海伍德（1869—1928 年）为了适应工人斗争的需要，在 1905 年 6 月领导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简称产联）。其成员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季节工人，主张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产联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较大，1908 年产联分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主张采用直接行动，因而社会主义者退出产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产联实际上陷于瓦解。十月革命后，产联的优秀分子组成美国共产党。

第五节 俄国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形成 1861 年农奴制的改革，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障碍。再者，俄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便于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有助于大型企业的发展；沙皇政府的加工订货、直接投资、保护关税等措施，使工业受到了扶植。所以，俄国资本主义有较大速度的发展。到 80 年代，基本上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860—1890 年，钢产量增加 3 倍。生铁产量增加近 10 倍，煤产量增加 19 倍。铁路线长度从 1861 年的 1500 多公里，增加到 1900 年的 53000 多公里。铁路的修建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俄国工业，不但发展较快，集中程度也较高。

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同时，农业也日益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农奴制的改革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城市人口和工人的增加又推动了农产品的生产。1864—1905 年，谷物产量增加了 1.5 倍。在农村出现了剥削雇农的富农。地主经济也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但是，由于大

量封建残余的存在，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相当缓慢。

俄国无论在科技水平或工业产量上都落后于其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据 1897 年调查，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五。20 世纪初，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只占 41%。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输出谷物来换取外国工业品的农业国。

虽然俄国比较落后，但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也走上帝国主义阶段。80 年代出现了第一批垄断组织，1900—1903 年危机以后，垄断组织广泛发展起来。俄国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是辛迪加。1900 年，巴库的五大石油公司控制了全国石油产量的 45%，南俄的 7 大铁矿控制了全国生铁产量的 57%。1910 年“金属销售公司”这一辛迪加的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 80%以上。

20 世纪初，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起来。亚速海—顿河、国际、联合、道胜等 8 家银行，控制了全国银行资本的 55.7%。由于工业企业家的投资和银行向工业企业的长期贷款，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银行资本家垄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工业资本家也大量投资于银行。这种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在一起的财政资本，控制着俄国的经济命脉。

20 世纪初，俄国形成帝国主义国家，但它仍然保存着大量封建残余。如广大农民在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下，仍然受着封建剥削，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在当时的条件下，沙皇政府需要垄断资本家的财政支持，垄断资本家也需要依靠沙皇政府的军事力量，对内镇压人民和向外侵略，他们还要依赖政府的订货和保护关税等扶植政策。这样，垄断资本家便同封建专制政府结合起来，所以列宁认为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由于沙俄政府力图通过野蛮的剥削和掠夺弥补其财政的不足，俄国广大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受到极其严重的压榨。国内市场的狭小，以及由于生产落后，不能与其他列强竞争，沙俄更加进一步向外侵略。俄国帝国主义的经济落后，为英、法、德、比等外国资本的输入提供了机会。1914 年，外国资本在工业资本中占 17%，采煤、石油、金属加工等主要工业部门多为外国资本家所控制。沙皇政府为了支持庞大的政府经费，也不断向外国借债，每年交付高额的利息。沙俄政府成为西欧垄断资本剥削、奴役俄国人民的代理人。俄国帝国主义把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民族的，以及外国资本的种种压迫剥削集中在一起，成为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俄国的对外侵略扩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帝国主义过渡，沙皇俄国更加疯狂地向外扩张侵略。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沙俄的侵略矛头主要指向巴尔干半岛、中亚和中国。俄国为了实现其称霸欧洲的宿愿，趁巴尔干、斯拉夫民族反土耳其统治的机会，发动了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结果，土耳其战败，签订了《圣斯特凡诺和约》，俄国占领了土耳其的阿达汉、喀尔斯和巴统，割取了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又置保加利亚于俄国的保护之下。从而在巴尔干半岛取得了优势，占了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基地。但是，英国与奥匈不愿俄国的势力强大，

故以与俄国断交相威胁，俄国被迫与英、奥等七国在 1878 年签订了《柏林条约》，这样，俄国在巴尔干的力量受到削弱，使这一地区成为欧洲列强角逐的场所。

为了打开通向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之道路，沙俄在迫使布哈拉汗国臣服以后，1873 年又征服希瓦汗国，1876 年吞并浩罕汗国，1885 年占领了土库曼的大部分地区。这样，到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便在中亚建立起殖民统治。对中亚的征服，为沙俄下一步向阿富汗和伊朗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侵略中国和朝鲜是俄国夺取东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沙俄充当了急先锋。1895 年，俄国趁清政府无力向日本赔款的时机，同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项以海关收入为抵押的 4 亿法郎借款合同。1896 年又以俄曾协助中国共同抵御日本为幌子，与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夺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管理权。1897 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后，俄国又乘机占领旅顺、大连。以后，俄国又把旅顺据为独占军港，获得在中东路沿线驻军、采伐木材和开矿权，使东北沦为其势力范围。1900 年，沙俄除派兵镇压义和团起义外，还遣十几万大军入侵东北，烧杀抢掠。

日俄战争后，沙俄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受到削弱，但加紧对当时中国领土外蒙的侵略。1911 年它策动外蒙古一小撮反动活佛王公宣布“自治”，实际上控制了外蒙古。与此同时，俄国还强占中国唐努乌梁海等地 1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沙皇俄国通过不断的扩张，到 1914 年，已占有 1740 万平方公里，3320 万人口的殖民地。

民粹派运动 由于俄国广大农民遭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农村反对专制制度，要求获得土地的斗争不断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民粹派运动。民粹派主要是由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团体。他们主张消灭沙皇专制政体和农奴制，把土地分给农民。民粹派不承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起来的必然性，鼓吹保存前资本主义小生产和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认为俄国农民村社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胚胎”。他们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甚至认为无产阶级在俄国出现是历史的“不幸”，宣传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暴动就可推翻沙皇专制政府。

19 世纪 60、70 年代，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等地先后建立起第一批民粹派团体。其代表人物是拉甫洛夫（1828—1900 年）和特卡乔夫（1844—1885 年）。起初，他们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展开宣传工作。1874 年春夏之交，他们发动了“到民间去”的运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穿起农民的服装，学说农民的语言，进行宣传鼓动，号召农民举行暴动，推翻沙皇政府。但农民没有接受他们的激烈空洞的口号，没有响应他们的号召。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大批民粹派分子被逮捕流放。

1876 年，有的民粹派分子提出“土地与自由”的口号，组织了“土地与自由社”，以教师、医生等身份在农民中进行活动。但也遭到失败。1879 年，“土地与自由社”又发生分裂，坚持民粹派旧路线的人组成“土地平分社”，不久停止活动；主张采取恐怖手段，诬蔑人民群众为“群

氓”的一派，组成了民意党。1881年3月，民意党人在彼得堡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以更残暴的手段进行镇压，民意党被摧毁了。

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导致了他们在理论、路线和策略上的错误。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粹派的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和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们的个人恐怖活动，转移了劳动人民对剥削者进行阶级斗争的视线。80年代以后，民粹派的大多数人放弃斗争，转而同沙皇专制制度妥协，堕落成为富农利益的代理人。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传播，民粹派的错误理论和斗争策略就成为革命的障碍了。

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工人数量不断增长。1865—1890年间，仅大工厂、采矿和铁路的工人就由70多万增加到143万多人。俄国工人身受封建残余和国内外资本的三重压迫，状况极其恶劣，工作日一般是12—14小时，有的长达16—18小时，工资也远远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此外，厂主还经常滥用罚款、包工制，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在政治上，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俄国不但没有任何劳动立法，而且工人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殆尽。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榨，使俄国工人具有高度的革命斗争精神。

19世纪70年代，俄国工人阶级便开始走上斗争的道路。1870年5月，彼得堡涅瓦纱厂举行了俄国工人第一次罢工。此后5年间，俄国共发生了105次罢工，54次暴动。经过斗争实践，工人觉悟不断提高，认识到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1875年，在敖德萨建立了工人第一个独立组织“南俄工人协会”，其章程要求把“工人从资本和特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协会只存在8个多月，就被专制政府解散。1878年，“南俄工人协会”的组织者奥布诺尔斯基和哈尔士林成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目的在于“推翻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其最近任务是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和缩短工作日。1880年，这个工人协会也被宪兵摧毁。以上的两个工人组织的出现表明：俄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但是它们还不是群众性的组织、成员都只有一二百人，而且在思想上还受了民粹派的影响。

8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在1880—1890年间，工人发动了500次左右的罢工斗争。1883年俄国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它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侨居日内瓦时成立的。其主要成员有阿克雪里罗得、扎伊奇、伊格纳夫等。普列汉诺夫原是民粹主义者，1880年由于沙皇的通缉逃往国外。他在国外侨居的前期，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探索了民粹派失败的原因，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心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不少工作。它把《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著作，译为俄文，在国外印好，运到俄国秘密散发。普列汉诺夫还写了批判民粹派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如《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等。在这些著作里，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民粹主义理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无产阶级是俄国历史上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个阶级。普列汉诺夫还阐述

了马克思主义的英雄史观，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英雄人物只有在其思想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一致的条件下，才能够起作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培养出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严重地打击了民粹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做了开辟工作，但普列汉诺夫有严重的思想错误。其中主要的是：忽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不理解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允诺个人恐怖行动，过高估价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等。在劳动解放社活动的同时，俄国还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但它们同劳动解放社一样，同工人少有联系。

当时，俄国革命者的迫切任务是将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彻底批判民粹派的观点。这些伟大的历史任务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1870—1924年）完成的。

列宁早期的革命活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里扬诺夫）1870年4月22日生于辛比尔斯克（现名乌里扬诺夫斯克）。188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同年12月，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流放农村。1888年秋，列宁返回喀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1889年，列宁全家移居萨马拉（现名古比雪夫）。在这里，列宁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曾多次到农村调查研究，1893年写出了《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指出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农村，农民正在分化，证实了民粹派理论的错误。

1893年8月，列宁来到彼得堡。当时，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等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为了彻底粉碎民粹主义，1894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等著作，阐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发展起来。无产阶级是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其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列宁进行了反对以司徒卢威为首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沙皇政府所允许的合法刊物上发表文章，企图通过反对民粹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要求，列宁揭露了他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本质。

1895年，列宁经过艰苦的努力，把彼得堡20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曾经领导了1895—1896年彼得堡的群众性的罢工斗争。在它的推动下，莫斯科、基辅等地也建立了同样的斗争协会，各地斗争协会积极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使俄国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沙皇政府对斗争协会进行了疯狂镇压。1895年12月，列宁被捕，在狱中一直坚持斗争，189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流放期间（1897—1899年），列宁坚持理论研究，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30多部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1898年3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的斗争协会，在明斯克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有 9 个代表出席，列宁因在流放地，未能参加。会议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实际上没有完成建党任务。

当时俄国的经济派猖狂地散布修正主义观点，成为建立统一政党的严重阻碍。经济派公开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斗争，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工人只作经济斗争。列宁在流放地便提出，为了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必须同经济派斗争。1900 年初，列宁从西伯利亚回来，为了批判经济主义和团结各地马克思主义组织，决定创办一个全俄性的党报。因为国内环境险恶，列宁经过艰苦的工作，于同年 12 月在德国莱比锡创办了《火星报》，作为批判经济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建党活动的阵地。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1902 年所著的《怎么办？》，彻底批判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在这些著作中，论述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政治斗争对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决定作用；阐明了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指出工人的自发斗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批判了经济学派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指出如果没有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列宁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思潮，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列宁领导《火星报》经过三年的努力，把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创造了建党的必要条件。1903 年 7 月 30 日—8 月 23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先在布鲁塞尔，后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的代表有 43 人，其中还有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列宁亲自出席。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构。

在讨论党纲问题时，围绕着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展开了斗争。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报派驳斥了机会主义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通过了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党纲。党纲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规定：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的内容是：党的当前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消灭农奴制残余。这个党纲第一次列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形成同第二国际诸党纲领的根本区别。

在讨论党章时，就组织路线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列宁制定的党章第一条规定：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主张，宣扬只要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不必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都可以自行“列名”入党。这种主张只能使党变成一个没有统一纪律、组织涣散的团体。但是，在表决党章第一条时，由于机会主义者的反对，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但在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时，机会主义分子遭到失败。列宁的拥护者占了多数，称“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占少数，称少数派，即孟什维克。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1903 年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出现，标志列宁主义的诞生。

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分子开始了分裂活动。普列汉诺夫这时已经堕落为孟什维克分子，他们篡夺了《火星报》的领导

权，攻击列宁主义，鼓吹修正主义。列宁在1904年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批判了孟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

俄国1905年革命 20世纪初，随着俄国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形，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由于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3000多家企业倒闭，10多万失业工人流落街头，在职工人的工资也大幅度降低。随着工人生活的急剧恶化，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他们开始从经济罢工转到政治斗争，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治自由，实行8小时工作日。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广大农民也积极开展斗争，1901—1904年，俄国的欧洲地区有84%的省份发生了农民运动，与此同时，学生运动也高涨起来。1901年末到1902年初，有30000多学生举行了罢课。在工农运动高涨的同时，俄国的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由于沙皇政府推行民族压迫和俄罗斯化政策，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初等教育俄语化的政策。1901年，沙皇宣布废除芬兰自治，解散芬兰的民族军队，其政府内部的所有高级职务，均由俄罗斯人担任。在犹太人居住地区，对犹太人的各种事务干预的更为严格，并在许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排犹运动，使许多犹太人流落异国。少数民族对沙俄政府的压迫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在革命风暴行将来临的形势下，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粹派的残余分子也活动起来。前者先后成立了“地方自治立宪主义者同盟”和“解放同盟”，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后者组成“社会革命党”。提出把全部土地交由村社统一支配。

沙皇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方面妄图操纵工会，从内部破坏工人运动，结果，没有得逞。另一方面，发动同日本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但这场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1905年俄国革命是从1月9日（公历22日）星期日开始的。

1905年1月3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为抗议无理开除4名工人举行大罢工。其他工厂立即响应，到1月8日发展成全市总罢工。沙皇政府为了镇压工人运动，指使其走狗加邦牧师引导工人向沙皇请愿，以便乘机对工人进行屠杀。由于工人没有识破沙皇政府的阴谋，1905年1月22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14万多人向沙皇和平请愿。沙皇政府命令军队向请愿工人开枪，有1000多人死难，2000多人受伤。史称“流血星期日”。1905年革命从此开始了。

“流血星期日”的消息激起全国城市抗议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在1月间，罢工人数就达44万人。同时，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也在一些地方开展起来。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布尔什维克制定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1905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孟什维克拒绝参加，并在日内瓦单独召开会议。伦敦代表大会指出：革命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在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争取掌握领导权，建立工农联盟，推翻沙皇政府，立即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大会还修改了党章，摒弃了马尔托夫的第一条条文，采纳了列宁的第一条条文。而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炮制了一条拥护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列宁又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

命中的两种策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全面批判了孟什维克的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充当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反对建立工农联盟、反对武装革命、反对建立工农革命民主政府等谬论。这本书粉碎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奠定了党的策略基础。

在列宁的革命路线指导下，革命逐渐走向高潮。1905年5月1日，许多城市举行了“五一”节政治罢工，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7万多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并且于5月中旬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运动也随着发展起来。1905年夏，在欧俄的501个县中，有104个县发生了农民起义。工农运动的发展影响了军队，6月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举行起义，开往敖德萨，但由于领导那里罢工的孟什维克阻止水兵上岸，终于被镇压下去。10月，革命运动发展为全俄政治总罢工，职员、学生、教师、工程师和医生也群起响应，全国陷于瘫痪状态。在罢工的浪潮中，许多城市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成为革命政权的萌芽。

面对革命风潮，沙皇政府被迫做出了让步。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沙皇政府宣布，允许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建立拥有立法权力的国家杜马。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对沙皇的让步十分满意，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俄国已经进入了君主立宪的国家行列之中。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向人民呼吁，沙皇的让步决不等于专制制度被彻底废除，要取得革命成功还必须进行长期与艰苦的战斗。

在革命处在重要关头时，列宁于1905年11月9日从瑞士回到彼得堡。亲自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9日，莫斯科的政治总罢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工人同政府军队激战了9天，由于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的被捕和孟什维克的鼓吹投降主义，起义被镇压下去。在莫斯科起义的同时，格鲁吉亚、乌克兰、西伯利亚等地也爆发了起义，12月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此后，革命开始逐步退却。1906年7月21日，沙皇宣布，根据他在上一年10月宣言所建立的国家杜马为非法，并将其解散。并任命斯托雷平为大臣会议主席，并宣布召开第二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考虑到革命已处于低潮，遂参加了第二届杜马的竞选，以利用杜马的讲坛进行革命宣传。1907年1月，国家杜马召开，左派力量几乎占议席的半数。在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农民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在这种情况下，斯托雷平借口布尔什维克要发动政变，非法驱逐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并将其中的16名代表流放。6月3日，斯托雷平宣布解散第二届杜马，史称“六·三政变”。这一事件标志着1905年革命的终结。

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处于分裂状态，孟什维克的破坏削弱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其次，没有形成坚强的工农联盟，农民、士兵行动迟缓，甚而有的农民对立宪还抱有幻想。最后，国内资产阶级极力帮助沙皇政府镇压革命，如美国协助签订日俄和约，使沙皇政府从前线抽回兵力，应付国内形势，集中精力镇压革命，法国资产阶级给沙皇政府贷款，帮助它摆脱财政危机。

1905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它沉重地打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锻炼了俄国革命群众，使他们认识到沙皇制度是人民的死敌，必须用暴力去推翻它，也看清了孟什维克的真正面

目，提高了布尔什维克的威信，显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和先锋作用。最为重要的是，这次革命使俄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受到了一次真正的锻炼，所以列宁称这次革命是十月革命的总演习。这次革命推动了欧亚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西欧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新发展，在亚洲、伊朗、印度、土耳其相继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 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进入总理大臣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时期（1907—1912年）。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革命人民惨遭杀害。在革命失败后的3年间，有5000多革命者被处死刑，有数万人被流放服苦役。资产阶级和地主也疯狂地向工人、农民反攻倒算。

1910年6月，地主和资产阶级所控制的杜马通过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强行拆散农村村社，规定份地归农民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在农村出现了一个新富农阶层，从而扩大了沙皇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

在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下，一部分经不起敌人打击的孟什维克形成“取消派”，公然提出取消秘密的革命的党，另建为沙皇政府所允许的“公开的工人党”。同时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出现了“召回派”，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拒绝一切合法斗争，要求“召回”党在杜马中的代表。列宁对以上两派进行了批判，指出，建立所谓的“公开的工人党”是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而“召回派”的作法则将减少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根据革命低潮时期的特点，提出了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相结合的策略方针。列宁还在组织上采取了坚决的立场，1909年6月，将召回派分子开除布尔什维克。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清除孟什维克取消派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成为统一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六节 日本

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1868年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20世纪初，它已加入帝国主义国家行列。

日本最初的近代工业，主要由国家经营，并以军事工业为基础，以纺织工业为重点。政府在原来幕府和诸藩的军工场的基础上，又发展起使用机器的军事工业。纺织工业也发展起来，在1872—1892年间，纱厂增加1.4倍，纱锭增长了47倍。

从1880年开始，政府将军火工业以外的国有企业，通过出售或无偿赠与的办法都转让给私人。得益者都是同藩阀官僚勾结的特权商人，如三菱、三井、住友、大仓等。这些财阀集团构成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在政府的扶植下，在80年代就出现了垄断组织。到19世纪末，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垄断组织，已成为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四大财阀。

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掠得2.3亿两白银的赔款，并取得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在中国倾销商品和开设工厂等特权，使资本主义更加迅速发展。工业资本1903年比1894年增加了2.7倍，铁路1901年比1893年增长一倍，航运1903年比1893年增长6倍，进出口额1903年比1893

年增长了 3.4 倍。20 世纪初，日本在完成产业革命的同时，主要工业部门都被三井等垄断组织所控制。这几家大财阀集中了全国资本的 57.4%，纱锭的 58.7%，铜矿产量的 69%，煤炭的 54%。它们在金融及其他工业部门也占有垄断地位。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内封建残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明治维新后，半封建的地主剥削制度仍然存在。佃农交纳苛重的地租，自耕农也经常负债累累，农民子女往往被迫涌入城市成为工人。日本的垄断资本家与大地主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之中，有的是大地主，有的原来是封建特权商人。这些封建贵族、地主官僚与财阀结合在一起，控制了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极端贫困，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向外侵略。而三井、三菱等财阀则以军事工业为支柱，为日本军阀的对外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侵略战争的胜利，则又为财阀们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原料基地。因此，日本和俄国帝国主义一样，都带有军事的、封建的性质，所以列宁指出：“日俄两国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极为广大的领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

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建立后，国家大权实际上掌握在萨摩和长州两藩武士出身的官僚与军阀手中。他们以天皇的名义任意发号施令，实行“藩阀专政”。明治维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社会性质。国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被排挤在政权之外的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一般的商人和地主，虽然由于维新得到了经营自由和土地的私有权，但是政府竭力扶植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则使他们的经营举步维艰。大批的没落武士则对“藩阀专政”和由于改革而失去的种种特权而愈益不满，从 70 年代起，以手工场场主为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商人、没落武士们便要求成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结果导致了自由民权运动。以福泽谕吉、加藤宽治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著书立说，翻译西方名著，大力宣传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武器。

由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一部分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对官僚专制不满。明治初期由福泽谕吉等人组织的“明六社”，积极宣传“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理论，提倡“自由”、“民主”和宪政。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潮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自由民权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

1874 年 1 月，因主张“征韩论”而下野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提出“建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所谓征韩论，是指 1873 年，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以“朝鲜侮日”为借口提出“征韩论”，认为，日本要想富国强兵，第一步必须征服隔海相望的朝鲜，然后，以此为跳板，向东亚大陆扩张。然而，征韩论遭到了主张“内治优先”的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连续被排挤出政府，成为政府的反对派。1874 年 1 月，板垣退助等人组织了“爱国公党”，提出建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建议书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民选议院，并对官

僚专制政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建议书”遭到政府拒绝。板垣等人对政府的批评，在本质上属于在野派同当权派的斗争，但是它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各阶层反对官僚专制的要求，导致了日本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4月，板垣和片冈健吉等人创立了“立志社”，宣传“天赋人权”思想，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中心汇合了各地的政治社团，建立起全国性组织——“爱国社”，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1877年6月，片冈健吉将上书内容公诸于众，向民众发出呼吁。上书表明自由民权派已开始把自己的斗争和人民要求减轻地租的斗争结合起来，争取民众的力量来实现自由民权主张，使自由民权运动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活动。

1880年3月，爱国社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22个县的114名代表，代表着8.7万多会员（后发展到13万）。大会决定将爱国社改名为“国会期成同盟”，并再次向政府递交开设国会的请愿书。

自由民权派的宣传，使开设国会已成为一种社会潮流。1880年，各地纷纷向政府提出建议书、请愿书并有20多万人签名。在运动的压力下，1881年10月，天皇颁布诏书宣布：将于10年后（1890年）开设国会，颁布宪法。

在运动中，自由民权主义者逐渐分成两派，即以板垣退助为领袖的“自由党”与大隈重信和犬养毅为领袖的“立宪改进党”。“自由党”主张实行法国式的议会制。“立宪改进党”则宣扬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在这些政党中，自由党最为激进。他们往往与农民运动相配合，进行反对专制政府的斗争。1882年在自由党领导下，福岛发生起义，他们打着“自由万岁”、“扑灭压迫”的旗帜同官府进行斗争。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惊恐，从1882年开始，明治政府对民权运动采取了限制和镇压以及收买和挑拨离间双管齐下的瓦解手段。同年，政府诱导自由党总裁板垣游历欧洲，借此削弱自由党领导力量。又让三井收买自由党副总裁后藤象二郎。次年，板垣不顾党内反对，接受政府公费出国。同时，政府又挑唆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相互争斗，从而导致两党威信下降。1884年自由党宣布解散，立宪改进党也趋于消沉，1884年后，自由民权运动乃告终结。自由民权运动虽然瓦解，但在日本历史上意义重大。这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使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思想得到传播，推动了日本由君主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政体的转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次运动是明治维新的深入和发展。

帝国宪法 在自由民权运动压力下，1881年天皇颁布诏书，预定10年后开设国会。此后，日本政治开始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1882年3月，政府派遣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考察团”前往欧洲各国考察宪政。在考察过程中，伊藤博文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宪法甚感兴趣，并在柏林和维也纳，亲自拜会了德国法学家格奈斯特和奥地利法学家斯泰因。对格奈斯特提出的缩小议会权力，加强皇帝和行政权力观点以及斯泰因的皇室自律主义，倍为欣服，而对英国的虚君制和美国及法国的共和制则持排斥的态度，他决心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日本宪法。

1883年8月伊藤回国，开始秘密草拟宪法。1888年完成宪法草案，

经由天皇和枢密院审定，经若干修改后定名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于1889年2月11日正式颁布。

《大日本帝国宪法》共7章76条。宪法赋予天皇至高无上权力，拥有批准和颁布法律、召开和解散议会、任命和罢免文武官吏，宣战、媾和等权力，是海陆军的最高统帅。

天皇之下的重要机关是内阁和枢密院。按照宪法规定，内阁作为行政机关辅佐天皇行使政权。内阁不对议会负责只对天皇负责。内阁中的海、陆军大臣的奏章可直接呈送天皇。枢密院是天皇最高咨询机关，审议重要国务和法律，它虽然不干预施政，但事实上是凌驾内阁和国会之上的最高决策机构。

议会设上下两院。上院（贵族院）由天皇任命的300多个皇族、华族和高额纳税人组成，任期7年。下院（众议院）由选举产生。但按选举法规定，年满25岁，每年缴纳直接税15日元以上的男子有选举权，当时具有选举权者仅占全国人口1.14%。下院议员任期4年，下院对立法和政府预算都有表决权，但不经上院同意，法律和预算不能成立。因此议会不过是天皇政权的一件装饰品。

帝国宪法规定日本国民须称臣民，不称公民。宪法又规定，军部有独立的权力，不受政府的约束，直接由天皇统辖，从而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宪法虽然规定，臣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和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以及非依法不得逮捕、监禁、审问和处罚等权利；然而在另一些条款中又对上述权利加以种种限制乃至取消，反映出日本帝国宪法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日本1889年的帝国宪法，在法律上确立了从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近代天皇制。以1890年11月日本帝国议会成立为标志，日本由君主专制政体变为君主立宪政体。

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受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处境非常恶劣。平均劳动日长达15到18小时，工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低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产业工人队伍也迅速壮大。1889年为226821人，1912年增到939973人，其中女工约占一半以上。灾难深重的工人群众在残酷的压榨下，逐渐觉醒。1886年，山梨县缫丝厂女工反对降低工资和要求减少工时的罢工斗争，揭开了日本近代工人运动的序幕。

1887年片山潜（1859—1933年）首次组织了“工会期成会”，还出版了工会杂志《劳动世界》，通过这个组织的努力，铁厂工会、机会工会、印刷工会相继组织起来。1898年，片山潜、幸德秋水（1871—1911年）等组成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年又组成“社会主义协会”，并在这个基础上创建了社会民主党。虽然该党立即被解散，但它的纲领却在社会上发生了深远影响。它曾要求缩减军备，实行普选。1903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1870—1933年）创立“平民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反对天皇制军国主义斗争。片山潜在荷兰召开的各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曾经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演讲。

20世纪初，许多兵工厂和铜矿发生了罢工，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坚定了工人的斗志。1906年，在工厂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又重建起来。但党内又出现了以田添铁二为首的改良

派和幸德秋水领导的激进派。前者主张争取普选权和合法的议会斗争；后者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认为总同盟罢工是唯一的革命途径。日本政府是不能容忍社会党的存在的，便以“有害于安宁秩序”为借口，勒令社会党解散。1910年，又将幸德秋水等12人处死。

日本政府的血腥镇压，并不能阻止日本工人运动的发展，1912年，东京市的电车工人罢工，引起社会的震惊。片山潜因领导罢工而被捕入狱。1914年出狱后，流亡美国。

日本农民的处境尤其悲惨。他们不仅遭受地主的盘剥，而且还受兵役制的奴役以及资本家的压榨。1871—1874年，共发生89起农民暴动。1876年又发生了三重、岐阜、爱知和歌山四县的农民大起义。他们袭击官府、法院、兵营，惩治官吏，焚毁文契，沉重打击了藩阀专制统治。到20世纪初，农民仍然受着资本主义和封建的双重剥削，没有基本的平等和自由权利。在1898—1907年间，不少农民曾经组织佃农协会，要求改善他们的处境。1900年政府曾颁布《治安警察法》，不许农会存在，压制农民运动的发展。

日本政府对工农运动的镇压，在各国是最残酷的。日本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在极其残酷的条件下向前发展着。

日本的对外侵略 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富国强兵”为国策，疯狂地向外扩张，将其侵略矛头主要指向朝鲜和中国。

1872年，日本把琉球国王劫持到东京，宣布琉球为日本的属地，后来改为冲绳县。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杀，派战船侵入台湾，敲诈“抚恤金”50万两。1875年日本又武装侵入朝鲜，第二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入侵朝鲜的大门。

19世纪80年代，日本决定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但深感自己的力量不够，便向英美求援，而英美又希望假借日本之手排挤俄国在中国的势力，支持日本的侵略行径。于是日本于1894年发动了对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甲午战争。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夺去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白银。沙俄不甘心日本吞并辽东半岛，联合德、法，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但中国又付给日本赎金3000万两白银。

甲午战争后，日本又积极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行，把福建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日本派兵参加“八国联军”。日本与俄国在争夺中国和朝鲜中，发生尖锐的矛盾，终于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1904年2月8日，突然袭击旅顺口的俄国海军。于是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进行了战争。1905年3月俄军在沈阳等地失败，5月俄国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歼后，战争基本结束。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出面调停。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和约，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将旅顺、大连、中东铁路南线让与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1905年底，日本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从朴茨茅斯条约中所得到的各项特权。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便以朝鲜为桥头堡，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参考书：

-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0—848页。
-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0—110页。
-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63—587页。
- 恩格斯：《论美国资本的积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7—339页。
-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1—125页。
- 列宁：《关于1905年的报告》，《列宁选集》，第1卷，第925—943页。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史部分），下册，第563—587页。
- 井上清：《日本近代史》（中）上册。
-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六章。
- 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第十八章。

复习题：

1. 德国统一后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是什么？
2. 试述德国帝国主义的特征。
3. 试述英国的两党执政情况。
4. 英国的新工联和旧工联有什么不同？
5. 简述法国共和党政府的内外政策。
6. 试述19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帝国国义的特征。
7.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在俄国传播起来的？
8. 简述列宁早期的革命活动。
9. 试述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过和意义。
10. 为什么说日本帝国主义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试举出其原因。

第十七章 第二国际

第一节 第二国际的成立

第二国际成立的历史条件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各国工人运动暂时进入低潮。但由于工人生活恶化，不久又高涨起来。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工人阶级所受的更残酷剥削，使他们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激烈。到 80 年代，爆发了许多次规模巨大的罢工，国际工人运动又出现高潮。在罢工斗争中，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支援，经常联系，增强了各国工人国际团结的愿望。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为了加强团结、争取斗争的胜利，便体会到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必要。德国社会民主党于 1869 年成立以后，欧美国家先后成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有：荷兰（1870 年）、丹麦（1871 年）、捷克（1872 年）、美国（1876 年）、法国（1879 年）、意大利（1882 年）、比利时（1885 年）、挪威（1887 年）、奥地利（1888 年）、瑞典和瑞士（1889 年）。在俄国（1883 年）和英国（1884 年）也成立了社会主义组织。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而具备了组织国际的条件。

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许多国家的先进工人迫切寻求解放自己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和其它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译成欧洲文字。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下，各国工人运动中涌现出不少优秀领导人和骨干力量。如德国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法国的保·拉法格、英国的艾威林夫妇等，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团结和教育工人群众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正当国际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需要革命导师领导的时候，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因长期工作过度劳累，于 1883 年 3 月 14 日在伦敦与世长辞。马克思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的逝世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重大损失。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的葬礼上演说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人类、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称“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为建立新国际而斗争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夜以继日地从事理论著述，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二、三卷。他还具体指导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进行工作，为新国际的建立创造条件。

第一国际解散后，虽然各国工人不断要求加强国际团结，但恩格斯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即便成立国际也无济于事。80 年代后期，恩格斯鉴于马克思主义对工人的影响日益加深，而且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已经建立起来，具备了成立国际的条件。于是，开始考虑新国际的成立问题。

与此同时，机会主义者也企图通过建立新国际，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888 年，法国可能派纠合英国的社会民主同盟、英国工联和

美国的劳动骑士团等组织，在伦敦召开预备会议，准备于 1889 年 7 月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借以把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纳入机会主义的轨道。

针对机会主义者的阴谋，恩格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权，号召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行动起来，建立自己的国际组织。在恩格斯的指示下，各国社会主义党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倡议于 1889 年 2 月在海牙举行预备会议，决定于当年 7 月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恩格斯为了保证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揭露可能派机会主义的本质的同时，还对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盖德、拉法格等做了充分的教育，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建立新国际的筹备工作。申明不同可能派联合的重要意义。恩格斯的努力对第二国际起了重要作用。

巴黎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的建立 1889 年 7 月 14 日，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召集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 22 个国家的 393 名代表。改良派也在同一天举行代表大会。在他们的 550 个代表中，可能派就占 477 人，实际上成了法国可能派自己的会议。

在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巴黎公社战士瓦扬(1840—1915 年)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主持了开幕式。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恩格斯因为忙于《资本论》第 3 卷的整理工作，未能出席。这次大会所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劳工立法，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废除常备军以及“五一节”罢工示威游行等问题。由于代表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在讨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便和机会主义分子展开了斗争。

关于国际工人立法，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草案为：要求实行 8 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 14 岁以下的童工，少年工人每天工作 6 小时，加强女工和少年工人的劳动保护，工人参加工厂检查机构，取消实物工资等。倍倍尔明确指出：这些要求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只是现阶段提高工人觉悟的一些手段，有助于使工人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教育。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个提案表示反对。他们主张实现工人的个人自由，否认争取劳工立法的必要性，错误地认为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是无益的。大多数代表不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通过了倍倍尔的提案。

讨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问题时，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工人参加选举和议会斗争，不赞成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经过激烈辩论，大会通过了与无政府主义者愿望相反的决议，明确规定工人阶级必须组织社会主义政党，进行政治斗争，争取普选权。但决议片面地夸大了议会斗争的作用，显示出改良主义的倾向。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为纪念美国工人 1886 年 5 月 1 日总罢工的英勇斗争，把 5 月 1 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共同的节日，各国工人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示威游行，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巴黎大会的其它各项决议。

巴黎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二国际的成立。它最初从定期召开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大会为存在形式。大会的决议鼓舞了工人阶级的斗志。各国工人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五一节的决议。1890 年的五一节，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威力。

第二节 第二国际的活动

第二国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巴黎大会后，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苏黎世和伦敦所举行的三次代表大会，都以反对无政府主义为主要活动。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大批破产的小资产阶级，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无政府主义者利用这个阶层扩大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者扬言采取“直接行动”，如罢工、怠工和抵制，就能消灭资本主义，因而否认政治斗争的作用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引导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必须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1891年8月16—22日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的有14个国家的380名代表。恩格斯没有出席大会，但密切注视着这次大会的进行。当时欧洲形成两大敌对军国主义集团，战争危机不断增长。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军国主义和战争的问题。

以荷兰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846—1919年）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战争都是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挑起的，不可能有进步的、正义的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号召人民举行总罢工来反对所有的战争。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指出军国主义和各国之间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保卫世界和平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加强团结，把反对军国主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他强调说：战争一旦爆发，举行反战总罢工只是一句空话。大会表决时，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李卜克内西提出的议案，无政府主义者遭到失败。

关于实现国际社会主义政党的统一策略问题，是大会另一中心议题。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把“直接行动”作为国际的统一策略。倍倍尔对此进行了坚决回击。他指出：国际工人运动还没有发展到用统一策略去指导各社会主义政党行动的地步，国际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将推翻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同争取民主权利和满足人民经济要求的斗争结合起来。多数代表支持倍倍尔的意见，无政府主义者再次遭到失败。

1893年8月，第二国际在苏黎世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有18个国家的411名代表出席。其中仍有以荷兰纽文胡斯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和对于战争的立场问题。

关于政治策略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再一次肯定了工人进行组织和开展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并建议各国工人必须夺取政权，社会民主党必须保持独立性，不可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在战争问题上，以纽文胡斯为首的荷兰代表团再次提出：如果战争爆发，交战国的工人应立即举行总罢工，拒绝服兵役。德、法等国代表坚决反对。最后通过了德国代表团的提案，除重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外，还要求各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军事预算的反对票，并要求裁减军备。

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72岁高龄的恩格斯出席了苏黎世代表大会，亲自主持了闭幕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1896年7月，第二国际在伦敦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20个国家的535名代表。这次大会重申了以前几次大会决议的精神，讨论

了殖民地和土地问题。19世纪90年代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活动日益激烈。社会主义者理应对殖民地问题表明态度。大会通过决议，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号召殖民地的工人和宗主国的工人团结起来，共同为战胜资本主义而奋斗。关于土地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只是一般地指出：只有土地和矿产归社会主义社会所有，才能使农民摆脱灾难，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这反映了第二国际对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还缺乏认识。

这个期间，第二国际内部已开始滋长右倾机会主义，有些领导人错误地认为议会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唯一形式。于是，恩格斯这时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1891年初，他为了批判改良主义幻想，阐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不顾德国党领导的阻挠，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他还为《法兰西内战》写了再版导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纲领草案批判》，科学地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势必破产，农民必须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必要性。这篇光辉著作提高了德、法广大党员的觉悟。1895年，恩格斯最后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这篇重要文章论述了无产阶级在积极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的同时，还要善于利用合法斗争以聚集力量的策略。

正当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他于1895年8月5日在伦敦逝世。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的逝世也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巨大损失。此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便嚣张起来。

第二国际的革命派反修正主义的斗争 90年代末期，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逆流。除德国的伯恩斯坦等人外，在法国有“入阁派”，在俄国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在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英国等国也都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他们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充当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别动队。修正主义的泛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有些中等资产阶级和大量小生产者破产，因而被卷入无产阶级队伍，致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工人中广泛传播起来；再者工人贵族阶层在各国普遍出现，他们宣传工联主义，涣散工人的斗志，形成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此外，资产阶级政府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和各国工人党在议会选举中的不断胜利，助长了和平过渡的幻想，也为修正主义的流传提供了条件。

1900年9月，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欧美21个国家的721名代表。在这次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交锋。两派围绕着米勒兰事件展开了斗争。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宣称，米勒兰的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饶勒斯认为米勒兰入阁可以争取实行一些改良措施，逐步改变资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从而能够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卢森堡为代表的革命派严厉谴责米勒兰的叛变行为，指出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只能使无产阶级政党腐化。

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刻，考茨基提出了一个调和的决议草案，认为个别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只是一种临时的手段，是应由各国党自己解决的一个策略问题，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最后这个提案经过轻微

改动便通过了。由于它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入阁起了开脱作用，因而被称为“橡皮决议案”。

大会还讨论了其它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大会通过了谴责殖民主义，号召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侵占殖民地的决议，通过了各国社会主义者必须在议会中反对军事预算的决议，又决定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执行局”，设在布鲁塞尔，作为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机构。

到 20 世纪初，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明显地形成了三派：即以卢森堡等人为代表的左派，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中派实际上是以革命词句掩盖的修正主义者。

1904 年 8 月，第二国际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世界五大洲 24 个国家的 483 名代表。俄国布尔什维克第一次派遣代表参加。列宁虽未参加大会但积极地参与了编写和校对给大会的报告。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仍是米勒兰入阁事件。由于左派的坚决斗争，通过了社会主义者不得企求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决议。但大会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仍然是不彻底的，决议回避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此外，大会在讨论关于工人政党统一问题时，通过决议，要求各国为了集中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力量，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但没有明确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表示出机会主义滋长的倾向。

列宁和第二国际的左派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1907 年 8 月，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的有 886 名来自 25 个国家的代表，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第一次出席了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由于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形成，国际形势日益紧张。因而无产阶级如何对待战争，就成为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

大会批判了法国代表艾尔威的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战争，主张用国际性的罢工和起义来对待一切战争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列宁指出：“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

倍倍尔的草案正确指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战争只有在资本主义被消灭后才会消失，但是它把战争分为“防御的”和“进攻的”两种类型，从而抹杀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关于反对战争的行动，这个草案只承认议会斗争的和平方法。列宁和卢森堡把倍倍尔的草案修改为：遇有战争的威胁，应该用一切最恰当的方法阻止战争的发生。如果战争爆发，应利用战争引起的政治经济危机，加速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个决议草案，获得大会一致通过。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文献。

关于殖民地问题，机会主义者在会上有的说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起传播文明的作用，有的认为文明民族对非文明民族的监护是必要的。有的甚至胡说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文明。列宁领导左派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大会终于通过了谴责殖民政策的决议案。左

派获得了胜利。

1910年8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了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23个国家的886名代表参加。列宁也出席了大会。由于战争危机的加剧，大会又讨论了战争和反对军国主义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包含了斯图加特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基本观点。但只建议各国党加强议会斗争，没有具体提出在议会以外发动群众进行反战斗争。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社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大会还着重讨论了合作社问题。经过热烈争论，最后通过决议，指出：合作社运动是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但工人阶级只靠这个运动，不能获得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社会党人应该用社会主义精神去影响合作社的发展。

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形势更趋紧张。世界大战颇有一触即发之势。于是第二国际在1912年11月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欧洲各国社会党均派代表参加，出席的共有555人，专门讨论了反对战争威胁问题，一致通过了题名为《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宣言。宣言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和哥本哈根大会有关战争决议的基本原则，严厉谴责了德、英、法、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军备战活动，号召各国人民采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巴塞尔宣言反映了各国工人激昂的反战情绪，具有动员工人群众起来反对战争的重要意义。

巴塞尔代表大会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完全背叛了宣言的革命精神，他们奉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扩军备战，从事战争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为帝国主义战争效劳。所以第二国际随之而破产。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国内危机，进行了国内革命战争，取得了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参考书：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7—375页。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9页。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同上书，第437—440页。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八章。

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第19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第298—328页。复习题：

1. 试述第二国际成立的历史条件。
2. 试述第二国际建立的经过。
3. 第二国际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意义是什么？
4. 试论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

第十八章 亚非拉三大洲的民族民主运动

第一节 亚洲的革命风暴

亚洲觉醒的历史前提和历史地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侵略活动日益疯狂,并将魔爪伸向古老而又日益衰落的亚洲。在亚洲,除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外,东亚的中国、朝鲜,西亚的土耳其、伊朗,中亚的阿富汗、南亚的印度、缅甸、泰国,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都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从而成为列强的原料掠夺场所和商品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亚洲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资本输出和文化渗透,将亚洲诸国拖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趋于解体,封建的纲常伦理日暮途穷。与此同时,一批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思想影响,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脱颖而出。这一阶层与历代封建的爱国主义者不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外抗强敌的同时必须革除弊政、改良维新,否则将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在他们的领导下,一场致力改革、倡导宪政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在亚洲各国爆发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印度的国大党运动、伊朗和土耳其的君主立宪运动、中国的戊戌变法等。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民族危机的深化,亚洲各古老帝国已经无法维持旧秩序的统治。发展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提上了历史日程。于此,亚洲人民的斗争起了质的变化:由旧式的、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地方武装暴动,演变为以资产阶级为领导、以民族民主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从此亚洲开始了新的觉醒,出现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三次革命高潮,列宁称颂这次革命高潮的意义是:“亚洲的觉醒。”亚洲觉醒时期,土耳其、伊朗、中国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朝鲜、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发生了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列宁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在这一时期,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以往的革命高潮相比较,涉及的范围之广,波及的阶层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而汇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革命洪流,使亚洲成了世界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最广大的战场。

在这一时期,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由于有新的阶级力量的参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由自发、散漫、无组织的暴动和起义变为自觉地、有组织地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斗争,并且赋予它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8页。

同上。

但是，这一时期，亚洲各国人民掀起的暴动、起义和革命，先后都遭到了失败。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在革命中，资产阶级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由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其上层买办资产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成为帝国主义镇压各国革命的帮凶，而一般的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封建主义的压迫，赞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当革命在国内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勇猛参加，而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民族资产阶级又怀疑、害怕人民，表现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妥协的动摇性，特别是他们不可能有进行反复辟的精神和毅力，因而造成革命的失败。亚洲觉醒时期的革命实践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

亚洲觉醒时期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势力，推动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在客观上支援了西欧工人运动。同时，它为各国人民后来的革命还提供了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传播了爱国思想与民主思潮，是亚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正如列宁深刻地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 20 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 日本是朝鲜的凶恶侵略者。1876 年 2 月，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除釜山外，再开元山、仁川为商埠，享有领事裁判权，严重地侵犯了朝鲜的主权。继日本之后，美、英、德、俄等国也先后与朝鲜订了不平等条约，于是朝鲜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掠夺的对象，沦为它们的半殖民地。

各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各种手段对朝鲜进行掠夺，如用放高利贷的手段，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通过垄断运输和对外贸易，掠夺更多的财富。在日本和其它国家侵略下，朝鲜国库日益空虚，只能靠增加捐税以维持其统治。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朝鲜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开化派。其主要成员是一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贵族青年知识分子与中小官吏。1882 年开化派的一些成员成立了独立党，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断绝与清政府的藩属关系，独立自主，自上而下地改革内政，将朝鲜建成像日本式的独立国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刚刚产生的朝鲜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执政的守旧派闵妃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881 年，闵妃集团的兵曹判书（最高军事长官）闵谦镐按照日本方案，缩编旧军，增建新军，聘请日本人为新军教官，给新军以优厚的待遇，而对旧军则持排斥放任的态度。旧军士兵待遇差，经常收不到薪饷，引起旧军官兵的普遍不满。

1882 年 7 月 23 日，汉城驻兵数千人举行起义，袭击禁卫府，杀死日本教官，袭击日本公使馆。次日，义军冲进王宫，处死闵谦镐和其他几位大臣，闵妃化装逃走，汉城为起义军所控制。因这一年为壬午年，史称“壬午兵变”。一些起义官兵拥戴反对闵妃集团的兴宣大院君重掌朝政。8 月 25 日，应闵妃的请求，清政府派出 3000 清军，开进汉城，镇压

了起义，并逮捕了兴宣大院君，闵妃集团重新执政。

“壬午兵变”后，开化派和闵妃集团守旧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开化派在国内企图依靠国王高宗（李熙）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外则寻求日本的帮助。日本考虑到清政府支持闵妃集团，为排除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便拉拢和利用开化派，培植亲日势力。

从1882年底开始，开化派曾利用他们在政府中的职权，实行了一些改革。如改革警察制度，建立新型的邮政制度，开办新式农场，推广农业技术，创办学校，从平民中选派青年，去日本留学，设立博文局，出版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份近代报纸《汉城旬报》等。开化派的改革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革新朝政的愿望，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守旧派的极力阻挠，这些改革都未能收到很大成效。

从1883年开始，开化派为了使其改革摆脱保守派的阻挠，遂准备发动推翻守旧派的政变，并受到日本驻朝公使的支持。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借举行庆祝邮局落成宴会之机，发动政变。他们联合日本军队，杀死守旧派大臣等人并挟持国王李熙，组成开化派新政府，宣布同清政府断绝藩属关系。6日，新政府将开化派的主要主张以施政纲领的形式颁布。当天下午，大批清军应闵妃集团之请，开入王宫，击败日本，杀死开化派首领洪英植。政变以失败告终。因1884年是甲申年，故史称这次政变为“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其施政纲领反映了开化派变封建朝鲜为资本主义朝鲜的愿望，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性。

“甲申政变”后，政权虽然重新落入亲清的闵妃集团手里，但日本仍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各种特权，继续倾销商品，收购粮食、原料，控制朝鲜的海运业、金融业和渔业，使朝鲜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朝鲜统治集团由于开支扩大，财政困难，故滥发货币，增加税收，使人民处境极端悲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全国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特别是南部各道，起义频繁。农民起义的浪潮推动了东学教运动，并同东学教结合起来。东学教的创始人崔济愚，他在1860年创立该教后，提出“惩治贪官污吏”和“斥倭斥洋”口号，反映了朝鲜农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要求。东学教最初采取“控诉申冤”形式同统治者进行斗争，后来摒弃了这种形式，参加农民起义。

1893年大饥荒和全罗道古阜郡守赵秉甲非法征收水税和杂捐，成为甲午农民战争的导火线。1894年1月15日，东学道地方首领全琫准领导全罗道古阜郡农民举行起义。起义者攻克古阜郡城，夺取武器库，惩处贪官污吏，释放囚犯，开粮仓分米，烧毁土地奴婢文契，农民纷纷响应。

全琫准和金开男在白山建立起义军司令部，颁布了四条纲领：（一）不杀人，不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逐灭倭夷，澄清圣道；（四）驱兵入京，尽灭权贵。同时，发表檄文，号召朝鲜人民内斩贪污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尽管起义军的纲领提出“忠孝双全”，对封建统治抱幻想，但明确提出了消灭封建权贵、贪污官吏和外国侵略者，符合朝鲜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此得到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等广大群众的拥护。

1894年4月，农民起义已扩大到全国各地，起义军完全控制全罗道、忠清道和庆尚道。他们占领郡城，建立革命政权“执纲所”。同年4月28日，起义军乘胜攻克南方重镇全州，并向汉城进军。统治集团惊恐万状，国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清朝乞援，同时向起义军求和，以求得喘息时间。全琫准同意议和，放弃进军汉城计划，和政府签订《全州和约》12款，退出全州，撤至顺天、南原一带。

《全州和约》12款是起义军向政府提出的议和条件，其主要内容有惩处贪官污吏，烧毁奴婢文籍，改善贱民待遇，允许妇女改嫁，废除苛捐杂税，严惩密通日本之人，取消一切债务和平分土地等，反映了起义农民对改革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要求。为执行议和条款，起义军在全罗道53郡建立农民政权——执纲所。

6月至7月，中、日两国军队先后在朝鲜登陆，日本以清军登陆为借口，于7月6日在仁川登陆。7月23日，日军占领汉城，发动宫廷政变，组成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政府。7月25日，日本向中国不宣而战，9月清军被迫撤出朝鲜，日本侵略者完全控制了朝鲜政府。于是起义军的斗争锋芒转向日本侵略者，抗击日本和朝鲜政府军的联合进攻。最初起义军达10余万人，士气极为振奋。但后来起义军领导集团发生分裂，实力削弱，日本侵略军则不断增援，而且又有精良武器，这样使起义军遭受严重损失。全琫准率领一部分起义军向南撤退，准备重新集结力量，继续战斗。但由于叛徒告密，12月9日，全琫准在途中被俘，后来慷慨就义，轰轰烈烈的甲午农民战争被日本侵略军和朝鲜反动军队血腥镇压了。

甲午农民战争是在东学道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也是朝鲜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这场斗争充分显示了朝鲜农民的伟大力量，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和日本侵略者。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被日本彻底排挤出去。此后，日本在吞并朝鲜的侵略过程中，与俄国发生尖锐矛盾。日俄战争后，日本吞并朝鲜的步伐加快。1905年11月，日本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强迫朝鲜签订《日韩保护条约》，即《乙巳保护条约》，规定：朝鲜的外交由日本外务省代管；由日本政府负责履行朝鲜与其他国家的现行条约，不经日本政府同意，朝鲜政府不得与他国签订任何国际条约；日本在汉城设立朝鲜统监府，日人统监代表日本管理朝鲜一切外交事务。自此，朝鲜一切外交事务均受日本控制，朝鲜遂成为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7月日本又迫使朝鲜签订《丁未七款协议》，规定朝鲜的全部行政，均受统监管辖。朝鲜实际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政府在朝鲜实行的“保护制度”，激起朝鲜人民的强烈反抗。学生罢课，市民罢市，群众性示威游行连绵不断。在反对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许多朝鲜爱国志士组成了义兵，在“灭倭讨敌”、“剪除卖国逆贼”口号下，开展武装斗争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义兵运动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也有少数爱国贵族、旧军官和知识分子。在义兵运动发展最盛时期，其活动范围遍布40余郡。

1907年7月《丁未七款协议》签订后，国王高宗被迫退位，朝鲜军队被命令解散。但朝鲜军队拒绝服从命令，他们不愿放下武器，而是携械出走，与日军展开战斗。汉城1300余名义兵和日军进行激烈巷战，打

死日军 100 多人。12 月，各地义军推举李麟荣为十三道义兵大将，他率领义兵攻打汉城，在进抵离汉城 30 里处时，遭日军阻击失败。同年年底，洪范图领导的义兵在咸镜北道原峙岭战斗中，重创日军。1907 至 1910 年，义兵到处袭击日军，惩办朝奸，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在这一时期内，参加义兵运动的人数达 14 万多人，作战 2900 余次，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大威胁。1910 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从国内调来大批军队，加强对义兵运动的镇压。至 1911 年，义兵运动才基本停止。

1910 年 8 月，日本统监寺内正毅与朝鲜卖国贼李完用相勾结，挟持朝鲜末王李柘，承认日本提出的《日韩合并条约》，从此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朝鲜人民并未屈服于日本的野蛮统治，反对日本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

越南人民的反法斗争 自 17 世纪起，法国教士和商人便侵入越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又屡次派兵侵犯越南领土。1861 年，法国占领了嘉定、定祥、边和、永隆，第二年又与阮氏王朝签订了《西贡条约》，开始控制了越南的内政和外交。1884 年，法国和越南订立《巴特诺条约》，使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在侵略越南的同时，还从越南侵犯我国广西、云南等地。清军在镇南关——谅山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但清政府反而在胜利中屈辱地结束了战争。1885 年 6 月，中法代表在天津缔结和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法国殖民者通过掠夺土地，开采矿产，开办企业，课征重税，实行盐酒专卖等手段，对越南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他们还开设鸦片馆和赌场，搜刮民脂民膏。法国的殖民统治把越南人民推入灾难的深渊。

从法国入侵之日起，越南便展开反殖民主义斗争。1885—1896 年间，不少地区爆发了由贵族领导的勤王运动。但领导者各自为政，缺乏联系，都先后被镇压下去。反法的主流是农民所进行的游击战争。其中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黄花探领导的农民战争。黄花探自 1883 年起就领导安世农民打击法国侵略者。经过将近 30 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不幸于 1913 年被叛徒杀害，为民族独立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法国的侵略破坏了越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客观上给越南民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因而越南民族工商业在沿海一带发展起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士大夫阶层中涌现出维新派。他们中有的以潘佩珠为首，主张反法勤王，建立君主立宪制；有的以潘周板为领袖，主张依靠法国，“启民智，长民权”，推翻封建王朝。这两派严重脱离群众，没有取得显著成就。

越南还爆发了农民的“反拉伕和抗税运动”，反对压在农民身上的强迫服役和重税。1908 年 2 月底，广南省大禄县农民首先发难。他们为了表示抗议，携带食粮、炊具、席子，露宿在会安法国殖民官署前一个多月，迫使殖民当局允诺此后不再增加捐税。会安的抗税斗争引起强烈反响。中部各省都进行了反法斗争。到 5 月底，农民的斗争才被镇压下去，许多农民遭到枪杀。

中国的辛亥革命给越南带来了新的希望，许多革命志士聚集在广州，在孙中山的热情支持下，于 1912 年成立了越南光复会，提出了“驱逐法国殖民者，争取越南独立，成立越南共和国”的纲领。光复会征募

旅华越侨成立光复军，数次越过中越边界，袭击法国殖民军营，但都未成功。

印度的民族民主运动 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英国除把印度当作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市场外，还向印度输出大量资本，投于铁路、航运、纺织等部门及橡胶、茶、咖啡等种植园，到 1914 年，英国在印度的投资总额高达 5 亿英镑。

英国对印度的经济侵略，破坏了印度的自然经济，也促进了某些工业的发展，因而印度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印度资本家主要经营纺织业，也投资于银行和印刷、造纸、榨油等小型企业。他们的前身多是富商、买办和高利贷者，也有地主和官吏。由于他们在资金、技术、设备上都依赖英国，因而与英国资产阶级有着依附关系。另一方面，英国资本家又利用殖民机构，极力限制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印度资产阶级又和英国资本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两面性。

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印度也出现了近代产业工人。到 19 世纪末，印度无产阶级队伍已达 50 万人。他们除受到英国和印度资本家的剥削外，还受英国殖民政府的种种压迫。所以工人的反抗斗争非常频繁。1877 年，那格浦尔皇后纺织厂的工人罢工揭开了印度工人斗争史的第一页。以后，各地工人便连续不断地进行罢工斗争。

高利贷剥削、苛捐杂税和连年的灾荒，造成农村饿殍遍野，19 世纪下半期，有 2850 万人死于饥馑。农民忍无可忍，只得揭竿而起。1872—1879 年，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徒和马拉特农民举行起义；泰鲁古族和沙沃族于 1879—1880 年进行了反殖民和反封建斗争；1882 年比哈尔地区农民曾经发生暴动。因为这些起义是分散的，所以都先后被镇压下去。

随着印度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印度资产阶级已经拥有 50 多家纺织工厂和许多小工业企业。孟买则是印度民族纺织工业的中心。此外，印度还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印度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已经成为重要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当时印度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要求。1870 年梵教派领导人凯舍夫在加尔各答创立“印度改革协会”，1878 年苏·纳·班纳吉组成“印度协会”，以及孟买出现达达巴伊·纳奥罗哲和马哈捷夫·戈文德·拉那德所代表的“印度国民经济学派”等。他们反对英国殖民束缚，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普及欧式教育，发展民族工业，改革税制，司法平等，建立陪审制度，实现在英国范围内的殖民地自治，等等。他们要求改革，但又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惧怕农民斗争；他们反对英国殖民束缚，但又幻想依赖英国求得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要求有限的自治，不求民族的独立；他们严重地脱离群众，敌视工农运动，表现了地主资产阶级政治上极端的软弱性。但他们反对中世纪的社会风俗，要求发展民族工业，争取民族平等的活动，在当时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兴起，对印度人民的民族觉醒起了启发作用。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活跃起来。19 世纪 70 年代，他们组织了“英属印度协会”和“印度协会”，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提出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

印度的工人运动、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高涨，引起英国

殖民当局的不安。为了防止革命爆发，英国统治者一方面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防范，另一方面极力拉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力图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引入他们设想的轨道。1885年，英国殖民政府通过退休官吏休谟同印度民族主义者联系，表示不阻挠他们成立全印度性的政治组织。于是由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城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发起，于1885年12月28日在孟买召开了印度国民代表大会，在出席的72名代表中，半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2是地主和高利贷者，会议宣布成立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又通过9项决议，表示效忠英国，要求享受民族平等，印度人有参政权，实行行政改革和保护关税。国大党的活动只限于在报纸上作文字宣传和向英国议会呈递请愿书等。

国大党成立不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地主家庭的自由职业者便纷纷加入，形成了该党的激进派。他们认为印度贫穷落后的根源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指责国大党的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因而国大党遂分温和派和激进派。激进派的领袖是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1856—1920年），他创办《狮子报》宣传民族主义思想，揭露英国殖民者的横暴统治，主张进行暴力斗争。但他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不能把民族运动和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虽然如此，提拉克的反英斗争也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他成为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代表人物。

英国丧失工业垄断地位以后，更加紧了对印度的掠夺，它极力向印度输出资本，从印度输入原料，限制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提高英镑对卢比的兑换率。此外，英国还采取分割孟加拉省的阴谋来扼杀印度的民族运动。

孟加拉省工业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较强，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基地。1905年7月20日，英国殖民政府宣布把孟加拉分为东西两个行政单位。孟加拉的宗教情况比较复杂，东孟加拉的上层分子多是印度教徒，而一般民众则信仰伊斯兰教；西孟加拉的情况恰恰相反，上层人士多信仰伊斯兰教，广大居民多是印度教徒。英国企图利用东西孟加拉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宗教上的隔阂，分化瓦解民族解放斗争力量。但英国这一阴谋很快便被印度人民识破。他们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更加痛恨。

根据国大党的号召，全国掀起了以反对孟加拉分割法案为内容的反英运动。1905年8月7日，全国举行国丧以表示抗议，接着各地都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罢工罢市的浪潮席卷全国，交通运输完全陷于瘫痪。国大党在运动中提出自治和自产的口号。但这个党的两派对这个口号的解释互有不同，温和派认为自治意味着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实行有限度的自治，理解自产为保护关税以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他们希望通过和平请愿实现以上目的。激进派则要求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联邦共和国，充分发展民族工商业。

随着运动的深入，工人和农民积极响应激进派的号召，斗争突破了国大党温和派所规定的范围。英国殖民者和印度剥削者惊恐万状，他们迅速结成联盟，对日益高涨的反英斗争，共同进行镇压。1907年12月在国大党的年会上，温和派在警察的帮助下把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逐出会场。激进派被排出以后另成立“民族主义者党”，继续斗争，但它没有提出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没有在群众中打下基础，很快

被镇压下去。

1908年6月，殖民当局逮捕了提拉克，判处6年徒刑。英国这一暴行激起反英斗争的新高涨。各地工人要求释放提拉克，又举行罢工、示威游行。在这次斗争中，孟买工人站在了最前列，他们自22日到29日举行了总罢工。殖民政府调来了正规军队镇压。

罢工工人反击军警的镇压，展开街垒战，工人们用石块、木棒同军警搏斗，并持续两个星期之久，被枪杀的工人约有200多人。殖民当局不得不撤销对提拉克的原判，把苦役改为监禁。孟买工人阶级的政治总罢工实现了印度由改良主义运动到民族革命运动的转变。这次政治总罢工是印度人民1905—1908年反英斗争的高潮、印度自主运动发展的最高点。这次斗争失败了，影响却是深远的。到1911年，英国发表宣言，取消了1905年孟加拉分治法案，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到此暂告一段落。

1908—1909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奥斯曼帝国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1856年英法两国迫使苏丹保证土耳其基督教徒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允许外国人购置土地，答应利用欧洲科学和资本进行改革。这就使土耳其向欧洲资本家敞开了大门。不久，英、法、俄、德、奥等国便侵入土耳其，使之处于被瓜分的危境。

土耳其在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封建王朝因债台高筑，对人民群众加紧搜刮，沉重的地租和捐税使农民生活日益困难；手工业者在苏丹反动政府的压榨和外国资本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民族企业由于外国商品竞争和封建关系的阻挠发展极其困难。因而农民不断起义，异民族屡次掀起反抗运动。1865年6月，那米克·凯末尔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部分资产者、开明官吏和军官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个秘密政治组织——“新奥斯曼党”。它宣传改良思想，倡导立宪运动，不久，这个组织很快发展到245人。他们在《舆论解说报》上发表了一封费萨尔亲王致苏丹的公开信，要求实行君主立宪。1867年2月，苏丹政府逮捕流放了一部分新奥斯曼党成员，多数成员被迫逃亡国外进行立宪宣传活动。普法战争后，“东方问题”又成为国际问题，土耳其成为欧洲列强争斗的场所，奥斯曼帝国面临新的瓜分危机，苏丹政府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苏丹实行大赦，新奥斯曼党人陆续返回土耳其，在国内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得到众多青年军人和学生的支持。

1876年5月30日 新奥斯曼党利用首都接连发生反对苏丹专制统治的示威游行的机会，联合穆拉德王子和改革派首领米德哈特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废黜阿卜杜尔·阿西兹（1861—1876年在位），另立穆拉德五世（1909—1918年）为苏丹，因其患严重精神病，当政3个月，改由其弟继任苏丹，称阿卜杜尔·哈密德二世（1876—1909年）。凯末尔等新奥斯曼党人被召回委以重任，米德哈特（1822—1884年）被任命为总理大臣，着手制订宪法。

1876年12月23日，土耳其第一部宪法公布，宪法规定土耳其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国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宪法宣布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臣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此外还规定了给资产阶级的一些民主权利。但是，哈密德二世并不准备实行宪法。次年初，哈密德二世下令流放凯末尔和齐亚等新奥斯曼党人的骨干，继而又免除米德哈特的职务，并将他秘密处死。1878年2月，哈密德二世下令解散国会，废除宪法，恢复专

制统治。立宪运动遂告失败。

俄土战争后，英、法、德、意、奥等国成立了监督帝国财政的“奥斯曼国债管理处”。这个机构不仅征收各种捐税，管理土耳其的烟草和食盐专卖，而且恣意干涉土耳其内政，置苏丹于其控制之下。这些国家还大量向土耳其输出资本，加紧掠夺土耳其财富。此外，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进一步缩小了土耳其的领土。

外国的入侵和苏丹哈密德二世的反动统治激起了异民族的不断起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满。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系青年军官、军校学生和官吏于1894年成立了秘密组织“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又称“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是新闻记者、新奥斯曼党人阿麦德·李萨。1897年青年土耳其党举行政治示威失败后，一度处于瓦解的境地。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内异民族解放运动再度高涨时，青年土耳其党才重新振作起来。1906年青年土耳其把活动中心从巴黎迁到马其顿的萨罗尼加。1907年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决议以抗交捐税等手段，迫使苏丹恢复1876年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如果苏丹拒绝，就举行武装斗争，准备走上革命的道路。

1908年7月初，马其顿第三师士兵对于不平等待遇表示不满，青年土耳其党人趁机鼓动起义。7月23日起义士兵攻入萨罗尼加城，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苏丹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宣布恢复宪法，举行国会选举。这时青年土耳其党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但各地人民继续示威游行，举行罢工，反对苏丹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青年土耳其党才制定了分给农民土地，取消封建税赋的纲领。1908年底，新国会开幕，在230个议席中，青年土耳其党人占有150席，艾哈迈德·里扎当选为议长，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后，立即同封建势力妥协，保留哈密德二世的王位，背弃了工农大众，既没有给农民土地，也没有减轻捐税，反而镇压铁路和码头工人罢工，强迫非土耳其游击队交出武器，极力推行奥斯曼主义，强制各民族实行土耳其化等。这次革命对帝国主义强加在土耳其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丝毫未予触动，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无力。

青年土耳其党的倒退政策，削弱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孤立了自己，助长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革命气焰。1909年4月12日，在英国的支持下，在商业买办阶级的“自由联盟”和特务暗探及近卫军余孽的帮助下发动反革命政变，解散国会，捕杀青年土耳其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反动政府，青年土耳其党纷纷逃亡首都。

反革命政变不得人心，逃往萨洛尼卡的青年土耳其党在马其顿重新发动第二、三军团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的民族武装，建立“救国军”，由麦哈茂德·谢夫凯特任司令、穆斯塔法·凯末尔任参谋长。4月24日，救国军占领首都伊斯坦布尔，逮捕并废黜了哈密德二世，另立其弟年迈昏庸的穆罕默德五世为苏丹（1909—191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组织新内阁，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新上台后，颁布了巩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法律，农民问题置之脑后，处境仍和革命前一样；还公布了《公用企业罢工法》，以此镇压工人的罢工。继续推行奥斯曼主义，镇压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对外保留外国资本在土耳其的特权，投靠德帝国主义，使土耳其逐

渐沦为德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发动大战的走卒。

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结束了封建专制的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成为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后实行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起了积极作用。它标志着土耳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是，由于土耳其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害怕工农群众运动，革命极不彻底。革命后土耳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完成。然而土耳其革命是“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土耳其人民的觉醒，推动了土耳其境内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第二节 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

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 近代时期，非洲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撒哈拉沙漠以北，埃及发展到高级的封建社会，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也分别进入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撒哈拉沙漠以南，各地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埃塞俄比亚进入封建社会，苏丹一带多为奴隶制国家，索马里则处于部落联盟阶段。西非多数国家还是奴隶制社会，南非地区最为落后，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

非洲很早就成了欧洲国家的掠夺对象。自1514年葡萄牙在摩洛哥建立殖民点以后，欧洲殖民者相继入侵，先后建立殖民据点，进行海盗式的掠夺、欺骗性的贸易以及罪恶的奴隶贸易。进入19世纪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要求开辟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便大量侵占非洲领土，掠夺可可、咖啡、剑麻、棉花和贵金属等重要物资。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掀起了抢占和瓜分非洲的争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勉强保持独立外，非洲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制度。英国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即各殖民地的基层政权由当地的封建主、部落酋长掌握，省级以上的政权则由英国官员依靠军队、警察掌管；法国和德国推行“直接统治”，即由宗主国委派各级行政官进行统治。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强迫非洲各地种植单一经济作物，开发黄金、金刚石、铜、铁等矿藏，对非洲人民进行封建和奴隶制的剥削。

列强恣意瓜分与重新瓜分非洲的历史，也是非洲人民揭竿而起、殊死抗争的历史。由于各国社会的发展不平衡，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形式不一，多数停留在旧式的民族起义阶段。其中有的甚至是由封建贵族领导，如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斗争，有的是农民战争，如苏丹马赫迪起义，有的是部落起义，如祖鲁人民起义，只有埃及的抗英斗争是一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使非洲近代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阿拉比领导的埃及抗英斗争 19世纪中期，英国和法国竞相对埃及加紧侵略。英国取得在埃及修筑铁路、架设电报线以及建立商船队等特权；法国则将其势力渗入埃及财政部门，并于1854年获得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权利。1869年运河完工，1857年英国利用埃及的财政困难，购买了埃及的运河股票，将自己的势力打入苏伊士运河。由于英法两国的掠

夺，埃及政府负债累累。1876年，它们乘机组成埃及债务整理委员会。英国代表为财政收入总监督，法国代表任财政支出总监督，对埃及实行双重控制。1878年英法又迫使埃及总督伊斯迈尔任用欧洲人组阁，直接对埃及人民实行残酷搜括和掠夺。欧洲人内阁的反动统治激起了埃及各阶级的强烈不满。

在反对政府的声浪中，知识分子和爱国军官于1879年1月成立了祖国党，其领袖是陆军中校阿赫默德·阿拉比（1841—1911年）。阿赫默德·阿拉比出身农民，早年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应征入伍后晋升至陆军中校。阿拉比深刻地认识到：军队是当时受束缚最少，受民族主义思想感染最深的社会集团，是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战胜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柱。因此，他牢牢地掌握军队，并使之服务于民族斗争的需要。祖国党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口号，主张维护埃及主权，实行宪法。1881年9月，祖国党人在阿拉比领导下，指挥军队向总督府进攻，要求解散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新任总督杜菲格被迫同意，任命大部分祖国党党员组成内阁，阿拉比任陆军部长，结束了英法两国的直接控制。

英国和法国为了恢复对埃及的控制，1882年5月借口保护侨民，将军舰开入亚历山大港，向杜菲格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解散新内阁，将阿拉比驱逐出去。杜菲格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完全答应了英法的要求。但是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人民不能容忍英法的侵略行径，立即举行起义，杜菲格为逃避人民的惩罚，竟躲入英国军舰。

这时，法国正忙于侵略摩洛哥和准备对德战争，于1882年7月10日，从埃及撤走舰队，英国单独对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第二天，亚历山大城失守。阿拉比积极部署开罗保卫战，埃及人民捐款输粮，踊跃参军。当时英军有从北面或东面向开罗进攻的可能。但他轻信列强保证运河区中立的诺言，放松了东线的防御。英国在北线不能得逞，从东线向开罗推进，经过几次激战，开罗终于在9月15日失陷。阿拉比被俘，流放到今日的斯里兰卡。此后，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实际掌握了埃及的政权。1914年，英国利用对土耳其作战的机会，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

苏丹马赫迪反英大起义 苏丹位于埃及之南。1819—1822年，埃及总督占领了苏丹，由于埃及名义上是土耳其的一个行省，因此苏丹也被称为土耳其的一部分。70年代以后，英国利用其在埃及的债权国地位，迫使埃及总督委派英国人任苏丹总督和各省省长，从而取代埃及对苏丹进行统治。英国殖民者和苏丹封建贵族、部落酋长互相勾结，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广大人民贫困不堪，全国呈现极度荒凉破败景象。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摆脱奴役和压迫，苏丹人民不断进行斗争。80年代初，爆发了震动一时的马赫迪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者穆罕默德·阿赫默德（1840—188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造船工人家庭，成年后成为一名教长。1881年8月，他宣布自己是“马赫迪”（意即救世主），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和“邪恶势力”作斗争，把叛教者（土耳其人、埃及人）和异教徒（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驱逐出苏丹国土，建立“普遍平等、处处有公正的美好社会”。

广大人民热烈响应马赫迪的号召，许多部落人民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军所向无敌。1881年12月和1882年6月，两次重创英国遣派的军队，1883年1月9日，攻下科尔多凡省的省会乌拜伊德，宣布人人平等，

烧毁了一切卖身契。11月5日，起义军一举几乎全歼希克斯所率领的一万英军。希克斯本人也被打死。这次胜利更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多的地区举行起义。起义军继续向东挺进，于1884年2月直抵红海沿岸。

为了拯救在苏丹的败局，英国任用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的老牌殖民主义分子查尔斯·戈登（1883—1885年）为苏丹总督。1884年2月，戈登到达首都喀土穆。8月，马赫迪以4万大军攻下这个重要城市，第二年戈登被起义军刺死。马赫迪领导苏丹人民经过5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赶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取得了重大胜利。马赫迪于1885年6月病逝后他的战友阿卜杜拉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定都恩图曼。史称“马赫迪国”。

马赫迪为抵抗外国侵略，积极发展生产，加强武装力量，但没有实行社会经济改革。阿卜杜拉和地方首领占了大片土地，形成新的封建统治集团，对农牧民仍然进行压榨。阶级矛盾的尖锐削弱了对外防御力量。1890年英国调集25000名军队，配备新式武器，再度侵犯苏丹。虽然苏丹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但1898年9月2日，首都恩图曼陷落，1899年11月25日，阿卜杜拉牺牲于战场。1900年1月最后失败，苏丹成为英国殖民地。

马赫迪起义是非洲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有力地推迟了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

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殖民地 1830年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后，阿尔及利亚人民便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在经济上，法国殖民者恣意侵占土地，农民被迫沦为种植园工人或佃农，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所以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挑起反法斗争。19世纪30、40年代，阿布德尔·喀德尔（1808—1883年）曾领导西部山区和沙漠地带各部落和法国殖民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1847年喀德尔在一次战斗中失败被俘，起义暂时进入低潮。

1871年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又出现高潮。3月14日，卡比利亚山区30个卡比尔部落，在封建贵族莫卡拉尼的领导下首先起义，不久，伊斯兰教兄弟会首领哈达德也号召人民对法进行圣战，得到250多个部落的响应。这两股起义军汇合起来，迅速发展到了15万人，到处袭击法国殖民军。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不断向阿尔及利亚增兵。8月，法国派来的军队已达85000人。法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血腥镇压。莫卡拉尼在战斗中殉国，哈达德也被法军俘虏。1872年1月，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大起义被镇压下去。

此后，法国殖民者进一步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压榨。法国除对起义部落人民的残酷屠杀外，还没收了45万公顷土地，勒索了6000万法郎的罚款。以后法国殖民者继续掠夺土地，到1901年，已经侵占了阿尔及利亚全国可耕地的1/3，致使将近300万阿尔及利亚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法国地主的佃农。阿尔及利亚人民在起义失败后，仍然坚持斗争。不过这些起义规模不大，很快被镇压下去。

法国对突尼斯的侵略 1881年4月，法国以突尼斯某部落侵人阿尔及利亚为借口，遣派海陆军对突尼斯发动进攻。5月12日，迫使别伊（首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保护条约，掌握了突尼斯的内政、外交和经济大权。法国的入侵，激起全国人民的起义。由于突尼斯人民的英勇战

斗，1883年法国才把起义军镇压下去。

法国殖民者镇压了突尼斯人民的起义后，使突尼斯成为其保护国。法国官员充斥突尼斯政府各个部门，对突尼斯人民进行奴役。在法国殖民者疯狂掠夺突尼斯土地的情况下，突尼斯多数农民沦为分成制佃农，遭受残酷剥削。法国资本家操纵了突尼斯的工矿业，垄断了全部对外贸易。从而突尼斯完全变成法国的原料供给地和商业销售市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尼斯的知识分子组织了“青年突尼斯人”、“伊斯兰国民党”、“共和党”、“突尼斯党”等政治组织。它们的纲领主要是要求自治，实行改良。这些组织由于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在反殖民统治方面，没有起到显著作用。

摩洛哥人民的反法斗争 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后，便对摩洛哥有了觊觎之心。它在进行武力和经济侵略的同时，还极力拉拢摩洛哥苏丹阿齐兹，使之成为其压榨的工具。摩洛哥政府的投降政策，激起人民的普遍憎恨。1908年1月，苏丹的弟弟哈费德利用人民的不满，推翻阿齐兹统治，自立为苏丹。但哈费德仍然投靠帝国主义，向法、德借款，出卖国家利益。1911年4月，不少部落起义，反对哈费德的反动统治。法国乘机借口恢复“秩序”和保护侨民，派兵占领非斯和一些重要城市。1912年3月强迫哈费德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保护国。

主权的丧失激起摩洛哥人民的大规模的起义，起义者利用德法矛盾，得到德国人一些援助。但起义以部落为单位，在起义军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因而不能形成全国统一的斗争，对法国侵略者没有形成严重的威胁。

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的东北角的高原地带，交通极其不便，长期保持着独立地位。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濒临红海的埃塞俄比亚就成为英、德、意争夺的目标。19世纪70年代，由于英国忙于侵略埃及和苏丹，法国致力于争夺刚果，都无暇顾及埃塞俄比亚。于是，意大利在三国竞争中逐渐占据有利地位。

1882—1885年间，意大利占领了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省。以后又屡次向内地推进，均未得逞。1889年埃塞俄比亚国王约翰四世在英唆使下攻打苏丹马赫迪起义军阵亡，意大利乘机支持绍阿邦王公麦纳利克（1889—1911年）夺取了王位。

1889年5月意大利强迫麦纳利克签订了《乌西阿利条约》，规定意大利给埃塞俄比亚一些枪炮作为获得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补偿。意大利还玩弄篡改条约的阴谋，使埃塞俄比亚成为它的保护国。它把这个条约的阿姆哈拉文本第17条：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在与其他列强或政府进行交涉时，可以请求意大利国王陛下给予协助中的“可以”字眼，在意大利文本中改为“必须”。意大利则据此声称埃塞俄比亚已经接受意大利的“保护”。

意大利的卑劣行径激起埃塞俄比亚人民和政府的强烈抗议，麦纳利克声称这个条约作废。1894年7月，意大利为了报复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了侵略战争。麦纳利克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痛斥意大利的野蛮侵略，号召埃塞俄比亚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坚决抗击侵略者。埃塞俄比亚人民踊跃捐献衣粮，积极参军，在短期内就组成一支八万多人的军队。

1895年12月7日，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安巴—阿拉古—战告捷。1896

年3月1日，与意军在阿杜瓦进行决战，又歼灭敌军3个纵队，意军伤亡11000人，被俘4000人。经过这次惨败，意大利不得不和埃塞俄比亚签订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为独立的主权国。放弃其侵占的土地，赔款1000万里拉。

埃塞俄比亚反意侵略战争的胜利，在非洲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西非、南非反英法殖民主义的斗争 英国和法国对西非的侵略，激起当地各族的反抗，其中居住在黄金海岸一带的阿散蒂人抗英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

17世纪末，阿散蒂人建立国家，定都库马西，到18世纪中叶控制了黄金海岸的内陆地区，成为西非最大强国。自18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不断进犯阿散蒂的领土，均遭失败。1873年春，英国从各地调集了4000多人，向阿散蒂发动进攻，第二年3月阿散蒂被迫与英国殖民者签订和约，赔款5万盎司黄金，并放弃沿海地区的主权。

1896年1月，英国殖民军悍然占领了库马西，俘虏了国王及其家族，宣布阿散蒂为英国的“保护国”。但阿散蒂人民拒不承认，1900年英国黄金海岸的总督霍吉逊公开称他是阿散蒂的最高统治者。从4月起，阿散蒂人便向英国人发动了猛烈进攻。但英国军队使用近代武器，终于在年底把起义镇压下去。1902年吞并阿散蒂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当英国殖民者在黄金海岸遭到阿散蒂人抗击时，法国人在塞内加尔上游也遭到图库勒国和乌阿苏鲁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图库勒国的建立者艾尔·哈吉·奥马尔（1799—1864年）是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富尔贝族人。他在1850—1863年间统一了塞内加尔河与尼日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以塞古为首都。此后，图库勒国便不断抵抗法国的侵略。1893年，由于内部分裂，被法军完全占领。

乌阿苏鲁是由萨摩利·杜尔（约1830—1900年）在1870—1875年间建立的，其版图西起尼日尔河上游，东至锡卡索，北与库图勒接壤，南达利比里亚，首都是比桑杜古。19世纪80年代，法国殖民者以塞内加尔为据点，不断发动对乌阿苏鲁的侵略战争，始终没有得逞。1886年3月，双方签订和约，以尼日尔河为界，处于对峙局面。90年代初，法国又集中优势兵力向比桑杜古进犯。乌阿苏鲁人民在萨摩利·杜尔的领导浴血奋战。1898年，由于少数酋长叛变，他不幸被俘，被流放到法属加蓬一个孤岛上，1900年被折磨致死。

在南非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英布战争，即英国人和布尔人争夺剥削非洲人的掠夺性战争。17世纪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建立了殖民地，这里的移民及其后裔被称为布尔人。1806年，英国趁法国占领荷兰的机会夺取了荷兰在南非的殖民地，并向南非大批移民。英国殖民者侵占土地，排挤布尔人，特别废除了奴隶制，打乱了布尔人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大批布尔人向东向北进行了迁移，19世纪中期他们在内地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此后，双方为了争夺钻石和黄金以及整个南非的富饶资源和势力范围，于1899—1902年爆发了英布战争，1902年英国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吞并。

英国殖民者为了扩大在南非的殖民统治，还向居住在纳塔尔地区的祖鲁人发动了进攻。1879年1月10日，英国殖民政府派5000殖民军侵

入祖鲁领土，祖鲁军奋勇抗敌，曾将侵略军包围有半年之久。由于英军大量增援和部分酋长的动摇，8月祖鲁军失败，1887年这个国家被英国灭亡。

在南非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居住着马塔别列人和马绍纳人。1890年英国殖民者招募“拓荒队”侵入。1895年，英国占领了整个地区，命名为罗得西亚，马塔别列人和马绍纳人不堪英国人的压迫，不断举行起义，打击英国侵略者。

在马绍纳和马塔别列人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同时，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尔加什族人民也掀起了抗法斗争。马达加斯加岛自16世纪起就不断遭受葡、英、法、荷等欧洲殖民者的入侵。1890年8—11月，法国分别与英、德达成协议，取得了对马达加斯加的独占权。1894年12月，法国派15000人的远征队在马达加斯加登陆，马达加斯加全体人民奋起抗击。但1895年9月，法军终于攻下首都塔那利佛。马达加斯加被迫接受法国的保护。1896年8月法国进一步宣布马达加斯加及其附属各岛为法国殖民地。但到20世纪初马达加斯加人民仍然坚持进行反法游击战争。

以上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进行侵略和非洲人民斗争的情况。20世纪初，欧洲列强已经把非洲瓜分完毕。英国占有埃及、苏丹、乌干达、肯尼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今加纳）、尼日利亚、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尼亚萨兰（今马拉维）、贝专纳（今博茨瓦纳）、南非（阿扎尼亚）、冈比亚等地；法国控制的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马里、塞内加尔、几内亚、尼日尔、乍得刚果、加蓬、马达加斯加等地区；比利时统治了刚果自由邦（今扎伊尔）；德国占有喀麦隆、多哥、坦噶尼喀、卢旺达、布隆迪和西南非部分地区；葡属非洲为安哥拉、莫桑比克、部分几内亚与佛得角；意大利夺得大部分东非索马里兰。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疯狂地掠夺非洲的财富。

第三节 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

独立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状况 独立战争以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几乎完全集中在包括教会在内的地主手里。他们经营大庄园、种植园或牧场，剥削债务农、佃农和雇农。拉美的农产品主要供应国外市场，所需用的工业品依赖进口。

拉丁美洲各国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侵略对象。最早向拉丁美洲侵略的是英国。英国资本长期在这个地区占居优势。1880年，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为17949万英镑，1913年增至99923万英镑，约占外资总数的17%。自19世纪上半期起，美国资本开始向拉丁美洲渗入。到80年代后期，美国掀起“泛美主义”的旗帜，成立泛美组织，企图对拉丁美洲全面控制。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墨西哥的势力空前增长。1913年，美国在拉美的投资达到10.7亿美元，约为外国投资总额的13%。美国在拉美的投资虽然少于英法，但对这个地区的贸易，却居于首位。

由于封建关系的束缚和外国资本的控制，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极其

缓慢，而且非常片面。从 80 年代起，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才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并且仅是与外国资本掠夺有关的工业才有发展。其中最发达的是输出品的初步加工业，如阿根廷的肉类冷藏业，古巴的制糖业；其次是采掘业，如智利的硝石矿，阿根廷、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油田，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银矿，智利和秘鲁的铜矿，玻利维亚的锡矿等。再次是某些轻工业，如纺织、火柴、制纸、制烟和酿酒等部门。重工业在拉丁美洲几乎属于空白。

欧美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使拉丁美洲的农业服从世界市场的需要，从事单一作物生产。如巴西、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主要种植咖啡，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只生产香蕉，厄瓜多尔出产可可，古巴以种植甘蔗为主。这样，除阿根廷外，各国的主副食品都不能自给，谷物和肉类都仰赖进口。

拉丁美洲各国的阶级关系，基本上如下：地主阶级对内剥削劳动人民，对外依附外国资本，从而往往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人民的反抗。资产阶级由于受封建关系的阻碍和外国资本的排挤，所以除与工人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外，也同地主和外国侵略者都有矛盾。小资产阶级由于处境的困难，也成为反对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政治力量。

农民在各国都占绝对多数。在他们中有债务农、佃农、雇农和自耕农的不同。债务农是世代对地主负债的农民。佃农所交的地租极重，至少是收成的 1/2。雇农的工资很低，只能维持个人的生活。自耕农在农民中只占 1/10，他们在大地主的排挤下，时时有破产的危险。所有农民都无政治权利，经常受到欺侮和凌辱，所以有强烈的革命愿望。

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的生活也非常困难，工作日长，工资低，而且还没有劳动保护法。他们自始就为提高政治经济地位展开了斗争。19 世纪 70 年代，工会开始组织起来，第一国际在拉美设立了支部，工人不断举行大规模的罢工。以后，工人运动便广泛地开展起来。

拉美各国独立后，地主阶级便掌握了政权。他们和外国侵略者勾结，推行所谓考迪罗主义。“考迪罗”是西班牙文“首领”的译音，考迪罗主义即军阀独裁统治。多数考迪罗在地主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通过政变和非法选举获取总统职位，对人民进行压榨。由于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不断和考迪罗进行斗争，而地主阶级不同集团之间又经常争权夺利，所以拉美各国经常发生政变和内战，各国政府屡次更换。例如，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 70 年内分别发生过 50 次和 27 次政变和内战。秘鲁在独立后的 100 年内，曾经更换过 50 多个总统。玻利维亚在 74 年中发生了 60 次内战和动乱。墨西哥在 19 世纪，先后成立过 72 个政府。拉丁美洲各国几乎每年都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

墨西哥的资产阶级革命 墨西哥独立后便陷于动乱的处境。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派同反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要求的民主派展开了长期的斗争。1855 年，以胡安·阿尔瓦雷斯（1790—1867 年）为首的民主派推翻保守派圣安娜的统治，从而开始了一个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这次革命的倡导者是知名的“自由党”党员、司法部长贝尼托·胡亚雷斯（1806—1872 年）。在他的推动下，阿尔瓦雷斯政府剥夺了宗教法庭的审理民事权，迫使教会出卖土地，禁止官吏欺压百姓，1857 年 2

月又通过了一部民主的宪法，规定 21 岁以上或 18 岁已婚的男子都有选举权，宣布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取消贵族称号和世袭权。

胡亚雷斯的改革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他们在大地主苏洛亚加和米拉蒙的领导下，挑起了将近 3 年的内战，最后民主派胜利。1861 年 6 月，胡亚雷斯被选为总统，保守派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请求英、法、西班牙出兵干涉。12 月，三国派兵在墨西哥登陆。英、西鉴于墨西哥人民势将奋力抵抗，担心将来得不偿失，不久撤兵。法国力图使墨西哥成为自己的殖民地，继续向内地进军，并且立奥地利贵族麦克西米连为墨西哥傀儡皇帝。法国侵略军遭到胡亚雷斯领导的墨西哥人民的坚决抗击。1867 年 3 月，法国侵略军被迫撤回。麦克西米连被墨西哥政府判处死刑。1872 年胡亚雷斯因心脏病去世，保守派便猖狂起来。1876 年 11 月，他们在美国的帮助下，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1830—1915 年）发动政变，建立起反动的考迪罗统治。

迪亚斯原为军官，在反法战争期间利用职权，侵占了大量土地，成为富有的甘蔗种植场主。他夺取政权以后，对内收买军队作为反动支柱，把土匪组织起来当作警察镇压人民；对外投靠美国，出卖祖国利益，使墨西哥成为其附庸国。

迪亚斯在他统治期间掠夺了农民 1.35 亿英亩土地，把大片土地无偿地赐给自己的党羽和外国垄断公司。如他曾经把下加利福尼亚的 3000 万英亩土地赠给 4 个地主。据统计，834 个地主和外国公司霸占了全国 95% 的土地。其余的土地由 45 万农民和地主所拥有。绝大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债务农，受着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剥削。

迪亚斯为外国资本大开方便之门，他允许外国资本家享有开采矿藏、兴办工厂、修建铁路和经营种植园的权利。结果，美国资本源源而入，到 1910 年，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达 10.55 亿美元。英国资本在墨西哥工业中也占很大比重，1913 年英国投资有 1.5902 亿英镑。

迪亚斯的反动统治激起墨西哥人民的普遍不满。各种反对力量汇合成不可抗拒的洪流。在反迪亚斯的斗争中，墨西哥工人起了很大作用。墨西哥工人的工资极低，而且工作日长达 13—16 小时。生活的困难和政治上的无权，促使他们走上斗争的道路。他们为了加强团结，在 1878 年成立了社会党，和迪亚斯政权展开了不懈的斗争。

在工人进行反政府斗争的同时，农民也纷纷起义。在北部的乔华华和杜兰克州，债务农潘乔·比利亚（1877—1923 年）领导农民游击队夺取地主的土地。在南部的莫瑞罗斯州，贫农埃米利亚诺·查巴塔（1880—1919 年）在山区建立了农民军根据地，和政府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战斗。

迪亚斯的反动统治不但激起劳动人民的反对，而且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地主也不满他的独裁统治。1910 年，他们在地主兼资本家弗朗西斯科·马德罗（1873—1913 年）的领导下，成立了“反对连任党”，提出反对独裁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口号，与迪亚斯开始了斗争。马德罗为了调动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又发表了所谓“圣路易波托西方案”，要求归还非法掠夺的印第安人的土地，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推翻迪亚斯的反动统治。这个“方案”的公布成为 1910—1917 年革命的信号，立即得到广泛的响应。除比利亚和查巴塔率领起义军发动攻势外，许多州的

农民也挺身而出，展开了游击战争。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使迪亚斯处于四面楚歌的局面。1911年5月26日，他看到大势已去，便逃出墨西哥城，逃亡欧洲。马德罗被“选”为总统。

马德罗政府代表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归还印第安人的土地，而且下令解除农民的武装，于是查巴塔于1911年11月在莫瑞洛斯州提出“土地和自由”的口号，立即起义。由于马德罗政府根本无意改善工人生活，各地工人举行罢工。遍及全国的革命浪潮，引起美国的忧虑，而且马德罗企图排斥外国资本，也使美国非常不满。美国为了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指使陆军司令乌埃尔塔发动政变。1913年2月，乌埃尔塔逮捕、枪杀了马德罗，自己就任总统。

乌埃尔塔在美国支持下夺取政权，更引起革命的深入、广泛发展，各州农民蜂拥而起，考维拉州州长大牧场主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1859—1920年）趁机提出打倒军阀主义、教权主义和富人统治等口号，也举行起义。墨西哥举国上下的发动，对美国形成严重的威胁，于是美国政府于1914年4月出兵干涉。全国人民对美国侵略军进行了坚决的抗击，迫使乌埃尔塔于7月逃往国外，美国在11月撤回侵略军。1915年3月，卡兰萨就任总统。

在人民的要求下，又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努力，卡兰萨政府于1917年2月制定了一部比较民主的宪法。这部宪法宣布没收教会、外国人和地主所霸占的土地、政教分离、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废除债务权，规定最低工资等。以上条例反映了墨西哥人民的要求，是他们与国内外反动势力斗争的结果。但卡兰萨根本没有实现这部宪法的意愿。因而宪法颁布以后，农民和工人仍然坚持斗争。

阿根廷的民族民主运动 阿根廷独立后，由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争夺政权，内战与政变经常发生。自19世纪30年代起，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通过考迪罗实行专制统治，残酷地屠杀印第安人，疯狂地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阿根廷政府曾经颁布“移民垦殖法”，把印第安人的良田沃土以最低的价格卖与大地主和英、美资本家，又制定《空地占有法》，将成千上万公顷的印第安人土地无偿地赠与军官。于是，在过去地主霸占土地的基础上，更加发展了大土地所有制。20世纪初，阿根廷2000个地主集中了4500万公顷土地，10万个农民只有土地96万公顷，而无地农民又在100万人以上。

在对外方面，阿根廷执行亲英政策。执政者出卖国家利益，允许英国资本家在国内投资，结果阿根廷的交通运输业、工业和屠宰业等，都受到英国的控制。他们为了购买廉价工业品，还降低英国商品的进口税，使英国货充斥市场，从而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

地主阶级的统治引起其他各阶级的不满，1890年，资产阶级民主派莱安德罗·阿莱姆和伊波利托·伊利戈廷（1850—1933年）成立了“激进公民联盟”，其政治纲领为要求普选、改善工人生活、实行政教分离、设立公立学校。经过长期的斗争，激进公民联盟在工人的支持下，迫使政府于1912年通过萨恩斯-培尼亚法，规定年满18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并且实行秘密投票选举法。由于选举法的改革，“联盟”在1912年的国会和州长选举时，得到空前胜利。它完全控制了下院；在上院也得到不少席位；在过去保守派控制的州内，也取得了州长的职位。随着人

民运动的不断发展，1916年伊利戈廷被选为总统。但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下，劳动人民的生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19世纪后半期，由于欧洲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和肉类，阿根廷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交通运输、纺织、玻璃、水泥、金属加工和造船业也有了发展。但是，阿根廷的主要经济部门都由外国资本所控制。据统计，阿根廷的铁路几乎都是英国公司的财产，许多纺织、金属加工工厂以及公用事业公司也属于英国资本家。阿根廷的屠宰业分别被英、美垄断资本家所操纵。1914年，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达15亿美元，外国资本家掌握着阿根廷财富的1/4。

阿根廷工人所受的剥削是惨重的。他们每月的最高工资不到105比索，而一个4口之家最低的生活费是125比索。工作日一般都在10小时以上。所以自19世纪70年代，阿根廷工人便开始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阿根廷最早的工人组织是德、法移民成立的工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科尔多瓦工人又成立了第一国际支部。1889—1890年，由于物价飞涨，工人生活每况愈下，铁路员工、港口工人、面包工人和木工等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189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积极响应第二国际的号召，举行了庆祝“五一”劳动节游行，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1896年，阿根廷工人还成立了社会党，它在领导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解散教会学校、实行累进税、成立工会和要求罢工自由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到20世纪初，党的领导人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他们宣扬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谬论，放弃了政治斗争的路线，给阿根廷工人运动造成不小损失。

虽然社会党的领导人堕落为机会主义者，但广大工人群众却和统治阶级展开了激烈斗争。1904年5月1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八小时工作日。1906年全国发生了170起罢工，参加者有7万多人。1907年罢工增加到231次，参加者有17万多人。以后罢工斗争屡有发生。1912年阿根廷工人为了加强团结，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和“阿根廷工人联盟”，促使议会通过年满18岁的男子有选举权的法律，并制定工人立法，如星期日休息、资方对工伤事故负责、发给铁路工人养老金等。工人斗争的胜利，引起社会党的分裂。1917年，左派分裂出去，另成立了“阿根廷国际社会党”。

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同时，农民开展了反抗运动。1896年农民举行暴动。1909—1912年农民爆发了起义，成立了“土地联盟”，要求进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并减轻赋税。农民的殊死斗争有力地打击了阿根廷的统治者。

巴西的民主运动 1822年，在拉美独立战争浪潮席卷下，巴西击败葡萄牙殖民军而宣告独立。独立后巴西的经济以奴隶制种植园占主导地位，占当时人口近一半的奴隶是巴西的基本劳力。种植园生产的甘蔗、棉花、咖啡、烟草、橡胶等则供应世界市场的需要。巴西土地十分集中，2000个大地主拥有的土地竟比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丹麦4国面积之和还大。19世纪中期以后，巴西经济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漩涡，首先是外国资本数以亿计的输入，渗透到工矿企业与公用交通事业中去。其次为欧洲移民数以百万计的涌入，作为合同制工人代替了来源频

于枯竭的非洲黑人奴隶。其三为世界市场对于经济作物特别是咖啡的大量需求，使咖啡取代了甘蔗、棉花而成为巴西的头宗出口产品。随着咖啡生产的增长，外贸数额激增，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产业无产阶级由此形成。两种劳动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与种植园奴隶劳动的冲突日益尖锐，从而将废奴运动提上了历史日程。

黑奴起义最早爆发于1824年，其后时起时伏，时有发生。1863年，林肯政府颁布的解放黑奴宣言以及美国南方叛乱的被粉碎，极大地鼓舞了巴西的废奴运动。巴西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废奴活动，并将之与反帝制的斗争结合起来。黑人奴隶纷纷逃亡，他们在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集合起来，建立了形同政权的逃亡堡。1870年，首都里约热内卢成立了奴隶解放协会，巴西皇帝彼得罗二世（1840—1889年在位）慑于人民斗争的威力，于1871年宣布“胎儿自由”法令，规定自法令颁布后出生的奴隶子女为自由人。1873年，巴西共和党通过专门决议，要求废除奴隶制度。1883年，国内各种废奴协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废奴主义同盟，统一领导全国废奴运动。1885年，国会通过一项法令：“60岁以上的奴隶，再无偿服务数年，可获解放。”法令一经颁布，即遭到废奴主义者的愤怒声讨，废奴运动更为蓬勃地开展起来。1888年5月，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国会被迫通过了立即无条件废除奴隶制度的法令，并由摄政的公主伊萨贝拉签字，当即生效。75万名黑奴由此获得自由，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废奴运动，至此胜利告终。

奴隶制废除以后，巴西的工人、手工业者、大学生、下级军官和资产阶级掀起了共和国运动。军官曼努尔·丰塞卡（1827—1892年）是这一运动的领导人。1889年11月15日，他和另一位军官本杰明·康斯坦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政府机关，逮捕了各个大臣。19日，彼得罗二世退位，前往葡萄牙，以丰塞卡为首的“共和政府”建立起来。

共和国建立后，巴西政局便陷于动荡之中。1891年才制定了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废除了等级制和封建特权，宣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障公民权利，还规定政教分离、解散教会学校、凡有文化的男子都有选举权。宪法虽然公布，但丰塞卡仍然实行着军事专制统治。一切重要官职都由他委任，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由于文盲占全国人民的90%以上，所以普选权的规定犹如一纸空文。

在经济方面，由于官吏的贪污腐化和橡胶在世界市场上的滞销，政府入不敷出，财政非常困难。英、德、法和美国资本家乘机侵入。他们通过放债控制了巴西各个主要经济部门。1910年，外国在巴西的投资将近30亿美元，其中英国资本占比重最大。

巴西的工人运动自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发展起来。1891年，铁路工人所举行的罢工是巴西工人运动开始的标志。此后，工人群众便和资产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1892年，里约热内卢工人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号召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实行社会保险和成立工会而斗争。同年，圣多维斯港工人成立了社会主义中心，又在1895年举行了巴西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示威游行。自1896年起，工人报刊相继出版，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号召工人进行斗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初，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地的工人不断举行罢工，争得减少工作日的胜利。

共和国的建立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绝大多数农民以债务农

或佃农的身份从事劳动。所以反奴役、反剥削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1893年，巴伊亚州的农民在安东尼奥·马西尔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撼巴西的大起义。他们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土地，在森林、草原中建立了根据地。他们用游击战术，多次击败政府军，到1897年才被镇压下去。1902—1906年，圣加达里纳州的农民又举行了一次汹涌澎湃的起义，起义农民痛击政府军，分了不少地主和外国公司的土地。最后，政府调动配有大炮的一万多军队才将起义军战败。

古巴的独立战争 拉美各国独立后，西班牙便加紧了对古巴的压榨。在政治上，古巴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时时遭到殖民政府的凌辱迫害。在经济方面，宗主国横征暴敛，对古巴人民恣意勒索。从1868年10月起，古巴人民便在以种植园主卡洛斯·塞斯佩第斯(1819—1874年)为首的独立派领导下，举行起义。他释放自己的奴隶作为武装起义的基本队伍，提出了“打倒西班牙殖民统治”、“废除奴隶制度”等民族民主革命的口号。其后，又联合其他起义者发表了“雅拉宣言”，宣告古巴独立。古巴历史上长达10年(1868—1878年)的第一次独立战争，就此拉开了序幕。1869年4月，“自由古巴”定国体为共和国，塞斯佩第斯出任总统，并制定了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废除奴隶制度，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和受教育等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议会是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具有任免总督和总司令权力。这就从法律上消除了考迪罗产生的基础。但是，宪法并没有提出社会经济改造的纲领，也没有触及大地产制，这对进一步发动群众，带来了障碍。1875年后起义军渐趋逆势，西班牙殖民当局乘机分化瓦解。1878年2月10日，西、古双方签订妥协性的“桑洪协定”，以古巴放弃独立为代价，换取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某些“改革”，参加独立战争的黑人奴隶与契约华工，全部享有自由。1880年，西班牙被迫宣布废除古巴的奴隶制度。

1892年，古巴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党——古巴革命党，领导人为何塞·马蒂。

何塞·马蒂(1853—1895年)出身于贫苦的西班牙移民家庭，学生时代即从事反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是古巴最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1892年，马蒂在纽约流亡的爱国志士和侨民中成立古巴革命党，号召古巴和拉美人民用胸膛来堵塞殖民军侵略的道路。他明确提出通过解放战争实现民族独立。1895年2月，在古巴革命党领导下，第二次独立战争开始。马蒂亲临战场指挥，身先士卒，不幸牺牲。9月，古巴革命党召开立宪会议，成立共和国政府。至1897年，革命党政府控制了古巴的近1/2领土。西班牙殖民军几乎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正当古巴的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美国借口其“缅因号”军舰在哈瓦那港爆炸事件，于1898年4月发动美西战争，战败了西班牙，占领了古巴。

美国占领古巴后，首先实行了4年的军事管制。1901年，古巴制宪会议在美国的监督下，通过了宪法。但美国又强迫古巴接受它所提出的普拉特修正案作为宪法的附录。这个修正案强迫古巴同意美国对古巴的保护权，承认美国有权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规定古巴未经美国同意不得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不得举借外债。这样，美国就使古巴成为自己的保护国了。

在普拉特修正案的保护下，美国资本大量涌入古巴，“美国制糖公

司”几乎垄断了古巴的整个制糖业，其他垄断资本也控制了古巴的矿产、交通运输、烟草业和公用事业等。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对于古巴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引起他们的起义，特别是1906年、1911年和1916年的起义，更加沉重地打击了美国资本家和国内卖国者的反动气焰。

参考书：

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全集》，第2卷，第477—448页。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史部分）。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十九章。

刘祚昌等主编：《世界近代史（近代史）》（下）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章。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1983年，下册。

复习题：

1. 试述朝鲜1894年甲午农民起义的后果。
2. 印度国大党是怎样成立的？后来分为几派？
3. 试举1905—1911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
4. 试论1908—1909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
5. 简述埃及阿拉比抗英斗争的经过。
6. 试述埃塞俄比亚战败意大利侵略的意义。
7. 简述英法对西、南非洲的侵略行径。
8. 试述拉丁美洲诸国独立后的政治经济概况。
9. 试论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的原因和后果。
10. 简述巴西废除奴隶制的原因。

第十九章 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的国际关系

第一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 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便激烈地展开了。帝国主义所以推行霸权主义，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高额的垄断利润，总是力图垄断地控制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为此它们必然要竭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也通过向外扩张的途径来和缓国内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

随着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对世界的分割，继之而来的必然是对世界领土的分割。垄断资本家依仗国家的力量，通过武力侵略而分别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帝国主义之间为了争夺殖民地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帝国主义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争夺奴役世界的垄断权。

19 世纪末，整个世界已被帝国主义列强基本上瓜分完毕。到 1900 年，非洲领土的 90.4%、亚洲领土的 56.6%、美洲领土的 27.2% 以及澳洲全部领土都沦为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此外，还有许多形式上保持独立，实际上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经形成，世界被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矛盾。

帝国主义是按照“资本”和“实力”瓜分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使帝国主义国家间“资本”和“实力”的对比关系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德、美等国迅速兴起，跳跃式地赶上并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各国工业增长速度来看，1870 年至 1913 年，美国增长 8.1 倍，德国增长 4.6 倍，而法国只增长 1.9 倍，英国增长 1.3 倍。从各国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来看，1870—1913 年美国从 23% 上升到 38%，德国从 13% 上升到 16%，而英国则从 32% 下降到 14%，法国从 10% 下降到 6%。英国丧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而美国工业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德国在欧洲也首屈一指。

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同历史上形成的对殖民地占有的状况已极不适应。1914 年，英国占有 3350 平方公里土地及 3.93 亿多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法国占有 10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及 5550 万人口。俄国占有 1740 万平方公里土地及 3320 万人口。而德国仅占有 290 万平方公里土地及 1230 万人口。到 1914 年德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只等于英国的 1/10、法国的 1/3。

这种与各国实力极不相称的对殖民地瓜分不均的状况，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它们强烈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然而世界已

被瓜分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想多得土地，只能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去夺取，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则力图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世界霸权地位，于是，帝国主义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迅速尖锐起来。正如列宁所说：“把最后一块土地都分割完了；再要瓜分，再要扩大领土，就只有牺牲别人，为了一个国家而牺牲另一个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使用武力，因此，世界掠夺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就是早期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局部战争。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 帝国主义国家各有自己的争霸计划，互不相让。德国企图建立一个包括奥匈帝国、巴尔干半岛、西亚、波罗的海沿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比利时及法国一部分在内的“大德意志”或“中欧帝国”，它还要夺取英、法、比、葡的海外殖民地。美国首先要在西半球确立自己的霸权，而后再侵略中国和东亚。日本的侵略目标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英国力图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想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借收复阿尔萨斯、洛林为名，积极准备“复仇”战争，想侵占德国的鲁尔区，并夺取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沙皇俄国不仅要夺取加里西亚，在巴尔干建立自己的统治，而且要占领君士坦丁堡，进一步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还要夺取伊朗，彻底瓜分中国。奥匈帝国则要征服塞尔维亚，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和西部的统治地位。

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德国成为英、法、俄的劲敌。德国首相比洛叫嚣：“在别的民族争取统治那些拥有发展前途的国家之竞争里，一开始就不该把德意志关在门外。当初有过一个时候，德意志把领土让给这个邻邦，把海洋让给那个邻邦，而自己留置于纯粹空谈的天空里，但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德国也要求在太阳下的地位。”德国首先成为占有全球土地四分之一的殖民帝国—英国的极大威胁。进入90年代以后，英德矛盾更为紧张。

中东地区是英德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中东是欧、亚、非三洲交通枢纽，是通往地中海、印度洋的战略要地，自然成为德国垂涎欲得之地，极力插足其间，扩大自己的势力。自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德国加紧向土耳其渗透，德国商品大量向奥斯曼帝国倾销，德国军官训练和改编土耳其的军队。1903年德国和土耳其正式订立条约，取得建造巴格达铁路的特权。这条铁路西北起自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经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东南至波斯湾的巴士拉。它将把柏林、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波斯湾直接联系起来，是德国东进的重要工具。它将严重威胁英国在西亚、北非和印度的殖民利益，也威胁着沙俄的殖民利益。德国殖民主义者宣称：巴格达铁路将替我们开辟到伊朗和阿富汗的道路，而成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因此，遭到英、俄、法的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使铁路工程时建时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也未能完工。

拉丁美洲也是英、德争夺的一个地区。1904年德国在这里的投资为48亿马克，是德国当时对外投资总额的1/4强。德国在拉丁美洲20个国

家的对外贸易总额中仅次于英、美，居第三位。德国成为英国在拉丁美洲竞争的主要敌手之一。

在海上，德国也向英国挑战，要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德皇威廉二世叫嚣“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定叫海神手中的三叉戟（即制海权）控制在我们手中。”

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德国于1897年侵占中国的胶州湾，1899年取得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1900年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勒索了巨额赔款。

总之，德国处处以进攻的姿态出现，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在19世纪70—80年代后，德法矛盾曾为欧洲国际关系中最尖锐的矛盾；进入90年代以后，英德矛盾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主要矛盾。

第二节 两个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形成

从三皇同盟到三国同盟 在准备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帝国主义根据各自的利害关系寻求同盟，经过曲折的分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两大对立的军事侵略集团，即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

普法战争的结局，引起欧洲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形成了几个大国争霸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法国统治阶级不甘心失败，力图夺回它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相结合，使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争霸的野心勃勃，准备发动一场新的对法战争，以巩固其在欧洲的霸权。为达到此目的，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与两个邻国——沙俄和奥匈帝国结盟。

沙俄看到正在兴起的德国对它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此对德国存有戒心。但当时沙俄主要是在中亚与英国争夺，为了加强在同英国对抗中的地位，需要暂时改善同德国的关系。

奥匈帝国在争夺对巴尔干的控制权上虽然与俄国矛盾较深，但德国以支持奥匈帝国掠夺东南欧为条件，诱逼它与德国一起同沙俄结盟，奥匈只好追随德国维持在巴尔干的现状。

德、奥、俄都是君主专制国家，国内封建势力浓厚，工农运动，民族运动高涨；在争霸世界中，又暂时有共同利害，彼此接近。1873年6月，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与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在维也纳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协定。协定规定：一旦发生战争危险或革命骚动，缔约国应协商共同行动。同年10月，德皇威廉一世也加入了此项协定，至此“三皇协定”即“三皇同盟”形成。它与“神圣同盟”同样反动，被称为新的“神圣同盟”。三皇同盟是极不稳固的，在镇压欧洲革命上是一致的，而在各自争霸的利益上又是互不相让的。

1875年，德国企图利用“三皇协定”对法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俄国却表示，一旦德国进攻法国，俄国将支持法国。英国也表示反对德国势力的扩大。在英俄的牵制下，德国的野心未能得逞。“三皇协定”瓦解的兆头已经出现。1875年至1878年，欧洲列强在企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加速了“三皇协定”的瓦解，使欧洲大陆国家重新组合。1875年夏秋，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尔干地区爆发了民族起义，沙俄以援助斯拉夫人为名，向巴尔干扩张，1877年4月公开对土耳其宣战，1878

年 1 月进逼君士坦丁堡，这就触犯了英、德、奥匈的利益。英国和奥匈帝国立即向俄国提出警告，英国舰队开进马尔马拉海，停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迫使俄国停止进攻。1878 年 3 月，俄土两国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圣斯蒂凡诺签订和约。根据和约，俄国得到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土耳其的喀斯、巴统、阿达罕等地。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得到加强，而英、德、奥匈帝国的势力遭到排挤。在英、德、奥匈强烈要求下，1878 年 6 月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修改俄土和约。7 月签订柏林条约以代替俄土和约。柏林条约规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奥匈帝国占领和管理；俄国占有比萨拉比亚以及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重要地带。英国同土耳其直接签订了条约，取得了地中海东部的重要战略基地塞浦路斯岛。这场帝国主义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斗争被称为“东方危机”。这场斗争使俄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关系恶化。1878 年“三皇协定”到期后未再续订。1881 年虽曾一度恢复，但终因德俄矛盾的扩大而崩溃。

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关系却进一步接近。双方于 1879 年 10 月缔结秘密军事同盟条约，规定如同盟双方之一遭受俄国进攻，另一方应以全部兵力援助对方；如同盟中一方遭到俄国以外国家进攻，另一方至少应取中立态度；如一方遭到有俄国支持的国家进攻，另一方应全力助战。

意大利在与法国争夺突尼斯失败后，也倒向德奥一边。1882 年 5 月，德、奥、意三国在维也纳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不得参加目的在于反对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同盟或协定。如意大利遭到法国进攻，德奥应全力援助意大利；如德国遭到法国袭击，意大利将援助德国；奥、俄战争时，意大利应保持中立；缔约国中的一国与两个以上国家发生战争时，其它两国应给盟国以军事援助。

三国协约的形成 三国同盟形成之后，处境孤立的法国急需寻找一个强大的同盟者，德俄关系的破裂为法俄的接近造成了机会。1887 年法国开始向俄国提出了结盟的呼吁，俄国也急需法国的经济援助，积极向法国靠拢。1888 年，法国向处于窘境俄国提供了一笔为数 5 亿法郎的贷款。1889 年又续订了两笔共达 19 亿法郎的借款合同。随后几年，法国资本源源不断向俄国输入，使资金匮乏的俄国加深了对法国的依赖。1888 年俄国正式向法国订购了 50 万支步枪。这一切都为法俄结盟奠定了基础。1891 年法国舰队访问波罗的海的海港喀琅施塔得要塞，在迎接舰队时，乐队高奏一向在俄国禁唱的《马赛曲》，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破天荒地在乐曲声中脱帽致敬。这显然是一次对法亲善和对德示威的表示。接着两国订立了《咨商协定》。1892 年两国又缔结了名为《法俄军事条约草案》的军事协定，规定：“如果德国或意大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法国，俄国应使用它的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如果德国或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俄国，法国应用它的所有的军队和德国作战。”“如果三国同盟或组成三国同盟的国家之一动员了它的军队，法国和俄国一经接到这件事情的消息，不需要任何事先的协议，应立即同时动员他们的全部军队，并将这些军队调到尽可能靠近边界的地方”。“法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 130 万人，俄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为 70 万至 80 万人。这些军队应尽快全部参加战斗，使德国不得不在东线和西线同时作战。”该协定于 1893 年生效，俄法军事同盟正式形成。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英国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法国和俄国，它同德国

的关系比较平稳。但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德国奉行“世界政策”，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梦想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于是英德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

在贸易方面，英德双方激烈争夺商品市场。1880—1890 年间，德国出口额由 30.09 亿马克增至 34 亿马克，即大约增加 10%，而在以后十年间，出口额又增至 46 亿马克，即增加 36%。与此同时，德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也迅速增加。1870 年它只占 9.7%，到 1913 年上升为 12.6%，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英德贸易竞争遍及全球，不仅存在于欧洲大陆各国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在殖民掠夺方面，德国也是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尤其是德国修筑了巴格达铁路，对英国以印度为基地的势力圈造成直接威胁。德国在瓜分非洲中沿赤道两旁向外扩张，从西南非向东非推进斜断非洲。德国支持布尔人抗英以打击英国在南非的霸权。1896 年，南非公司经理詹森袭击布尔人共和国失败后，威廉二世特地发电向布尔人表示祝贺。所有这些都加深了英德两国的矛盾。

英德海军竞争也非常激烈，1898 年德国帝国议会通过海军法案，决定大力扩充海军。德皇威廉二世明确宣称要夺取海上霸权。

随着英德矛盾的发展，英国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光荣孤立”政策。1902 年英国与日本结盟以对付俄国，确保自己在东亚的利益。接着英国又放弃了传统的仇法政策，调整与法国的关系。1904 年 4 月与法国签订协定，在殖民地问题上达成妥协，法国承认埃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同意法国占领摩洛哥。英俄在中亚及中国西藏地区的矛盾也得到调整。1907 年 8 月底，英国又同俄国签订协约，双方在伊朗、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争夺上达成妥协。协约规定：（一）将伊朗分为三个部分，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中部为“缓冲区”；（二）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三）双方尊重西藏领土完整，不干涉西藏内政，只通过中国政府与西藏发生关系。这样，英俄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由于 1893 年法俄同盟和 1904 年英法协约的订立，所以英俄协约的签订，标志着与德、奥、意同盟对立的英、法、俄协约国集团的形成。在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积极备战的情况下，国际上不断发生危机和局部战争。

19 世纪末欧洲列强的扩军与海牙会议 19 世纪晚期，欧洲掀起一股扩军狂潮。列强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大规模的扩军提供了物质前提。1913 年英法俄集团生铁产量为 2020 万吨，钢产量为 1860 万吨；德奥集团亦分别为 1902 万吨和 1630 万吨。列强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纷纷建立了军火工业。20 世纪初德国有大军火工厂 30 家，法国 23 家，英国 19 家，沙俄 20 余家。19 世纪末科学技术的突破推动了欧洲各国军事技术的革新。陆军的枪炮走向自动化，出现了重机枪、远射程大炮、坦克和装甲车。海军的军舰有了根本的革新，排水量达 2.7 万吨以上的巨型装甲舰——无畏舰已制造出来。潜艇和鱼雷的制造成功，把海面的战斗引向海底。而飞艇和飞机的发明，又把陆上的战斗伸展到空中，军事技术革命的结果使未来的战争出现了新型的武器，增添了新的兵种，开辟了新的战场，而这就更加扩大了军备竞赛的内容与规模。

军备竞赛首先表现在军费增长上面。从 1872—1912 年，德国经费增加了 335%，英国增加了 180%，奥匈帝国增加了 155%，法国增加了 133%。

扩充陆军的竞争主要在德奥法俄之间进行。德国在普法战争前陆军只有 31 万人，1874 年为 40 万人，1914 年已达 75 万人。奥匈的陆军力量较弱，1911 年增加预备役兵员 40%，1912 年又颁布新的征兵法，扩大征兵额，使陆军人数扩充到 20 万人。法国从普法战争后一直在秣马厉兵，1871 年陆军为 43 万，1900 年常备军为 62 万，受过军训的已达 100 万人，1913 年，通过延长士兵服役年限，使常备军达到 72 万，1914 年又扩至 76 万多人。俄国陆军的装备和素质较差，但人数却居欧洲之首，1871 年为 76 万人，1904 年扩至 109 万，到 1918 年又猛增到 144 万人。大战爆发后，各国通过总动员，使兵员几倍甚至十几倍地扩充，德奥法俄的陆军人数均达到几百万人。

海军的竞争主要在英、德两国之间进行。德国为了从英国手中夺取海上霸权，1898 年和 1900 年，国会两次通过加强海军法案，有与英国海军并驾齐驱的势头。这使英国十分恐慌，它坚持“海军两强标准”的原则。1905 年，英国开始制造一种 18000 吨级的巨型装甲舰——无畏舰。当英国第一艘无畏舰刚建成，德国也开始着手建造同类战舰。1908 年，英国有 8 艘无畏舰，德国有 7 艘。旧式装甲舰的对比是：英国 51 艘，德国 24 艘，1909 年，英国决定，德国投建一艘军舰，英国要建造两艘，至 1914 年，英国共有大小军舰 688 艘，德国为 391 艘。德国虽未赶上英国，但已一跃而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个海军强国。

两大军事集团各自加紧进行疯狂的扩军备战活动，却又要用“和平”的伎俩来掩盖其战争准备。1896 年 8 月 24 日和 1899 年 1 月 11 日，沙皇政府连续两次向各国发出通知，倡导举行和平会议。沙皇的建议，欧洲列强都知道是一个骗局，但谁也不愿拒绝。正如德皇威廉二世所说：“和平倡议”隐藏着一个把戏，谁要是拒绝了邀请，谁就是拒绝和平。因此，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加了会议。

1899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29 日，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参加的有 27 个国家。这次会议尽管就裁军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但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议，仅仅在一个公约中表示希望限制陆军军力及军事预算。此外，会议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陆战法规等三项公约，以及禁止从汽球上投掷炸弹和爆炸物等三项宣言。还决定成立“常设仲裁法庭”。第一次海牙和会，在空洞虚伪的喧嚣声中结束。会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扩军，力求在未来大战中一决雌雄。

1907 年 6 月 15 日至 10 月 18 日，又举行了第二次海牙会议，有 5 大洲的 44 个国家参加。这次会议名为裁军的和平会议，但在会议上，却把限制军备的问题丢到一边，而专门讨论制定陆、海战争的种种法规，通过的陆战和海战的法规达 10 项之多，这是帝国主义战争即将来临的征兆。所谓和平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列强准备战争的会议。

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后，国际气氛愈来愈紧张。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开完不久，俄国沙皇就和英王爱德华在勒佛尔（今爱沙尼亚的塔林）举行会谈，决定扩充俄国的海陆军以对付德国。而德国也在筹划对付协约国的战略。事实证明海牙和会完全是一场骗局。

第三节 战争危机与局部战争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形成之后，双方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夺，20世纪初的所有重大国际事件，无一不是对峙的两大集团矛盾尖锐冲突的产物。

位于欧亚非三洲之间的地中海，是联结大西洋和印度洋最近的航道，而直布罗陀海峡、黑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又是控制这条航道的咽喉，地中海沿岸和巴尔干因此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地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在这里猛烈展开，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

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角，扼地中海至大西洋的通道，地理位置至为重要。早在19世纪80年代列强瓜分非洲斗争中，法国就企图占领摩洛哥，西班牙也有此想法，矛盾发生了。1880年，西班牙倡议在马德里召开摩洛哥问题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4个国家。会上英国和德国支持西班牙，孤立法国。法国被迫让步。1880年签订的马德里公约规定一切外国在摩洛哥都有平等的贸易权，不给予任何一国以独占权。可是法国的野心不死。1900年法国同意大利达成政治交易，法国赞同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意大利支持法国占领摩洛哥。1904年英法协定中也达成了同样的政治交易，法国承认英国占领埃及，英国支持法国占领摩洛哥。于是法国公然违反马德里公约，于1905年2月向摩洛哥苏丹提议改革，使摩洛哥成为法国的附属国。法国的改革方案是：由法国派使团到摩洛哥，协助改革内政，训练摩洛哥军队，建立摩洛哥国家银行，修筑铁路，开采矿藏。接受这个方案将使摩洛哥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德国也企图在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沿岸建立海军基地，反对法国独占摩洛哥。1905年3月，德皇访问摩洛哥，假意提出要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要使所有国家在摩洛哥都有贸易自由和平等权利。接着德国提出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摩洛哥问题，并对法国进行军事威胁，声称如果法国拒绝德国的建议，就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于是造成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德皇从摩洛哥回国后，向《马德里公约》的主要签字国英、法、西、俄等国发出照会，指责法国违反公约，并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1906年1月在西班牙的阿尔吉西拉斯英、美、德、俄、法、意等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召开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德国本以为法国独占摩洛哥的企图必定遭到与会多数国家的反对。却不料在会上法国取得了英、美、俄、西、意等国的支持，而德国陷于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不敢树敌过多，只得作出让步。4月7日与会国签订条约，承认摩洛哥“独立”，但其财政由国际监督，大部分警察组织和“治安”工作由法国管理。从而使法国在维持治安的借口下控制了摩洛哥。

波斯尼亚危机 巴尔干地区是俄、奥两国长期角逐之地。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由奥国占领，而名义上仍是土耳其的属地，但奥匈却想完全吞并两地作为进一步南进的基地。1908年土耳其爆发革命，10月7日奥匈乘机公开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俄、奥背着塞尔维亚人达成密约，沙俄同意奥匈吞并波斯尼亚，奥匈则同意沙俄舰队可以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10月奥匈帝国宣布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俄国自由通过达达尼

尔海峡的权利却因英、法的反对而落空。奥匈帝国吞并波黑二省遭到塞尔维亚人民的反对，沙俄又转而支持塞尔维亚人反对奥匈。这实际上是沙俄利用塞尔维亚人的反抗情绪与奥匈对抗。奥匈拒不让步。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受命向奥匈承诺：一旦俄奥发生冲突，德国将全力履行同盟条约。3月奥匈进行动员，准备进攻塞尔维亚。21日，德国向沙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沙俄承认奥匈兼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二省。当时俄国的1905—1907年革命刚刚过去，元气未复，无法同有德国支持的奥匈对抗。3月2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电告德皇：俄国接受德国的要求。3月31日，塞尔维亚政府在沙俄的压力下被迫发表屈辱声明，承认奥匈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停止国内一切反奥宣传和活动。至此，一场战争风波平息。

波斯尼亚危机使俄国与德奥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为了同德奥对抗，俄国进一步向英、法靠拢，并加速重整军备。奥匈的扩张行动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均势，也使对这个地区怀有野心的意大利不能忍受，于是意大利开始疏远奥匈而向俄国接近。1909年10月24日，俄意缔结《拉科尼基协定》，规定两国共同维护巴尔干地区的现状，意大利支持俄国在黑海海峡问题上的立场，俄国则支持意大利夺取的黎波里。从此意大利开始向三国协约集团靠拢。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1911年4月，摩洛哥爆发了人民起义。法国借口维持“秩序”和保护侨民，派遣军队占领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不能容忍法国独吞摩洛哥，7月德国炮舰“豹号”驶进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对法国进行威胁，这就是所谓“豹子的跳跃”，它使德法战争一触即发。英国不愿德国在大西洋得到海军基地，决定支持法国，德国没有作好战争准备，暂时让步，11月缔结德法协定，德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保护国，但摩洛哥必须实行门户开放；法国则同意把法占刚果的部分领土转让给德国作为补偿，转让领土的总面积约27.5万平方公里，德国感到满足，就停止对抗，这次战争危机就这样渡过去了。

意土战争 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意大利乘欧洲英法德等国争吵不休，无暇他顾的时机，发动了旨在吞并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两地即今利比亚）的意土战争。

的黎波里位于地中海南岸，与西西里岛遥相呼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意大利对这个地区一直垂涎三尺。它通过1900年的《法意协定》和1909年的《意俄协定》，使它在的黎波里扩张的计划获得德、法、俄三国的认可。1911年9月28日，意大利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声称意大利在的黎波里的企业受到土耳其当局的敌视，意大利侨民受到威胁，因此意大利政府由于被迫关心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意大利对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实行军事占领。还要求土耳其政府对于意大利军队的入侵不许采取任何形式的抵抗。土耳其政府断然拒绝。10月5日意大利出兵强占的黎波里城，意土战争爆发。意大利军队很快就击败了当地为数不多的土耳其警备部队。但是它遇到了的黎波里的阿拉伯人民的坚决抵抗，土耳其政府也不接受意大利所提出的苛刻的和谈条件，战事被旷日持久地拖下来了。直到巴尔干战争爆发，土耳其才被迫让步。1912年10月18日，意土两国在瑞士洛桑签订和约，土耳其承认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归属意大利。

两次巴尔干战争 意土战争刚刚结束，又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早在 19 世纪巴尔干半岛就形成了很多国家，如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今南斯拉夫的两个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等。但是土耳其还控制着巴尔干的大片土地。在这里居住的希腊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等，要求摆脱土耳其的统治与已独立的祖国合并。意土战争加速了巴尔干各国反土耳其力量的联合，1912 年 3 月至 8 月，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四国组成反土的巴尔干同盟。同年 10 月，四国先后对土宣战。这是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列强企图从中渔利，德国与奥匈帝国一起支持土耳其，力图阻挠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沙俄则力图利用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反土斗争打击土耳其，削弱德、奥势力，扩大自己在巴尔干的利益。沙俄的行动得到英、法的支持，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土耳其军队很快被巴尔干同盟击溃。11 月土耳其被追求和，阿尔巴尼亚宣布为独立国家，形势有利于巴尔干同盟。但在议定和约时，由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争夺，几乎引起欧洲大国间的战争。1912 年 12 月，在伦敦同时召开两个会议，一个是交战国签订和约的会议，另一个是英、法、德、俄、奥、意六国大使会议。大使会上，协约国支持巴尔干同盟，同盟国支持土耳其，双方互不相让，使谈判一度中断。1913 年 2 月，巴尔干同盟再度发起进攻，3 月攻下亚德里雅那堡，土耳其再次求和。5 月土耳其与巴尔干四国同盟订立《伦敦和约》。和约规定土耳其将欧洲部分的领土除君士坦丁堡及其附近和海峡沿岸的一小块地区外，全部割让给巴尔干四国同盟。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交德、奥、法、英、意、俄六国决定，实际上仍为奥、意争夺的场所。

在分配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战果时，巴尔干同盟内部因领土分配不均而发生矛盾。保加利亚获得领土最多，得到色雷斯和马其顿的绝大部分。塞尔维亚和希腊为同保加利亚争夺马其顿，在 1913 年 6 月，订立反保同盟，罗马尼亚随即加入，门的内哥罗也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土耳其想从保加利亚手中夺回一部分领土，也参加了反保联盟。6 月 29 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在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土耳其之间展开了，战争进行了一个月，保加利亚战败求和。这是一次争夺领土的王朝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8 月双方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保加利亚把多布罗加的一部分地区划归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得到马其顿的大部分，希腊获得马其顿南部、克里特岛和色雷斯西部；土耳其重新取得亚德里雅那堡。

巴尔干战争以后，巴尔干地区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局势更加复杂。战争促使了波斯尼亚人和黑塞格维那人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要求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奥匈帝国不仅反对波、黑的独立运动，还想吞并塞尔维亚，为此便竭力拉拢保加利亚。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矛盾尖锐起来。保加利亚不甘心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积极准备复仇战争，极力想靠拢德奥集团。德国支持奥匈帝国，沙俄则支持塞尔维亚，把它当作在巴尔干同德奥相对抗的力量。在巴尔干，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同土耳其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于是，奥、塞冲突必然会引起奥、俄冲突，进而导致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战争。巴尔干成为帝国主义矛盾斗争的

焦点和欧洲的火药库。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二十章。

吴于廑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第六章，第五节。

管敬绪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二十一章。

胡洽坤主编：《简明世界近代史》第十七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上），第三编。

复习题：

1. 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主要经过。

2. 20 世纪初有哪些国际危机和冲突？说明了什么问题？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节 大战的爆发

萨拉热窝事件 1914年6月，奥匈帝国为了炫耀武力，进行战争威胁，决定在紧靠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进行军事演习，把塞尔维亚当作假想之敌。奥匈王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将亲自到萨拉热窝检阅演习。塞尔维亚的爱国组织黑手会决定刺杀斐迪南，并派遣在贝尔格莱德学习的、受黑手会影响的波斯尼亚青年执行这一任务。6月28日，斐迪南夫妇在军事检阅结束后，乘敞篷车参加萨拉热窝市政府的欢迎会。车队行至市中心，一个青年冲上去，掷了一枚炸弹，没有命中，炸弹在车后爆炸。在返回的路上，塞尔维亚的爱国青年普林西波连发两枪，将斐迪南夫妇当场击毙。

斐迪南被刺事件，使早已渴望战争的德国统治集团非常兴奋，德皇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千载难逢的机会！”6月30日，德国驻奥大使呈给帝国首相的报告中说，维也纳希望“跟塞尔维亚人来个一劳永逸的彻底清算”，威廉二世批示道：“要末现在就算，要末永远不算……必须消灭塞尔维亚人，就在现在。”当时，德国通往边境的战略铁路已经完成，能够通行无畏舰的基尔运河也已竣工，德国海军可以迅速从北海进入波罗的海，整个军队的动员只需2个星期，而俄国的战争准备要到1917年才能完成，因此德国认为现在开战最为有利。

奥匈帝国决心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吞并塞尔维亚。但对塞尔维亚的宣战，意味着将引发对俄国以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战争，奥匈必须得到德国盟友的保证。7月5日，奥匈驻德大使携带皇帝的信去见威廉二世，询问如果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是否能够得到德国的支持？威廉二世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在给奥皇的回信中敦促他“不必踌躇”。

在协约国方面，俄国表示支持塞尔维亚。7月20日，法国总统彭加勒到彼得堡访问，表示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将支持俄国。法国政府也得到俄国同样的保证。英国则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向德国表示，如果纠纷发生，英国一定尽可能“防止暴风雨”。直到7月26日，英王乔治五世还亲自出席德国大使馆的宴会，对德国声明：“我们尽力不介入战争，并将保持中立”。另一方面，英国又私下鼓励俄国参战，但又不公开声明支援俄国，从而给德国造成一种英国不会立即卷入战争，暂时保持中立的错觉。

德国估计法俄准备不足，英守中立，就可以用闪电战击溃法、俄。于是鼓励奥匈尽快开战。奥匈选择了彭加勒从俄国返国途中的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塞尔维亚政府48小时答复。通牒提出了10项具体要求，主要是：取缔一切反奥组织；制止各种反奥宣传；由奥匈提出名单，严惩进行反奥活动的文武官员；由奥方派代表到塞尔维亚境内会同追捕和审判与谋刺案有关的凶手。塞尔维亚政府在7月25日答复说，最后一条违反了塞尔维亚宪法，不能接受，其它全部接受。奥匈借口塞尔维亚未能作出满意的答复，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

7月30日，沙俄尼古拉二世宣布全国总动员。接着，奥匈宣布动员。

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并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限18小时内明确答复，在此之前，法国已下令边境部队后撤10公里，避免与德军接触，以免激起事变。但在德国最后通牒的压力下，也在8月1日秘密下令动员。德国制造谣言，说法国飞机越境轰炸德国铁路。与此同时，德军准备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仅有700万人口的比利时勇敢地拒绝了德军的过境要求。8月3日，德军入侵比利时。同日，德国对法国宣战。英国借口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8月4日对德宣战。8月23日日本借口德国拒绝交出在中国的殖民地山东胶州地区向德国宣战。1915年5月，德奥原来的盟友意大利倒向协约国集团，向德奥宣战。长期持观望态度的美国，借口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在1917年4月6日也对德宣战。到1918年大战结束时，全世界总共31个国家参战。其中，加入协约国集团的有英、法、俄、意、美、日、中等27国。参加同盟集团的有：德、奥、匈、土、保4国。战争席卷全世界，主要战场在欧洲。战火从欧洲蔓延到亚洲、非洲、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广大地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场浩劫。

交战双方的战略计划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9年，德国军方就制定了一份详尽的“施里芬计划”。主要制定者是德军的总参谋长老毛奇和德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冯·施里芬伯爵。普法战争后，为防止德国的再次进攻，法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沿150英里长的法德边界构筑了一条坚固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带，并特意留了一个伏击德军的缺口。针对法国的防卫情况，施里芬主持制订了打破法国的防卫系统的战略计划，史称“施里芬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使德军在战争爆发后，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即先用闪电战击败法国，在具体实施时，将78个师投入西线，东线只用9个师配合奥军阻挡俄国的进攻。78个师中8个师放在左翼固守法德边界，70个师集中在右翼，进入比利时，越过不设防的法比边界，沿海岸线推进，在背后对法军实施致命打击，然后迅速包围巴黎，在4—6周迫使法国投降。在法国投降后，再将主力调至东线，与奥军会合，全歼俄军。计划预定战争在3—4个月内结束。

施里芬计划是建立在对形势错误估计的基础之上的。施里芬推断，战争开始后，将会出现俄军动员缓慢、法军不堪一击、英国不会立即参战等有利局面。因此，“施里芬计划”实施和德国闪电战术的成败，全系于预测的形势之上。但是，由于战前俄法军事力量的增强和比利时的顽强抵抗及英国的迅速参战，给施里芬计划蒙上不祥的阴影。战争全面爆发后，俄军忠实履行盟友的义务，在没有充分动员好的情况下，迅速出击并攻入德国的东普鲁士，西线左翼莱茵地区的工业资本家又提出保护产业的强烈要求，迫使施里芬的继任者小毛奇不得不削弱西线右翼的进攻力量，抽调11个师分别去援助东线德军和加强西线左翼的防御，这就更加速了施里芬计划的破产。而整个德军战略计划的破产，意味着德国将不得不进行一场持久战，也预示了同盟国集团的最后败局。

奥匈的作战方案重点是对付俄国。德国希望战争开始后，奥匈在东线进攻俄国，牵制俄军，待德国西线战斗结束后，再配合德军主力，南北合击俄国。

英国的作战计划的要点是：发挥海军优势，对德国进行海上封锁，派遣远征军至法国西北地区，协同法国对德作战。

1814年4月，法国总参谋长霞飞制订了《第十七号计划》。把主要

兵力放在东部，准备在战争初期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并在东线攻进德国。这一计划致命的弱点是忽视了法比边界的防卫，使东北部边界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这是法国初期失败的原因。

俄国于 1910 年制订了《第十九号作战计划》，准备从西北和西南两翼分别向德奥进攻。西北战线集中五分之二的兵力，占领东普鲁士，渡过维斯杜拉河，控制其河口。西南战线集中 3/5 兵力，击溃奥匈。俄国将主攻目标放在西南战线，目的是为了在巴尔干地区建立霸权。

战争开始后，形成了 3 条主要战线：西线，从北海到瑞士边境，全长 700 公里，英、法、比对德作战。东线，从波罗的海到罗马尼亚边境，全长 1200 公里，俄国与德、奥作战。南线，在巴尔干，由奥匈与俄国、塞尔维亚作战。另有 4 个次要战线；意大利战线（意奥作战）、高加索战线（俄土作战）、非洲战线和巴勒斯坦战线。在战争期间还有海上战役和空中战斗。各个战线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其中最关键的战线是欧洲的西线和东线。

战争的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有欧洲的帝国主义参战国都极力将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爱好者，掩盖进行战争的真正目的，极力将战争的罪责推给对方。德国宣布自己参战是预防法国的侵略，俄国说自己是为了反抗德奥的进攻，法国声称是“再一次为人类的自由、理性和正义而斗争”，英国则表白自己是为了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和欧洲的和平。

历史的真相必将昭然于天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产物，是列强几十年来全部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1915 年，德国公开发表了经垄断资本家们和军方共同讨论的《战争宣言》，毫不掩饰地宣布：德国将通过战争吞并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占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乌克兰地区。将埃及变成德国的棉花产地。把南美洲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要经过战争，夺取海上霸权，要让“战败的英国”向德国交出全部海军舰队，使“战败”的协约国向德国缴付巨额的战争赔款等等。这份宣言将德国欲取代英帝国充当世界霸主的野心公诸于世。

奥匈帝国因实力有限而将它的目标定在巴尔干。希望通过战争将俄意的势力从巴尔干地区排挤出去，从而建立起在巴尔干和亚德里亚海沿岸的霸权。

法国的目标是夺回在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占领德国的煤产地鲁尔和莱茵工业区，建立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梦寐以求的“天然疆界”，以雪 1870 年惨败的耻辱。此外还企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扩张法国在中近东的势力。

俄国的战争目标则十分狂妄，在欧洲是打败德奥，夺取奥匈的加里西亚，瓜分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建立在巴尔干的霸权，在亚洲夺取伊朗和瓜分中国。

英国的掠夺计划丝毫不亚于德国，英国首先要将敢于问鼎世界的德国彻底打败，保住其世界霸权的地位，不仅要保持现有的殖民地，还要掠夺更多的殖民地，重点是在中近东肢解奥斯曼帝国，夺取两河流域和巴勒斯坦等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目标和领土要求，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节 大战的进程

1914年的战况 1914年8月4日，德国撕毁其所承诺的关于比利时中立的保证，派150万大军侵入比利时。德军一向看不起比利时军队，认为他们是“巧克力兵”，但遭到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直到20日，德军才占领布鲁塞尔。随后，德军右纵队就以极快的速度分5路向法国北部边境挺进，英法联军连战连败，德军前锋距巴黎只有15英里。法国政府被迫于9月3日迁都波尔多。

战争开始后，法军根据“第十七号作战计划”，在洛林一带向德国发动攻击。当霞飞发现德军主力在法国北部时，及时重新部署兵力，从右翼调兵到左翼，加强巴黎的防卫；同时将法国的北路军南撤，撤到塞纳河的后面，使德军反而受到法军两面夹击。9月4日，法军停止后撤。9月5日至10日，德法双方从巴黎到凡尔登长达200公里的战线上，举行了有名的“马恩河会战”。双方投入兵力200万人，火炮6600多门，战斗持续4天，德军全线撤退，法军取得胜利。这一役，法军伤亡14万多人，德军伤亡20万人。马恩河会战使德国速决战计划遭到破产。9月14日，德皇以患病为借口，撤去了毛奇的参谋长职务，派陆军大臣法尔根汉继任。

接着，双方展开了持续两个半月的争夺法国北部海岸线的激烈战斗。德军获胜，共占领了法国1/12的领土，约21万平方公里。这些被占的地方是法国东北部重要的工矿地区，拥有法国铁矿90%，钢铁制造业的80%。它还侵占了比利时的大部分国土，包括首都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奥斯坦德等重要城市。法军伤亡达38万，被俘和失踪达60万。不过德军切断英法交通线的战略计划并未实现，到1914年底，整个西方战线基本确定。从比利时海峡至瑞士北部，出现了长达数百公里的堑壕，双方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阵地战，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当西线德军进攻比利时时，俄军按照同时攻击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的预定作战计划，在东线发动了进攻。东普鲁士是夹在波罗的海与俄属波兰之间的德国领土，很容易被俄军切断。但德国在东普鲁士早已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和据点。同时，发达的铁路系统，使德国可在短期内迅速将大批军队运往前线。而俄国由于运输问题，部队迟迟不能到达集结地，军需供应也严重不足。

8月中旬，俄军攻入东普鲁士。俄军的初战胜利，迫使德军从西线抽调出4个师以加强东线的防御，德军的东线指挥官被撤职，由重新服役的老将军兴登堡和攻克比利时列日要塞时崭露头角的鲁登道夫接任。8月底，由于俄国将领的指挥无能，俄军主力之一萨松诺夫集团军被引进德军的包围圈，坦能堡一役，俄军全军覆没，萨松诺夫本人自杀。两周后的马祖里湖战役，德军又重创另一俄国集团军，肃清了东普鲁士的所有俄军。

在巴尔干战场，奥军于8月12日首先攻入塞尔维亚。塞军顽强抵抗使奥军连连受挫，当9月1日返回本土时，伤亡已达4万人。此后奥军又发动进攻，并占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但不久便遭到塞军的有力反击，于年底，奥军被全部赶出国境。

进攻塞尔维亚失败后，奥军把主要兵力转到8月中旬开始的加里西

亚战场，但同样命运不济。俄军采取诱敌深入、伺机分割的战术，接连击败奥军。9月底，俄军占领了东加里西亚、布柯维纳，并向匈牙利进攻。俄军的胜利，对德国的西里西亚工业区造成威胁，9月28日，德军东线司令官兴登堡派出一个集团军增援奥军，这样，就使德军原订的闪击战计划彻底破产，并被迫两面作战。

1915年的战况 经过1914年的战争，德国的锐气大减，为了集中力量歼灭德军有生力量，英法调整战线，实行局部进攻。1915年春，英法军队在香槟和阿杜瓦地区发动进攻。9月间，英法军队再次分别向这两个地区进攻，但都没有什么进展。4月22日，德军发动伊普尔战役，并违反海牙国际公约，第一次使用毒气。5分钟内，施放毒瓦斯18万公斤，英军15000人中毒，5000人死亡，阵地被德军占领。此后，交战双方开始大规模使用毒气，总计该年度内，西线战场上英法军队死伤157万人，德军损失61万人，但阵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德国由于西线进攻受挫，东线俄国的威胁日益明显，决定改变施里芬的战略计划，在东线寻找决战机会，以图彻底击败俄国，使俄国退出战争，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德军总参谋部认为，西线现已进入相持阶段，局势一时难以开展，而东线俄国比英法薄弱，战线漫长，可以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迅速打开局面。1915年1月底，德军便开始向东线调兵遣将。到9月，德国东线兵力达65个师，连同奥匈军队达107个师，占德奥集团总兵力的一半以上。

1915年2月，德军发动奥古斯托夫战役，歼灭俄国第十集团军的一个军。俄国残兵败退至格罗德诺和鲍尔河一线。俄德这时又在普夏尼希展开争夺战，未分胜负。但在对奥匈的战争中，俄军则取得重大战果。1月至4月，俄军在喀尔巴阡山一带向奥军发动进攻，夺取普热米什尔，俘获奥匈军12万人，大炮900门。不久，德国4个军驰援西南战线，与奥匈的两个军混编成第11集团军，于5月2日在加里西亚果尔利策地区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突破俄军战线，大败俄军。此后德奥军队乘胜前进，占领波兰、立陶宛、里加以西和沃伦等大片地区。俄军死伤、失踪人数达170万人之多。但在9月底德军占领维尔诺市后，攻势停顿下来。这时，德奥与俄国战线从里加湾至德涅斯特河上游，成一条直线，双方转入阵地战。

战争爆发后，意大利虽名义上是三国同盟的成员，却借口德奥进行侵略而宣布中立，拒绝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德皇威廉二世在接到意大利国王的电报后，大骂他是“坏蛋”。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也同样抱着伺机而沽的观望态度。两大集团都以占有敌国领土为诱饵，极力拉拢意保两国。1915年4月，协约国与意大利订立了满足其领土要求的伦敦密约。5月，意大利向奥匈帝国宣战。意军参战后，投入了约39个步兵师，牵制了奥匈的大量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西线协约国军队的压力。但意军战斗力并不强，连续进攻未获进展，对整个战局没有带来大的影响。

德奥对保加利亚领土要求的慷慨允诺，加之1915年德奥军队在东线、意奥战线的胜利，促使保加利亚倒向了同盟国。1915年9月，保加利亚分别与德、奥、土签订了条约，10月正式参战。30万保军和35万德奥军队对塞尔维亚发动南北夹击，塞尔维亚政府和军队只得沿着阿尔

巴尼亚且战且退，直退到亚德里亚海上的科孚岛。

从战争开始到 1915 年，俄军损失达 300 万人之多。同盟国虽然没能迫使俄国投降，但却认为东线俄军已失去进攻能力，可以放手掉转头来对付西线。于是，从 1916 年起，战争的重心又转到西线。

1916 年的战况 德国在确定 1916 年的重点打击方向时，考虑到俄国由于 1915 年的失利，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其军事能力，而法国战线成为德国面临的巨大威胁，决定将突击方向转向西线。德国由于兵力不足，在法国战线不可能展开全面进攻，指望在西线选择一处用“消灭和消耗其预备队”的方法来打败法国，突击的目标选在凡尔登。

凡尔登是法国的战略要地，法国战线东翼的支点，通向巴黎的门户，也是法国人坚强和勇敢的象征。德国军事首脑法尔根汉预计到，对于凡尔登这个战略要塞，法国统帅部为了保卫它，将不得不牺牲到最后一个人。

2 月 21 日，德军以 27 万人的优势兵力突破了法军的两道防线。当时凡尔登只有 10 万军队守卫。法国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派兵支援，并委派 60 岁的第二集团军司令贝当为凡尔登地区的司令官。2 月 25 日，贝当到达凡尔登，立即组织力量赶运预备队和军火，在 65 公里长的公路上，每昼夜通过 6000 辆汽车，即每分钟 4 辆，相当于 15 对铁路列车每昼夜的周转量。从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19 万名士兵，23000 吨弹药，2500 吨物资被送到凡尔登。到 3 月 2 日，法军增加了一倍，而德军只增加十分之一。德军发动多次进攻，都被法军打退，接着双方形成拉锯战，伤亡惨重。2 月底，德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遭到失败。6 月上旬，德军再次发起猛攻，德皇发布了要求在 6 月 15 日前占领凡尔登的命令，德军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也未奏效。德皇鉴于凡尔登城下的失败，将法尔根汉撤职，任命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参谋总部的首席军需官。从 8 月开始，法军掌握了凡尔登城下的主动权，开始反攻，12 月 18 日，结束战斗。历时 10 个月的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法国 70 个师中有 66 个师先后投入战斗，德军有 64 个师参加作战。双方共死伤近 100 万人。故凡尔登被称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绞肉机”。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内外交困，开始走下坡路。

正当凡尔登展开激烈战斗的时候，英法联军按照预定计划，于 6 月开始在索姆河对德军阵地展开猛烈炮击。这次战役由于法军在凡尔登疲于奔命，只好由英军担当主攻。英法联军在炮击以前，由飞机侦察阵地，拍摄照片，使炮击目标较为明确。从 6 月 24 日起，连续炮击 7 天，7 月 1 日英法军队发起进攻。9 月，英国发明的坦克首次用于战场，这个怪物一出现，使德军大为惊恐，为英军进攻壮了胆。开始使用的坦克很笨拙，时速仅 6 公里，但已给在战壕中防守的德军以颇大威胁。不久德军即发明了反坦克炮。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一样，都是巨大的消耗战。几个月中，英法军共损失 60 万人，德军约为 50 万人。虽然付出巨大代价，英法只不过夺回德军占领的领土 180 平方公里。英法军队虽未达到收复失地的目标，但牵制了德军，使之被迫放松了对凡尔登的攻势。两次战役之后，双方重新转入阵地战。

1916 年 5 月 31 日，正当凡尔登战役杀得难解难分之时，英德海军在

北海日德兰半岛附近海面摆开阵势。英国出动军舰 150 艘，德国出动 116 艘，266 艘战舰在 400 多平方英里的洋面上展开了激战。6 月 1 日，战斗结束，英国损失战舰 14 艘，伤亡近 7000 人，德国损失了 11 艘，伤亡 3000 多人。日德兰海战暴露出英国在军舰设计和装备上的不足，但英国的海上优势并没有丧失。尽管德国海军以后又有几次出击，但制海权仍掌握在英国手中。

1917 年的战况 两年多的残酷斗争，特别是 1916 年凡尔登、索姆河战役的巨大消耗使同盟国和协约国都感到筋疲力尽，尽管协约国的力量正在逐渐上升，但并未取得决定性优势。旷日持久的战争破坏了交战各国的社会经济，人民的厌战情绪普遍增长，在双方内部都出现了主和派势力。1916 年底，两大集团都在呼吁“和平”，企图通过谈判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从而获得体面的和平。1916 年 12 月 12 日，同盟国集团首先向协约国集团发出呼吁。并分别照会中立国、交战国和罗马教皇，建议在中立国荷兰的海牙召开和会，进行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12 月 18 日，美国总统威尔逊以“仲裁人”的姿态照会交战各国，提议实现没有胜利的和平，要求双方提出自己的和平条件。协约国集团拒绝了同盟国召开和会的建议，在 1917 年给威尔逊的答复中，要求同盟国恢复比利时等国的领土现状，放弃占领的法国、俄国的领土，并赔偿这些国家的战争损失。由于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不可能放弃掠夺来的对方领土和殖民地，因此，这场“和平”闹剧很快就结束了。

日德兰海战结束后不久，德国海军司令就向威廉二世建议，为了制服英国，无限制潜艇战必不可少。大战开始时，英德海军拥有的潜水艇只有几十艘，但潜艇的威力很快就显示出来。1914 年 9 月 22 日，一只德国潜艇首开记录，用 3 枚鱼雷击沉了 3 艘英国巡洋舰。此后，德国海军积极展开潜艇战，袭击英国周围水域的所有船只，对协约国的运输线造成很大威胁，1915 年 5 月 1 日，载有美国公民的英国巨型邮船“路西塔尼亚号”被击沉，1198 人遇难，其中妇女和儿童有 300 多人。这一事件引起美国的强烈抗议。1916 年，德国潜艇就击沉英国船 270 艘，总吨数为 125 万吨。英国海军大臣古庆纳乘巡洋舰赴俄途中，亦被潜艇击中，葬身鱼腹。自 1917 年 1 月起，德国开始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凡是在英吉利海峡航行的船舰，均受到潜艇袭击。德国的这种战术在头几个月内，使协约国受到惨重损失。凡自英国开出的船只，每 4 艘中便有一艘被击沉，整个战争期间，总共击沉协约国商船达 6000 艘计 1500 万吨，德国仅损失潜艇 216 艘。德国潜艇战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也促使协约国在战争中迅速地发展了反潜艇战术，逐步有效地保护商船航行。因此，协约国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英吉利海峡的交通运输，并未中断。德国的潜艇未能摧毁英国海军或迫使英国谋和，反而驱使美国加快抛开中立的立场，对德国宣战。

大战开始后，美国以“中立”地位，同交战双方做买卖，大发战争财。又乘列强忙于欧战无暇它顾之时，向加勒比海和南美扩张。战争期间，美国控制了拉丁美洲市场，占领了海地和多米尼加，武装干涉墨西哥，完全控制了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国家。使南美成了美国的后院。

由于英国海军的封锁，美国在经济上与同盟国的接触日益减少，而

同协约国却密切起来。美国成为供给协约国军火、军用物资和粮食的巨大基地，一跃成为欧洲 200 亿美元的债权国。于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同协约国的命运便连结在一起了。1916—1917 年德奥集团在军事上的进展，使美国特别关心协约国的命运，担心协约国失败，使美国不能收回给协约国的贷款，丧失一切实际利益。因而从 1916 年以来，美国参战的舆论逐步上升。

1917 年 1 月 31 日，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后，1917 年 2 月 3 日，美国断绝同德国的外交关系。2 月 28 日，英国将一封截获的德国密码电报交给美国。这是一份德国外交部给驻墨西哥公使的指令，让他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德、墨、日反美军事同盟谈判，并指示他可向墨西哥政府担保，一俟战争结束，德国将保证将美国在 19 世纪夺取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还给墨西哥。这一密码电报公布之后，美国朝野一片震惊。随着美国商船的不断被击沉，美国人民的仇德情绪迅速上升，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又造成垄断资产阶级对德国可能赢得战争的恐慌。4 月初，参众两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参战法案，4 月 6 日，美国对德宣战。

美国的正式参战，对协约国的物资供应和军事力量是极大的补充。使协约国的实力出现了决定性的变化。整个协约国集团的缔约国增加到 27 个国家，形成了对同盟国的绝对优势。

1917 年的 4 月 16 日至 5 月 5 日，索姆河战役后取代霞飞的法军总司令尼维尔，在兰斯和斯瓦松一带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势，遭到德军的猛烈回击，法军伤亡达十几万人，战役后，尼维尔被迅速解职，由贝当接替了统帅职务。1917 年 6 月至 11 月，英军在西线进行了伊普尔战役，双方形成胶着状态，德军在得到有生力量的增援后，迅速反击，使英军伤亡极为惨重。在东线和意奥战线，协约国同样遭到惨败，德奥军队将俄军赶出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攻占了波罗的海沿岸城市里加。意军在德奥的打击下，一溃千里，丢掉了大部分威尼斯平原，直到英法军队赶来增援，才挡住德奥的攻势。

交战国的经济政治危机 帝国主义战争给交战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到 1916 年底，协约国方面的军队总数，由战前的 300 万人增加到 2500 万人；双方阵亡已达 600 万人，伤残在 1000 万以上。由于劳动力的不足和战争的破坏，生活资料的产量急剧下降，各交战国对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制，面包、肉类、食油、糖、茶、衣服、靴鞋、煤炭等，都实行凭证供给。

物资的减少和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引起物价直线上升。1916 年，各国日用品的价格增加了一倍以上，粮价上涨两倍以上。法国 1 公担小麦的售价，1913 年为 24 法郎，1917 年按国家规定价格已达 75 法郎。劳动人民不仅生活困难，而且丧失了政治权利。各交战国政府借口战争状态需要安定，剥夺了罢工、集会、迁居等自由。

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使各交战国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德国在 1915 年有 4.7 万工人参加罢工，1916 年增到 42.2 万人。群众的反战情绪也反映在社会民主党左派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清界限上。1916 年卡尔·李卜克内西等左派组织成“斯巴达克团”，提出“敌人在国内”的口号，在群众中积极开展活动，进行反战宣传。

在奥匈帝国，战争促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激化。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互相呼应，使奥匈帝国这个“民族监狱”处于危机的局面。

在法国，“国内和平”开始破裂。1915年罢工人数为9500人，1916年达到4.1万人，增加了4倍多。罢工工人提出了迅速制止战争，缔结和约的革命要求。士兵也开展了反战运动。

1916年英国工人的反战情绪也开始高涨。工人群众逐渐摆脱工联领袖的影响，要求改善生活条件。1915—1916年，英国有48.8万人参加罢工。爱尔兰人民于1916年4月22日举行起义，占领都柏林，但是被镇压下去。

由于战争，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抓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英国每年从殖民地掠夺的各种商品值1.2亿英镑，超过战前10倍；法国在殖民地仅强迫借款一项，就达11.13亿法郎。由于帝国主义的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掀起波澜壮阔的斗争。印度人民不断爆发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伊朗人民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在中东、北非、叙利亚都发生了民族自治运动。

第三节 大战的结束

俄国二月革命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俄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400万男子被征入伍，造成大片土地荒芜，许多工厂关闭，粮食和日用品严重缺乏。人民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对沙皇政府深恶痛绝。

布尔什维克根据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指示，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展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激发了俄国人民的革命情绪。1916年工人罢工1500次，参加者在100万人以上。许多地区的农民夺取地主的粮食和牲畜，焚烧庄园。士兵也展开反战斗争，弃枪逃走事件不断出现。被压迫民族同时也展开反沙皇斗争，1916年，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发生几万人的起义。革命形势日益形成。

列宁的理论著述对俄国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列宁于1915、1916年间先后写了《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光辉著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理论，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俄国正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列宁这些革命论述武装了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给他们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1917年初，群众运动日益高涨起来。1月9日，彼得堡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为纪念1905年的“流血星期日”，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示威。2月23日（公历3月8日），9万工人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开始罢工，次日增加到20万人。全城群情激昂，到处是集会游行队伍。25日，工人响应布尔什维克中央局的号召，开始了总政治罢工。26日（公历3月11日），彼得堡工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部署，举行起义，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军队也被争取到革命方面来。27日（公历3月12日），起义工人和士兵已有6万多人。他们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推翻了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当晚，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召开第一次代表

大会。彼得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人民奋起展开了推翻沙皇政权的斗争。

二月革命后，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叛变，政权落到以大地主李沃夫公爵为总理的临时政府手中。临时政府由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组成。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与临时政府并存的还有另一个政权，即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在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 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冲破帝国主义的种种阻挠，于1917年4月3日（公历4月16日），从瑞士回到彼得堡。第二天，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人民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战斗。4月20日，6月18日和7月3日，彼得堡工人曾经举行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但遭到临时政府的血腥镇压。临时政府的暴行说明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必须准备起义，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7月26日—8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堡秘密召开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决议。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彼得堡的20万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

10月26日，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宣读的《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开始正义的、民主的和平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结果协约国拒绝了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德国同意进行和平谈判。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为了争取暂息时间以加强国防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接受了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1918年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按照条约，德国占领波兰、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土地，乌克兰也成为其保护国。从此苏维埃政府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

1918年的战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德军第一次取得了对英法联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德国企图利用这一时机，在美军到达以前，打败英法军，于1918年夏季结束战争。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德国妄图首先削弱并消灭苏维埃俄国，保持东线的“平静”，此外，它还想从乌克兰掠夺粮食和原料。德国背信弃义地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占领乌克兰，侵入顿河区、巴库油区和南高加索等地，苏维埃政府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对德国强盗的卫国战争，予德寇以严重的打击，德军不得不在东线留下50多师的兵力。

1918年3月，德军在西线集中197个师，开始发动攻势，英法对抗德军的部队有167个师，法国元帅福煦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实行统一指挥。4月间，美军第一次加入作战，英法军得到了增援。从3月到6月，德军举行3次进攻，都未能取胜。7月15日德军发动最后一次攻势，战斗两天，遭到失败。在4个半月里，德军损失了10万人及大量枪炮弹药。此后，协约国占据了优势。

8月8日，协约国军队在福煦的指挥下，开始反攻。这一天，在从索姆河到阿夫尔河的战线上，击溃了德国16个师。接着，协约国军队于8月和9月中在西线各个战区继续不停地进攻，把德军撵出法国和比利时国境，德军主力已开始迅速瓦解。

9月15日，协约国军队在巴尔干战线发动进攻。保加利亚的军队被击溃。29日向协约国投降。英军从巴勒斯坦进攻土耳其军，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英军胜利，10月31日土耳其投降。奥匈帝国此时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境地，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都相继宣告独立。意、英、法的军队趁机进攻，奥匈帝国于11月3日投降。

此时，德帝国主义已濒于绝境。革命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11月4日，基尔的海军舰队水兵举行起义，成立苏维埃。接着许多城市的工人也举行起义。11月9日，柏林工人和士兵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左派领导下，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德皇威廉二世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宣布退位，10日逃往荷兰。

1918年11月11日，德军正式投降。德国代表在巴黎北部的康边森林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停战协定签订后的两天，11月13日，苏维埃俄国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结 延续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卷入战争的共有33个国家的1.5亿人口，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4。各交战国共动员了近7000万人参加军队，死伤达4000余万人，还有由于战争死于疾病、饥饿和灾害的约1000万人。战争造成了极其巨大的物质损失，各交战国直接用于战争的军费达2000亿美元，间接支出约1500亿美元。数以千计的城市和乡村成为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和房屋被毁坏。战争引起交战各国经济紊乱、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捐税加重，使城乡劳动人民陷于极端困苦的境地。

战争以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虽为战胜国，也比战前削弱。而美帝国主义则乘机发战争财，从战前欧洲的债务国一变而成债权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开始企图称霸世界。日本帝国主义也在亚洲崛起。战争虽使德国失去全部殖民地和遭受其他损失，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名单中勾销了，但并没有消除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除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存在矛盾外，在战胜国之间仍然还有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重要的政治后果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俄国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也出现了迅猛高涨的局面。

参考书：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二十章。

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第二十三章。

管敬绪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第二十二章。

胡洽坤等主编：《简明世界近代史》第十七章。

萨那、孙成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复习题：

1. 试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性质。
2. 试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进程和主要战役。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影响。

第二十一章 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

第一节 科学技术

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与分期 人们通常把 16 到 19 世纪的自然科学，称为近代自然科学，这一时期大约有 400 年。

近代自然科学是从古代的自然研究中演进并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继承了古代科学的优秀遗产，另一方面打破了古代科学的局限，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进步。首先，在研究目标和内容上，早期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往往与技术的改进、哲学的思考交织在一起，人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大多直接反映在技术之中或者完全融合在哲学之内。在古代后期、自然科学除了少数学科门类初具规模之外，在整体上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近代自然科学旨在考察自然事物的具体性质和运动规律，它既不同于技术的研究，也异于哲学的思考，它把自然界“解剖”开来加以研究，寻求其中的规律性东西，这种研究虽与技术和哲学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但目标和方法均不相同。直至近代，自然科学才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这表明自然科学已趋于成熟。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古代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或以总结技术上的经验为途径，或以哲学思辨和逻辑推理为依据，虽然也对自然现象作一些直观的观察，但实验的方法尚处于萌芽状态之中。近代自然科学与此不同，它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科学实验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科学实验的方法与生产实践不同，它不是以获得物质产品为目标，而是以谋求精神产品（即概念、原理、理论等）为目标，它把自然过程置于人为控制的条件下加以分析研究，因而能够得到比直观观察更为可靠、更为准确的知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了科学实验的方法，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知识才真正成为科学。除了实验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先进的方法出现，并被广泛应用。

近代科学技术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6—18 世纪中期）是近代科技的兴起时期。在这一时期，科学家主要把自然分解成不同部分加以研究，考察各种自然过程的区别，但却忽略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此时的自然科学发展速度不快，水平较低，许多学科门类还处在打基础阶段。尽管如此，一些学科还是先后形成并有了一定的发展。牛顿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问世，并成为力学的柱石；解析几何，微积分有了系统的发展；光学在飞速发展之后，又处于停滞状态；近代化学刚刚萌芽；生物学主要是搜集和初步整理资料，世界科技中心由意大利转移到英国。

第二个阶段（18 世纪中期——20 世纪初）是近代科技的发展时期。自然科学从分门别类的自然研究过渡到探讨变化发展着的自然历程，从以搜集材料为主的经验总结过渡到以整理材料为主的理论分析。自然科学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分子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电磁学等学科都出现了重大变革。在这个阶段，世界科技中心由英国转移到法国，再由法国转移到德国。

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 16—18 世纪，近代自然科学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经典力学（又称牛顿力学）。这除了由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经济上的需要之外，也因为力学研究的对象最简单，它抛开物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只把它作为一个质量的实体来看待，研究物体间的作用及在这一作用下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规律。在经典力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三定律的发现。这些成就构成了经典力学的基本内容。在经典力学的建立中，曾有许多科学家为之付出心血，如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牛顿则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故经典力学又称为牛顿力学。

牛顿（1642—1727 年）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他在数学、光学等领域均有重大贡献。在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与运动三定律的基础上，牛顿对已有的力学知识进行了系统的综合。他效仿古希腊人的方法，把力学知识整理成为一个演绎的知识系统。1687 年，他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在该书中他首先给力学的基本概念如质量、动量、惯性、力及向心力下了定义，对大至宇宙天体，小至光的微粒的一切物体在真空中或在有阻力的介质中的运动，全部应用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给予了说明，把自然界中的一切力学现象都囊括在他的力学体系之中。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经典力学的成熟。牛顿力学在科学史上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它把天上和地上的运动统一起来，把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三定律视为宇宙间一切力学运动的普遍规律，从力学的角度证明了自然界的统一性，实现了人类自然界认识的第一次综合。

近代化学的成就 第一位从实验出发，提出科学的元素概念，从而使化学真正成为科学的是英国化学家波义耳（1627—1691 年）。波义耳在化学方面有过许多重要的成就，如波义耳——马略特定律，定性分析方法等。波义耳在化学上的新见解集中反映在 1661 年出版的名著《怀疑派化学家》一书中。此书仿照伽利略的风格，用对话形式写成。提出了科学的元素概念。波义耳受希腊原子论的影响，把原子的思想与他的关于元素微粒的概念联系起来。他通过多次实验和探索，给元素下了一个朴素的定义。在《怀疑派化学家》一书中，波义耳指出：“我所指的元素，就是那些化学家们讲得非常清楚的要素，也就是某种不由任何其他物体构成的或是互相构成的原始的和简单的物质，或是完全纯净的物质”，“是确定的，实在的，可觉察到的实物”。波义耳将化合物、混合物与元素区别开来，从而为近代化学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来，关于燃烧现象的本质众说纷纭，自 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中叶，在欧洲比较通行的是“燃素说”。

燃素说是德国化学家施塔尔在另一化学家贝歇尔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贝歇尔认为可燃物中含有“油状土”，燃烧时其中的油状土被烧掉。施塔尔把油状土改称为“燃素”，认为燃素含于可燃物或金属中，燃烧时能很快地从物体中逸出，燃烧后所剩下就是缺少燃素的残渣。燃素说解释燃烧现象时，认为一切与燃烧有关的化学变化都可以归结为物体吸收燃素和释放燃素的过程。对于燃烧现象的正确认识是伴随着气体化学而前进的。18 世纪下半期，化学知识的积累和化学实验的发展使人们相继发现了多种气体，认识到空气有复杂的成分，这就为科学的燃烧理论开辟了道路。

确立正确的燃烧理论的人是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43—1794 年）。

他从汞煅灰中分解出了一种比普通空气更能助燃、助呼吸的气体，1777年正式命名为氧气（oxygen），证明了燃烧过程是金属和氧气的化合过程，而不是金属失去燃素的分解过程，否定了燃素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科学的氧化燃烧学说：物体只有在氧存在时方能燃烧；空气由两种成分构成，物质重量在空气中燃烧时因吸收了其中的氧而增加，其增加的重量等于所吸收的氧的重量。一般的可燃物质燃烧后通常变为酸，氧是酸的本原，一切酸中都含有氧元素。虽然拉瓦锡不是第一个发现氧的人，但他却是真正理解这个发现的人，他了解氧作为一种元素的真正本性，并通过精巧的实验，建立起正确的燃烧理论，从而使化学得到了全面的革新。

1778—1780年间，拉瓦锡完成了《化学纲要》一书，其中对当时所知的各种化学现象提出了他的解释。拉瓦锡更进一步明确了元素的定义，认为元素是“化学分析所达到的终点”，即用化学方法不能再分解的简单物质就是元素，他还把已知的33种元素排列成表。此外还建立了化学元素和化合物的命名法。

拉瓦锡所著《化学纲要》一书，是近代化学形成时期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它对整个化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19世纪化学的突出成就是英国化学家道尔顿（1766—1844年）的原子说和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1834—1907年）发现的元素周期律。

1803年，道尔顿提出了原子论，标志着近代化学发展新时期的开始。因为化学作为一门重要的自然科学，它所要说明的现象的本质就是原子的化合与化分。道尔顿的学说正是抓住了这一学科的核心和最本质的问题，主张用原子的化合与化分来说明化学现象和各种化学定义。道尔顿认为：第一，一切元素都是由非常微小的不可再分的微粒组成，这种微粒称为原子。原子在所有化学变化中均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质。第二，同一元素的原子在质量和性质上都相同，不同元素的原子在质量和性质上都不相同。第三，不同元素的原子以简单数目的比例相结合，形成化合物。他的原子说把原子量作为区分化学元素的根本特征，统一解释了各种各样的化合物。道尔顿原子学说的建立是近代化学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理论综合，它统一解释了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和化学反应的结构，把原子量作为区分化学元素的根本特征，为整个化学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理论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说都超过了燃烧的氧化学说。恩格斯在评价道尔顿的原子论时说，道尔顿的成就是“能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并且指出，化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所以近代化学之父不是拉瓦锡，而是道尔顿）。其后，由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的发展并经过许多化学家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测定了几十种元素的原子量，最后建立原子——分子论，使整个化学学科发展到新的阶段。

对发展化学元素周期律作出决定性贡献的是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他认真考察了前人的工作，紧紧抓住原子量这个元素的基本性质，努力探索原子量与元素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将元素按原子量大小排列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6页。

同上书，第269页。

来，发现元素性质的变化也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

经过完善和修改，门捷列夫于 1871 年以《化学元素的周期性依赖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他认为：元素的性质和它们的化合物的性质与元素的原子量有周期性的依赖关系，元素的性质是元素原子量的周期函数。门捷列夫按照元素周期律大胆地修正了某些元素的原子量，并为未知元素留下了空位。

门捷列夫的周期律，总结归纳了元素的性质随着原子量的增加而周期性地变化的规律，为研究元素及其性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并把原来认为彼此孤立、不相依赖的各种元素统一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为寻找和探索新元素指明了方向，使化学科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光学的成就 近代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光的直进性和光的反射规律，并对反射现象有相当精确的研究。但是对于光的折射现象进行了精确考察的则是荷兰数学家斯涅尔，他于 1621 年发现了光的折射定律。但斯涅尔本人从未发表过这一定律，这一定律是由笛卡儿在他的《屈光学》一书中发表出来的（1637 年）。开普勒对光学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发现了光度学定律，研究了透镜成像的规律并发明了一种用两个双凸透镜组成的望远镜。这种类型的望远镜比伽利略式的望远镜（由一个凹透镜与一个凸透镜组成）视野更大。

从 1665 年开始，牛顿进行了分解日光的实验，他发现白光是由连续变化的若干单色光组成的，每种光都有不同的折射“能力”。根据这一发现，他解释了为什么由物体上反射的白光经过透镜折射形成的像，边缘有彩色模糊的现象。为了消除这种现象，牛顿于 1672 年设计了一种反射望远镜。大约在同一时期，牛顿还发现了后来人们称之为牛顿环的现象。

1670 年丹麦物理学家巴塞林发现了光通过冰洲石晶体时产生双折射的现象。所有这些发现构成了当时光学的主要内容。

伴随着光学上的这些发现，科学家们对光的本性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学说，一种是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一种是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

光的微粒说与波动说各持己见地争论了一百多年。在 18 世纪，由于牛顿在科学界的崇高威望而使他所主张的微粒说占了上风。但是这一学说隐藏着一个根本弱点，那就是认为光在较密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加快。一旦在科学中有了足够的手段测量光在不同介质中的速度时，这一弱点就使微粒说遭到不可挽回的败局。

19 世纪，光学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被忽视，甚至被物理学家们抛弃的波动说再次复活起来。英国物理学家托·杨用光的干涉实验重新证明了光是一种波动。

1807 年，有人发现了光的偏振现象后，他又用光是横波而不是纵波的观念解释了这一现象，使光的波动说重新为人们所重视。以后经过法国科学家菲涅尔的工作，使波动说不仅能合理地解释了已知的光学现象，而且能定量地证明了光的运动规律，从此波动光学确立起来。

天文学的成就 18—19 世纪，人类对于包括地球在内的天体运动规律的认识比科学革命时有了很大进展。

继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之后，人们依照这一定律解释了天体运

动中新的观测资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意义。随着天文观测手段的进步，人类的视野从太阳系扩展到银河系和河外星系；从天体力学扩展到天体物理学的领域。在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人们对天体的起源和演化问题也提出有价值的见解。

18—19 世纪，天文观测上获得的成果是丰富多采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威廉·赫歇耳对恒星和双星的观测、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发现、波德律的提出与小行星的发现以及光行差和恒星视差的发现。

威廉·赫歇耳（1738—1822 年）出生在德国，后移居英国，是 18 世纪最有影响的天文学家之一。他在天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涉及到当时人们所能及的一切现象，首先是他对恒星的观测。1871 年，赫歇耳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天空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颗星的异常情况，认定它不是一颗恒星，经过认真的观测和计算，又认定它不是一颗彗星。后来英国人麦斯格雷发现了它是一颗前所未有的行星，这就是天王星。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经过计算，于 1846 年 8 月公布了天王星附近的一颗行星的轨道参数。

不久，德国天文学家加勒威耶计算的轨道数据果真找到了这颗行星，其位置与计算值相差还不到 1° ，这就是海王星。海王星的发现是牛顿力学在天文学运用上的伟大胜利，它标志着天体力学已趋于成熟。

18 世纪关于太阳系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小行星的发现，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太阳系的家族。1766 年，德国人提丢斯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太阳系各行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有一定的规律，即大致为 $0.4+0.3 \times 2$ 天文单位。

这个假说于 1772 年由德国天文学家波德公布于众，因而被称为波德律。1801 年，意大利人皮阿杰根据波德律找到了一颗很暗的小行星，它后来被名为谷神星。次年德国人奥伯斯在那里又找到另一颗小行星。到 1850 年，在这个天区找到的小行星达到了 13 颗。到现在为止，已发现的小行星有 2000 多颗。

18—19 世纪，天文学上另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光行差和恒星视差的发现。哥白尼从他的地动说出发预言，由于地球的周年运动将使我们在观察恒星时看到恒星也有一种微小的视位移，叫做恒星视差。从那时起天文学家把寻找恒星视差作为检验哥白尼地动说的一个重要依据而花费了极大的力气。第谷因为没发现恒星视差不肯接受哥白尼学说，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人也没有看到恒星视差。

1725 年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布拉德雷（1693—1762 年）在寻找恒星视差时发现，天龙座 R 星每年有微小位移。这一发现使他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恒星视差。可是当他把这一结果与理论推算的数值加以对照时，发现这一位移的方向与恒星视差不符合。

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了光行差。此后，又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恒星视差终于为几位天文学家差不多同时确认，他们是俄国人斯特鲁维、德国人贝塞耳和英国人亨德逊，他们先后于 1836、1838、1839 年得到了恒星视差的数值。从此，对哥白尼学说的地动观点的怀疑被彻底打消了。

在 18 世纪，天文学研究中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关于太阳系起源学说的提出。

17 世纪，法国人笛卡儿重新提出古希腊人关于天体形成的旋涡假

说。18 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家布丰又认为，太阳系起源于彗星与太阳的偶然接近，太阳的部分物质被彗星吸引力拉出而形成行星。但是，他们的说法与古代人一样都是思辨的产物，缺乏科学上的依据。第一个提出具有科学价值的天体起源学说是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 年）。1755 年，康德出版了他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或又译《根据牛顿定理试论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一书。在书中，康德既运用他的哲学思想也试图利用牛顿力学的知识来探讨宇宙起源的问题。

康德认为，太阳系是由原始星云演化而成的。原始星云由许多粒子所组成，这些粒子不均匀地散布在空间之中。由于引力的作用，一些粒子聚集在一起，在吸引力最强的地方形成中心天体。较小的粒子在向中心天体聚集的过程中，有一些会斜向落下，互相碰撞，当某个方向的运动占了优势的时候，这些粒子就形成了围绕中心天体的大致在一个平面上的大旋涡。最后，旋转中的粒子又因引力作用逐渐结合起来，成了各个行星。他认为环绕行星旋转的卫星的形成亦大致如此。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土星的光环。

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 年）也提出了他的星云假说。他说太阳系起源于一个巨大而灼热的原始星云，这个星云由于冷却而收缩，旋转逐渐加速，当加速到一定程度时，星云边缘的物质即分离出来成为围绕星云转动的气环，这个过程的继续，便形成了多个层次的气环，最后，星云的中心部分凝聚成为太阳，气环则凝集成一个个行星。

无论康德还是拉普拉斯的假说，都与当时人们观察到天空中存在着许多星云的事实有关，同时也都运用了一些当时的物理学知识，但基本上还都只是一些猜想，而且有许多漏洞。不过他们重新把天体演化这个古老的问题提出来，并且试图以新的科学知识去研究它，这在天文学史上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康德与拉普拉斯的理论对于打破在欧洲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起了重要的作用。

地质学的成就 18 世纪以后，人类开始综合过去积累起来的关于地质的知识，出现了关于岩石成因的水成论和火成论之争，关于地壳运动变化的突变论和渐变论之争。在这些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从赫顿到赖尔的地质学思想，即坚持以自然界自身的规律来说明自然界中的地质现象，这种被后人称为“将今论古”的基本方法，对于地质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有重要影响。

火成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则是英国地质学家赫顿（1726—1797 年）。赫顿的学识广博，他既长于观察，也注意哲理上的探讨。他反对以《圣经》上所说的洪水作为立论根据。他认为在科学中，一切自然现象必定表现出它是一个在构成上不受超自然力量影响的自我控制系统。这就把任何非自然界的因素（包括神学）排斥在外，坚持以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界中的现象。他提出了地质学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应以现在所知的自然规律来探究过去所发生的地质事件，或称“将今论古”。赫顿这些地质学思想对于把地质学建成一门科学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赫顿被誉为“近代地质学之父”。英国人赖尔（1797—1857 年）本来也是持灾变论的地质学家。1827 年他读到了拉马克的著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点。1830—1833 年他出版了《地质学原理》一书。在书中，他坚持赫顿的观点，认为必须用自然法则来

解释自然现象，认为地质营力古今是一致的，将今论古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赖尔的学说立足于可知的自然规律，这对于使地质学发展成为科学有重要的意义，深为后世所推崇。

电磁学与热力学的成就 在 16 至 18 世纪，人们对电学的研究仅限于静电学，但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主要有：发现了自然界中有两种电，一种是摩擦玻璃、水晶、毛皮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所得到的电，当时叫“玻璃电”，即后来的正电；另一种是摩擦琥珀，丝绸或树脂所得到的电，叫做“树脂电”，即负电。这两种电荷之间也存在着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作用；发现了电的传导和静电感应的现象；发现了火花放电，弄清了天空中的闪电是由放电造成的自然现象。1752 年，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通过一只特制的风筝把雷雨中的电引到地面上，从而证明了它与摩擦产生的电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1785—1786 年间，法国物理学家库仑发现了电荷相互作用的规律，叫做库仑定律。在此时期，意大利人还发现了电流。1780—1791 年间意大利医生伽伐尼通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当两种不同的金属分别与蛙腿的神经和肌肉相连时，如果这时形成一个闭合线路，其中就出现电流，蛙腿的肌肉因电流刺激而抽搐。伽伐尼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电，是本来就存在于生物体中的电，人们叫作伽伐尼电，金属接触后就把这种电激发出来。后来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发现电流的产生是由于两种金属同时插入液体导体中的结果，不论这种液体是否存在于生物体中。根据这一思想，他制成了伏打电堆，以后又制成了伏打电池，这是第一个能连续供给电流的装置。电流的发现和电池的发明把电学从静电领域推进到动电的研究。

到了 19 世纪，电学的研究进入了动电领域，围绕着电流及其效应的研究电学有了巨大进展。法拉第通过研究电池的化学效应发现了电解定律，定量地刻画出电流与其所引起的化学变化之间的关系。欧姆发现了欧姆定律，揭示了电压、电流强度和电阻之间的关系。焦耳通过实验证明了电流与其产生的热量之间的关系。

在 19 世纪电学史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发现了电和磁的相互转化。在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电和磁之间没有本质联系。19 世纪初，一方面来自物理学各个领域中的发现逐一揭示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有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中关于自然界统一的见解影响了一部分科学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开始寻找电和磁的统一。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和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是两个代表人物。奥斯特(1777—1851 年)在 1820 年研究了电磁之间的联系，发现电流的磁效应。揭示了电与磁相互转化的一个方面。英国科学家法拉第(1791—1867 年)指出电和磁力学的概念。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把法拉第的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完成了经典电磁学说的理论。他运用高超的数学才能，以非常简洁、完美的形式，建立了两组定量描述电磁场作用规律的方程—麦克斯韦方程：一组方程表示电磁场的连续性，另一组表示一个场的变化将引起另一个场的变化。1873 年他的巨著《电磁学通讯》问世，其科学价值可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媲美。他还预言光波就是电磁波。1886 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证实了这一预言。麦克斯韦把电、磁和光统一起来，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又一次综合。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建立是经典物理学历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经典物理

学已趋于成熟。

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与热现象打交道，并很快学会了利用热为人类服务：用摩擦取火，利用气体受热膨胀来制造新奇玩物等（赫伦的技术发明）。但是用科学方法对热现象加以考察则是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之时才开始的。

16 到 18 世纪，热学的研究局限在测温学与量热学的领域。首先，人们利用热胀冷缩的性质研制了温度计并确立了温标（量度物体温度高低的标尺，主要是确定温度的零点和规定分度方法）。从 1593 年伽利略造第一个温度计起，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科学家们研究制出以不同液体（汞或酒精等）作材料的温度计，并确立了 3 种温标，这就是至今仍在使用的摄氏温标，华氏温标和现在不常使用的列氏温标。

摄氏温标是 1742 年由瑞典人摄尔修斯确定的。他把水的冰点和沸点定为测定温度的两个固定点，把其间等分为 100 份，每份为一度。华氏温标是 1714 年德国人华仑海特确定的。他把水、冰和海盐混合物的温度定为零点，把健康人的血液的温度定为另一固定点、其间分为 $4 \times 24 = 96$ 份，每份为一度。这样，水的冰点相当于 32° ，沸点测定为 212° ，其间正好差 180 度。列氏温标是 1730 年法国人列奥默确定。他把水的冰点定为零度，沸点定为 80° ，其间等分为 80 份，每份为一度。这种温标曾较多地为德国人采用。到 19 世纪又出现了热力学温标（又称绝对温标或开氏温标），这种温标的零点相当于摄氏温标的 -273.16° ，它的一度与摄氏一度相等。这种温标一直作为科学测量的标准。

从 1800 年起，物理学和化学中的一系列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到 19 世纪 40 年代，关于各种自然现象统一的思想已为许多科学家所接受。为这一思想提供科学根据的关键是找出不同运动形式（能量）在相互转化中的当量关系，这种方面的工作促成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

最早把能量守恒和转化思想作为一个普遍的自然规律加以表述并给出了热功当量的科学家之一是德国的医生迈尔（1814—1878 年）。他从压缩气体所作的力转变成热量这个假定出发，估算了热功当量的值。英国的物理学家焦耳（1818—1889 年）系统地测量了可以转化为一定数量热的各种形式的能量，揭示了电和热两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转化规律。1847 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兹通过数学证明并指出了守恒定律在力、热、电、磁和天文现象中的普适性，并以专业科学家一望即知的术语给这一定律以新的解释。到 1850 年左右，物理学家们已普遍相信，自然界中一切物质都具有能量，能量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它能够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由一个系统传递给另一个系统，而在转化和传递中总能量守恒。这就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普遍形式。这一定律的发现揭示了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化学等存在着普遍联系，证明了自然界的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统一性，为哲学上早已确认的运动守恒原理提供自然科学根据。这是自牛顿以来向自然界的统一性迈进的又一大步。1851 年英国科学家威·汤姆逊（1824—1907 年）对能量守恒定律作了比较科学的论述：自然界一切物质都有能量，能量能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从一个物质系统传递给另一个物质系统。在转化和传递中能量不变。他把人们称之为“力的守恒定律”改称

为“能量守恒定律”。这一定律被誉为 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19 世纪 70 年代，恩格斯又把这条定律改称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这条定律指出了自然界各种运动、能量相互转化的当量关系，为人类认识、控制、利用自然提供了理论武器。

生物学的成就 17 世纪生物学的主要成就是分类原则细胞学说和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确立。意大利的解剖学家契沙尔比诺和马尔比基主张物种是不连续的，可以用一个或少数几个人为选取的标准把他们分成界限明确的类群。例如根据花的形状或子叶的数目来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叫人为分类法。另一种分类方法是荷兰人洛比留斯和瑞士植物学家鲍兴所主张的。他们认为，物种是连续的，不同种类的生物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分类学应该反映这种亲缘关系，因此应该对一切可以找到的特征进行研究，用以作为确定他们亲缘关系的分类标准。这种分类方法叫自然分类法。

到 18 世纪，这两种分类方法分别为林耐和布丰所发展。林耐是瑞典博物学家，人为分类法的集大成者。他描述和记载的植物就有 18000 种之多。为了廓清当时在分类学上存在的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混乱现象，他采用了等级从属分类法。他把有花植物分为 23 个纲，另包括无花植物一纲，成为“林氏 24 纲”。每个纲又细分为目、属、种。他还发展了生物命名的“双名法”，即对生物名称都用两个拉丁字表示，第一个字是属名，第二个字是种名。此法比以前的十分冗长的名字方便。由于林耐的努力，杂乱无章的关于动植物方面的知识形成了较完整的系统，这种分类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17 世纪在对生物物种来源的研究中，出现了“预成说”与“渐成说”之争。有人主张，组成生物躯体的各种器官，是在卵里就已经形成了，后来的发展不过是逐渐扩大而已。由于那时的显微镜不能消除使影象失真的色环，因此，不能清楚地辨认细胞内部的一些结构，致使有人宣布在显微镜下看到精子里已有预成的微型人。德国生物学家沃尔弗（1733—1794 年）是“渐成说”的主要代表。他通过观察证明，成体动物的肢体和器官是胚胎发育过程中从一个简单组织发展起来的。德国学者冯·贝尔在 1827 年发现并证明哺乳动物的卵是一个细胞。30 年代消色显微镜问世，人们可以观察到细胞的详情。英国植物学家布朗、捷克生理学家普金叶分别观察到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的核。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1804—1881 年）着重于植物个体发育的探讨，在 1838 年提出细胞是一切植物结构的基本单位。植物体所有器官组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具有细胞核。1839 年德国解剖家施旺（1810—1882 年）把施莱登的理论扩大到动物界，形成了适用于整个生物界的细胞学说。细胞学说的提出，证明了有机体在构造和发育上的统一性，驳斥了在胚胎发育上认为只是原有微型生物长大的机械论，从而被称做是 19 世纪打破旧的形而上学自然观的三大发现之一。

1858 年柏林大学病理教授微耳和（1821—1902 年）在长期病理检验实践的基础上，将细胞学说应用于病理学，创立了细胞病理学。微耳和认为，细胞产生于细胞，有病的细胞就会产生有病的细胞，从而使疾病扩散。几乎与此同时，法国的化学教授巴士德（1822—1895 年）在对发酵现象、蚕病的研究中，建立了细菌致病的学说，并在微生物学的研究

中作出了卓越贡献。施旺在建立细胞学说之后曾发现酵母是一些微小的单细胞生物。巴士德则认识到正是这些微小生物的活动决定了发酵的过程。同一原料酿造出来的酒之所以味道各异，正是由于酵母的种类不同所致。葡萄酒之所以变酸也是由于一种叫作醋酸菌的侵入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杀死这些有害的微生物。这一研究成果使酿酒业获得了巨大利益。巴士德还在对蚕病研究中，分离出致病的细菌，并提出了消灭细菌的办法，有效地挽救了法国的养蚕业。

巴士德正是在对细微的病菌——细菌的研究中，创立了细菌致病学说，从此开辟了医学研究病因的新途径。他用病原菌毒素的接种法防治炭疽病、鸡霍乱、猪丹毒以及狂犬病，均获得了成功。他开创了医学上的免疫学。巴士德关于消灭细菌的消毒方法在医学上广泛应用，使手术真正成为拯救生命的手段，而不是传染疾病的温床了。巴士德被后人称之为“细菌猎人”。

在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个提出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年）。拉马克的进化论思想是从他的分类学工作中衍生出来。他原是植物学家，因为在他工作的巴黎博物院需要开设无脊椎动物的讲座从而改行研究无脊椎动物。通过对当时已知的无脊椎动物化石的比较和分类，他发现，无脊椎动物的十个纲在构造和组织的复杂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等级和次序。由此他认识到整个动物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序列。1802年，他将这个序列排成一个线性进化阶梯，每一个阶梯代表构造复杂、程度相似的一类生物，整个阶梯表示从最简单的物种一直上升到高级动物。

1809年他在《动物哲学》一书中，系统地论述生物的本质、物种的性质、生命发展的趋向以及环境、习性与变异的关系等问题。他把动物界按直线次序排成一个进化的序列，把生物演变看成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尽管拉马克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但是他毕竟是第一个描写了生物进化的自然次序的人，使生物进化的思想在他的手中获得了科学的形态。

最终完成科学进化论的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年）。1831年他以博物学家身份，随贝格尔号科学探险船作环球航行。在长达3年的探险航行中，达尔文根据其详细的观察，得出物种必然是逐渐变异的推论。1859年，他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在书中他提出，物种不是被分别创造出来的，一个物种是从原有的另一物种进化而来。人工选择能造成新物种，人工选择就是人把动植物对人有利的变异保留下来，让它遗传给后代，并将对人无用的变异淘汰，不让它传种。这样一代一代地选择，形成新品种。适者生存和不适者淘汰，是通过生物和环境的斗争实现的。生存斗争不仅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而且也是促进生物界进化发展的动力。在书中，达尔文用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物种是可变的，对生物的适应性也作了正确的解释。达尔文的学说标志着科学生物进化论的完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的重要成就 19世纪末，物理学界连续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这就是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它们被称为物理的三大发现。

1833年法拉第提出电解定律后，一些物理学家认为电荷有可能存在

着最小单位。1874年，英国物理学家斯托尼明确指出，原子所带电荷为一基本电荷的整数倍。1891年，他提出用“电子”这一名字来命名这些电荷的最小单位。19世纪中期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力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电的应用日益广泛，电报、电话、电灯、发电机等等都迅速发展起来，这促使物理学家对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放电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858年，人们在研究低压气体中的放电特性时发现，当放电管内气体足够低时，它的阴极会发出辐射，使得正对着阴极的管壁上产生绿色的荧光。人们把从阴极发出的这种肉眼看不见的辐射称为阴极射线。1879年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发现阴极射线实际上是一种高速带电的粒子流，而不是电磁辐射。

1881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指出阴极射线是带负电的微电子流，这种粒子有很高的速度并沿直线运行。最后汤姆生从理论上分析断定，阴极射线是由质量比氢离子小得多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有负电荷。他起初称阴极射线的“粒子”为“微粒”，后来采用了斯通尼的说法，把阴极射线的粒子改称为“电子”。电子是人类认识的第一个基本粒子。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研究阴极射线激发玻璃壁而发生荧光时，偶然发现放在真空的放电管附近的用黑纸严密包好的照相底片会被感光。这现象说明放电管内发出了某种能穿透底片封套的射线。伦琴还发现，把放电管用黑纸包起来，这种射线也能使涂有荧光材料的物质发出微弱的荧光。因为阴极射线是透不出玻璃管的，所以伦琴认为还存在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射线。他称这种穿透能力极强的射线为X射线。经过实验，他再次肯定，激发这种荧光的東西来自阴极射线管，但决不是阴极射线本身。他选用了多种物质，把它们一一放在电管和荧光屏之间进行实验，发现除少数几种物质外，几乎所有物质都能被X射线穿透。伦琴还用X射线拍下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张照片。照片呈现了伦琴夫人的手骨结构及手上那枚金戒指的轮廓。X射线发现后不久，维也纳医院在外科治疗中便首次应用X射线来拍片。1901年伦琴获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研究X射线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又导致了新的重大发现。

伦琴最早发现的X射线是从阴极射线轰击玻璃管壁而产生的。由于玻璃壁同时发出荧光，因此不少人从这一现象出发，误认为荧光是X射线的来源。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打算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1896年2月他选用了一种荧光物质——硫酸钾铀酰作实验材料，把它置于用黑纸包严的照相底片上面，放在日光下照射几小时使之发出荧光，这时密封的照相底片感光了。他因此猜想，是一种伴随着荧光现象而产生的射线使底片感光，这种射线可能就是X射线。但不久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有一次，贝克勒尔把准备好的硫酸钾铀酰与黑纸包严的照相底片一同放进暗橱。几天后他发现底片还是感光了，这说明荧光现象与射线之间没有联系。经过反复实验，他发现他所研究过的铀盐都能自发地产生出一种射线，这种射线显然只与铀元素有关而与荧光无关。贝克勒尔得出了铀盐的这种放射性质是铀原子本身所具有的结论。发出X射线尚需要阴极射线管和高压电源，而铀盐无需任何外界作用就能不断地放射一种神秘的射线。后来，人们把物质这种自发放出射线的性质叫放射性，把有放射性的物质叫放射性物质。

法国科学家皮埃尔·居里和他的夫人玛丽·居里受贝克勒尔工作的启发，很想确定是否还存在着其它如铀那样能自发地放出射线的元素。通过艰苦努力，他们发现钷也有放射性。在提取钷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种矿石中含有比铀强得多的放射性元素，他们把这种元素命名为钷（Polonium）以纪念居里夫人的祖国波兰。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种放射性更强的元素镭。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1902年他们才从好几吨铀的废矿渣中分离出0.12克纯氯化镭。1903年，居里夫妇与贝克勒尔同获诺贝尔奖金。

X射线、电子放射性的发现，以实验事实使得原子不可分、不变化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过去认为一种元素不可能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现在看到放射性物质发生衰变后可以转变为其它元素。这样一些事实使物理学家们大为震惊，一些人在这些新发现面前不知所措，有人惊呼“原子非物质化了”，也有人因此而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说“物质消失了”。物理学家们曾认为的似乎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的经典物理学体系，从根本上出现了动摇，这就是所谓的“物理学危机”。其实，物理学本身并没有什么危机，只不过是人们的认识上出了点问题。经典物理学所研究的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易于理解的宏观世界，三大发现所揭示的却是人们没有直接经验的微观现象，这只能表明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已经深入了一个层次，传统的观念在那里不够用了。物理学的“危机”其实也没有吓倒大多数物理学家，他们还是带着自己的惶惑勇敢地向前探索，于是产生了以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的建立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物理学从此开辟了新的天地，并且带动了整个科学和技术飞速前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界出现了一种崭新的革命性的理论，这就是相对论。它同量子理论共同构成近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

爱因斯坦曾说：“相对论的兴起是由于实际需要，是由于旧理论中的严重和深刻的矛盾已经无法避免了。新理论的力量在于仅用几个非常令人信服的假定，就一致而简单地解决了所有这些困难。……旧力学（指牛顿力学）只能对低速运动有效，从而成为新力学的极限情形。”

相对论是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相对论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只讨论两个惯性系之间以不变的相对速度运动时所得到的观测结果。广义相对论把狭义相对论在惯性系中所研究的问题推广到非惯性系，从而建立起引力场理论。广义相对论又被认为是一种引力理论。

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1879—1955年）生于德国，犹太人，因受纳粹迫害迁居美国。1905年他发表《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论文，标志着相对论的诞生。在文章中，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原理，即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规律在所有惯性系中是相同的，因而从根本上抛弃了绝对静止的参考系、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光在所有惯性系中，真空中的光速都是相等的。他把相对性原理推广到非惯性系（加速运动的参考系）中去，于1907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即物理学规律在任何参考系中都可以表现为相同的数学形式，在一个小体积范围内的万有引力和加速系统中

的惯性力相互等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示了时空的可变性、时空变化的联系性，树立了新的时空观、运动观、物质观，使人们能进一步去研究微观高速运动。这一理论被后人誉为 20 世纪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第二节 文学

法国古典文学 古典主义是 17 世纪流行在西欧，尤其是在法国的一种资产阶级文化思潮。由于它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都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典范，因而有“古典主义”之称。其基本特征是：以统治者的标准进行创作，它在政治上拥护王权、歌颂圣君、推崇理性、宣扬一统，在艺术上摹仿古典文学，恪守“三一律”——时间、地点、情节的绝对统一。古典主义文学以宫廷与贵族生活为主要题材，以戏剧尤其是悲剧为主要体裁，其主要代表作家有高乃伊、拉辛与莫里哀。高乃伊（1608—1684 年）是第一部古典主义悲剧《熙德》的作者。作品通过理性与感情，荣誉与爱情，封建义务与人性的冲突，塑造了远比常人高大的英雄形象，奠定了古典主义文学的基础，被誉为法兰西民族戏剧史上的里程碑。拉辛（1639—1699 年）是古典主义文学后期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多借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传说，暴露宫廷贵族的荒淫和残暴。他善于刻画贵族妇女形象，偏重于心理分析，尤以采用细腻入微的笔触描绘了人类道德的沦丧而著称。代表作《昂朵玛格》突出暴露出人的弱点，剖析人们瞬息万变的心理状态，反映并鞭挞了物欲横流的罪恶世界。在古典主义文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是喜剧大师莫里哀（1622—1673 年），他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特色，《伪君子》为其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他用辛辣讽刺的笔调，对比的手法，勾画出伪君子塔丢夫这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代表的阴险、奸诈、狠毒的形象。讽刺喜剧《堂·璜》刻画了璜这个“恶棍大贵族”的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人物形象，揭露了 17 世纪法国封建贵族的两面性。他笔下的社会生活既富于时代气息又带有民间风味，堪称古典文学创作的顶峰。

启蒙主义文学 随着 18 世纪启蒙思想的传播，启蒙文学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其特征是以理性为唯一尺度，以文学为斗争工具，以资产阶级与平民为主人公，以哲理小说为主要体裁，并建立了启蒙主义文艺理论。

启蒙文学起源于法国，并在法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其代表人物通常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以 50 年代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出版为界，前期有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后期则有狄德罗与卢梭。

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由 160 封信组成的书信体小说。它通过两个波斯青年旅居巴黎时，用通信方式报道见闻，反映了作者痛恨法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情绪。伏尔泰的政治悲剧《布鲁图斯》借用历史题材，宣传自由思想，激起人们对封建暴政的仇恨。狄德罗的哲理小说《修女》，以修女苏珊写信向侯爵诉苦和求援的方式，控诉了天主教会折磨人的罪行。卢梭的书信体长篇小说《新爱洛绮斯》，描写贵族姑娘尤丽和她的年轻家庭教师相爱的故事，表现“自然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谴责封建等级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哲理小说《爱弥儿》提倡用人道的博

爱精神教育儿童，反对封建的教育体制。博马舍（1732—1799年）的两部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则辛辣地揭露了封建政治的罪恶。

德国的启蒙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莱辛、哥德和席勒等人。莱辛（1729—1781年）的代表作为《爱米丽娅·迦绿蒂》。该作品揭露了封建贵族专横跋扈的本性，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的怯懦。在莱辛之后，德国启蒙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狂飙运动阶段。这一运动波及整个德国。在政治上狂飙运动时期的文学要求民族统一，在艺术上提倡民族风格，主要代表为歌德与席勒。歌德（1749—1832年）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德国文学中第一部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作者以觉醒青年终为充满罪恶的社会所窒息的感人故事，博得了无数青年人的同情。席勒（1759—1805年）的代表作《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是狂飙文学的至高点。其后，古典主义悄然兴起，它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和谐、统一为最佳形式，将启蒙文学推向新的高潮。席勒晚期代表作《威廉·退尔》即以思想丰富与艺术完美的统一而著称。歌德晚期代表作《浮士德》，文情并茂，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形象，被誉为欧洲文学四大名著之一。

英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有笛福、菲尔汀、彭斯与斯威夫特。笛福（1661—1731年）的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塑造了一个勇于追求、百折不挠的英雄形象，其目的在于讴歌新兴的资产阶级开拓、占有世界的冒险精神。该作品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研究18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和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菲尔汀（1707—1754年）主要创作嘲讽时弊的作品，代表作《汤姆·琼斯》反映了当代英国社会百态。彭斯（1759—1796年）是苏格兰著名的农民诗人，作品带有浓郁的民族气息，体现了高原人民的豪放性格。其中《自由树》等篇，直接歌颂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他的诗歌集《苏格兰方言》在民间广为流传。斯威夫特（1667—1745年）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讽刺作品。作品叙述医生格列佛航海漂流到小人国与大人国的经历。作者讽刺和批判了英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与党争。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19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欧美文坛出现了以具体反映现实生活，暴露社会黑暗为特征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逐渐成为文坛上的主要思潮。它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之广，对社会问题揭露批判之深，是以往的文学思潮所无法相比的。

法国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是司汤达（1783—1842年）的小说《红与黑》。小说通过塑造一个挤进上流社会不择手段以至最后被处死的青年于连的典型形象，鞭挞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无耻行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巴尔扎克（1799—1850年）。他的《人间喜剧》由96部长短不一的小说构成，出现2000多个人物，堪称一部从法国革命到七月王朝末期的法国社会的风俗史。福楼拜（1821—1880年）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通过女主人公、医生包法利的妻子爱玛堕落的悲剧，无情地批判了法国社会的丑恶习俗。雨果的《悲惨世界》通过叙述失业者冉阿让颠沛流离、投河自杀的悲惨一生，反映19世纪初至30年代的法国社会状况，集中体现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左拉（1840—1902年）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但他的由20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

马卡尔家族》有着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其中的《萌芽》描绘煤矿工人的苦难生活和他们的斗争。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1850—1893年）的作品语言生动、人物描写逼真、情节发展曲折，实为文学精品。其中最受人们推崇的是《羊脂球》和《项链》。罗曼·罗兰（1866—1944年）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通过宫廷乐师的儿子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断反抗的人生，对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狄更斯（1812—1870年）著有《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等20多部长篇小说。小说从各个角度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萨克雷（1811—1863年）的《名利场》，生动描绘了充满铜臭味的资本主义世界图景。女作家夏洛蒂·白朗苔（1816—1855年）的《简·爱》，描写一位女家庭教师在冷酷的环境中的奋斗。哈代（1840—1928年）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给农村带来的种种厄运，《德伯家的苔丝》为其代表作。多产作家肖伯纳（1856—1950年），共创作51个剧本。他的剧本在喜剧中蕴含着发人深省的悲剧性内容，其代表作是《华伦夫人的职业》。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俄国非常兴盛，主要代表人物有果戈理、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果戈理（1809—1852年）是俄国文学从模仿走向独创的第一人，其代表作《死魂灵》勾画出农奴制俄国的剪影。别林斯基（1811—1848年）是俄国第一代平民知识分子代表，曾主持编辑《望远镜》、《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杂志，他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屠格涅夫（1818—1883年）是果戈理之后的俄国文坛的主将，其代表作《父与子》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中第一个新人的形象，从侧面反映了贵族革命的结束。冈察洛夫（1812—1891年）的代表作为《奥勃洛摩夫》，作品主人公为“多余的人”大家庭中最后的一员，奥勃洛摩夫性格成为意志颓唐、因循懒惰的代名词。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年）在代表性剧作《大雷雨》中，抨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指出沙皇俄国是一个黑暗的王国。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是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其代表作《怎么办》塑造了一代信仰坚定、热爱生活、敢于行动的“新人”群象，这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正面人物的典范。这部作品使一代俄国青年走向革命。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8年）擅长细腻地描写社会底层人物的心态，他的代表作是《罪与罚》。一代文豪托尔斯泰（1828—1910年）倡导贵族平民化思想，他遵循着忠实于现实生活的原则，在作品中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他的作品被列宁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比较重要的作品《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中心，展示1805年到1820年底欧洲的重大事件，描绘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安娜·卡列尼娜》，主要描写贵族妇女安娜，为追求爱情，遭到虚伪的贵族社会的蔑视和污辱，最终在绝望中自杀的悲剧。《复活》通过描写一位贵族青年和农奴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爱情故事，揭露法庭、监狱的黑暗和官吏的昏庸。

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代表是显克微支（1846—1916年），其作品《你往何处去？》写古罗马暴君尼禄时期的社会和基督教徒殉道的故

事，这部小说使他获得 1905 年诺贝尔文学奖。《十字军骑士》以 15 世纪日耳曼条顿骑士入侵波兰的事件为题材，预示 90 年代初德国对波兰的侵略。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丹麦的安徒生和挪威的易卜生。丹麦作家安徒生（1805—1875 年）他共发表了 156 篇童话和故事，其作品具有浓厚的民主精神，是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北欧作家，《卖火柴的小女孩》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皇帝的新衣》巧妙地讽刺了爱好虚荣的皇帝。《丑小鸭》则体现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挪威的易卜生（1828—1906 年）一生写了 25 个剧本。早期作品以古喻今、充满爱国主义精神。1877 年，他创作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剧”，其中意义较大的有《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玩偶之家》否定了男权思想，鼓励妇女为争取独立人格而斗争。《人民公敌》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

独立战争后，美国民族文化得到了发展。19 世纪中叶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兴起。斯托夫人（1811—1896 年）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叙述黑奴汤姆毕生劳动，结果仍死在主人的鞭下，其女伊莱扎勇于反抗，终于获得了自由的故事。希尔德烈斯（1807—1865 年）的长篇小说《白奴》通过一个混血奴隶的自述，反映黑奴的非人生活。民主诗人华尔特·惠特曼（1819—1892 年）在早期诗作里讴歌普通美国人积极进取，乐观豁达的品格。在南北战争前后，他的诗作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他的诗作都收录在著名的《草叶集》中。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发展。马克·吐温的作品（1835—1910 年），以讽刺、幽默的笔调，戳穿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揭露种族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罪恶行径。与他人合著的《镀金时代》，抓住美国社会金钱支配一切的特点，描绘政界、新闻界贪污受贿的丑行。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借儿童的观察和感受，暴露资产阶级的欺诈虚伪，谴责种族歧视行为。诺里斯（1890—1902 年）的代表作《小麦史诗》三部曲，生动地描写了资本家对农民的残酷掠夺。杰克·伦敦（1876—1911 年）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特写集《深渊中的人们》以自己的调查材料，描写英国工人的贫困生活。社会空想小说《铁蹄》，用幻想的方式，展望未来，反对“铁蹄”统治的美国工人运动。小说《马丁·伊登》控诉资本主义社会扼杀有才华青年的罪行。德莱赛（1871—1945 年）的作品题材广泛、文笔犀利，代表作《美国的悲剧》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竞争的残酷及青年一代的悲惨命运，可以说德莱赛的作品，使美国文学走向世界。

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文学诞生于 19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它以不可遏制的激情，谴责封建专制，讴歌自由理想，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解放，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的主要代表是海涅（1797—1856 年）。其作品把政论与警句、神话与传说、诗歌与散文交织在一起，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他的早期诗作《歌集》以爱情为主线，在倾诉个人喜怒哀乐时，为知识分子的权利抗争，嘲讽市侩的庸俗。政治抒情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用“冬天”象征走向衰亡的德国现实社会，预示了其必然

灭亡的命运。

英国浪漫主义的代表是拜伦（1788—1824年）和雪莱（1792—1822年）。拜伦的代表作是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这是一部讽刺现实的浪漫抒情作品。作者歌颂西班牙、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表达了对奴役和侵略的憎恨。未完成的诗体长篇小说《唐璜》是拜伦交替运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杰作。诗人通过贵族青年唐璜在欧洲许多国家的所见所闻，抨击了以“神圣同盟”为代表的欧洲反动势力。雪莱与拜伦齐名。其作品有《西风颂》、《自由颂》、《麦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其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突出了主人公作为人类解放者的光辉形象，被恩格斯誉为“天才的预言家”。同一时期的司哥特（1771—1832年）是欧洲近代历史小说的先驱。其代表作《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将民间传说中的绿林好汉置于历史小说之中，并赋予主人公的地位。

法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为夏多布里昂（1768—1848年）。其代表作《阿达拉》以贵族阶级的伤感情绪，通过精细的文字描述，体现了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特色。1830年，法国文坛兴起了一场革命，确立了浪漫主义的主宰地位。主要代表为雨果。雨果（1802—1885年）是提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纲领的第一人。他的代表作小说《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均被列为真正浪漫主义的杰作，后者达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珠联璧合的艺术境地。

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普希金（1799—1837年）是俄罗斯语言文学奠基人。他的作品数量浩繁，主要有《致恰达耶夫》、《自由颂》、《高加索俘虏》、《叶甫根尼·奥涅金》等。他在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塑造了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多余的人”的形象，并借此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莱蒙托夫（1814—1841年）发表了俄国第一部心理小说《当代英雄》，塑造了继普希金后又一个“多余的人”毕乔林的形象。

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为密茨凯维奇。密茨凯维奇（1796—1855年）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为民族独立而献身革命的斗士。其作品《青春颂》是1830年华沙起义的战歌。代表作诗剧《塔杜诗先生》，虽为历史题材，却表达了民族复兴的希望。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23—1849年）是一位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浪漫主义作家。其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格。裴多菲运用节奏自由而又富于音韵美的诗体，把对未来的憧憬与对现实的批判融为一体。在代表作《爱国者之歌》、《民族之歌》中，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爱情、自由》既体现了诗人对爱情的忠贞，也体现他对自由的热爱。

早期无产阶级文学 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与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以诗歌为主要形式，迅速、集中而又尖锐地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中的问题。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始于英国的宪章运动，因此也被称为宪章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是琼斯。琼斯（1819—1869年）是宪章运动的领袖，他写下了许多充满革命豪情的战歌。代表作《人民之歌》发出了“打倒贪婪的权贵人物”“打倒万恶的黄金大王”的呼声。巴黎公社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新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

鲍狄埃与米歇尔。鲍狄埃（1816—1887年）是公社委员，在保卫公社的战斗后，他写下的广为后人传唱的《囚徒之歌》，是一首慷慨壮烈的战歌。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为高尔基与普列汉诺夫。高尔基（1868—1936年）的著名诗篇《海燕》满怀激情地呼唤革命，代表作长篇小说《母亲》唤醒广大劳动群众走向革命。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是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所提出的学说，为建立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社会政治思想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出身于英国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由于自幼体弱多病，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养成了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的习惯，并且掌握了丰富的知识积累。1850年，他发表《社会静力学》一书，引起英国学术界的注意。他完成了多卷本著作《综合哲学》。这部著作不仅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而且也使他成为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大思想家。

斯宾塞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社会研究，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及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从生物学的立场出发，把人类社会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借内在的生命力，不断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向前发展，最终目标是一种理想的静止状态。一旦达到这种状态，社会进化停止了，人们便会自动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政府就会变成多余的东西而自行消失，人将得到最大的幸福。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虽有差异，但发展规律相同，都是通过生存竞争得以生长的。强者欺凌、消灭弱者，弱者受欺压死亡，这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国家要保护这种生存竞争。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新唯心主义更能适应于资产阶级的需要。因为斯宾塞所鼓吹的以自然选择为旗号的自由主义，非常有利于向垄断阶段过渡的资产阶级的发展。

叔本华与尼采的唯意志论 叔本华（1788—1860年）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创立了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流派。他认为，自然界只是现象，“意志”才是宇宙的本质。人是宇宙的部分，因此人的本质也就是意志。他指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但人们利己的生活意志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所以人生充满痛苦。叔本华的主要著作是《世界即意志和观念》。他的哲学思想带有明显的悲观主义色彩，反映了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消沉情绪，在当时甚为风行。普鲁士以武力统一德意志之后，德国资产阶级思想界的气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的情绪为之一振，于是出现了尼采的哲学。

尼采（1844—1900年）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出生于传教士家庭，24岁就成为大学教授，10年后因精神分裂而退休，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扎拉图斯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权力意志》等等。尼采谴责当时的自由资产阶级，称他们为因循守旧、苟且偷生的“庸人”。认为必须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人道主义影

响的西方文明，而要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并创造新的价值。他站在利己主义的立场，从否定基督教道德出发，进而否定人类一切进步思想。尼采把非理性的权力意志看作人类以至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动力，强调进化即权力意志实现其自身的过程，人生的目的也就是运用权力，“扩张自我”。他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对生活的“肯定”态度，推崇肯定人生，有利于人的发展的“自由道德”，但他又认为这种新道德的产生，必须依靠“超人”的出现。尼采鼓吹“超人”哲学，认为只有“超人”才能创造历史、创造一切，有权奴役群众、能够体现权力意志，而普通人只是“超人”实现自己权力意志的工具，“超人”学说是尼采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尼采公开歌颂战争，认为战争就是道德。他提出艺术是权力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艺术家就是高度扩张自我，表现自我的人。

由于尼采的哲学思想充分反映了正在形成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因而广为流传，在当时便成为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流派。甚至在几十年后，唯意志论又被纳粹奉为德国的官方理论，用以鼓吹战争，煽动民族复仇情绪。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其最大特点是认为人的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原则在道德观上的反映。最早系统地阐述功利主义的利益原则的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1715—1771年）。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利益是唯一支配作用的东西，“利益是我们的唯一的推动力”。但是，他主张限制个人利益，铲除封建小集团利益，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近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思想家边沁（1748—1832年）。提出的功利原则的内容不同于前者，边沁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的现实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合”。在他看来，“求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是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同时又是人们衡量和评价一切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他指出，一切有助于产生快乐的事物和行为就是好的，而那些能够带来痛苦的事物就是坏的。后来约翰·密尔（1806—1873年）继承了边沁的学说，并于1822—1823年组织“功利主义社”开始使用“功利主义”一词。但与边沁相比，密尔的功利主义学说还是具有一定的进步之处的，那就是在提倡利己主义的同时，也提倡利他主义。

功利主义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17和18世纪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禁锢的思想武器之一。19世纪后，却成为一种政治思潮，变成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在本质上自由是指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即个性的自由发展，个人谋求私利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他们主张国家只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而不应该干涉个人自由和经济生活；个人利益、个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他们完全否定了前一时期启蒙思想家把自由同民主，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由此可见，19世纪的自由主义同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相比，已经丧失了革命性和进步性，赤裸裸地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并在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英国经济学

家，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当时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代言人，主要著作有《人口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等。1798年出版并使作者一举成名的《人口论》，全面阐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提出，人口增长要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在正常情况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当人口和生活资料无法相适应时，自然规律会使两者之间恢复平衡，减少人口使之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性因素是贫困、饥馑、瘟疫、战争等，并主张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人口的繁殖。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一定的科学性，在节制生育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为贫困与罪恶辩护，因此又有反人民的一面。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新流派 在19世纪中叶的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并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及他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及他的学说主要代表着英国工场手工业已高度发展、产业革命开始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于1776年发表其代表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以经济自由为中心思想，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指明经济自由是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条件和基础。亚当·斯密准确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内在关联，但又把它的表面现象庸俗地加以反映。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为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但他又将剩余价值和利润混合起来，又将利润视为生产费用的一部分，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亚当·斯密主张自由竞争，抨击重商主义、对英国经济政策产生过重大作用。他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论》。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代表性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制定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所能提出的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他的理论学说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他的贡献。但他还不明确劳动的二重性、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混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因而未能解决劳动论、剩余价值论、平均利润等所存在的矛盾。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马克思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准备了条件。

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当时影响甚大，德国的经济学家曾试图把它引入德国，用以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古典学派的自由经济学说，并未能为落后的德国经济带来好处，因为如果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在自由竞争中，德国的经济将被经济先进的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所冲垮。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应运而生，并创立了自己的经济理论。

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1817—1894年）。1843年，罗雪尔出版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大纲》一书，被德国经济

界视为历史学派的纲领性著作。1854—1894年，他出版了5卷本巨著《国民经济体系》，这是罗雪尔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学领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作者在该书的第一卷中建立了历史学派的基本理论体系。为此，罗雪尔称政治经济学为“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的方法”。

罗雪尔反对古典学派关于经济发展存在着普遍规律的观点，也反对他们的方法论。他提出，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一门论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诸规律的科学，或它的国民经济生活的科学。”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有密切地结合政治史、法学史、经济学史及文明史，才能正确地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发展的特点。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年）和卡尔·克尼斯（1821—1898年），也是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从根本上说历史学派的经济理论是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他们从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提出国家应当干预经济生活。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积极主张德国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反对自由贸易。借助国家的力量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学派认为是改变德国的经济落后状况的基本措施。

由于历史学派侧重于经济现象的探讨，所以他们的著作大都有堆砌历史资料的倾向。他们力图通过对历史现象的记述，追踪经济发展的轨迹，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这些著作中所包含的丰富的资料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由于作者未能科学地分析这些资料，因此不可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

19世纪70年代德国统一之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德国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简单地继承和阐发历史学派的理论观点及研究方法，他们更注意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这样，旧历史学派发展为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有古斯塔夫·施莫勒（1838—1917年）、路德维希·布伦坦诺（1844—1931年）和阿多夫·瓦格纳（1835—1919年）。他们针对当时德国所存在的严重的劳资关系问题，提出要重视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范畴同时也是道德范畴，经济组织和制度只不过是受伦理道德规律所制约的一种秩序。他们甚至认为，工资也属于道德范畴，因此在他们看来，经济问题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和解决。他们认为，社会经济问题并非基于社会经济关系，而是基于道德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提出，劳资关系问题可以根据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标准，通过改良的途径加以解决。

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特别强调了国家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国家是集体经济的最高形式。凡是依靠个人的力量无法实现的目标，都应由国家去实现。他们强调的国家不是具体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是抽象的超阶级的国家，国家应起干涉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作用。

新历史学派于1873年发起成立“社会政治学会”，通过这个学会，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

由于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教授，经常利用大学讲坛宣传他们的社会经济主张，并给他们的主张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因此他们的学说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

新历史学派的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使国家机器进一步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理论得到容克资产阶级的欢迎，所以在德国经济学界占居支配地位达数十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的失败，新历史学派才由盛而衰。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除。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在美国演变为制度学派；在德国，则成为纳粹主义思想基础之一。

奥地利学派 19世纪70年代初，正当历史学派的理论学说广泛流传之际，以卡尔·门格尔（1840—1921年）为首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起来驳斥历史学派的观点，捍卫古典学派的学说。他们指责历史学派舍弃古典学派的基本理论，降低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他们自称古典学派的继承者，反对历史学派用经济史、统计资料及经济政策取代理论经济学，主张建立纯粹的经济学。在与历史学派的论战中，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奥地利学派，又因他们先后都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

由于奥地利的情况不同于德国，奥地利是个统一的帝国，国内不存在关税壁垒和市场分散等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以半封建大地产为主要形式的封建残余。因此，奥地利经济学界易于接受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的思想，而排斥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主张。

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古典学派的理论已不能全面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而奥地利学派则根据新的经济形势，把研究重点放在市场方面，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首先由门格尔在其《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然后在宠巴维克的《资本与资本利息》和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等著作中进一步完善化。

奥地利学派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规律，应该用抽象的研究方法对之进行理论概括。但是，他们的方法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探寻个人的心理动机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起点，认为社会经济生活就是人对物的欲望以及满足这一欲望的活动。他们认为，物品的价值起源于效用。但是，他们所说的效用不是物品本身的客观属性，而是指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人对物品最后也是最小的欲望为边际欲望，物品满足边际欲望的能力就是它的边际效用。他们认为物品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该物品数量，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随着物品数量的减少而上升。稀少和效用成为决定物品价值的前提条件。

奥地利学派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来说明生产、分配及消费领域的各种经济现象，并以此论证经济生活中价值转移的规律，都是不科学的。他们的谬误就在于把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当作判定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割断了价值与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价值由经济范畴变成心理范畴，也抹煞了价值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奥地利学派虽自称古典学派的继承者，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古典学派的学说没有无视或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并进而揭示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奥地利学派则只强调纯理论研究，企图用人与物的关系掩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这就充分暴露了它的庸俗性。在19世纪后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说一直在奥地利经济学界处于支配地位，

并在近代各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四节 史学

近代法国史学 在近代西欧诸国中，法国的史学研究一直较为活跃，出现了一大批史学家。近代法国史学通常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指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即如何解释历史、思考问题和提出疑问的理性时代，后期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侧重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

在理性时代，法国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应首推著名的史学家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是一部史论专著。他借论述古罗马兴亡的问题，阐明自己的史学和政治观点，提出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的优劣和风俗的善恶。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受诸种因素制约，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他的这种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伏尔泰有较重要的史学著作4部，即《查理十二世传》、《路易十四时代》、《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

《路易十四时代》是伏尔泰的史学代表作，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路易十四时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较为详细的图景。伏尔泰第一次提出“历史哲学”的概念，主张用“理性”审视历史现象，判断前人的功过是非，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他还认为，历史还应包括把科学、文艺、风俗、饮居等方面，开了文化史之先河。他还把东方国家的历史当作世界历史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加以研究。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史学相当发达，主要史学家有梯叶里、米涅、基佐、梯也尔、米什莱等人。梯叶里（1795—1856年）的主要著作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等。他把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于历史研究，被称为法国史学中的“阶级斗争说之父”。米涅（1796—1884年）的代表作是《法国革命史》。他以严谨的态度，简明扼要地叙述了1789—1814年法国历史，该书一直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权威著作。梯也尔著有《执政府和帝国史》与《法国革命史》，因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政治家的洞察力而闻名。基佐（1787—1874年）著作颇丰，主要有《法国历史研究》、《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等，他用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法国第一位“伟大的人民史学家”米什莱（1798—1874年）以写人民群众历史为己任，所撰17卷《法国通史》逼真地再现中世纪法国社会全貌，讴歌法国人民和大好河山。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法国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其中主要代表是托克维尔、奥拉尔、马埃迪、瑟诺博斯等人。托克维尔（1805—1859年）著有《旧制度与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旧制度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19世纪后期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仍较为重视。1886年，巴黎市议会为奥拉尔（1849—1928年）在巴黎大学特设一个“法国大革命史”讲座。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学会，创办《法国大革命》月刊。他本人著有《法国革命政治史》等书。马埃迪（1874—1932年）著有《法国革命史》。瑟诺博斯（1854—1942年）是著名史论家，他与人合写《史学研究导论》，对史学方法问题条分缕析，对习

史者很有帮助。

近代英国史学 17至18世纪史学的代表主要是休谟和吉本。休谟(1711—1776年)是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其史学代表作是6卷本的《英国史》(《从凯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历史》)。在这部著作中,休谟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观点即:历史仅仅是良心的纪录,气候和环境能影响身体,但对人的思想无能为力。

吉本(1737—1794年)力求以写真的笔法再现历史,在他动笔写作其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时,曾用多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希腊等地游历,搜集资料,并阅读了大量古典作家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是欧洲启蒙时代史学代表作,在欧洲近代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世纪初英国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马考莱与卡莱尔。马考莱(1800—1859年)于1825年发表论文《弥尔顿》,以流畅的文笔对这位诗人作恰如其分的评述,引起轰动。他的《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一书,生动地记述了英国1685—1702年的历史。卡莱尔(1795—1881年)著有《法国革命史》,把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场面描绘得有声有色。卡莱尔认为是英雄创造历史,在其传记作品《克伦威尔传》、《腓特烈大帝传》中,他极力宣扬这一观点。其晚年所写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是宣扬英雄史观的代表作。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史学家中,最为著名的是柏克尔、斯塔布斯、约翰·格林、阿克顿等人。柏克尔(1821—1862年)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决定作用,其代表作是富有哲学思想的佳作《英国文明史》。斯塔布斯擅长史料考证,对《不列颠史料集成》的编纂贡献最大。他的多卷本《英国宪政史》是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英国通史,他曾任牛津大学的近代史讲座教授,是英国史学中“牛津史学”的开创者。约翰·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将群众当作历史主人来写。“剑桥学派”创立者阿克顿(1834—1902年)知识渊博,主张以兰克“客观主义”治史,《剑桥近代史》大纲就出自他手。

近代德国史学 德国史学是统一后才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中叶后,出现了尼布尔、兰克、蒙森等著名史学家。

尼布尔(1776—1831年)是罗马史学家,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时,曾以新颖的内容吸引各层次听众,该讲义出版后,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分析成为后世研究罗马史的权威著作。兰克(1795—1885年)。在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上均有重要建树。他提出治史中的“客观主义”的观点,即写历史要客观公正,不挟带个人偏见,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就怎样叙述。同时,他还强调写历史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要让亲临其境者说话,要对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透彻的批判并对作者进行心理分析。其著作主要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法国史》、《世界史》等。他在柏林大学任教时,首创研究班(西明纳尔),他的学生标榜他的“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形成兰克学派。蒙森(1817—1903年)是著名罗马史学家。他才兼文史,擅长资料考证,所著《罗马史》在许多方面能发前人所未发。19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领导编辑的《拉丁铭文集成》,是研究古代罗马史的

重要资料。

近代俄国史学 近代俄国史学是在德意志史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8世纪初，德意志史学家拜伊尔、米勒、施洛塞尔等来到俄国，但他们都主张俄罗斯国家的“诺曼起源说。”俄国民族主义史学就是在这种学说的论战中产生的。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代表塔季舍夫，罗蒙诺索夫都认为诺曼人到来之前，东斯拉夫人已建立了民族国家。关于诺曼起源的争论达到高潮，但诺曼征服说逐渐占了上风。在19世纪“卡拉姆辛(1765—1826年)的《俄罗斯帝国史》、索洛维约夫(1820—1879年)的29卷的《远古以来俄国史》中，用大量史料论证“诺曼起源说”，并阐述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继承性。

19世纪中叶以后，涌现了一批史学家，他们受西欧史学影响颇深，科斯托马罗夫从地方志、民间传说中挖掘史料，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撰写了《斯杰潘·拉辛叛乱记》、《史学专题研究论文集》等著作。克留契夫斯基(1741—1911年)对俄国史上许多重大问题提出看法，他的著作取材丰富，文笔生动，其代表作为《俄国史教程》。科瓦列夫斯基主要研究农村公社，对于东方的土地制度研究颇有心得，其《公社土地私有制瓦解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一书，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

近代美国史学 美国史学诞生于独立战争以后。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著作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州制宪和政治史要》、约翰·马歇尔的《乔治·华盛顿》、华盛顿·欧文的《乔治·华盛顿传》、斯巴克士的《美国革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等。但这时的美国史学尚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美国史学的发展是在19世纪之后，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史学家。班克罗夫特(1700—1891年)用丰富的材料撰写了10卷本《美国史》，叙述了美国的历史过程。普列斯科特的《斐迪南和伊萨贝拉在位时期的西班牙史》以及《墨西哥之征服》和《秘鲁之征服》，则是这一时期较为优秀的史学作品。摩特莱著有歌颂尼德兰革命的《共和国之兴起》和《荷兰共和国史》。希尔德累斯的《美国史》是一部坚决反对黑奴制，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的作品。

南北战争后，围绕着国家统一和黑奴制问题，出现了美国史学中的“南派”和“北派”。“南派”有斯蒂芬女士、戴维斯等人，他们用种植园奴隶主的观点来解释美国的史学，为已被废除的奴隶制招魂。“北派”有贺拉斯、格里利等人，他们则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论述南北战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相当繁荣：巴克曼专门研究北美殖民地史，费斯克代表种族主义学派，马汉(1840—1914年)鼓吹大海军主义，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也是历史学家，特纳(1861—1931年)创建“边疆学派”，鲁宾逊宣传实用主义的新史学，1884年成立全国性美国历史学会，1895年开始定期出版《美国史学评论》。

第五节 艺术

近代音乐 进入18世纪以后，欧洲的音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音乐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斯卡拉蒂、法国

的拉穆、英国的亨德尔、德国的巴赫等人。

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1660—1725年）是著名的西洋歌剧乐派——那不勒斯乐派的核心人物。他的一生作品甚丰，仅歌剧就有一百多部。他确立了意大利序曲快板—慢板—快板的三段形式和反复三段体的咏叹调，并使后者成为正歌剧的主要构成成分。他又创用管弦乐队以伴奏宣叙调。这些创新，直接推动了西洋歌剧的发展和交响曲的形成。

拉穆（1683—1764年）是法国作曲家兼音乐理论家，他继承了法国音乐的优秀传统，创作了多部歌剧、舞剧。在学术思想上，他深受查理诺和笛卡儿的影响，撰有和声论著多种，1722年写成的《和声学教本》，创立了近代和声学理论，也使他一举成名，在歌剧舞台上，他创造性地把独唱、合唱、诗词、歌调、舞蹈和管弦乐融为一体，使之成为一种整体艺术，这是他在戏剧音乐领域中最重要贡献之一。

亨德尔（1685—1757年）是一位圣剧大师。在他的圣剧中，合唱占有着中心的地位。他早年大量的作品取材于古代历史和神话，所创作的歌剧保持了意大利歌剧华丽的特色，后半生则致力于清唱剧的创作。他的作品结构宏伟，风格明快，富有史诗性。《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一部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逃出埃及苦海的史诗。《弥赛亚》颂扬救世主牺牲自己换取万物的幸福。《参孙》是对英雄的赞美。

巴赫（1685—1750年）是德国最有成就的作曲家之一。他的创作广泛吸收了16世纪以来尼德兰、意大利、法国等国音乐的成就，对西洋近代音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只有通过对巴赫作品的研究，才能真正理解欧洲音乐。巴赫的作品反映出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市民阶级在封建割据、穷困落后局面下的思想矛盾：一方面深感压抑苦闷，力图挣脱桎梏，另一方面自身的极度软弱，又使其只能向宗教寻求解脱。他的声乐作品以宗教内容为主，器乐作品以世俗内容为主，主要声乐作品有《b小调弥撒曲》、《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等等，器乐作品则包括古钢琴曲、管风琴曲、管弦乐组曲、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和大提琴无伴奏奏鸣曲等多种形式的曲目。

到18世纪中叶，斯卡拉蒂创造的意大利式交响乐由歌剧院进入音乐会之后，立即博得了人们的普遍喜爱，音乐界也迅速掀起了创作交响乐的热潮。当时还有一位比较重要的奥地利作曲家，即塔米兹（1717—1757年），他们创作的乐曲已经显露了现代管弦乐所特有的变幻性和流动性。

自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欧洲乐坛出现了新的气象：音乐家开始走上独立、自尊的自由艺术之路，音乐语言趋于精练朴实、音乐结构变得明晰匀称，主调音乐风格已占据主导地位。

在此期间，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曾先后将维也纳作为创作基地，形成了“维也纳古典乐派”。

海顿（1732—1809年）一生创作了100多首交响曲、大量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各种独奏乐器的协奏曲、清唱剧等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伦敦交响曲》12部，清唱剧《创世纪》、《四季》以及交响曲《告别》、《惊愕》、《时钟》等。他的创作吸取了奥地利、波希米亚等民族、民间音乐的素材，风格质朴、明快，充满着乐观、幽默的气息。另外，海顿对交响乐的创新主要就在于使之有了主题。

莫扎特（1756—1791年）被誉为18世纪的万能音乐家，他不仅创作

了大量的交响乐和钢琴协奏曲，而且在歌剧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他的歌剧作品有许多部，比较著名的如：具有鲜明的反贵族倾向的意大利式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反映贵族荒淫生活的意大利式歌剧《唐璜》和憧憬超社会、超阶级的理想世界的德国民族歌剧《魔笛》等等。莫扎特深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晚年曾参加共济会组织，其作品风格清丽流畅，结构精巧工致。他继海顿之后进一步丰富了交响曲与室内乐的表现力。

贝多芬(1770—1827年)自幼从父学习音乐,1792年起定居维也纳,以教学演出及创作为主要生活内容。1798年起听觉开始衰退,1820年后两耳失聪,但仍然坚持创作。他早年便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开始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热情,歌颂理想中的英雄性格。他晚年处于梅特涅反动统治和封建势力在德意志各邦复辟的时期,所以,部分作品流露出一种消极隐退的情绪,但也可以看出,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然怀有热切的向往之情。在欧洲音乐史上,他继承海顿、莫扎特的传统,吸取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音乐成果,集古典派之大成,开浪漫派之先河,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创作手法上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作品风格简洁、粗犷、热情,节奏变换频繁,气魄恢宏,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的创作成就,对近代西洋音乐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贝多芬的主要作品有交响曲9部(尤以第三“英雄”、第五“命运”、第六“田园”、第九“合唱”最为著名)、歌剧《菲岱里奥》、歌德悲剧《哀格蒙特》的配乐、钢琴奏鸣曲32首(尤以《悲怆》、《热情》等最为著名)、钢琴协奏曲5部、小提琴协奏曲一部、弦乐四重奏16部和《庄严弥撒曲》等。

19世纪乐坛是浪漫主义的世界。浪漫主义乐派注重感情,渴望无限,追求绝对的理想性。浪漫主义音乐的三个永恒主题是:讴歌自然、倾诉衷情与回忆童梦。这一音乐流派突出音色的价值,强调艺术的综合性,重视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此外,在音乐理论的建树,音乐评论的开展与音乐教育体系的确立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浪漫主义乐派的奠基人是奥地利音乐家舒伯特。

舒伯特(1797—1828年)是欧洲音乐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在生活贫困、疾病侵扰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反映梅特涅统治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苦闷压抑和渴望摆脱压迫的心情。他的器乐创作师承贝多芬,声乐创作则从自我感受出发。舒伯特曾被誉为“歌曲之父”,他的作品以歌曲最为著名,共有600多首,多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缪勒等人的诗作为歌词。他提高了歌曲的艺术表现力,加强了钢琴伴奏的作用。代表有《魔王》、《野玫瑰》、《春之信念》、《流浪者》以及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日旅程》等。

门德尔松(1809—1847年)是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莱比锡学院)的创建者。他毕生推崇巴赫的作品,并力图扩大18世纪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影响。他将古典音乐的严谨、和谐与个人情感的表现结合起来,形成了宁静、幽雅、平和的风格。《第三交响曲》(苏格兰),《第四交响曲》(意大利)以抒情的笔调,描述他对不同国家的风光景色的感受。

舒曼(1810—1856年)既是德国作曲家,又是音乐评论家。从青年

时代起他便深受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他于 1834 年创办《音乐新报》，宣传“用艺术的理想来代替现实的理想”，重要论文收入《音乐与音乐家》一书。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特色，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和生活》、《诗人之恋》为其代表作，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蝴蝶》、《狂欢节》、《春》、《莱茵河》等等。他从 1854 年起精神错乱，后死于精神病院。

瓦格纳（1813—1883 年）是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他早年便开始致力于歌剧创作，并为欧洲歌剧改革作出了贡献。他主张歌剧应以神话为题材，音乐、歌词与舞蹈等必须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交响乐式的发展是戏剧表现的主要手段。他曾广泛使用贯穿全剧的主导动机及新颖的和声、配器效果，丰富了歌剧的艺术表现力，扩大了多响音乐的表现领域。代表作《多歌手》反映了他对音乐艺术传统的探索与革新。

勃拉姆斯（1833—1897 年）是德国作曲家。他维护德国古典传统，很少创作浪漫派作曲家所倡导的标题音乐。在音乐创作上，他早期主要受舒曼的影响，中期摹仿贝多芬的风格，晚期作品则以室内乐及钢琴小品为主。其重要作品有交响曲、协奏曲各四部，管弦乐《学院典礼序曲》、《悲剧性序曲》、《海顿主题变奏曲》、《匈牙利舞曲》，以及《德意志追思曲》、室内乐曲、钢琴曲等。此外，他还曾改编了九十余首民歌，创作 200 余首歌曲，继承并发展了舒伯特、舒曼的德国歌曲艺术传统。

柏辽兹（1803—1869 年）是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评论家，曾被誉称为法国浪漫乐派之父。他致力于标题音乐的创作，力图通过变化无穷的音乐语言，来塑造生动的文学形象，表达一种神秘的崇高意志。他的比较重要的作品有《幻想交响曲》、乐队序曲《罗马狂欢节》、歌剧《贝文努托·切里尼》等等。

古诺（1818—1893 年）是法国重要的作曲家。他的早期作品以宗教音乐为主，以《浮士德》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最为著名，这是法国抒情歌剧的较早的代表作。他于 1846 年为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加冕礼所创作的《教皇进行曲》，1849 年被梵蒂冈教廷选为梵蒂冈“国歌”，沿用至今。

比才（1838—1875 年）是法国著名作曲家。他所创作的歌剧《卡门》取材于梅里美的同名小说，剧中成功地刻画了热情奔放、个性突出的吉卜赛女郎卡门的形象，音乐多用舞蹈歌曲及分节歌，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浓厚的西班牙色彩。这部歌剧至今仍被人们列为世界最优秀的剧目之一。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也是近代歌剧的发祥地。17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美声唱法，将意大利歌剧的艺术技巧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及至 19 世纪，音乐家开始立足于生活，将本民族英雄儿女的斗争业绩化作浪漫主义的旋律，并以歌剧的形式广为传播。其中的杰出代表为罗西尼与威尔第。罗西尼（1792—1868 年）的代表作《塞维尔的理发师》是一部优秀的喜歌剧，其特点是结构紧凑，旋律优美、自然，使人在艺术享受中领会其讽刺消极现象的主题。《意大利女子在阿尔及尔》以雄壮的音乐呼唤人们的爱国精神和行动。威尔第（1813—1901 年）的《拿布柯》、《伦巴底人》等前期作品都与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相关，是以有力的节

奏、明快的旋律，表达人民的爱国热情。他后期的作品着力刻画“永恒人生”，如《弄臣》、《游吟诗人》等。

19世纪也是民族乐派兴起与繁荣时期，波兰音乐家肖邦是这一乐派的先行者。

肖邦（1810—1849年）既是作曲家，又是钢琴家。他毕生憎恨沙俄对波兰的民族压迫和奴役，不少作品反映了他对被占家园的怀念和对民族独立的期望；也有一部分作品流露出个人感伤的忧郁情调和沙龙气息。他少年即接触波兰民族音乐，并将民族音乐的旋律和体裁引入创作中，他的创作对其后的西洋音乐（特别是钢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有钢琴协奏曲两部、钢琴奏鸣曲3部以及玛祖卡、波洛涅兹、圆舞曲、练习曲、前奏曲、夜曲、即兴曲、诙谐曲、叙事曲等大量钢琴独奏曲和歌曲等。与肖邦珠联璧合的音乐家是李斯特。

李斯特（1811—1886年）是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他是西洋音乐史上重要的浪漫派音乐家之一，曾丰富和革新钢琴的演奏技术，首创“交响诗”体裁，创作了大量的标题音乐，从而扩大了钢琴和管弦乐的表现领域，促进了欧洲标题音乐的发展。他的主要作品有交响诗《塔索》、《匈牙利》、《前奏曲》等13首，交响曲《但丁神曲》、《浮士德》，钢琴曲《匈牙利狂想曲》19首、协奏曲两部、《高级练习曲集》、《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等，并撰有音乐专著两部和音乐评论多篇。

斯美塔那（1824—1884年）是捷克作曲家。他对捷克民族音乐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被认为是近代捷克民族乐派的创始人，甚至人们誉之为“捷克音乐之父”。他的主要作品有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等八部、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G小调钢琴三重奏》、《C大调弦乐四重奏》、钢琴曲集《波尔卡》等。

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年）是奥地利作曲家。他创作了圆舞曲四百余首，其中《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艺术家的生涯》、《春的声息》等，流传甚广。他还创作了《蝙蝠》、《吉普赛男爵》等轻歌剧16部及各种舞曲。为别于其父，人们常称他为“小施特劳斯”。其父（同名，1804—1849年）也是音乐家，创作了大量的圆舞曲及各种舞曲。

在19世纪以前，俄国几乎没有重要的音乐家。直至19世纪，俄国成为欧洲大国，欧洲的音乐艺术也影响到了俄国。这时，杰出的音乐家在俄国出现了，他们在民歌旋律的基础上，创作了富有人民精神的俄罗斯歌曲。使俄罗斯音乐走向世界乐坛的音乐家应首推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

格林卡（1804—1857年）是俄罗斯音乐家。他创造了格林卡式的俄罗斯音乐，因而被称为“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奠基者”和“俄国民族乐派之父”。他的歌剧杰作《伊凡·苏萨宁》，是俄国第一部民族歌剧，这部歌剧为俄罗斯古典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创作有其他歌剧作品以及管弦乐曲、乐队曲、室内乐、钢琴曲和歌曲等。

柴可夫斯基（1840—1893年）是19世纪下半期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他的十部歌剧作品中，《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最为著名，3部舞剧作品《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提高了音乐

在舞剧中的地位，至今被誉为芭蕾舞音乐的经典作品。他的主要作品还有《第六交响曲》（也称“悲怆”）及其他管弦乐、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歌曲等。

19世纪中后期，印象主义乐派应运而生。这一乐派主张对不同的音响作平面排列，通过其内在的相似性，达到印象上的统一效果。印象主义乐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德彪西。

德彪西（1862—1918年）是法国作曲家。他的作品多以诗、画、自然景物为题材，而着重于表现其感觉世界中的主观印象。主要作品有管弦乐《意象》，管弦乐组曲《夜曲》、《大海》，钢琴曲《版画集》、《意象集》等等。

近代绘画 17世纪的欧洲艺坛处于巴洛克艺术时期，就其实质而言，巴洛克艺术风格是王权至上思想在艺术上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这种艺术风格在绘画方面主要体现为：构图宏伟壮观，光度明暗显著，色彩鲜艳夺目，线条夸张有力。主要代表人物有佛兰德斯的鲁本斯、西班牙的委拉斯凯兹与荷兰的伦勃朗等。鲁本斯（1577—1646年）创作的神话、历史、宗教、肖像、风景和风俗画等作品，构图富有气势，色彩富丽，溶合了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艺术传统，对欧洲绘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的主要作品有《智者朝圣图》、《农民的舞蹈》、《却夺其普的女儿》等等。委拉斯凯兹（1599—1660年）虽然终生担任宫廷画师之职，但他的作品却出色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他创作了大量的肖像画、风俗画和历史画，其特点是笔致自然，色彩明亮。代表性作品主要有《火神的炼铁工场》、《酒神》、《腓力四世之家》、《纺织女》等。伦勃朗（1606—1669年）擅用聚光及透明阴影突出作品的主题，他给后人留下了300多幅油画、300多幅版画、2000多件素描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等等。

在18世纪画坛占统治地位的是罗可可风格。这一艺术风格的特点是构图精巧，光线轻柔，色彩淡雅，线条自如，带有一种矫饰的生动。可以说，罗可可艺术风格的特点，反映了路易十五时代日益没落的封建贵族的情调。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华多与布歇。华多（1684—1721年）的作品轻盈灵透，似有淡淡哀思，堪称罗可可艺术中的上乘之作。他的代表作有《发舟西苔岛》等。布歇（1703—1770年）以熟练的笔法、浮华的色调，创作牧歌、神话题材的富有装饰性的绘画作品，体现了没落贵族的生活情调，主要作品有《维纳斯之胜利》、《早餐》、《彭巴杜夫人》、《浴后的狄安娜》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以“艺术到民间去，到自然中去”为口号，反对罗可可绘画风格，法国画家夏尔丹积极响应。夏尔丹（1699—1779年）擅长风俗画和静物画的创作，他的风俗画创作，多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他的静物画创作，则能把平凡的内容变作优美的画面。主要作品有《勤劳的母亲》、《烟斗与茶具》和《鸕鱼》等。

在18—19世纪之交，新古典主义画派在欧洲诞生。这一画派的绘画作品的特点是主题严肃，构图缜密，造型完善，细节工整，带有古典雕塑的典雅的风格。新古典主义画派的杰出代表是法国的大卫与安格尔。大卫（1748—1825年）被称为“古典主义之父”，他的作品画风严谨，技法精湛。早期作品多以历史英雄人物为题材，如《荷拉斯兄弟之誓》

等，1793年完成名作《马拉之死》。他后来成为拿破仑一世的宫廷画家，创作了《加冕式》等歌颂拿破仑的作品。安格尔（1780—1867年）是大卫的学生，也是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画法工致，重视线条造型。他尤其擅长于肖像画创作，并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肖像画作品。主要作品有《爱蒙夫人像》、《画家格拉奈像》、《别丹先生像》等等。

戈雅（1746—1828年）是西班牙著名画家。他以奇异多变的油画、素描和版画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年代的社会生活动乱，对19世纪后期的欧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要作品有铜版组画《奇想集》、版画集《战争的灾难》、油画《1808年5月2日》、肖像画《唐·何塞·比奥·德·摩林》等等。

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末，浪漫主义画派在法国画坛兴起。这一画派摆脱了当时的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束缚，偏重于发挥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创作题材主要取自现实生活、中世纪传说和文学名著等，有一定的进步性。代表人物主要有狄奥多·热里科和欧仁·德拉克罗瓦。热里科（1791—1824年）是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者。他的创作多选取现实题材，并探索新的表现手法，代表作《梅杜萨之筏》，以悲剧性的手法描绘“梅杜萨”号海轮沉没后，漂流在海洋上的人们挣扎求救的悲壮情景。这部作品也被视为浪漫主义画派的宣言式作品。德拉克罗瓦（1798—1863年）深受热里科的影响，坚持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由于他在艺术上的革新成就，加强了浪漫主义画派的地位和影响。代表作《自由引导人民》（又名《1830年7月27日》），以象征和现实形象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歌颂了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反对王权复辟的斗争，色彩丰富，笔法奔放，他也因此被称为新时代历史画的创始人。

19世纪30—60年代，现实主义艺术成为画坛的主流。这一艺术流派的突出特点是赞美自然，歌颂劳动，深刻而又广泛地展现现实生活的图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米埃、米勒、库尔贝、门采尔、列宾等人。杜米埃（1808—1879年）是法国进步的现实主义画家，他创作了许多幅揭露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罪恶的讽刺画，如讽刺国王路易·菲力普的漫画《高康大》，对反动统治阶级表示抗议的大型石版画《立法肚子》、《出版自由》、《康斯诺南街的屠杀》等等。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他被迫停作政治漫画而改作油画和水彩画，主要作品有《起义》、《流亡者》、《三等车厢》、《街垒中的家庭》等等。米勒（1814—1875年）是一位法国农民画家。他创作了一批描绘农民的生活，歌颂农民的淳朴性格，揭露剥削制度的残酷的作品，如《拾穗者》、《播种者》、《牧羊女》等等。他的绘画风格质朴、凝重，富有抒情气氛。库尔贝（1819—1877年）是当时法国进步画家的领袖人物。他曾参加巴黎公社，被选为公社委员，并担任艺术家协会主席。他在自己的作品和宣言中，确立了以生活真实为创作依据的原则。他的创作对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绘画艺术有较大的影响。一生作品达数千幅，代表作品有《碎石工》、《奥南的葬礼》、《会议归来》、《筛谷的妇女》等等。门采尔（1815—1905年）是德国画家，他平时注意观察生活，认为劳动是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代表作《轧铁工场》是世界上第一幅以重工业工人为主题的大型油画作品，作品所表现的劳动场面甚为壮观。列宾（1844—1930年）是俄

国画家，巡回展览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许多风俗画和历史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沙皇统治下的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作品刻画人物性格具有特色，画法概括，标志着 19 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绘画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代表作品有《伏尔加河纤夫》、《宗教行动》等等。

此时，在画坛上独树一帜的是惠斯勒。惠斯勒（1834—1903 年）是美国油画家和版画家，侨居英国。他的绘画艺术深受库尔贝等人及日本绘画的影响，曾和法国印象派画家接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线条与色调的和谐。其作品带有装饰趣味和东方情调。主要作品有油画《母亲》、《白衣少女》，铜版画《威尼斯风景》等等。

19 世纪下半期，就其主流而言，绘画艺术领域仍处于现实主义绘画发展、完善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印象画派在法国兴起。印象画派的名称由当时的批评家对莫奈的《日出印象》的嘲笑而得名。这一画派反对当时学院派的保守思想和表现手法，而采用新的创作方法表达新的主题内容，使欧洲绘画出现利用光色原理加强表现力的新方法，对欧洲绘画技法的革新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画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莫奈、德伽、雷诺阿等人。莫奈（1840—1926 年）是印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曾长期探索光色与空气的表现效果，常常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光线下，对同一对象连续作多幅的描绘，从自然的光色变幻中表达瞬间的感觉。他的代表作主要有《日出印象》、《睡莲》、《鲁昂大教堂》等等。德伽（1834—1917 年）擅长于从不寻常的角度，描绘对象瞬间的动态，代表作有《舞台上的舞女》等等。雷诺阿（1841—1919 年）是印象画派大师之一。他在创作上能把传统画法同印象派技法相结合，使作品独具风格，代表作有《包厢》、《舞会》等。

19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后期印象画派产生。这一画派的成员们接受印象派的用色方法但又加以革新，他们不满足于印象派对自然的客观描绘，强调主观感受的再创造，一般不表现光，而重视色彩的对比关系、体积感及装饰性等。代表人物主要有塞尚、凡·高、高更等人。塞尚（1839—1906 年）是法国画家，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他毕生追求表现形式，在用色彩造型方面有新的创造，代表作有《静物》等等。凡·高（1853—1890 年）是荷兰画家，擅用跃动的线条、凸起的色块，来表达自己的主观的感受和激动的情绪。其画风后来曾为野兽派及现代派所取法。他的主要作品有《向日葵》、《农民》、《邮递员罗兰》等等，前者为其代表作，尤为后人所称道。高更（1848—1903 年）是法国画家。他用线条和强烈的色块组成的画幅，具有装饰风味和东方色彩。他的绘画艺术对法国的象征派和野兽派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作品有《两个塔希提妇女》、《雅各及天使》、《塔希提的街道》等等。

参考书：

潘永祥主编：《自然科学发展史》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

远德玉主编：《自然科学发展概述》第五、六、七、八、九、十一章。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十一、十三章。

匡兴、陈惇主编：《外国文学》。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

复习题：

1. 试述近代科学技术的特点与分期。
2. 试述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的主要成就。
3. 试述近代文学的主要分期和主要流派。
4. 试述近代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流派的主要观点。
5. 试述近代史学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
6. 试述近代音乐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音乐家。
7. 试述近代绘画艺术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画家。

